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姜德明书话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想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儿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撷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未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年7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 红星佚史 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年4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骧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姜德明书话

第一辑 鲁迅之什

《女人与面包》

这是一本装帧十分粗俗的书，就像旧社会马路电线杆子上贴的卖野药的广告一样，用一种蓝颜色，拙劣地画了一些怪体的美术字，但它在旧书店的破书堆中却吸引了我。

我被这书名吸引了——《阿Q及其他》，还有那封面上的“滑稽电影”几个字。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力工。版权页上标明：1932年4月北平文化学社和东华书店代理发行。我见到有关鲁迅的书从不放过，还是买了下来。

回到家里随便翻翻，知道书中共收五部电影脚本，前边还有一篇《影片制法摘要》，介绍了一些电影术语之类。五部电影的次序是：《楔片》（有声）、《阿Q》（无声）、《傀儡》（无声）、《残忍之鹰》（炭画）、《钟馗与钟妹》（钢笔画）。后面两种实际是动画片脚本。全书以《阿Q》篇幅最大，用以作书名。我又发现在《阿Q》页码的边线上还印有《女人与面包》字样，立刻让我想起鲁迅先生致王乔南的信，其中不就提到《女人与面包》吗？

1930年10月5日，在北平的一位叫王乔南的写信给鲁迅先生，询问准备把《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剧本的事。同月13日鲁迅复信给他，明白地表示《阿Q正传》实无改编的必要，“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王乔南接到信后于11月6日又写信给鲁迅先生，并且讲到他已经着手把《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名字叫《女人与面包》，可能还详述了故事梗概，所以鲁迅在同月14日给王乔南的信中说，读了信“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当时作者还向鲁迅提出了准予表演摄制权，鲁迅回答：“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田地。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在我买的署名力工的《阿Q及其他》一书中，在《阿Q》剧本的结尾处，还有作者的一个声明：“此剧由《呐喊》中之《阿Q正传》改编，业经原著者许可，特此致谢。”看来，这位力工大概就是王乔南了。

为了找到根据，我去翻检1936年3月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在第22页上果然有王乔南的一个条目，他的笔名正好是力工。因此，今后在注释《鲁迅全集》时，即可注明力工是王乔南的笔名，他改编的《阿Q正传》是成功了的，而且还出版了单行本，不过改《女人与面包》原名为《阿Q》，至于是否拍成电影，恐怕回答是否定的。

关于改编者的态度，笔者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见到王乔南致周作人的一封信，时在1930年10月1日，即他写给鲁迅第一封信的第三天，其中也谈到他为什么要动手改编《阿Q正传》，估计在给鲁迅的信中也是这样谈的，今摘录一段：

去年我就有这个动机，曾以我的意见，说给一位影剧导演者。那位导演者很郑重的对我说：“现在一般观众，没有同情于工农的，且让剧中人长上辫子，那也实在难看。你若编制剧本，很偏重女角的片子，那才时髦，才能多多赚钱。”我回家一想，国产片子，所以没有艺术的产品大概都因“想时髦”，“想多多赚钱”的缘故吧？我不但不听他的话，反而有编制这篇《阿Q趣史》之决心。……有人说现在已是“阿Q死去了”的时代，但我

睁眼一看，各处仍然充满了这个灰色可怜的阿Q，我总想另给他一点生命，驱他到银幕上

去。……（原件藏鲁迅博物馆）

大体说来，改编者的动机还是严肃的。又因为本片是无声的，开首出现的字幕亦可以说明改编者的心思，那上面说：“人生最大的隐痛，莫过于内心之菌，如吃人的礼教，吸入膏血的资产阶级及其保护者是也。故欲除此痛苦，当先杀其菌，若以按摩符咒而医痼疾，讵能根本治疗耶？”从改编本来看，阿Q终于被处死，而且行刑前在野外的两棵大树下让他跪下，阿Q还不肯跪，士兵们用枪戳他的腿，阿Q才被迫跪下来。这基本上是忠实于原著的。然而，真正理解《阿Q正传》亦难，自从这部小说诞生以来，评家纷纭，何况搬上影幕？鲁迅先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尽管王乔南作了很大的努力，他还是摆脱不掉“女人”、“趣史”、“滑稽电影”这些趣味。诚如那位影剧导演事先对改编者说的，为了这本书的销行，在书脊和封面上，改编者也只好挂出“滑稽电影”这个招牌！这恰恰是鲁迅先生所反对的。

《女人与面包》终归是《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的第一个本子，而且鲁迅先生事先知道改编者的意图，表示同意，事后还见到了这本书。证据是：在鲁迅博物馆保存的鲁迅先生的藏书中有这本书，扉页上还有王乔南的题字：“请转呈鲁迅先生教正，著者敬恳。”

阿 Q 是个胖子？

鲁迅笔下的阿 Q 典型，自问世以来即争论不已，至今未停。阿 Q 究竟长得什么样，画家们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丰子恺、丁聪、程十发等都画过《阿 Q 正传》，近来北京又拍卖了一本 1937 年 7 月上海出版的叶浅予画的《阿 Q 正传》，一向不为人知，幸为同胞所得。画家蒋兆和久有创作阿 Q 之意，那时他生活在上海，原想当面求教鲁迅后再动手，不料先生病逝。稍后他移居北京，画了一幅水墨的阿 Q 像，似乎比别人的画传影响更大些。

1939 年底，周作人看了蒋兆和画的阿 Q，有感而作《关于阿 Q》，载于 1940 年 3 月号的《中国文艺》，开头便说：“阿 Q 近来也阔气起来了，居然得到画家给他画像”。他提到了丰子恺和蒋兆和，不怎么喜欢丰先生的漫画阿 Q：“这回所见，虽然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也总不见得好。阿 Q 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够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本来评论画家的创作，包括评论鲁迅原作，不管是否得当，都是可以讨论的，想不到周作人竟以知情人和权威自居，连起码的文学常识也不顾地说起胡话来。他不把阿 Q 当作小说创作里的人物，强调“我在三十年前曾经认识真阿 Q”；即绍兴姓谢的阿桂。为此还专门查出 1915 年自己的日记，印证是什么时候与阿桂相识的，据以回忆了几件阿桂的事。得出的结论是，蒋兆和把阿 Q 画得太瘦了：“在有些场面，特别是无赖胡扯的时候，阿 Q 如是那么瘦便有点不相称的，实际上阿 Q 本人也还比较的胖。”那么，画家把阿 Q 画成个胖子就对了么！想想实在荒唐。

当然，抛开周作人在这里的胡闹，如果光是听他讲生活里的阿桂，如何给鲁迅创作阿 Q 带来某些影响，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别人也无法提供这些材料。

蒋兆和看了知堂的评论，当然不以为然，似乎也看出作者的言外之意，他紧跟着在下一期 4 月号的《中国文艺》上发表了《阿桂与阿 Q》。文章一开头便带有反讽的意味说：“近来阿 Q 真的走运了；本来像他那样的人，已经是过渡的人物，他的事又似乎为君子所不齿，偏偏现在各刊物中又拿他来当作好的材料，这岂不是阿 Q 又走运了么？”他指出知堂的回忆是想讲阿桂“不无好意”，“至于《阿 Q 正传》中的事情，还说明白了都是他弟兄们的行为，似乎与阿桂并不相干，阿桂也就仅仅是知堂老人所知道的一个阿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鲁迅先生偏偏要写出那样一个阿 Q 来……”蒋兆和道出了知堂的真正目的，好像在说鲁迅把阿桂写歪了，“知堂老人这些证明，也不过是为了阿 Q 辩护，然而也实在抱了莫大的苦心；因为人之常情，父母是希望有一个成器的儿子，国家希望有优秀的人民，纵然有了阿 Q 类似的人物，我们可不以正眼去看他，况且君子是要隐恶扬善的，何况国家社会有了如此一个败类，更当得在可能范围中来粉饰一下，这确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对于国家社会的苦心爱护，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感想。”我佩服画家置知堂对他说的那么好话于不顾，敢于戳穿这位名人的借题发挥，意在歪曲鲁迅创作阿 Q 的意义。话说到了点子上。画家鲜明地表示：“阿桂与阿 Q，我们始终不能合而为一，因为阿桂是事实中的人物，阿 Q 是社会大众一个抽象的典型，也就是作者创造的人物。”这样的理论难道还要画家来给他补课吗？周作人的失态和离题有点费解，也许一沾鲁迅，他就头脑不清了吧。

每位画家笔下的阿 Q，都是画家读了鲁迅作品后的个人感受，一定会各有所重。蒋兆和说：“虽然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大著，实际上还是我自己对于阿 Q 有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特别画他形容憔悴，垂头丧气，可是两手握着拳头，是必要挽回精神胜利的态度。”这应该得到论家的理解和尊重。蒋兆和本来可以根据想象来作画，他觉得那样还不够，因此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相近的模特儿。有一次，他在朝阳门外发现一个进城的乡下人，神态郁闷，面色焦黄，一了解，恰好此人当过农工，睡过破庙，画家的创作冲动来了，终于借他画出了阿 Q。

为阿 Q 画像不是件举手可得的事。鲁迅早就提出过警告，弄不好会把阿 Q 变成了“滑稽”。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的英译本《阿 Q 正传》，书面外封绘有赤足、小辫的阿 Q，正坐在那儿吃旱烟，据说是位德国人画的。作家章依萍介绍，鲁迅先生看后笑着说：“阿 Q 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可见光是形似不行，还得画出人物的性格和灵魂。鲁迅在《寄 戏 周刊编者信》中说过：“我的意见，以为阿 Q 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按鲁迅的要求，蒋兆和笔下的阿 Q 狡猾不足，宽厚有余，仍然缺少人物的某些心理动态。

阿 Q 也是我们文学殿堂里一个永久的形象，今后还会有画家来再作尝试。我相信不会有人按周作人的要求，把阿 Q 画成个胖子！知堂老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作聪明，只能留给后人一个笑柄而已。

鲁迅与“国文学会”

从旧书肆买到了两本旧杂志——《国文学会丛刊》，发现鲁迅还参加过“国文学会”这个团体，这使我非常高兴。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1902年创立。辛亥革命以后，改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据有关书刊的记载，鲁迅先生是1920年8月进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的。

从《鲁迅日记》上看，这一年8月26日起鲁迅开始接到高师的来信，9月里又连续接得来信五封。9、10两个月他复信各一封。这些在日记里都有记载，估计是联系授课事宜吧。依我看，这还不能算入校教书的时间。编撰鲁迅先生年谱或传记者，似乎可以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即1921年1月12日：“午后往高师讲。”三天后（1月15日）又载：“午后寄高师校信并名簿。”此后便频繁地记录了到高师讲课的事。如果头年8月已进校授课，为何日记中无记载？

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成立了国文学会，并出版了《国文学会丛刊》。据“发刊词”说1916年始设国文部，1917年创立国文学会。鲁迅先生支持这个刊物出版，还参加了国文学会。可惜在鲁迅先生的年谱和传记资料里迄未提及。1922年的《鲁迅日记》至今遗落人间，鲁迅先生这一年的活动殊少记载，如今能够补充一点空白当然可喜。

《国文学会丛刊》是1922年11月出版的。第1卷第1期上登有本刊鸣谢捐款名单，其中有周树人先生捐款五元。捐款名单中还有钱玄同、马幼渔、朱希祖、黎锦熙等人。这期刊物上又刊登了国文学会的会员录，其中教员16人，依次为：朱希祖、汪怡、沈兼士、吴梅、吴虞、周树人、高步瀛、马裕藻、陈汉章、章铤、单石庵、杨树达、刘文典、刘毓盘、黎锦熙、钱玄同。第2期《国文学会丛刊》上又有王易、沈尹默、徐祖正、张凤举、张尔田等参加。此外便是学生入会的名单。

根据《丛刊》第2期所载该会简章第14条规定，国文学会是“以研究文学，整理国故，讨论国文教法为宗旨”。会员由毕业、肄业同学及国文系教职员组成。“五四”以后，学校民主气氛浓厚，这种师生一起组织学会研讨问题的空气大开，国文学会是否首创我不敢说，但可以肯定这是较早的一个研究文学的社团。

国文学会的会员每年要交现洋一元，《国文学会丛刊》每年发行两期，定于3月、10月出版。可是第2期的《国文学会丛刊》是在距第1期出版后的两年多才出版的，即1924年1月方始出版，学校已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封面题字似出自钱玄同的手笔。这个会刊仅仅出版了两期便结束了。

《丛刊》第1期载有杨遇夫（即杨树达）的《古书疑义举例补》、吴虞的《墨子的劳农主义》、黎锦熙的《国语中基本语词的统计研究》、汪震的《大学之哲学的研究》、胡适的讲演《研究国故之方法》和刘师培的《古书疑义举要补》等。

《丛刊》第2期载有马叙伦的《六书之商榷》、梁漱溟的《评谢著阳明学派》、杨树达的《读盐铁论札记》、徐祖正的《文艺复兴之意义》、梁启超的《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等。鲁迅先生没有给刊物写文章。

1981年1月

两把短刀

鲁迅先生住在北京“老虎尾巴”的时候，在他的卧榻底下藏有两把短刀。后来，这两把短刀被许广平强行“缴械”了。

1976年10月，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一本《中日故迹纪行》，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实。书内收有一篇《仙台与短刀——广濑川畔的鲁迅》。他判断有一把短刀是鲁迅在仙台的邻居、一位武士送给他的。竹内实先生在1968年还写过一篇《关于鲁迅的短刀》，联想秋瑾在日本曾经照过一张手持短刀的相片，猜想那把短刀可能是鲁迅借给秋瑾的。为此，他还专门访问了鲁迅在仙台的故居。那里原是仙台藩士族佐藤喜东洽氏的住宅，当年屋主人还照顾过鲁迅的生活。竹内实先生仔细地问过佐藤家的后人，都肯定老人有过不少刀剑，还出售过借以贴补生计，也曾赠送过朋友。因此竹内实以为鲁迅的短刀很可能是佐藤喜东洽氏所赠。

日本朋友如此重视追索鲁迅短刀的来历，想是作为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段史话来研究，精神可感。

关于这两把短刀的事，见于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一书。书中说：“鲁迅有两把短刀，一把短些，两边有刃，作短剑形，装有黄漆的木头短柄，有黄漆木套，是在日本留学未久，因为觉得样子有趣买来的……一把长些……鲁迅说，这一把刀是日本一个老武士送给他的。”这位武士或许就是佐藤喜东洽。鲁迅把这两把短刀带回国内，又带到了北京。

当年孙伏园在“老虎尾巴”里作客，也曾经见过鲁迅的短刀，他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说：“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什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坚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鲁迅跟孙伏园讲的这些话，也许还同别人说过，有好奇的人就传开了，竟有一个同乡散布鲁迅悲观厌世，想用刀自杀。

流言也传到了许广平的耳边，她似乎认起真来，于是“在某一天，我顽皮地搜索书架和床褥，果然发现两把刀。或者正确地说，是两把匕首。我实行‘缴械’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刀是防外来不测的，哪里是要自杀’。我把他同乡的话反问他，先生大笑起来……”（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在爱侣的眼中，这两把匕首已经成为可疑和多余之物，连鲁迅先生也未曾料到，这两把短刀竟成为许广平女士感情上的一种牵挂。1925年6月1日，许广平满怀深情地写信给鲁迅：

“褥子下明晃晃的小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两地书》，“小鬼”指许广平。）

第二天，鲁迅回信说：“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当鲁迅先生被逼“缴械”的时候，心内该激荡起怎样一种温暖的感情呢？

《痴华鬘》和《百喻经》

现在要想找一本王品青校点、鲁迅作序的《痴华鬘》，也不容易了。这是北新书局于1926年5月出版的一册线装书，用蓝泥精印，天地宽阔，又加上疑古玄同的题签，典雅极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合为一集，也可以说这是《百喻经》的另一印本。鲁迅在本书《题记》中说：“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又说：“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鲁迅把这部书作为佛教文学来看，虽说都是佛家的寓言，但“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百喻经》原名为《百句譬喻经》。作者是印度的一个名叫伽斯那的和尚。南北朝时，有一个到中国来传教的印度僧人求那毗地，第一次把它译成汉文，至少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了。最先发现《百喻经》价值的还是鲁迅先生。1914年7月29日的《鲁迅日记》里记载：“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五十元，拟刻《百喻经》。”他根据何本就不详了。10月7日又记载：“午后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十元。”到了第二年1月11日便记载：“《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三十册。”当时只刻印了一百部。

鲁迅深爱这部古代印度的佛教寓言，他出资刻印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今人以启发和教益，他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译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百喻经》正是一部充满了哲理的书，语言精炼古朴，故事多从生活中来，用现代语言来说，它的“可读性”很强。鲁迅认识到古代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他刻印本书也是借鉴外国古籍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百喻经》中的寓言，有的很幽默，有的还有情节，篇幅也有长有短，以短为主。例如《伎儿作乐喻》全文只有四十个字：“譬如伎儿王前作乐，王许千钱。后从王索，王不与之。王语之言：汝向作乐，空乐我耳。我与汝钱，亦乐汝耳。”一个狡猾的国王绘声绘色地出现了。

鲁迅捐资刻版的《百喻经》原版共三十块，两面刻字，上面涂有灰色香墨。解放后仍完好地保存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这所1865年开办的金陵刻经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年都要利用原版为读者加印二三百部。得到此书者也乐于翻读书后附录的这段话：“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〇八十一，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经过十年浩劫未知原版安在乎？

鲁迅为王品青校点的《痴华鬘》写序言，时在1926年5月12日，是在他刻印《百喻经》的十多年以后。当年他不曾为刻印此书多说些什么，因此这篇序言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关于王品青，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在北京孔德学校教书。由于肺病，长期忧郁，曾经从医院楼上跳下。有人说他因病而疯，竟至跳楼。后来被人送回河南故乡，1926年10月亡故。此外，在鲁迅写完序言的十几天以后，《痴华鬘》便装订成书，出版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证据是在6月1日的《鲁迅日记》上记载着：“寄赠马珏小姐《痴华鬘》一本。”

至于《百喻经》为什么又叫《痴华鬘》，书中为什么又只见题记不见故事？去年张友鸾先生告诉读者，他怀疑《痴华鬘》为《幽曜经》（卷二十四）所载，那里面有一个痴公主要取水泡做花鬘的故事。这位任性的公主很喜欢

看雨水落在地上出现的水泡，非要国王命令工匠用水泡为她编成一个花鬟不可，否则工匠将被处死。一个聪明的老匠人应命，但声言不能识别水泡的美丑，请公主捞起水泡他再来编。那公主在雨中捞了一天，一个水泡也没有捞起，只好罢休。因此，张先生以为“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花鬟》竟”中的“造作”二字，实为编选者的自况，说编选此书也如编水泡花鬟一样，未免徒劳。

那么书中为什么又不见《痴华鬟》的故事呢？张先生以为可能是漏刻了，因为明明说“百喻”，现在却只存九十八则寓言，或者《痴华鬟》正是所缺的两则中的一个。

三十多年前，冯雪峰同志用白话编写了一本《百喻经故事》，1949年2月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作者在复述和演绎这些故事时，不可避免地赋予了时代性。例如他把上卷中的《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改名《狗和树》，用淡淡的笔墨，演绎得好似一幅意境隽永的图画。书前收有魏金枝写于1948年鲁迅忌日的一篇序，他说：“消去块垒，而归于平淡，原是他（指雪峰）近年来的心境，不料他在文字上也都做到了，那也是很可喜的。”又说：“寓言原是人民共同经验的结晶，也是他们用以观照真理的镜子。”这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那么喜爱《痴华鬟》。

1978年3月

鲁迅与尚钺的《斧背》

1926年，鲁迅先生在北平编的“乌合丛书”是专收创作的一套丛书。除了鲁迅的《呐喊》等，还有许钦文的《故乡》，以及冯沅君、高长虹、向培良的书，均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还有尚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斧背》，已经由鲁迅先生编进了丛书，却为作者硬性索回。直到1928年5月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抹去“乌合丛书”之名，挂上“狂飙丛书第二第七种”的标记。尽管如此，鲁迅付出的劳动却是永在的。

关于本书的来龙去脉，鲁迅于1926年11月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有所涉及。先是鲁迅说高长虹狂妄地夸大自己对《莽原》的贡献，同时讲到了《斧背》的作者突然收回原稿：“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这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鲁迅同青年作家交往中，也有一些颇不愉快的事，不过他往往不乐意向人念叨而已。

“狂飙”的高长虹、向培良先是从鲁迅那里得到过支持，转而大肆攻击培养和帮助过他们的鲁迅先生。青年时期的尚钺既然属于这个社团中人，为了行动一致，索回《斧背》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环绕着《斧背》有这样一段故事，倒引起我很想看看《斧背》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

鲁迅先生以为尚钺是莽原社三位“中坚的小说作者”中的一个，认为他的创作态度还是比较严肃的。这本《斧背》共收小说19篇，可以说是专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作者关心农村妇女们的命运，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礼教怎样残酷地迫害妇女，如《冲喜》、《节孝牌坊》、《假扮的客人》、《婢女》等便是。此外，《子与父》反映了被城市所抛弃和歧视的农民们的绝望；《丁王大爷》等又描画出内地乡村的风物和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总的说，在反映农村题材的早期小说中，《斧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相隔十年左右，鲁迅先生于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小说二集时，他并没有忘记选收尚钺的作品。鲁迅从《斧背》中挑了一篇《子与父》，又挑了一篇《谁知道》。后者是从泰东书局出版的尚钺的短篇集《病》中选来的。这本《病》也是狂飙丛书的一种，共收小说16篇。

鲁迅指出：“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鲁迅论析一些作家的创作，往往用语不多却能中的。对于尚钺的评论，亦不例外。肯定的部分先不说，我理解这“器械不良”和“手段生涩”并非全指写作的技巧而言，主要是讲作者搏击旧社会的思想力量还太弱，不能给以致命伤。你看，《子与父》的主人公是绝望地死了，《谁知道》里的主人公，那个诅咒军阀战乱的老妇人，最后不也是绝望而终了！作者不能深刻挖掘造成人物绝望的社会根源，却过多地渲染了人的迷信观念和宿命色彩，当然就减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在《斧背》里，我们

还能看到作者写尚未觉悟的农民的某些不健康的幻想，就更缺少现实意义了。

三十年代末，尚钺在悼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时，坦率地写下当年对人与事观察和判断肤浅、急躁、片面，他说：“先生对我的某些缺点，虽曾给以暗示，忍耐，说服与等待，但因第三者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同着空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默哑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鲁迅回忆录》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想来作者会看到鲁迅先生对《斧背》说的那些鼓励的话，以及指出这本书的不足之处。

尚钺同志后来是一位历史学家，从三十年代起似乎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1981年10月

鲁迅见到了休士

1933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第3期《文学》月刊上，鲁迅发表了一篇《给文学社信》，这是针对当时《文学》的编者傅东华的。

傅东华在《文学》月刊第2期上，以伍实为笔名写了一篇《休士在中国》，攻击鲁迅在七月上旬不去见来华访问的“非名流的黑色皮肤的作家”美国黑人休士，却去欢迎英国的名流萧伯纳，还说鲁迅此举是由于什么“肤色的顾虑”。对于这种恶意中伤，鲁迅不无感慨地说：“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之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

鲁迅在文章里写道：“这次招待休士，并没有接到通知，时间地点，一概不知，如何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略须加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说“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这究竟有否所指呢？

傅东华讽刺鲁迅：“萧翁（指萧伯纳）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鲁迅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鲁迅还揭穿这位伍实先生：“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在这里，鲁迅无情地揭露了上海文坛上某些专门靠造谣和中伤别人来建立自己地位的人。

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去见休士呢？

其实，鲁迅是见到了休士的。所以不明说，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吧。如果伍实正是利用鲁迅这种有口难辩的处境故意来攻击先生，那就更恶劣了。

应该感谢许广平，她在《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一文中，提供了一个重要事实：鲁迅见到了休士。许广平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11月上海出版的“奔流新集之一”《直入》上。许广平说，美国黑人诗人休士来华时，鲁迅虽然没有出席公开招待会，“而实在呢，在大家公开招待之前，鲁迅早已和休士先生接谈过了，不过当时的环境是未便从实说出的……”这件公案终于由她给澄清了。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为了顾全大局，鲁迅先生在写答辩文章时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明讲，这种精神不是也十分感人吗。

鲁迅先生的心胸很宽阔，并不斤斤计较于某些旧事。后来，他对傅东华还是以朋友相待。例如在1935年9月10日的《鲁迅日记》上记载：“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即黄源）来商延医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13日又记载：“往福民医院问傅养浩病。”鲁迅非常关切朋友孩子的病，后来傅东华很感动地说，他去请托鲁迅时，鲁迅“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的医生远道到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傅东华：《悼鲁迅先生》）傅东华对鲁迅先生的感念是真切的。解放以后，当1956年鲁迅墓迁葬虹口公园时，傅东华还写诗纪念鲁迅先生：

奋笔惟先天下忧，微君孺子怎抬头；

横眉卒扫豺狼尽，群犊争来拜乳牛。

休士在他的自传《我一边流浪一边思考》里，谈到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访问，至于是否谈到见过鲁迅，因未见到原书就不得而知了。

附记：日本鲁迅研究家小野田耕三郎先生来信，并附来《我一边流浪一边思考》日译本的有关部分，证明休士在他的这部自传里，果然记述了他在上海访问了鲁迅先生，还有宋庆龄先生。从上海到日本后，休士还因此而受到东京警察局的拘捕和传讯。

1985 年 10 月

闪光的铜板

读《鲁迅日记》，稍有疏忽有些事便不易觉察了。1935年5月9日《鲁迅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读了这条记载，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鲁迅在上海的最后若干年，年年都在日记里记载买茶叶的事，而且一买就是十斤、二十斤，甚至有一次竟买了三十斤（《鲁迅日记》1933年5月24日）。平常家居度日哪有上十斤地买茶叶的？“内山君”，当然是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但是，鲁迅施茶为什么要把茶叶交给内山完造？

其实，这也是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一项小小的合作。最近偶读内山完造的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中译本名《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6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指出这本书的致命缺点是“多说中国的优点”。内山先生长住上海，自以为是个“中国通”。但是，他所见到的中国未必全面。书中有一篇《便茶》，记载了关于施茶的事。原来每年夏季，在内山书店的门前都设立一个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者来饮用。内山说，在炎热的天气里，柏油马路被太阳烫得都起泡了，“半裸体的劳动者的身体上汗油直流，用出平生二倍三倍的气力来拉着，渴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这情形，显然是鲁迅与内山在一起见过或议论过，于是一个人供茶叶，一个人供开水，茶桶便设立起来了。“先投入一大袋的茶叶，然后渣渣地将开水倒了进去。”从此，每逢春天一到，鲁迅先生也就想到要买新茶了。

鲁迅先生一向关心城市底层劳动者——人力车夫的生活。1929年11月8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关于“车夫大闹”的事，近读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其中也有记载。当时新兴的交通工具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发展，人力车夫的腿怎么也赛不过它，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法求生的境地。1929年11月，北京的人力车夫愤怒地上街把电车颠覆了，他们以为摧毁了电车便能够保住生意。结果，得到的却是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有很多车夫被杀害了。据说，他们临死的时候仍激动地喊着朴素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电车！团结万岁！”这次事件，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无限愤慨地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已经为时不远了。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实际是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力车夫们快要起来造反了！

起初，内山完造还得意于来饮茶的那些劳动者“没有国籍相异”，意思是指人们对于日本还不抱什么歧见。后来，他却发现这些来饮茶的人力车夫对于日本并不是没有“相异”的看法。他说：

在我所设置的便茶的桶底，常常发现一二个铜子。起先还总以为是孩子们淘气，误抛进去的，其实是大错了。那原是为不收分文无条件地供给的便茶所拯救了的极渴的劳动者们所献，衷心之所献奉也。

这一个铜子，有时是他们被打被踢，甚至流了鲜血才换得来的。……我不能不向十万人的车夫致其感激之辞。

那些饮了便茶而又不愿承受外国人施舍的人力车夫是爱国的，即使在这小事上也保持了劳动人民的尊严。难怪连内山完造也深深地感动了。当然，掷钱于桶底的人力车夫并不知道书店主人对于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更不会知道这茶叶是鲁迅先生所赠，而且还是先生专门托人从茶区买来的春茶呢！

当我再读到《鲁迅日记》里关于买茶叶的记载时，我便想到先生每得新茶后快步走向内山书店的情景；想到烈日下内山书店门前的那座茶桶，以及茶桶底下扔着的几个铜板，那闪闪发光的铜板……

王孝慈与鲁迅

好多年前，我在琉璃厂旧书肆购得一本线装石印的《闻歌述忆》，无出版年月，著者署名“鸣晦庐主人”。结尾处写有“上卷终”，照说至少还有下卷，却始终没有购得，也许根本就不曾出版过。看了内容，知道这是一位酷爱京戏、剧赏谭鑫培表演艺术的戏迷随笔。全书无标点，记的主要是清末的事。

前几年，我在琉璃厂忽然发现《闻歌述忆》稿本两册，翻阅内容证明为鸣晦庐主人的手稿，其中修改和添补的文字恰与石印本同。书店主人说，稿本原为张次溪所藏，分上下卷，应是《闻歌述忆》的全本，却无石印本的自序。书稿写到谭鑫培的死，想来石印本刊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谭鑫培生于1847年，殁于1917年，活了七十岁。

鸣晦庐主人随着当官的父亲到过河南、广西、江西，民国建立后才落脚故乡北京通县。从这部随笔集里，可以看到谭鑫培在清末的一些艺术活动，以及京剧在当时的盛况。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官场子弟生活之一斑。作者第一次看谭老板的戏，约光绪二十七年，那是谭鑫培第三次到上海演出，已经五十余岁，被人誉为伶界大王。光绪二十九年作者正在北京，看谭老板的戏成了他每天的日程，往往兴奋得头一天便“喜而无寐”。谭到天津演出，他也携仆赶到天津去看戏，不过是为了一出《捉放曹》而已。

由于痴迷谭鑫培的艺术，他终于成为谭老板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情况，在《闻歌述忆》中也有记载。我以前读过四十年代舒湮写的六幕话剧《浪淘沙》，因写庚子前后事，在第三幕中就有谭鑫培出场，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小叫天”的第一人，可以说把京戏高峰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舒湮形容谭“目光炯炯，烟容满面。高瞻阔步，气概非凡”。手中自然少不了胡珠盖的羊脂白玉鼻烟壶，手指上戴着亮晶晶的金钢钻戒。自从谭叫天进入宫廷，成为供奉内庭的御班掌班、慈禧太后的宠儿，在这个京剧演员身上也不免贵族气派，舒湮说他“排场的阔绰，足以傲王侯，超六部，而迈九卿了”。现在读了《闻歌述忆》，当然比《浪淘沙》中的描写更加直接生动了。如作者初进谭府拜访叫天时，原在客厅相候，见面之后又由谭领至内室，“至内院，见上房五间，东西两厢，院落整洁幽静，女仆掀帘，谭肃客入西偏之曲室中。北首坑榻小几，中置陈白毯，明净照人。榻西首一条桌上列一玻璃匣，中有人焉，谭也。盘其辫结，裸胸臂，手持箸方餐。凭一小桌，肴菜咸具，意极闲适而貌若甚自得者。谭曰：‘此泥人张制以赠予者。’后指壁间挂镜，扮武侯像，曰：‘亦名笔也！’……又入内间，招余同莅，指榻上芙蓉盘曰：‘不客气，请试一口。’”说着自己先侧卧着抽起鸦片烟来。时人云，京戏到了谭鑫培时方始完美，这位鸣晦庐主人专为清末的这位大艺术家作了写照。

抗战前的1934、1937年，北京张次溪先后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当时郑振铎、顾颉刚、赵景深都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家重视民族戏曲之一例。《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中收入了《闻歌述忆》，可惜编者张次溪也不知作者真实姓名。

1989年春，我在无锡住了几天，日与黄裳兄相聚，偶然问及鸣晦庐主人何人，黄兄答：“可能是王孝慈。”我想是的，因为王正是通县人。北归后即找出寒斋所藏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因为记得《闻歌述忆》中，

作者述及曾将历年看戏所藏的谭鑫培的戏单装订成册，并广邀友朋题句，其中有袁寒云、杨云史诸名流。在诗集卷五《壮年集》中果然找到《题王孝慈英秀册子》，时在民国二年，即1913年。谭鑫培一名“英秀”，故名“英秀册子”。杨云史说：“王君孝慈，每夕听歌必存其曲目，凡四十日得四十篇，辑为《英秀集》。”据说王孝慈还为谭写了传记，并著有《仙韶余沈》三卷，被友人誉为论杂剧空前之作，因笔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

想不到这位王孝慈与鲁迅辑印中国古代版画亦有关。应该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刊印《十竹斋笺谱》，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孝慈。王孝慈除了喜爱京剧以外，也是一位藏书家，尤珍视古代版画。明崇祯十七年刊本《十竹斋笺谱》留传世间的仅一两部，连鲁迅先生都没见过原本，难得的是王君藏有一部，并慨然借与鲁迅、郑振铎重新翻印。1934年2月9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他“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当时郑振铎曾向鲁迅建议，拟请北京的王孝慈、马隅卿也担任该书的编辑，鲁迅于1934年5月16日回信说——

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

从这封信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尊重原本藏主，不仅待人宽厚，想得极周到，也是尊重文化的一种表现。《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仅仅说王孝慈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也是不知底细，等于不注。

王孝慈喜欢搜集古代版画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一生喜爱艺术当然有关。他在《闻歌迷忆》中谈到，他自小喜爱泥制儿童玩具，“购置年以千计”“弗吝也”，“每展纸描其容度至夜分无倦容”，“稍长则购石印画谱与名人相”。又因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藏《无双谱》等版画古籍也不少，为他后来的搜集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是郑振铎的一大对手，如郑颇重视的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书便为王先得。图近三百余幅的明本《瑞世良英》，也为王购得。郑在王孝慈家见到明刻《程氏墨苑》，不禁雀跃，赞曰：“此书于版刻史、美术史大有关系，国宝也！”在旧书肆上每遇佳本，郑氏虽与王君竞争而“竟不能夺之”。四十年代，郑氏编撰《中国版画史》时回忆：“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病死。”郑振铎还为王孝慈歿后的藏书哀叹，如讲原版《十竹斋笺谱》：“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印制过程延续了七年，到1941年方始完成，而鲁迅、王孝慈两位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

多年来关于王孝慈的史料无人顾及，我求教于史树青先生，他也不知鸣晦庐主人是王孝慈，却查出王原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法政学堂毕业，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秘书，政事堂机要局佾事，国务院秘书厅佾事，授五等嘉禾章。据史先生说，以上抄自民国九年七月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录》一书。看来王孝慈

在北洋政府的官运平常，他多年的积蓄大部都用来收藏古籍版画了，所以落得身后窘迫异常，家人不得不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事。王孝慈故于 1936 年 2 月，鲁迅先生恐怕没有直接同他往来过，1934 年 11 月 8 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发疯的。”话虽不多，却对王君充满了同情。这位被鲁迅誉为“老实人”的王孝慈，生于 1883 年，死时才五十三岁。

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常去的地方是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旧书肆。1912年5月，他到北京后几天便初访此地，头一次便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部《纂喜庐丛书》，共七册。到年底他写书账时共用去一百六十余元；1916年买书用去的钱已达四百九十六元。当年琉璃厂旧书肆的生意尚称兴旺，夏季还有夜市，鲁迅日记中便有夜游琉璃厂并购书的记载。有一次他流连旧书肆，一个下午竟购《秘波小影册子》等书七十余册。这怎能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鲁迅先生当时曾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然而他买起书来还是不怕破费。晚年更自我解嘲道，连土匪都想置办个好点的手枪，这是吃饭的家伙！

那时北京的旧书铺讲究送货上门，还有个人贩书者，俗称“背包袱”的。如1912年10月21日鲁迅日记里记载：“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当时鲁迅住在绍兴会馆，出入会馆的贩书者不在少数。1913年1月4日鲁迅日记又写道：“晚留黎（琉璃——编者注）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检，因以五金买之。”这些“背包袱”的书贩和书铺的小伙计，大多探清了主顾们购书的范围，深知主顾们的脾气和所爱，当然也懂得一些版本知识，甚至可以受主顾之托代为搜集某一门类的书，或者寻找一些难得的善本。我们不知道鲁迅先生联系最多的是哪家书铺，以及那些为他送书人的姓名，但在鲁迅日记里亦曾有记载，如1913年9月19日就有：“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本立堂是光绪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书铺的掌柜姓刘。1916年6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麟墓志》一枚。”这是近于救济的性质了，想来鲁迅以前同他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品行不端被掌柜辞掉了。可能还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凑上门来，鲁迅只好以“不买”对之。第三天又来了一名姓李的：“晚李估来，买造像三种，二元。”由此也可想见当年出入于会馆、宅门的书贾们有何等的频繁。鲁迅先生在《野草》的《死后》里，曾经为他熟悉的这些“背包袱”的小伙计们留下了一幅素描。他以第一人称说，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一个书铺的小伙计走近他：“您好？您死了么？”接下去——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

“那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碍事。”

一个能说会道的书铺小伙计，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卖书也要靠一张灵活的嘴。文中提到的勃古斋，可能是保古斋的化名，因为琉璃厂并无勃古斋的字号。

鲁迅先生自然也结识了一些旧书铺的掌柜，如琉璃厂宏道堂的程掌柜。1913年2月9日鲁迅日记记载：“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

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鲁迅对其经营方针和肯于说实话的作风显然持有好感。宏道堂为河北冀县人程存立于光绪年间开设，清末改由族人程锁成经营，鲁迅结识的程掌柜当是此人。1921年该店又易邢姓经营，后易富晋书社。鲁迅对琉璃厂旧书铺类似程掌柜这样的人印象很深。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写《守常全集 题记》时，忽然又想起当年北京的那些书贾：“他（按指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先生在追怀一位文士和革命先烈时，竟然联想起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们，这是绝妙的一个对比。如今北京的旧书铺几近绝迹了，那种古朴的文化遗风还遗留下多少？年轻的朋友们还能想象得出那些掌柜和聪颖的小伙计们的神采吗？

赵景深与鲁迅

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为了翻译上的问题，鲁迅在《教授杂咏》里曾经嘲讽过赵景深。事后证明赵先生并没有为此而节外生枝，表现得洒脱而宽厚。如今也有翻译家说，赵先生的译笔也是事出有因，不是任意胡撰。

鲁迅与赵景深的交往不多，但赵先生结婚时鲁迅先生曾经应邀赴宴，这可能与李小峰也有关系。1930年4月19日鲁迅日记载：“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在对待鲁迅先生的态度上，赵先生早在二十年代编辑《文学周刊》时，就不止一次地撰文推荐鲁迅的短篇小说，又因赵先生多年来从事古典戏曲、小说研究，他十分推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专门写过论述文章，还发表过鲁迅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实际上又何限于此，在介绍鲁迅作品方面，他至少还做了下述两件事。

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各自推出了活页文选，作为学校的课外辅助读物，也为了满足各方面自学的读者，发行量很大。赵先生负责北新书局《初中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高中部分由姜亮夫教授负责。赵先生在编选和注释中国新文学作品方面，非常重视鲁迅的作品，选收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散文、小说和翻译作品不下二十余篇，如《呐喊 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调子已经唱完》、《雪》、《藤野先生》、《父亲的病》、《鸭的喜剧》、《白光》、《狂人日记》等，详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选的作品全部加了注释。这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件事是关于介绍鲁迅作品的英译方面，这在过去也是不被人们重视的。1948年10月，赵先生编印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呐喊》，全书厚达三百余页，由上海北新书局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丛刊”之一出版。书内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白光》等八篇小说的英译作品。赵先生为书中的英文单词加了五百多条汉文的注释，花费了不少心血，也属于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出书之际已经是蒋政权风雨飘摇之日，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此后未见再版，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赵先生一向不喜欢自我标榜，也从不向人提及这些往事。如果他对鲁迅的批评心存成见，他决不会主动地去做这些平凡的工作了。

《少年鲁迅读本》

《少年鲁迅读本》，作家孙犁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晋察冀山里写成。1946年6月，《教育阵地》社于张家口印行。初版本我没有见过，据说还有吴劳所作的插图六幅。我所收藏的是1949年4月，天津知识书店发行、新儿童社出版的“新少年读物”第一种的第二版。用薄软的土纸印，封面亦朴素，只用两色，保持着简朴的风气。装饰花边是用高粱、玉米、麦穗、稻穗编织而成，围绕着中间的一颗红星，充分显示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在孙犁的作品中，这是很少人提到的一本书。

书名既以“课本”名之，故书内分为十四课，以《家》开始，以《战术》终结。文字精练，选题集中，不乏流畅隽永的句子，如讲鲁迅为了反对旧教育把孩子训练成绵羊似的人，曾经翻译了爱罗先珂等人的童话：“那里面讲说鹰的故事、虎的故事，争自由的故事，不愿居住在牢笼里的故事。”（见《小伙伴》）又介绍鲁迅译的《小约翰》和《桃色的云》：“那上面就说着一个草虫怎样会歌唱，一个青蛙怎样好清洁，一朵花怎样保护了自己的美丽，这些东西多么纯洁，有向上的意志，和环境奋斗着。”（见《私塾》）这些形象的语言，概括得准确而鲜明，很适合孩子们阅读。

这是解放区孩子们看的一本书，自然留下了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域的烙印，如在《科学知识的重要》一课里写道：“问问老师，地雷怎样做，为什么鬼子一走近它，它就发了脾气，连肚皮也气破？”历史是不朽的，人民的生活也是不朽的，如今不会有人感到这已是过时了的话。

我注意到《完全解放了我们》那一课，孙犁摘引了“一个和鲁迅不相识的少年人”写的一首叫《爱情》的诗，诉说了被旧时代牺牲了爱情的人是多么的悲哀！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感。我确信孙犁也有寂寞，过去有，现在还有。鲁迅和孙犁借着这位少年人的控诉，同时也揭开了自己心头的苦闷。

现在，孙犁一个人在孤独地生活着，也时常会思念起善良的妻子，可是我隐隐地又感到：他终于没有享受到爱情的真正滋味。

在《少年鲁迅读本》里，这是作者最动感情的一篇文章。当然，这并没有妨碍他热情地为边区的少年们祝福。1981年初春，我把这本小书送呈孙犁同志题几个字，他在2月22日的灯下写就：“此书虽幼稚浅陋，然可见我青年时期，对鲁迅先生景仰爱慕之深情。”他对鲁迅的感情始终不渝。去年夏天，有位记者去看他，他说过：“我受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对现实的观察，思想感情的表现方式，以及文字语言的表现我是用过功的，尤其是学到了一个作家对时代、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见198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可以这样说，当年作者献给解放区孩子们的这本小书，同时也是献给鲁迅先生的。尽管这不是孙犁的代表作，我却十分珍爱它。

1986年8月

第二辑书边杂话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经引起震动和争论，1923年3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编者胡怀琛（1886—1938）。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未予理睬，看来这并非事出无因。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的《序》，写于1921年1月，申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九年（1920）四月起，到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改字添句。作者当然不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胡适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里如何运用等。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生‘正’我的‘谬’，并不是和我讨论，我又何必加入呢，况且先生并不许我自己辩白。”胡适又抓住对方说的“我现在的主张，不是主张旧诗，也不是主张新诗，是主张另一种诗”，因反击道：“先生既不是主张新诗，既是主张‘另一种诗’，怪不得先生完全不懂我的‘新诗’了。以后我们尽可以各人实行自己的‘主张’，我做我的‘新诗’，先生做先生的‘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的‘另一种诗’，这是最妙的‘最后的解决’。”实际上从一开始讨论，胡适便把对方作为“守旧的批评家”来看待。《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虽然也留有历史资料，严格地说并非真正的诗歌批评，只能供研究新诗格律问题的人参考，它之不被史家所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场讨论还有一段余波，1924年3月，胡怀琛又在上海晓星书局出

版了一本《诗学讨论集》，继续与郭沫若、刘大白、吴芳吉等人讨论有关新诗的音韵等问题。书中收有他的一篇《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断定胡适的新诗有两大缺点：“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二，纤巧。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又有一位他的学生王庚，作了一篇《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的结果到底怎样？》，他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指出尽管赞成胡适主张的人数居多，但胡适“完全处于失败的地位；怀琛先生是完全对的。”这当然是一篇感情用事的文章。

所幸的这两位姓胡的安徽同乡，并没有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反目结怨。1926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怀琛诗歌丛稿》一书，书前有胡适应作者之邀而写的题词手迹——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小诗一章，寄尘先生索书。

适

胡怀琛号“寄尘”，他也作了答诗：“尘世原如梦，谁非梦里人。梦中还说梦，非梦也非真。”两人的诗似乎都话中有话，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新诗到底顺应时代的潮流进步、发展了。胡怀琛为了参加这场讨论，也试作了不少新诗，其中不乏清新可喜之作，后来他还检讨了当年对新诗怀疑的不妥。

《卷耳讨论集》

新诗诞生以来，以白话翻译《诗经》者不知有多少。1923年8月，郭沫若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卷耳集》，这是他较早的一次尝试。他不想被历代注释《诗经》的各种旧解所束缚，期望人们能从原作中直接感受古诗的美，为此他把一切传统的注解都放在了一边，宁可作直观的解释。

唐弢在他的《晦庵书话》中说：“《卷耳集》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称赞之者，诋毁之者，遍及书报杂志，群众图书公司曾为辑成一集，曰《卷耳讨论集》，今已绝版。”寒斋藏有此书，1925年6月出版。不过唐先生误记了，该书不是由群众图书公司出版，而是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印行，编者是作家曹聚仁。该书的封面右上方标有“一角丛书之二”的字样，看来比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印行的“一角丛书”要早。我还藏有“一角丛书之一”《相对论》，1925年6月出版，是爱因斯坦原著，编译者佚名，校订者之一是曹聚仁。梁溪图书馆为发行“一角丛书”发表了启事，说出版此丛书主要鉴于学术界太贫乏了，“想替学术界效些微力”。

《卷耳讨论集》卷首有编者曹聚仁的一篇《引言》，原文称——

余董理《诗经》，又读《卷耳》一诗，旧日纠纷，都来眼底，爰检三年前友朋讨论之文而阅之，觉昔日之悬案至今犹未决也！余之愚见，将于《诗经集解》中详之，诚恐海内贤哲有所讨论，乃辑旧日论文都为一册以备参证焉！

曹聚仁四月十五日

郭沫若《卷耳集》收所译《诗经·国风》四十首；《卷耳讨论集》仅收《卷耳》的原文及郭的译作，此外收入俞平伯、曹聚仁、郭沫若的讨论文章各两篇（其中有的是以柬代文），还有施蛰存、胡适、蒋钟泽、小民的论文各一篇。全书不过五十余页，是名副其实的一本小册子。

郭沫若译《卷耳》为白话，本不想纠缠各家的见解，然而他却无法拒绝别人对他提出异议和商榷，因此这场讨论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一旦讨论起来，意见纷呈，又不只是针对郭氏一人了。比如施蛰存既不完全同意于郭，也对俞平伯、曹聚仁有不同的看法。施与曹的见解恰好相反，施以为《卷耳》并非思妇自述之作，而是征夫行旅时的悲歌。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把《卷耳》也试译成新诗。他与郭译不同，郭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如果比较着来读很有趣味。现在看来，七十年前的这场讨论虽然也涉及对原作思想内容的理解，但主要还是限于对词义的不同理解，一时也难以得出共同的结论。

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之下，既然主流是反对古文，那么全盘否定传统文学的绝对化的观点也很自然地出现了。郭沫若《诗经》今译的诞生，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并冷静地考虑如何继承我国古典文学遗产问题，也是我国早期新诗运动中一个小插曲。

陆镜若与《社会钟》

提起春柳社，人们都熟悉李叔同和欧阳予倩，其实无论是在东京时期还是上海时期，陆镜若（1885—1915）都是一位更加活跃的骨干分子，可惜正当三十岁便病逝上海了。读过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的读者，当可从书前的画页里见到陆君的便装留影和剧照，正如欧阳先生所赞，确是一位“漂亮的少年”。欧阳先生在书中还描述了他俩在东京常磐馆后台的初见：“我看见他长身玉立，那温和诚恳的态度，和那锐敏而神秘的眼神，在人面前和人说话的时候，叫人不可思议的就会和他亲近”。莫怪陆在东京倾倒了不少日本少女，回到上海又风靡了那么多喜欢他的观众。一个演员的魅力是最宝贵的，陆君珍惜艺术，作风正派，从未陷入女性观众的包围。

陆镜若常州人，父亲陆尔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的主任。他参加春柳社的时候，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读书。欧阳予倩说：“我们里头只有他研究过戏剧文学。”还称他是当时话剧的唯一通才，能编能译能导能演，又有组织能力，春柳社并无首领，实际行政管理也都由他承担。当年他们演出的外国剧本，如法国萨都的《杜司克》等，即由陆根据日本翻译，改名为《热泪》。1911年秋，他辞去上海都督府的秘书，组织了一个新剧同志会，欧阳予倩亦应邀从外省赶来参加，并与陆在三马路的大舞台合演了陆编剧的《家庭恩怨记》，以及陆翻译的《社会钟》。讲到陆的舞台艺术，欧阳先生说：“他那真挚动人的地方殊不可及。我自投身剧界以来，再没有遇见谁演小生有他那样雍容华贵，而肝胆照人的。论起他到底素养不同。他在台上可以说一点俗气没有，一点过份的地方没有，这是多么难得啊！”当然，现在我们只能从前人的回忆里来领略陆在舞台上的风采了，而他所创作和翻译的剧本更难见到。因为尽管春柳社的文化素质高，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文学剧本，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剧目还是仅有幕表而无脚本，虽然那幕表比一般的都要详细。根据资料，陆镜若除执笔上述两剧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剧本，易卜生的《赫达·格卜拉》，以及莫里哀的两个喜剧，原本早已失落了。

天才早逝，六十五年前欧阳予倩曾经以如此深沉的语言来怀念这位战友：

他死了，同志会完了。也可以说：同志会完了，他死了！我生命的朋友只有他！我

生平演戏的对手也只有他！

寒斋有幸藏了一本陆镜若的《社会钟》，是民国元年（1912）7月28日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刷，新剧同志会编辑发行的“新剧本之第三”。全书一百零四页，没有译者说明，仅有天笑生的一篇序。至于新剧本之一、之二为何，一共又出版了几种仍待查。《社会钟》原名《云之响》，是日本新派戏作家佐藤红绿的作品。在这之前，陆还翻译了佐藤红绿的另一剧本《潮》，改名《猛回头》。两剧分别利用他两次放暑假回国的时间，于1910年和次年在上海与黄囡囡、王钟声等合作搬上了舞台。《社会钟》写一农民仅因偷了人家一瓶牛奶而终身被诬为贼，害得一家人最后惨死。剧本的故事情节受了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影响；农民的儿子石大被逼到绝路，烧了庙里的钟楼，杀了弟弟石二、妹妹秋兰后自杀，又明显地带有日本民族的色彩，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可是观众仍然接受了它。欧阳予倩说：“这个戏在当时表现着一种萌芽的社会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时期，这个戏也还

是能引起一些观者的共鸣。”（见欧阳予倩《回忆春柳》）欧阳予倩在《社会钟》里扮演一位贵族小姐左巧官，因辞退、逼走了秋兰，而被观众看作一个坏女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中国早期话剧选》，书中收有陆镜若的《家庭恩怨记》和《社会钟》。可惜前者并非原本，只是当年演出过此剧的演员忆述本；后者根据的是1913年《歌场新月》杂志第一、二期刊载的一个并不完备的残本。剧本共七幕，这里仅刊五幕。第五幕兄妹在松林相见，彼此都还活着，悲剧并未发生却误作终场了，而编者对此竟不曾怀疑，亦未加考证。按原本七幕各有标题，今本五幕中仅有一幕有标题，形式上极不统一，也不规范。作为一本早期话剧的选集，编辑意图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起来难度会很大，整理者的劳动理应令人尊重。但是把一个有头无尾，残缺较多的本子当作完整的剧本介绍，不免是个较大的疏漏。由此可见整理新文学史料并非举手可得的事，若有人据此而研究剧本，并写出理论文字，简直不可思议，更何谈科学性和权威性了。

我没有根据自藏本进行过校勘，却愿抄录原书七幕的标题于后，以见其真正的规模。原题是：左元襄家客堂、石大郎家之破茅屋、左家花园、长安寺内之藤棚、松林、观音山之瀑布、长安寺之钟楼。

从事新文学研究要不要寻觅原刊初版本，或有无必要做一点版本的汇校工作，回答怕是肯定的，此又一例证也。

俞平伯编“霜枫丛书”

俞平伯先生逝世了。他的散文、诗和《红楼梦》研究，将是后人乐道的话题。

在俞先生早期的文学活动中，我想起他为霜枫社编辑的一套丛书，名为“霜枫文艺小丛书”，可惜在俞平伯研究资料中未见说明。唐弢在他的《晦庵书话》中介绍过朴社发行的霜枫社的两本书，一是“霜枫之三”、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髭须》；一是叶圣陶、俞平伯的散文合集《剑鞘》，为“霜枫之四”。两书都是1924年11月出版的。早在四十年代唐先生就说：“霜枫社收歇已久，各书甚不易得。”但，唐先生没有提到霜枫之一、二何名，也没有说到这套书是谁编的，共出几种。

“霜枫文艺小丛书”第一辑共出四种，除了唐弢提到的两本外，还有“霜枫之一”俞平伯校点、沈复著《浮生六记》，1924年5月朴社出版。“霜枫之二”是严既澄的旧体诗集《初日楼少作》，1924年11月出版。何以证明这套丛书的编者是俞平伯呢？原来在1924年12月出版的《文学周报》上，有关的书刊广告中有明确记载。此外，严既澄在1932年11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初日楼诗、驻梦词合刊》一书，他在《后记》中说，1921年他编好《初日楼少作》，“平伯兄见而悦之，取厕其所编丛书曰霜枫之中而锲行焉”。据称书出版后，友人郑振铎面告，有人称作者年未三十而命其诗为少作，“不知其老成之作更何在耶？”因而他重印合刊本时便改动了书名。俞平伯曾经为《初日楼少作》写了跋。从俞平伯编的丛书第一辑来看，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了古今中外的作品，名为小丛书，范围却很大。何以只出了第一辑而未能继续下去，现已无法查考。1924年6月30日的《文学周报》上，刊有介绍这套小丛书的四则广告，是否出自编者俞平伯之手，待考。今录出——

《浮生六记》作者是个习幕经商的人，全凭真率的性情和天稟的文才，写成这部反映出身世和心灵的自传。俞平伯先后作序文两篇，就它的本质和艺术加以批评，并钩稽书中事实，编成年表，对于读者尤为便利。

《初日楼少作》月下微吟，灯前浅醉，如想在这境界中寻茜色芳年的残影，大可以读这本小诗集。良金美玉，灼烁明珠，令人爱玩。

《髭须》莫氏这六篇作品，沾有浓烈的肉的气息，而文笔犀利，态度严正，不落猥琐。此从法文原本译出。

《剑鞘》中含二人的论说美文小说札记书评等，俱经抉择，力扫浮滥，作者的才性，作品的风裁，比较观之，颇有兴趣。

我觉得这组广告文字简练、典雅，同俞先生当时的文风比较一致，尤其不尚虚夸，更近先生的风格。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未能及时去请教、核实，现在迟了。

《恋歌》

我藏有一本硬皮精装的新诗选集《恋歌》。编者傅绍光，有序，却无写作年月。36开本，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无版权页。从作者和作品写作时间，以及书的纸张、印刷、装帧来判断，大体出版于二十年代中期。这家书局同时期还出版过周瘦鹃编辑的《紫罗兰》等鸳鸯蝴蝶派的文艺期刊。后来书局改组也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如郭沫若、孟森等人的书。

“五四”初期的诗人，如胡适、刘大白、沈玄庐、俞平伯、康白情、宗白华、徐雉、闻一多、汪静之、胡怀琛、徐玉诺、陆志韦，包括鲁迅、张闻天、郭沫若、应修人、蒋光赤、魏金枝等人都有作品入选。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或不知是什么人用笔名写的新诗，全部没有说明原载何处及发表的年月。这类书近于坊间的盗版书，从版本价值来考虑，意义不大。但，由于岁月久远，流传不广，在有关新诗书目中亦无记载，因之用来了解“五四”初期白话诗的零枝片叶尚可参考，据此论断的话必得查明出处，核实原文才是。

当年我在旧书摊上所以要买它回来，实在是联想起另一本同类的书，涉及了一段新文学的掌故。1920年，钱玄同在北京前门外青云阁后门一家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名叫《情诗三百首》的书，这当然是书商的操作，也有无聊文人的帮忙，属于粗制滥造的盗版书无疑。钱氏大为吃惊的是书里还收了鲁迅的一首新诗，作为“奇事”，他马上报告了鲁迅先生。有趣的是《情诗三百首》和这本《恋歌》里所收鲁迅的诗，都是鲁迅以唐俟笔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他》。当然，《恋歌》并不等于那本《情诗三百首》，因为《恋歌》所收的诗不足百首，而且有的诗还是写于1921年的。《恋歌》步《情诗三百首》的后尘，无非借名人和情诗来赚钱而已。

1926年泰东书局也出版了一本《恋歌》，标明“中国近代恋歌集”，由丁丁、曹雪松合编。这倒是一种正式的出版物。作者增加了梁宗岱、刘梦苇、梁实秋、淦女士（冯沅君）、冯至、卢冀野、徐志摩、王独清、李金发、朱湘等人。编者在序言里特别提到，坊间出版的几部“恋歌”都不怎么样，主要有两个缺点：一是所据报刊有限，只选名人之作；二是外国译诗不应收入。这很可能是指大东书局的版本而言。然而他们所收的诗不过三十几首，还选收两位编者的情诗各一首，又以“中国近代恋歌集”来标榜，更是小题大做，虚张声势，没有强收鲁迅先生的诗则比较明智。

《短篇小说三篇》

人们说到许钦文的第一部小说集，一般都指鲁迅先生编入“乌合丛书”的《故乡》，1926年4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这不能说错，因为作者自己也这么说。但，我却藏有比这更早的一本《短篇小说三篇》，书面无装饰，仅有50余页，由《晨报》代印，显系作者自费印行。书的扉页上说明：“1925年4月出版——有版权。卖洋两角。函购处——北京宣外南半截胡同4号许钦文。”此处正是许氏所居的绍兴会馆。

书内收小说三篇：《吃锅贴》、《美妻》、《与未识者》。首篇写人们对当兵的歧视；次篇写一少妇爱美，无故自杀，并嘱丈夫把她制成标本，供世人观赏；末篇不似小说。作者自称小说材料多来自梦幻，又在《自序》中解释：“我对于很自然的事实，比较的不容易感到兴趣，而其中也有好些事情，在我的一方看来却觉得是很自然的。”

《短篇小说三篇》刊行后，鲁迅先生曾经得到作者送来的赠书10册。1925年4月27日《鲁迅日记》记载：“晚钦文来并赠小说集十本。夜目寒、静农来，即以钦文小说各一本赠之。”鲁迅对许钦文的这三篇小说未必喜欢，稍后他为作者编《故乡》时，并未看中，不曾收入书中。鲁迅先生认为许钦文的小说“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

我得许氏自费印行的《短篇小说三篇》较早，当时就视作稀见的刊本。后来见到作者提及本书的文字，认为水平不高，不过是“学生文艺”。尽管如此，它仍是研究作家早期创作的史料，不失版本价值。看看定价，只用二角，深悔当年错过不少搜访绝版书的大好良机。

濮舜卿

濮舜卿的名字，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实在陌生得可以。这也难怪老作家蹇先艾先生在《也谈“鲁迅和斯诺谈话纪录”》中（载11月13日《大地》），讲到女作家濮舜卿的名字，却忘记她剧作集的书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名为《人间的乐园》，作为“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的第七种于1927年初版，1933年又重印过。书中收了《人间的乐园》（三幕剧）和《爱神的玩偶》（四幕剧），还有一个独幕哑剧《黎明》。

这位女作家爱用神话传说的人物和拟人化的角色出台。比如《人间的乐园》便取自《创世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生活在人间的故事，既富象征意味，又是通俗易懂的，传达出“五四”时代争取自由的呼声：世人宁可赶走上帝也要把“智慧”留下来，追求人间的快乐。《黎明》是写“女权的黑暗时代到光明时代”，出场的人物除女子外，主要是仙女和“礼教魔”、“工厂魔”、“舆论魔”等虚拟的象征角色。最后，还是那位“智慧”女神重新点燃了“自觉”和“女权”的明灯。《爱神的玩偶》全为写实人物，揭示的是“强不爱以为爱”、“有爱而不能爱”的悲剧。1926年濮舜卿写完了这个剧本，当时由上海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电影。当然，这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意识的剧本。此外，濮舜卿还写有讨论妇女问题的剧本《光明之路》，证明她是一位关心妇女运动的女作家，代表了“五四”时代青年们的要求。

1935年，洪深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戏剧集”时，选入濮女士的《人间的乐园》，作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绩之一。

濮舜卿一名俊，在南京东南大学读政治经济，兼学文学。她曾与同时代的剧作家侯曜等人组织过东南剧社，并饰演剧作中的女主角。有趣的是长城影片公司出品的《弃妇》（侯曜编剧），女主人公采兰亦是由她扮演的。

新文学史上瞬息而过的作家颇为不少，想不到竟引起斯诺夫妇的注意，并向鲁迅先生提及。鲁迅先生没有具体回答，也许是因为她以后不曾再发表过什么重要的文学作品吧。

1987年11月

《中原的蛮族》

1947年5月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了姚雪垠的长篇小说《长夜》，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说，本世纪开始的二十年间，不仅河南遍省有土匪，山东、陕西、皖北也如此。“匪荒现象是北中国农村现实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是农村崩溃的产物，反过来又加速和深化农村崩溃。可惜我们的当代学术界，研究历史的和研究社会学的，还没有人通过深入调查，掌握详细资料，写出一部关于土匪的书，也没有写出一部关于红枪会的专著。”（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88页）其实写土匪的书有人写过的，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便出版过一本《中原的蛮族》，正是写河南土匪的。

本书作者署名T·K口述，郑飞卿笔记。作者以游记的形式记述了在豫东的一次探险性的旅行，目的是告诉读者：“人民怎样，土匪怎样，红枪会怎样，联庄会又怎样。……”（见本书《前记》）。作者还拍了一些照片，他找了一个借口，说连同两本日记均被土匪劫去了，所以不能公布，因此书中的村庄名称，土匪的姓名都不能写出。这么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全书共分十三节，如“土匪的生活难”、“土匪的组织”“红枪会的神秘”、“肉票的待遇”、“红会的受训礼”等，可以看到作者调查的用心，可惜稍嫌粗略，难以深入。原来书名叫《匪窟会薮探险记》，开明书店的同人叶圣陶先生以为不好，改名《另一世界》；另一位同人章锡琛又建议用了《中原的蛮族》。钱君匋作封面画，64开本。十分难得的是叶圣陶先生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时在1927年9月26日。

叶先生指出，人们虽然都知道红枪会，但不知“他们的心理与举措又是怎样”；人们虽然都知道土匪，但不知他们“劫掠为生的详细节目是怎样，他们的意念、态度、起居、行动又是怎样”，然而这部书却告诉你这一切。叶先生又说：“这一本书文字是质朴的。但是记叙很明白，因为它的质朴却保存着充分的真实。”叶老的序文自己早已忘记，经我提出先是怀疑，一见之下连连说：“不错，是我写的。”

1982年1月

徐志摩与《卞昆冈》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以后，彼此有过一次有意义的合作，即 1928 年 4 月两人开始在《新月》杂志上连载了合写的五幕话剧《卞昆冈》。同年 7 月新月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剧名像个译著名称，再加上江小鹣设计的封面极似古埃及的人像石雕，不读剧本真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个悲剧。主要人物有三个，卞昆冈是山西云岗乡村雕刻佛像的一名石匠，阿明是他前妻留下的孩子，还有他续娶的寡妇李七妹。阴毒的李七妹再婚后仍与人私通，并被阿明发现，终于设计害死了聪慧善良的阿明。从《卞》剧的主题思想来看，似无多少新意，也不可能寄寓何种深刻的道理，不过诗人还是非常热衷于此剧。当单行本尚未出版的时候，他便参加了《卞》剧的排演事宜，那是由中国戏剧社的王泊生、万籟天等参加演出的。但，由于诗人的出国等原因，此剧未能演成。1928 年 6 月 7 日，徐志摩在赴日本的途中写信给小曼，动员她一定去看王泊生他们的演出，并说：“我对于话剧是有无穷愿望的。”

《新月》杂志上刊有一则关于《卞昆冈》的广告，说明《卞》剧收入单行本时，著者又细心地修改过，与先前发表的“很有不同”，“处处看得出修改的进步”。这对有兴趣研究徐志摩作品的人来说，当然是个有益的提醒。广告中介绍，书中有余上沅的序，徐志摩的跋。可是寒斋的藏本中却不见这个跋，我多年寻找此跋，别人的藏本里亦不见。这篇跋是写了的，可能已经失落。

余上沅事先看过《卞》剧的原稿，他认为“那是大部分志摩执笔的”。故事的大纲则是小曼的，还有在人物对话方面，也是小曼的贡献，因为“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峡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剧本的结构趋于平淡，无起伏，少高潮，人物的面貌含有一种忧郁和神秘的色调。究竟是诗人执笔的剧本，有的对话已近于诗剧的特点，如阿明对奶奶说：“太阳都快没了，那山上起了云，好像几个人骑着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顶帽子，白白的。怎么影儿都还没有哪，怎么回事？”如此对白，在剧本里随处可见。

徐志摩逝世后，当时提倡爱美戏剧的北平小剧院的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再次排演了此剧，似亦未成功。但，三十年代上海龙马影片公司却把《卞》剧搬上了银幕。我保存了一张《卞昆冈》公演时的电影说明书，从片名和影片本身来看，基本上是忠实于原著的。男女主角由王元龙、雪明珠主演，导演也是王元龙。这也是我国早期电影改编文学原著的一个实例，无疑的是一部严肃的文艺片。

如今出版界热衷印行作家的全集、全编，我有意翻检了徐志摩的几种全编和全集，也不见诗人为《卞》剧写的跋。当年《新月》的书籍广告上宣传，有了余上沅的序和徐志摩的跋，等于请读者到“后台”去参观一番。这更引起我寻找这篇跋的兴趣。顺便讲一下，我平时就不太相信有人所强调的全集、全编的那个“全”字。比如在我藏的新月书店印行的小型杂志《声色》创刊号上，有徐志摩的一篇散文《一个诗人》，可是在市上出售的诗人的散文全编或全集中亦未见收入。世上的事若想真正做到名实相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适夷的小说集

楼适夷同志早期写的小说，我见到过四本：

《挣扎》，1928 的 5 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收短篇小说 8 篇。

《病与梦》，1929 年 3 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收小说 3 篇。

《她的彷徨》，1930 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这是一部中篇小说。

《第三时期》，1932 年 6 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收小说 6 篇。

前两本书，作者署名楼建南。

适夷同志的小说，大部分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创作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出版的时候，他还是一个 23 岁的青年。

说明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一者显示他思想的成熟，一者反映了他生活阅历还少，而大革命的失败，又不可避免地在他作品中流露出苦闷、急躁和感伤情绪，这没有什么奇怪。不过尽管形势困难，作品仍充满革命的感情，即以薄薄的一本《病与梦》来说吧，《病》写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和物质生活的贫困；《梦的憧憬》重点是怀念那位“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投身北伐，并在战争中受伤的女青年；《革命的 Y 先生》则以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一个投机分子。郑伯奇为《新文学大系》编选“小说三集”时选入《挣扎》中的《爱兰》，这是一个不幸女子悲剧的一生。爱兰是个年青女子，被少主人引诱失身，等待她的命运是被逐、堕胎和死亡。郑伯奇说“作者的才笔在这里已经露了锋芒”。《挣扎》和《病与梦》是 1934 年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的 149 种文艺书籍中的两种。

不久前偶遇适夷同志，我同他提起《她的彷徨》，他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那时候，是要靠写稿来维持生活呢！”这话是可以理解的，并非全是客气。这部小说的孤女阿毛性格模糊，情节也有点概念化。

我请适夷同志为我的藏书题字，他在《挣扎》扉页上写道：

这是我的第一本短篇集，是阿英同志要我编的，为了他有一个朋友要办一个新书店，

后来那书店没办成，稿子就交给现代书局。内容幼稚杂乱，不值一瞥，见之犹愧也。

另一本《第三时期》思想更加成熟，即使写日本生活，也没有离开革命。其中的《盐场》，更以大革命失败为背景，反映浙江余姚一带盐民的斗争，人物刻画细致，读来动人心魄。适夷同志在我的藏书上题道：

湖风书局是在宣侠父烈士的支持中创办的，有力地支援了‘左联’的工作。阳翰笙

同志向我要稿，编成此集，内容都是我在东京所作。后附《诗人祭》、《断片》二文，是雪峰的作品，他当时嘱我附入，并不要声明是他所作。

一本《第三时期》，有三分之一的篇目是雪峰同志的作品，以前不知道。其实《诗人祭》文尾明明写着“1927 年作于北京”，而适夷同志在 1949 年到北京以前，从来也不曾踏上过北方的土地。奇怪的是，这一点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怀疑。这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由此使我联想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书刊要不要讲究版本学呢？少不得的。

1982 年 10 月

《灯下恋者》

第一次知道东北青年诗人李曼霖名字很早了，只知他有本诗集《高粱叶》，抗战期间牺牲于鸡公山。我一直在旧书店访求这本诗集，至今未果，却意外地访到诗人的另一本诗集《灯下恋者》，1930年4月辽宁亚东印书馆出版。全书仅百页，是本朴素的小书，内分诗剧、小品、长诗、小诗四组。所谓小品，实际是散文诗，小诗只有两三行，长诗并不长，《灯下恋者》即诗剧之一。从诗里看，1929年他20岁，19岁时开始写诗。他的诗既写世情和恋爱，也有反对剥削的呼声，如《雾》里的：“——看！东方红霞呈现了/啊，是否工人压渣之血。”但，空洞的口号更多。他想手执利刃去“杀！杀！杀！”又欲怀装炸药去“破坏，毁灭”，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倒是怀念友人的《寄誓平》等诗富有人情味，也不那么公式化。

最重要的还是设法打听诗人的经历，继续寻找那本《高粱叶》。1983年1月11日，承辽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友人彭定安来函相告：

我前不久去看望了石光同志。他是我院已离休的原党组副书记。曾是北平《东北快报》副刊主编，与李曼霖共事并相熟。他说，当时李曼霖在报社当记者，曾是共产党员，后脱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光同志去武汉，李曼霖去河南鸡公山东北中学教书。当时东北中学原由张学良主办，后来要转为国民党国立中学，遭到学生的反对。国民党接收人员便在学校附近租赁一屋，并挂上了“国立东北中学”的牌子，学生乃起风潮，集合队伍前去砸牌子，李曼霖跟在学生中间，以“彼此都是东北人，应该团结”之类的话劝说学生。斯时国民党的军队来了，为了镇压学生，误将正在学生中的大个子（李曼霖）当作学生领袖，鸣枪射击其腿，受伤未死。但不久即得破伤风死去。

定安兄的调查是有用的，特别是对撰写东北文学史的朋友来说，尽管这位青年诗人仅有两本诗集，影响不大，还是应该有人研究，为他写上几笔。至于《高粱叶》，恐怕难以觅得了。

1984年4月

《红酒》小记

我在旧书店的乱书堆中发现一本线装小书，古色古香的外装，内里却是新文学，收有《离婚》、《红酒》两个独幕剧。1932年6月由北平琉璃厂的宝仁堂书店代理发行。

携书归家，灯下披读，知道本书问世之际作者邓承勋已经逝世半年，故扉页上印有“纪念邓承勋君”字样，并附作者遗像及演出《月亮上升》的剧照。据当时北平左翼剧联的张季纯介绍，邓君死于1931年11月29日，只活了21岁，“《红酒》则是他心血聚成的物品，是他给戏剧祭坛上的奠仪。”（见张季纯《写在 红酒 之前》）邓君少年时在天津读书，后来考入北平艺术大学戏剧系预科，与张季纯同学。这时他参加演出过熊佛西的《喇叭》，外国剧《最后五分钟》、《软体动物》、《伪君子》等，但他并未参加左翼剧联。《红酒》一书为同学们悼念邓君而印，主要在追悼会上发给来宾，仅印500册。版权页上说印了2000册，大概是代理印行的书店为了发行上的便利。这些都是季纯同志信中相告的。

《离婚》写有关男女问题的社会讽刺剧，剧本主题和人物语言都缺少特色，而他死前二十余日刚刚脱稿的《红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个“有时代感的国难剧”。《红酒》的故事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小洋酒店里。作者先反对酒店老板私卖日本酒，又通过两兄弟对抗日的不同态度，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的爱国要求。哥哥留恋女友和酒店，认为打起仗来没有好的领导也是白费。他解释自己不上前线的原因是：“对于目前政府没有一点改善的存心的时候，我更不愿去。”作者通过剧中人的口，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接着，借着弟弟的口喊出了：“你忘记了日本人正对于我们的蹂躏，你忘记了我们家里直接受到日本人的惨毒！你忘记了五卅惨案时我们在济南受的欺侮……”最后哥哥终于抛开女友和酒店，毅然参加了东北义勇军。

《红酒》产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及时反映了人民的抗日情绪，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情。剧本脱稿，作者因肺病住院，遂将原稿托友人交给北平晨报副刊，“可怜！那时候他的家乡（天津）已被暴日驱使便衣队在扰乱着，他卧病医院又何尝知道！”

这感慨当然亦引起今天读者的共鸣。这些情况是豫源执笔的《作者小传》里介绍的。

1962年

《关于丁玲女士》

1933年5月14日，丁玲去上海正风学院开文学座谈会，返回家里即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很快又被秘密押解到南京。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梓年。

消息传出，进步文艺界立即掀起极有声势的营救活动，左联还发表了《为丁玲、潘梓年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人们都关心着丁玲的命运。据称最初是从上海《大美晚报》传出了丁玲被杀害的消息。6月，鲁迅先生就写了《悼丁君》的七言诗，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丁玲被捕以后，北平曾经以最快的速度，即事发后的两个月之内出版了一本关于丁玲的书，即同年7月12日立达书局出版的《关于丁玲女士》，编者张帷夫。这本书编辑潦草，但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事件的影响，而丁玲的被捕正是当局讳莫如深，想极力否认的事。

已故画家王森然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开头便说：“丁玲之死，已成一谜，惊动无数读者，震撼无数青年……”那时很多人都以为丁玲确已牺牲，所以王森然说：“也频、丁玲，统在压迫下生活困苦中呻吟，皆为社会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生之无愧，死也有荣，已尽作家之天职矣。”据王森然自述，他与胡也频、丁玲在北京相识，并一起组织过文艺社团“无须社”。后来他到山东省教育厅任事，并介绍胡也频从上海来济南教书。稍后，丁玲也赶来。但终因丁玲与胡也频的思想左倾不为当地所容，被迫返回上海。

《关于丁玲女士》共分三辑，即：“丁玲的生活”、“丁玲的著作”、“丁玲的被难”。前两辑分别介绍了丁玲的文学简历，引录了当时一些作家对丁玲作品的评价。最后一辑《丁玲的被难》，包括了《丁玲失踪考》、《沈从文对丁玲被捕的前后两个不平之鸣》、《丁玲女士失踪后妇女界的呼救者》、《丁玲失踪后文化界之援助者》等篇。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剪辑而来，内容难免芜杂，甚至有些就是小报制造的谣传。尽管如此，公开这些舆论对政府还是很不利，所以本书一经问世，同年9月即被国民党查禁，罪名是：“普罗文艺”。

《陈案书状汇录》

我在旧书店见到这本来历不明的《陈案书状汇录》，知道与陈独秀被捕有关，因为好奇，价又低廉遂携归。回家仔细翻找，仍无出版单位及出版日期，只能确定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后打官司的记录。这次陈的被捕是在1932年10月16日，一直关到1937年8月27日，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释。全书102页，分6个部分，计：检查官起诉书；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南京《中央日报》论文；章士钊律师答《中央日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依判决书的日期1933年4月26日为据，本书当在这以后出版。莫非这是官方或法院内部印行的资料？想想又不像，因为本书基本上是为陈开脱辩护的。如此搁置十余年，实在没有条件解开疑团。

1980年读到汪原放写的《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方才清楚谜底。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汪原放的叔父汪孟邹创办于1913年，结束于1953年。汪原放为亚东标点的几部古典小说，曾经得到鲁迅的肯定，胡适、钱玄同等人亦给予支持。据汪原放说，陈独秀第5次被捕后，汪孟邹、章士钊都出面进行过营救。章士钊在担任陈的辩护律师时编过一本《陈案书状汇录》，由亚东图书馆排版印行，只印了一百本左右。汪是亚东人，他的话当然可信。看来此书应列入章氏编著书目和年谱，亦应列入亚东的出版书目。寒斋藏有仅印百余册的奇书能不自珍乎。值得注意的是，从1936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亚东图书馆又出版了若干托陈取消派的书，其中的是非则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出版史的课题了。

1982年10月

冰心与《娜拉的出路》

1933年，冰心为一位年轻的女作者林培志的短篇小说集写了一篇序。冰心自告奋勇地为这位作者联系出版地方，选编作品。但是，终究未能出版。直到六年之后的1939年9月，作者才在北京海淀燕京印刷所自费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书名叫《娜拉的出路》，书中共收小说十篇，先后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北平《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过。书内收了冰心当年为她写的序。奇怪的是新收的这十篇小说，没有一篇是当年冰心提到过的。因此严格地说，这篇序不能叫《娜拉的出路》序。

1939年正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的郭绍虞先生，也为《娜拉的出路》写了一篇序。他在序言中提到，冰心序中提到的那些作品，也许比本书中所收的十篇还要好。林培志的小说大多涉及家庭、教育和妇女问题。这也正是冰心所关注的。

林培志在“自序”中说：“记得我每篇文章披露时，冰心师见了，总是真诚地鼓励我多写，因为多练习才会有进步的。她又替我写序，选了我的作品，送去女青年会出版，后来因故未得送去，但我对她那份热心的奖掖，却永远铭感着。”冰心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已关心青年女作者了。这篇序多年来却没有收入冰心的文集。文章不长，今录如后：

我在燕大教书的第一年——1926年便认识林培志，那时她是一个很沉静，很温柔，很文雅的姑娘，课余我们也常有谈话的机会，她的一切，都能得到我的喜爱。

林女士自沈阳事变后开始写作，到如今已有十余篇。我在报纸上看见《■佳》或《宝琴》的作品，便会分外注意，自《舞后》看到《募捐》，觉得林女士的作品，有成书发行之必要了。

她的作品当然有着一切女作家的长处，描写得很细腻，很深刻，注意到家庭里夫妇，主仆以及一切的问题，同时对于青年女子的一切希望，憧憬，烦闷，也能体贴入微，写出时代的叹息与呜咽。此外，林女士如此年轻，笔下也免不了有着一切女作家的短处，不过这种困难是会随着年龄与经验之发展而渐渐消灭的。

我觉得林女士和我的创作经验有点相同，她是从“九一八”后写作的，我是从“五四”后写作的，同是被时代的呼声所唤醒。她和我同是先写份内应交的文章，因而引起自己写作的兴趣。她和我同是先写时代问题的小说……不过我却不希望此后的她像我，因为我十年以来没有进步，这是人所共认的。她应当以我为中途警告“危险”的红灯！

文坛上真是消沉，女作家尤其寂寞！去国的去国，搁笔的搁笔，死的死，失踪的失踪，雨打风吹，所余无几了。对于这欣欣向荣的嫩芽，我觉得自己无能多写作的人，至少有珍护灌溉的责任。我自己的经验是：读者的注意与批评是作者最猛烈的兴奋剂，我便商之于林女士，把这十段短篇交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了。

十一，一，一九三三，海淀，北平。

1989年欣逢冰心老人的90寿辰，当时去她府上拜寿的人很多。我不想再去打扰。稍后，又逢夏衍同志90寿辰，我随众人去了。心想，集体干扰一次，总比分散消耗老人的精力强。为此，我给冰心老人去信问候，说明我前次的失礼，并附去她失落已久的上述序文。我还记得，《娜拉的出路》是我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来的。

冰心老人很快回了我一封信：

德明同志：

您没来我处，而去看了夏老，实得我心！我在五号左右……头疼目晕，您真不必凑

那热闹！夏老脑充血不足，他说整天昏昏沉沉，本来他总是来看我，我是无车阶级，暂时也不能去看他，只好等些日子再说了。

感谢您给我附来我给林培志同志写的序，我这里早已没有了！您知道她是同她燕大的同班赵承信同志结的婚，赵是文藻的学生，学社会人类学，他们的结合，似乎我们也插了一手！他们的三个女儿，也都是我起的名字（“宗”字排行，和我们自己的儿女本来的名字一样），那时我们替我们学生的儿女取名字，都是这样的，如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林耀华的女儿林宗锦等。半个世纪了，真是弹指一挥间。今天刚刚得闲，多聊了几句，有空来玩吧，先通个电话。

祝好 冰心 十、廿一·一九八九

《娜拉的出路》的作者，后来放弃了文学创作。解放后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诚然，一部新文学史也不可能给每一位过来人都留下芳名。但是，冰心为林培志的作品写序的事，总让我难以忘怀。

冯友兰佚文

有件事我时常挂在心上。几年前我在主持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编有“百家丛书”一种，已出十多本。在梁漱溟先生的《勉仁斋读书录》问世后，即与宗璞女士联系，拟出冯友兰先生的一本。她与冯先生商量后愉快地答应了。可惜因环境有变，又加上我已届退休年龄，也不想超期服役了，便拖了下来。后来更无权过问此事。近来有家出版社拟出学人随笔，我力荐他们去找宗璞，果有所成，我的心事也有了着落，觉得分外轻松。我一向认同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有些史家的文笔也不比作家差，更何况史家注重实证，不尚空谈，他们的短章小札总是同智慧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比某些空幻无物的作家随笔要耐看和有益。

日前翻查资料，顺手拿起一本《李峻之遗著》，1933年由清华人自费印行，封面题签者顾颉刚先生，题序者冯友兰先生，作跋者吴晗先生。逝者李君河南南召人，大革命时代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被捕，出狱后于1930年到清华大学史学系，从陈寅恪、蒋廷黻学，1933年病歿于协和医院，年仅25。《遗著》中收李君的《周代西方民族之东殖》、《三恪考》等著译5篇，附钱穆先生的《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文前又有钱氏的长篇说明，实亦纪念李君的文章。我怀疑钱氏文集中未必收录这篇说明。钱氏当时在清华讲东汉史，李君亦是受业的学生，弟子敢于向老师挑战，作《评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师生学术见解有异，但老师赞赏李君“果恂恂诚笃好学之青年也”。《遗著》保留了师生之间的争论文字，体现了高等学府自由的文化空气。至于冯友兰、顾颉刚先生的举动自然也显示了前辈提携后进的精神。因想宗璞女士处未必存有此书，冯序又很短，特抄录如后，顺供世人一览。

凡世之成大功，立大名者，必具非常之才，有非常之志，又必享相当长寿，以成其志，而尽其才。《中庸》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实则非有大德者必得其寿，乃得其寿者始能成大德者。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不假年则欲学而不得，甚矣其言之悲也。李峻之君为余故人黄卓璋先生之女婿，可谓具非常之才，又有非常之志者，而竟早死。其友人集其平日所学为学术论文为此编，余未知其果能传否也；庶几世之爱才者，见此编，知有此早丧之英，与其友朋同声一哭耳。传此编果存，李君亦岂料其竟只以此数文显哉，悲夫！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冯友兰

吴晗的跋较长，写于1933年10月，本书印成当在年底，或下年初，本书之得以编成问世正是吴晗主持的结果。经查近年出版的四卷本《吴晗文集》，未见收录此跋，连张守常教授编制的吴氏著作年表亦无著录。旧存一本残书至少提供了冯、吴二氏的两篇佚文，此亦吾辈喜藏旧书，抱残守阙者的安慰也。

1996年11月

圣旦的《发掘》

“五四”新文学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鲁迅堪称一位开拓者。从他早期创作的《不周山》，到晚年写的《出关》、《起死》等，都闪耀着奇异的光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追随其后的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亦各有结实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丰富了这一创作领域。

三十年代，有位叫圣旦的作家似乎专写历史小说，并在1934年5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发掘》。书中收了5个历史题材的短篇。作者的名字在文坛上很陌生，六十多年来人们也没有闹清他的经历，作家词典里仍是个空白。一部工具书中仅有一行语焉不详的记载：“圣旦，江苏常州人。本姓刘。著有历史小说集《发掘》。”（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卷）。连作家的生卒年月都失记，更无论其他了。

《发掘》中的《新堰》写隋末农民的暴动；《白杨堡》写明末饥民的骚动和士兵的哗变；《突围》写清代白莲教的起义；《诗狱》写清初吕留良的文字狱；《北邙山》写南唐灭亡前君臣的苟安误国。总之，写了被奴役人们的哀音和怒吼，以及那个时代阴云密布，暴风雨袭来前后的广阔历史场景。小说写得紧凑，也有气势，不是浮泛的平庸之作。作者在书中有篇“前记”，没有介绍自己，却为小说的依据作了历史的考证。他坚守现实主义的原则，主要事件几乎都有史证和文字记载，人物的刻画又表达了现代人的爱与憎。没有人会相信作者仅仅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请看作者的自白：“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自然是发掘不尽的，这一点微细的工作，也许可以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场，各要各的见地。或者，历史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书名何以叫《发掘》，我们懂了。作者的理想和自信，以及小说针对的锋芒不也明明白白吗！这篇“前记”写于杭州，也许作者当时就生活在那里。我从《鲁迅日记》里又看到，1935年1月17日，圣旦曾托杨霁云寄赠一册《发掘》给鲁迅先生，至少说明他是心仪鲁迅的。以后是否还有联系，不能肯定。此外，柳亚子读过《发掘》，表示很佩服。曹聚仁与作者有交往，十分推崇《发掘》，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他评价作者的历史小说，“都是用新史观来照明往史的尝试，描写得非常深刻。”（见《如寄录·天马书店》）。曹先生还写了《从发掘说到历史小说》一文（见《笔端》一书），他认为作者在历史知识、文学技巧方面都是有相当修养的，其成功并不偶然，特别是以知识分子说农民的话，说得这样真实，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还藏有圣旦的另一本著作《诗学发凡》，洋洋二十余万言，从来无人提及，那是他继《发掘》之后，于1935年8月在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作者先论诗的演变，次述声韵，最后讲诗的规律。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柳亚子先生为该书作序，称赞他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诗，很有道理，也很需要。曹聚仁作跋，认为《诗学发凡》中为现代青年立论的地方很多。这部书进一步证明了作者在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修养。

1936年9月出版的《光明》第1卷第8期发表了圣旦的《岱山的渔盐民》，这一回不是历史小说，而是报告文学了。岱山是浙江定海县舟山本岛之北的一个岛屿，人口近五万。鱼盐民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日本鬼子又不断地越界侵鱼，官方无力反抗，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凄惨。这年七月，正当渔盐民

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时，官■又来硬性圈地，扼杀人民的生路。人民愤怒了，与官方展开斗争，在暴动中有三十多位弟兄被打死！又有两万多盐民乘船逃生，“岱山，果真死了吗？”现实生活中的图画和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命运何其相似？圣旦写历史，更写现实，实际上他的目光永远在注视着现实。

说来令人惋惜，据曹聚仁说，圣旦的年纪很轻，《发掘》出版的第二年便因病早逝了。那么，《发掘》是他的处女作，《诗学发凡》便是他的遗著了。

白宁的《夜夜集》

从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前的三十年间，究竟出版过多少本线装形式的新诗集，原以为不过三五种而已，现在我不敢肯定了，因为前年我偶然又从旧书店购得一册《夜夜集》。作者白宁，桂林雅典书局代印，1935年8月出版。

按照线装书双面为一页来计码，此书共百余页，分三辑：一是“故里之什”，是作者漂泊十余年后重返桂林而作；二是“流浪之什”，表明他早在1922年便到了北京；三是“情歌之什”；最后还附有一首“数理诗”。作者在序言里说，这本《夜夜集》虽然披着诗的外衣，却是一束文件，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纪录。总的看失意感伤的诗占了绝大篇幅。诗人述说自己的日常生活如在囚屋之内枯坐、徘徊；在《雨》中说“我周遭太像牢狱”；在《血花》里唱道：“青年握血花，彷徨野径边……举目四方望，遍地尽草莽；草莽多蝮蛇，何处是乐乡？”这些都透露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回到故乡，然而故乡也永远是冬天，因此他的诗颇有一些苦味。我们并不了解诗人的经历和真实情况，也不知道他最终是否走出了苦境。只在他写给“曼蒂”的一首诗《忆》中，我们才知道作者又名“尧”。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毛笔签名赠“先艾兄”，我给远在贵州的老作家蹇先艾先生写信求教。他回信说不记得这人和他的书了，又说：“1942年，我任遵义师范校长时，有一白宁，听口音，好像是广西人，曾来该校任音乐教师（系教育厅介绍），思想进步，相当活跃，曾指导学生办墙报，并在墙报上发表诗歌；后来引起了当地国民党专员的注意，聘约未满便离开遵义了，从此就没有他的消息。”这当然还不能肯定这人就是《夜夜集》的作者。

我又从诗集中一首诗的附记里，看到“晨后之琳来札”的字样（1935年6月30日），于是我又根据这唯一的线索致函卞之琳先生请教，很快便接到卞先生的回信：“祝贺你在搜集现代文学稀见书籍中又获难得的新收获，也感谢你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这位诗人白宁，恰好是他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多年来人们都以为这位同学早已故去。卞先生接下去写道——

白宁是他笔名，是我在北大英文系同班同学中最接近的，也曾住过今红楼西边当时北大东斋平房宿舍，一度恰和我住的房子几乎正相对。他的真姓名是秦宗尧，广西人，原是北师大附中的高材生。他常用白宁这个笔名在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大约作、译都有吧），因家境困难，常在外边教中学，最后竟教到他家乡广西去了。当时北大倒很开明，不在乎学生常缺课，只要到学期终、学年终考试及格就行，1933年我们班毕业那年却有个硬性规定，当年军训课一定要到够一定数量（也很有限几次）早操才能到学年终了参加毕业考试。你一定想不到我这个当年文弱学生，居然一学年上操十来次绰乎有余，还胆敢替远在广西的白宁代去排队，听到教官（还记得名字是白雄远）点名点到秦宗尧，我就代应一声“有”，让人家记录了几次就够资格参加毕业考试。那年初夏，日军从冀东和古北口逼进，兵临城下，毕业考试是到暑假后补行，我不记得白宁远道赶回来参加，所以在我们班毕业名单上好像没有秦宗尧名字，让我排在第一。以后逐渐失去联系，我只不知从哪里听说他在家乡病死了。

卞先生的回信就像是一篇忆旧的散文，活现了他当年做学生时的风貌。他始终不记得白宁也写诗，而且竟然出版过一本诗集。他原以为1935年白宁已经死了，想不到那时他还同白宁通过信，其时他正在日本的京都埋首译书。

卞先生急于要读这本诗集，我当然满足了他的愿望。事后他说：“白宁在我们同学时代是非常朴实谦虚的，想不到他也有如他在诗作中表现的才子气。”多年来，我在旧书店苦苦地检索，想不到竟为卞之琳先生寻来一个失去的旧梦，但愿诗人白宁还活着。

诗人方玮德

1935年5月，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病故北平，他是新月派后期诗人——方玮德。

他是徐志摩的学生，看了吴宓悼志摩诗一律，觉得后序中有评价未妥之处，他就起来维护老师，写了一篇质吴宓的宏文《再谈志摩》，洋洋洒洒，纵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实际是在保护新诗，反对吴宓的迷恋旧诗。

方玮德死后，吴宓也有悼诗，其中有句：“忘年为契友，同病许知音。……诗序迟刊就，铨衡识内心。”说明尽管彼此论战，最后还是成了朋友，而且吴宓的诗集序言里，还摘引了方玮德对吴的评语。

闻一多推崇方玮德诗作的标格，他说：“国家的躯体残毁到这样，国家的灵魂又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着。……但是为了绵延那残喘中的灵魂的工作设想，玮德无疑的是合格的一员。”方玮德留给入间的只是数十首小诗，一些信札和若干篇零散的文章。诗人逝世后，陈梦家为他编了一本《玮德诗文集》，1936年3月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陈梦家与方玮德同在南京写诗，他说方玮德在学校是读西洋文学的，“但他幼年受旧学薰陶极深，所以读他的新诗，也多少有些儿家学——桐城古文——轻逸的意致；而其为人，正亦如此。”读方的诗“却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好似隔湖望见湘神，一层雾，一袅烟，似显而隐，欲去不去的缠绵。”但是这也掩不住诗人“在静观纷乱的万有中，隐含无数热情的怀抱”。（见《玮德诗文集》跋）安徽方家是大族，诗人诞生于书香门第，是方苞的后代。女作家方令孺是诗人的姑母，舒芜与诗人是本家弟兄，宗白华又是诗人的表兄，陈梦家以为他受了家学的薰陶，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方玮德的诗大半是爱情诗，但他表面上又不作爱的颂扬，也不写失恋的痛苦。他是一位追求美梦的诗人，也是一位善于编织童话的诗人。他的诗不事铺陈，也很少单纯地描写自然，只是着意捕捉诗的意境，写出“诗的感觉”。可惜他的生活天地狭小，未能走进更广大的世界。

他的爱情诗很美：

姑娘，我昨夜偷偷地徘徊在你的门外
雪上的足痕织成了怯懦的悲哀
今早一阵雪花填满得无踪无影
姑娘，你猜不到我曾在那里徘徊

——《丧裳》

诗人的才华和爱情到底都成了幻影，临终以前他仍然沉醉在童话中，嘱咐人们用红绸铺盖在他的身上；让人停柩法源寺，因为那院里有醉人的丁香花，而他又特别喜爱自己写的一首《丁香花的歌》，生前还专门印来送给朋友。

诗人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朋友们按他的遗嘱照办了，事后还为他编印了一本《玮德纪念专刊》，那上面刊有方令孺、宗白华、闻一多、卞之琳、靳以、陈梦家、林徽因、孙毓棠等作家的诗文。此外，还收有方玮德写给女友的信，被宗白华评为：“真正的文学作品”。

诗人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弃诗而准备攻读南明史了，因此他留存的诗作不多，在中国新诗史的影响不大。但是讲到新月派的后期诗人，还是不应该漏掉他。宗白华先生说，方玮德的诗“不害人不误国”，如果天假以年，他

的成就会更大。方玮德的几十首诗显然不能兴国，但亦绝不会误国。关心中
国新诗史的人无妨了解一下这位寂寞的诗人。

1983 年 7 月

《书评研究》

1989年4月，萧乾重印了《书评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书评面面观》第一辑）。他在代序《未完成的梦》中说，1934至1935年，他忽然对书评感兴趣，恰好他在燕京大学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于是“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1935年7月，他用那篇毕业论文即《书评研究》完成学业以后，即到天津《大公报》去编文艺副刊。利用那块园地，他“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有趣的是，新印本的《书评研究》即附录了他当年在《大公报》经手发表的部分书评。这是他组织的一支书评队伍，如杨刚、常风等都在这本书里重新亮相。萧乾不愧是一名编文艺副刊的老手，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他还在报纸上组织了讨论，设计了“作家谈书评”、“书评家谈书评”、“读者谈书评”等三组文章来扩大影响。这里搜集有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张天翼、艾芜、施蛰存等人的文章，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单枪匹马地编一个大报的文艺副刊，竟然取得如此好成绩，这在今天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事。历史情况尽管不同了，但是当年萧乾那种富有开创性的劳动精神还是令人神往的。如果我们虚心的话，一定可以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

我收藏有《书评研究》的初版本，那是1935年11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出版的。这套小丛书由王云五挂名主编，小三十二开本，一律灰色封面，统一的格式。我的藏书是有作家题字的签名本，似乎先寄到了美国，由受书的友人带回了国内，终于又流散在北京的旧书摊。书上的题字是——

安宅兄：

这书一出版即寄美一册，不知你收到否？兹乘寄上《篱下集》之便，再奉上一册，我相信你一定有以示我。自你出国，我入报馆后，我们通信太少了，这罪过在我多事。我是太马虎了，太疏懒了，但我永不能忘记你给我的若干帮助启示。这几年我们各因工作而沉默，终究我们会把晤长谈的，愈晚，不是可谈的愈多吗？

乾弟

一九三六、四、六、上海

这实际上是一封散佚的作家书简，虽然很短，也能领略到年轻时萧乾的那种热情劲儿。作家平时习惯于用钢笔书写，还很少看到他使用毛笔，这次也许是个例外。受书者安宅，是李安宅教授，萧乾青少年时代的伙伴、从事革命工作的引路人。

恽铁樵

1934年5月，鲁迅先生向杨霁云公开了他写的第一部小说并不是《狂人日记》，而是发表在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卷首的文言小说《怀旧》。鲁迅特别谈到小说受到当时刊物的主编恽铁樵的赏识，并在文章后面加了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作为奖品。

鲁迅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恽铁樵先生仍健在，而且同住上海，似乎他们始终不曾晤面。1935年7月恽铁樵逝世。恽是江苏武进（常州）人，生于1878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专攻英文，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他喜爱文学，学林纾，也以章回体译述了不少外国小说，介绍过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此外，也创作小说，如《露西旅客》、《爱筏》等。他是经出版家张菊生的发现，从1912年来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的，直到1917年。这位最早赏识鲁迅小说的文艺杂志主编，同鲁迅走的是相反的路，后来他弃文从医了，而且成为卓有成就的海上名医。医名的声望超过了他的文名。

恽铁樵弃文从医，与他遭遇的家庭不幸有关。他有三个儿子在两年之内先后因得了伤寒症而死去，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本来也读过一些医书，曾经想到儿子可能患的是伤寒症，但为医生所误诊，白白献出了三个小生命。从此，他决心攻读中医，研究伤寒，终于挽救了第四个又患了伤寒症的孩子的生命。消息传开，慕名求医者不绝于门，他就正式脱离了商务印书馆，开始挂牌行医。在十几年的行医生活中，他不断钻研医术，总结临床经验，又加上他懂英文，接触不少西洋医学，成为较早地提倡中西医相结合的有识之士。他写了不少医书，尤其是上下两卷的《伤寒研究》，抱着挽救别人孩子的愿望，里面也包含了他个人的不少辛酸。

前几年，我在旧书肆偶然发现了恽铁樵先生的几本医书，线装铅印，是抗战以前他的弟子章巨膺在上海校印的。想到恽铁樵与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缘，还是顺手买了回来。特别是一本《保赤新书》，前面还有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一篇序言，也是平时不易见到的。太炎先生是朴学大师，也懂医学，他在序言里讲到很多医书和医理，决非外行所能。他充分肯定恽铁樵发愤著书《伤寒研究》的成绩，又指出《保赤新书》“语特浅露，意不欲以训医工，将使家人妇子见而知之也。”我想，这也是作者面向大众，有意在普及医学知识。恽铁樵所以这么关注儿科疾病，并把医书写得这么通俗易懂，很可能也念及自己三子的夭亡，不愿别的家庭再遭这人间的悲剧。

恽铁樵在《保赤新书》里不仅是谈儿科医理，还向读者披露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曲，讲他十五年前怎样经历了孩子生病，以及自己手足无措的情形。他说：“我曾死过三个儿子，六个女儿；最小的几个月，最大的十一、二岁。我的九个小孩，死法个个不同……”为了救治幼小者的生命，他在上海二十年来，请教过数十名中医，以及西医和外国医生，甚至还有教会的童贞姑娘、算命的盲人、解星宿的道士、设坛的巫婆，真是甜酸苦辣，无味不尝。他从三十五岁那年起，从无可如何之中，生出一个觉悟来：以为求人不如求己，发愤读医书，发下重誓，要做一个能自救兼能救人的医生。“……我常常想：假使我能做一个医生，遇着人家小孩生病，假如他的病是我的儿女生过的我都能救之，那就我的儿女不算白死了。”这真诚的倾吐怀着不少沉痛，他弃文从医想解除众人痛苦的愿望是非常真诚的。

从恽铁樵的医书里看，作为一个中医，他肯于论述节育及胎教等这类新

课题，证明他的思想并不保守。行文间又常涉及文学，留下他从事过文学生涯的痕迹。他在医书中既涉及《史记》，也论及《庄子》，甚至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提供的实例，来论证自己在医术上的判断。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新鲜的。此外，还有一些警言妙语，如讽刺当时的出版界：“各书局国文教科书出版得愈多，社会上好国文却愈少了。”这些议论在别的医书里能看到吗？他另有一部《生理新语》，其中的内容有：《今后中医须改良之途径》、《西国医学概况》、《细胞学说之大略》等，足以证明他确实接受了西医的某些科学理论。当然，他究竟还是个中医，也有对西医不理解的地方。他强调自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一样怪东西”。实际是把中医和“西洋医学和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见《生理新语》）难怪在当时就有人称他为中医的改革家了。恽铁樵还著有《临症演讲录》、《脉学发微》、《温病明理》、《脉学续著》、《温病续著》等书。又有一部《药庵医案全集》，共八卷，是他逝世以后作为遗著出版的。在我国近代文学史和近代医学史上，都不应该忘记恽铁樵的名字。

1986年4月

《蹇安五记》

读鲁迅书信和日记的时候，常见鲁迅先生提到《蹇安五记》这本书。1935年1月17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得曹聚仁信，……并赠《蹇安五记》一本，即复。”果然，同日便有致曹聚仁的信，信中说：“《蹇安五记》见赠，谢谢。但纸用仿古中国纸，为精印本之一小缺点。我亦非中庸者，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式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鲁迅对书籍装帧艺术既内行又讲究，印古书最好用古装亦是经验之谈。未见《蹇安五记》以前，我一直把它当成一部古书了，与我持同样看法的亦大有人在，因为前不久我还看到有人注释说：“《蹇安五记》，旧题蹇安撰。杂记、异闻。”可见注释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杂记云云，估断而已。

某日去旧书店，无意间得到此书，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尽管书有点污损，还是买了下来。回家后就灯夜读，谜底方始解开，此书并非杂记、异闻，乃是一本文言短篇小说，亦非古书，今人所作也。

《蹇安五记》是一本线装书，仿古机制纸印，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共六十页。扉页上印有说明，原文如下：“《蹇安五记》凡一册，怀宁潘氏堃止斋据手稿校录，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代印行世，售价六角正。此为海内珍秘之文，翻印盗刻，虽远必究。”又有皀公序文，作于1934年11月。据他说，十年搜讨本书而获于一旦，原来他曾在故都只见五记中之《玄玄记》、《归燕记》二记，“恨其断缺”，后来到上海又发现蹇安的《琐骨记》，前后共得三记，“与前二记同辞，尤诡丽悲痛”，很想一考作者的生平而不能。后来这位皀公有长江之旅，船上得识一人，自称是蹇安的朋友，介绍“蹇叔字安，谯国人”，后“弃功业而为僧”，云云。此人与皀公离别后，寄来蹇安的余稿，由此得窥五记全貌。皀公“恐复散佚，因为校印”。五记排比次第为：《玄玄记》、《拾书记》、《拾书后记》、《归燕记》、《琐骨记》。这一段关于本书的来历讲得头头是道，曲折多致，其实凡此种都只不过是皀公的虚构、假托而已。凡是见到本书并翻检一过的人，当知蹇安实即皀公。

《蹇安五记》用了古雅的骈俪文，古色古香，很像唐宋传奇，然而其中又夹杂不少现代词汇，诸如“报纸”、“摩托车”、“观影剧”、“组公司”、“影剧星”，等等。仅此一端便可知道这是一部写现代生活的小说。

这位皀公原名潘式，字伯鹰，皀公是他的号，亦是他撰写说部的笔名，有时又署皀工。他是安徽怀宁人，抗战前曾为天津《大公报》写连载小说《人海微澜》、《隐刊》，后来印了单行本，又曾印过《生还》和短篇集《残羽》等书。作者熟悉都市生活及知识阶层的喜怒哀乐，他的书多写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抗战期间他到了重庆，似乎未见有专著。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曾为北平《经世日报》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海王星历险记》。这部《蹇安五记》实际上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恋情和离合，用文言的形式，再披上了线装的衣裳，一时迷惑了不少未见原书的人们。

当《蹇安五记》于1935年装印成功，潘伯鹰即托曹聚仁转送鲁迅先生一册。曹聚仁在他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1972年10月香港版）中说：“潘兄，少年时才华流露，能作骈俪文字，所作《蹇安五记》，近于唐宋传奇文。他叫我送了一部给鲁迅先生，鲁迅也赞叹不已。章太炎师教弟子

以魏晋文章，弟子行辈别有胜义。潘兄之作，盖陈鸿《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之伦，述男女之私，乐而不淫者也。”鲁迅先生亦喜爱骈俪文字，在这之前他为淑姿女士的《信》作序使用骈体，而且还与许广平披览共读，铿锵有声，甚以为乐。《蹇安五记》文字古朴流畅，艳而不俗，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对它不无兴趣的原因吧。

潘伯鹰又精诗词书法，十几年前在上海印过一部《中国书法简论》，上下两卷，洋洋大观，所以知潘伯鹰为书法家者多，知他为小说家者少，知他是《蹇安五记》作者的就更少了。

《草堂之灵》

印度归来之徐梵澄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星花旧影》，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11期。徐先生当年与鲁迅有交往，他写的回忆文字人们很关心。

文中讲到一件事，鲁迅以为处理古籍要有眼光，而且研究古书不应当自异于社会，成了旧日的士大夫阶级。徐文说：“有一部旧书，名曰《草堂之灵》，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带到上海给先生看。先生看了颇为欣赏，说其中讲诗、文、书、画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见解，甚为高明。我以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如谈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对的。便说如将其翻印，便将那些皆芟掉。先生以为不可。说还是保存其原样好，因为那会将其书的特色抹煞了。这书终于没有翻印。”鲁迅先生的见识当然是正确的。

徐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鲁迅先生很欣赏《草堂之灵》这部书。但是，徐文并未讲清这是怎样的一部书，因此使人误会《草堂之灵》是一部古籍。实际这是今人的一部笔记，作者是湘潭的杨钧，1928年12月长沙印行。

杨钧（重子），是杨度（哲子）的弟弟，亦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他先后与蔡松坡、陈师曾相居一室。杨氏兄弟都是湖南名士王闿运门下的学生。《草堂之灵》共四部十六卷，其中以谈诗、书、画、印、碑刻、玉石者为多，作者也精通书法绘事，所以常有一些独得之见。至于《草堂之灵》的来历，作者自述：“其人也，有时而歌，有时而哭，痴顽混沌，如饮狂药。虽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诡譎恢奇又不可一世。故谓之为人不可也，谓之为神不可也，谓之为鬼不可也。无以名之，名之曰《草堂之灵》。”杨钧的室名曰“白心草堂”，他又有《白心草堂诗集》一部行世。

杨钧论画，屡见新解，例如他说石涛、石谿、瞿山、八大的作品“别具神情，不徒险怪，稽之法度，未稍乖离，学其用心，自能名世”。然而，有人只学其皮毛，以为十分容易，其实，“纵能自掩，难以欺人，徒窃怪形，当然出配也”。诚然，仅仅模仿怪形，实在浅薄得很，而究取古人一二不经意处即能成家的确是从来没有的。同时他又提出：“然学古之法，又在取其一二，非师其全体也。余常谓书家秘法，于小品冷碑，人所不经意处得之。画家亦复如此。广求名作，细意探求，其独到处又为人所未得者，取而扩之，练成一色，而家数出矣。”这些论述自然有实践的经验，也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莫怪鲁迅先生表示赞赏。而一部《草堂之灵》，很多这样的见解，绝非欺人之谈。

作者终究是一位旧式文人，论书画金石得心应手，光采逼人，一接触到新文化则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书中有《论新文化》一篇，语多谬误，如说新文化运动提倡古典小说《水浒》：“其害正大，诲盗之罪，实不可辞。”而且举出乃兄杨度亦是这种主张。

书中第十一卷《记厄》一篇，虽然观点不足取，却真实地记录了大革命时代湖南农民运动的风貌，值得一读。1927年3月10日，叶德辉丧命于长沙东门外，是否该杀，此处不论。杨以为叶“性至乖僻，不近人情，余早知其不免”。又说叶“门户之见最深，不可与辩也”。当叶死之前夜，杨钧亦被农民协会捕去，盖杨氏住宅与左侧梁氏宅相通，梁氏因办炼矿公司而成巨富。当时梁家工人“不知机变，仍循习惯，将其主之书籍衣被等物，由后门

运存余宅。驻梁家纠察队见之，以为所运皆梁家物，群入余宅捕盗。余闻声下楼，欲证明事实，人数太多，不易申辩，遂与工人一并捕去”。这当然是一个误会。看来农民协会还是讲政策的，事后除了对他承认错误之外，并表示“负日后保护之责”。而且“农协总会以分会辱余，欲严加惩杀，余固止之”。结果他被拘禁了半夜就被释放了。

当时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曾经问杨钧：“汝与杨度有关系否？”杨答：“杨度为我之兄，自不能全无关系。但彼谈政治，我事文学，各不相谋，彼事我不负责。”旁边站立的人说，此人之画，每张可值三千元。杨笑答：“多谢尊言，果能如此，早成土豪，恐尊会不能如此待遇！”从《草堂之灵》里，竟能看到湖南农协同开明士绅的一段交涉，杨钧的幽默感和农协的大度在这段笔记里都生动地表现出来。

自然，这段纠葛，恐怕鲁迅先生亦是读到了的。

《窥园留草》

窥园主人许南英的诗集《窥园留草》，1933年6月由许赞堃编成，在北平和济印书局付印。线装铅印，厚达200余页，只印了500部。

书前有编者许赞堃的《窥园先生诗传》，似为传主的后人执笔，可是作者没有明确交代与传主的关系，就像叙述他人的故事。编者有所解释：

作传，在原则上为编者所不主张。但上头底传只为使读者了解诗中底本事与作者底心境而作，并非褒扬先人底行述或哀启，所以前头没有很恭敬的称呼，也没请人“顿首填讳”，后头也不加“泣血稽顙谨述”。……

这里颇有点与世俗相违的味道，是一种平民思想的反映。这位许赞堃即传主许南英的第四子，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许地山先生。

许南英世居台湾，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许南英参加了台湾人民的抗敌斗争。失败后，全家逃到大陆来定居。在《窥园留草》中收有他一幅肖像，并有他62岁时的题句：“蒙耻作遗民，有泪何从恸哭！”足以窥见他的心情。他出身进士，做过知县，可是后来生活困窘，晚年不得不远走海外谋生。1917年，他63岁时卒于异域南洋，终于不见台湾的光复。

诗集中自然有不少忧愤之作，如《寄台南诸友》等；又《台湾竹枝词》十首，写台湾平民年节风俗，抒发了作者对乡土的恋情。还有一些讽喻性的诗，如《臭虫》：“肚皮饱尽民膏血，炎热场中毒吮人。未死已经遗臭味，恨污予手杀而身。”这当然是抨击贪官污吏的。

《窥园留草》附有《窥园词》。有不少缠绵悱恻的情词，这是诗人生活的另一面。许地山的“诗传”里并没有为先人讳，如实地说出许南英“在33岁左右，偶然认识台南一位歌伎吴湘玉，由怜生爱，屡想为她脱籍。两年后，经过许多困难，至终商定纳她为妾。湘玉喜过度，不久便得病。她底母亲要等她痊愈才肯嫁他。在抑郁着急底心境中，便她病加剧，因而夭折。她死后，先生将遗骸葬在荔支宅。……本集里底情词多半是怀念湘玉底作品”。许地山为父亲的这段婚外恋作了注脚，也是一反俗例的做法。所以由许地山编辑成书的这部《窥园留草》，不仅是一本亲族之间的纪念册，对于人们客观地认识一位台湾的爱国诗人亦有价值。

从《窥园留草》里，也可以看到许南英与许地山之间的父子亲情。那是1913年，儿子为家庭生活所迫，将赴缅甸仰光的中华学校去当教员。许南英有诗送别，题为《示四儿叔丑》。诗中有句：“我年过半生，汝年刚廿一。男儿志四方，何事困乡邑。……嗟嗟人海中，前途黑如漆。失足入迷途，后悔曷有极。……”“叔丑”是许地山的乳名。名字的由来，可能是因为许地山出生在1893年2月14日的丑时吧。1917年夏，许地山到北京燕京大学文学院去读书，许南英又有《丑儿入京游学作此送之》：

送汝出门，前程万里，临歧不尽歔唏！金台雪色，玉螭霜华，此际寒生燕市。寒威若此，早冻了桑干河水。此去好立雪程门，不知雪深有几？不患独行踽踽，有亚欧文人相助为理。噫，吾老矣，何日归来？想见入门有喜。勸哉小子，不愿汝缙青拖紫，只愿汝秋蟀春鹧，到时寄我双鲤。

就在许地山入燕京大学不到半年的时间，父亲病逝棉兰。“诗传”里却不作赞词和评价，其实父亲对他的一生还是有影响的。比如他的笔名“落花生”，以及他的代表作《落花生》都与许南英有关系。在那篇有名的散文里，他借着父亲的话说：“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

东西。”“落花生”精神代表了许地山的民主思想，父亲的话已经永远刻在作家的心上了。

1933年《窥园留草》印成之后，许地山恰好应中山大学之邀去广州讲学。他路经台湾，特地去故乡访旧。没想到随身携带的《窥园留草》却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容。据许地山先生的夫人周俟松介绍，这部书几被敌人抄没，经过交涉方才放行。

我慕名此书已久，今春竟在旧书肆偶然得之，尤其可贵的是，这本《窥园留草》还有许地山的签名，他在扉页上用毛笔写了：“淑度女士地山献先父诗”。受书者当然是刘淑度女士，即曾经为鲁迅先生刻过名章的那位“刘小姐”。至于她与许地山先生的相熟，我想与周俟松先生有关，因为两位女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同学，毕业后又都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1987年夏

《邻翁丛谈》

从旧书肆购得一册《邻翁丛谈》，线装铅印本，附《西轩诗草》。1927年中华印刷公司承印，山东诸城王季航遗著。《丛谈》内容以谈鬼说狐者多，如《女怪》、《鬼市》、《兽异》等，与清末民初流行的笔记小说同，取《聊斋》之状，无《聊斋》之实。其中也有记乡野村镇间的见闻轶事者，如《场屋记事》、《志家异事》、《运司公子事》等，虽记实仍不脱神异诡秘色彩，病在仿照《聊斋》也。

何以购藏此书？出于书后有作家王统照的一篇跋文。本书作者是他的父亲，《邻翁丛谈》正是由王统照编辑整理自费印行的。据王统照介绍，他的父亲“未冠即独立支持门户”，“天不永年，卒时仅二十八岁。”那时王统照才七岁。王季航之作，说明蒲松龄在乡人中达到了怎样一种迷人的程度，而王统照的文学启蒙，几乎也缘于阅读《聊斋》等说部。

1926年，王统照由北京回到山东，侍母并安葬了父亲之后，他携带父亲的遗稿移居青岛，时在1927年。同年完成书稿的编辑工作，并写了跋文。

集中所附《西轩诗草》，仅数十首，其中《读太真外传三首》能为杨贵妃一吐冤气，实为难得。诗如后：长生密语告三郎，争得今宵水殿凉。

终是蛾眉能殉国，香魂曾否怨渔阳。

沉冤黄土向谁申，不怨朝纲怨太真。

纵向尺绡送薄命，依然宫阙陷胡尘。

江山不赖六军持，安危全然仗女儿。

岂是马嵬毕命日，便为胡骑退兵时。

王统照先生也擅长旧体诗，译外国诗也爱用古体，如《题石集》。那是四十年代初他在上海自费印行的。1957年又自印了旧体诗集《鹄华小集》。至于他印《邻翁丛谈》，以及他为《丛谈》写的跋，却少为人知，连六卷本的《王统照文集》亦未收入，其实它于我们了解王氏家史和王统照的文学生涯，未必无益。

1987年冬

《古槐梦遇》

在俞平伯先生的散文集中，《古槐梦遇》似乎比线装铅印、丰子恺插图的《燕知草》还要难找。我也是访求多年不遇，最后于 70 年代不想找它时却碰上了。

觅得此书可不是空欢喜，一读之下发现它的内容和写法与《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燕郊集》等散文集大不一样。这是一本语录体的散文集，共收百则。扉页上标明为“三槐之一”，可见另外还有两槐。后来我向俞先生请教，原来还有《槐屋梦寻》和《槐痕》两种，可惜都未曾出版，如今俱已亡佚。“古槐”是俞先生书屋的名号，“梦遇”指书中文字都从梦中拾来。对此，读者也不必过于拘泥，包括作者居处是否真的有槐树之类。俞先生在《三槐序》中说：“舍下无槐，而今三之曰古槐书屋……”其实那院里只有一棵大榆树而已，“不知其为榆也，亦不知其为俞也……”总之，写散文是很随便的。

俞先生另外的几本散文集，或记事抒情，或论诗词古典，而《古槐梦遇》更近社会现实，文字犀利，讽喻性强，也可作杂文来读。如开篇第一则即是：

革命党日少，侦缉队日多，后来所有的革命党都变为侦缉队了。可是革命党的文件呢，队中人语：“于我们大有用处。”

此则写于 1931 年 9 月，其时国民党已堕落为镇压革命的工具，国民政府演变为特务政府了。

又如以下几则亦非梦话，不读《古槐梦遇》，怎能全面评价俞先生的散文：

站起来时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

今年奉中央明令，不禁爆竹，以神马黄钱祀于门，大然其双响。警士灼灼傍睨之，如木鸡。

以醒为梦，梦将不醒；以梦为醒，梦亦不醒。

仅有百则语录体的这本小书，小 32 开本，1936 年 1 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似乎也很喜爱本书，可以说是自己精心设计的。书用道林纸印，封面素白，请魏建功题书名，请周作人、废名作序，连同自序在内都以手书制版。三篇墨迹占了近 20 面，捧在手中自然与习见的书不同，增加了刊本的文学趣味。废名的字也是追随知堂的，不细看的话有时很难区分。这对喜欢欣赏作家手迹的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的藏书封面上钤有名印一方，原是作家关永吉的藏书。关永吉是华北沦陷区的小说家，著有《秋初》、《风网船》等几本小说集，写沦陷区的文学史无法回避他的名字，而他的小说又的确写得非常好。书面钤有印章，有点破坏了封面的完整，却可引起书外的话题，正是有得有失，没有什么遗憾。

1978 年 12 月

阿英与《西行漫画》

今年纪念长征胜利 60 周年,我从藏书中找出 58 年前出版的一本画册《西行漫画》。这是一位长征的参加者在行军途中所作的纪实速写,署名萧华作。编者钱杏邨(阿英)。小 32 开本,1938 年 10 月 5 日上海风雨书屋出版,共印 2000 册。其中 500 册是铜版纸精印本,其余是米色道林纸本。50 年代,我得于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为道林纸本。时至今日,已成革命文物矣。

风雨书屋乃阿英等地下党员利用租界“孤岛”的环境所办,社标图案为一公鸡,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那时阿英主编的《文献》,刊载了不少延安的文章,当他接到由陕北带来的这一束表现长征的漫画速写时,感到异常的喜悦和激动,这对一个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党员来说,更是一种鼓舞和力量。他担心在《文献》上未必能顺利连载,而全世界正在关心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消息,同时考虑到照片画稿不易保存,立即决定尽快印成一本小书,认定“它将不仅要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的行程永恒存在,它的印行,也将使中国的漫画界,受到一个巨大的新的刺激,走向新的开展。”(见《西行漫画题记》)书中附有“二万五千里行程图”,及毛泽东等红军领袖的合影。书名用《西行漫画》是想到了斯诺访问延安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发行不久,书中有专章写了长征,而环境又不宜用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类的字样。封面画选用了第五军团长董振堂生前的画像,画册第一幅则是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林伯渠同志。老人一手扶杖,一手提着马灯,充分反映了革命的乐观精神。其余是过湘江、在遵义、泸定桥、过雪山、过草地,以及川贵地区兄弟民族的生活场景。据云漫画照片是萧华带来的,印书时便写成作者萧华。印成的书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和新四军地区,起到了鼓舞士气和民心的作用,强化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然而,书屋不久即被查抄,人员遭到了逮捕,画册也无形湮没。

1958 年 12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西行漫画》制版,重印了三千本。萧华同志声明不是他画的,但已记不起作者是谁。直到 1961 年黄镇自国外归来,李克农同志同他谈及这本画册,经过本人看过,证实是他在长征途中所作。1962 年 7 月以《长征画集》为名,第三次印行了本书。萧华同志写了序。作者署名黄镇。

黄镇早年在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学习过绘画,长征时他正好与五军团同行。当时他行军途中不仅作画,在渡过金沙江后,于通往会理的路上,他还同五军团的战友们一起创作并演出了话剧《破草鞋》,表现出他的文艺修养和创作才华。可惜《长征画集》的原稿已不存,若不是阿英同志抢时间根据画稿照片印成一本《西行漫画》,恐怕人间难以留存这足以传世的奇书了。

1977 年 7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又重印《长征画集》,这是本书的第四个印本。余得钤有“钱杏邨印”、“阿英”印章本,并有家属的题字:“阿英同志逝世前夕,得悉《长征画集》即将重版。很高兴,嘱书出后赠德明同志一册,以志纪念。”每见此本,及风雨书屋的初版《西行漫画》,莫不怀想前辈在艰苦环境下保存革命史料的远见和魄力,同时也更加感念他病重中赠书的友情。

1996 年 9 月

杨大瓢的书

鲁迅与周作人都有搜集乡先贤作品的喜好，《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的编撰便是证明。晚年鲁迅已不及过问此道，周作人则兴趣依然。为此，他还刻了一方专用的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足见他这类藏书之丰。

当然，访求不遇的书也是有的。譬如数十年来他有意搜访清初杨大瓢的书就不那么顺利。1940年6月，他在《关于杨大瓢》一文中说：“我想蒐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著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求书心情之切流于笔端。

杨宾，字可师，号大瓢。康熙时代人。周作人已藏他的《铁函斋书跋》、《大瓢偶笔》，道光刻本，共十册；康熙中叶杨氏刊本《力耕堂诗稿》三卷。对于大瓢的诗，知堂没有详加评论，只说杨的《西湖杂咏六首》写西湖的情形与感触，同张宗子在《西湖梦寻》中写的意趣相似，境况亦相近。恐怕这与彼此写作的时间相距仅数年有关。1941年10月，知堂把《关于杨大瓢》收入《药味集》时作“附记”，讲到他从杨氏后人手中，借得一本大瓢日记的手稿，“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日后如有机缘，甚愿为之刊行，亦绝好传记资料也。”稍后他又作了一篇《杨大瓢日记》，收入他的《立春以前》一书。然而，愿为刊行的想法已不可能实现了。

有幸的是日记抄稿尚存北京图书馆，我的同事柯君有志清代诗文集的研究，他探得此稿，并发现知堂在抄稿上的一则不曾发表过的题跋，写于1963年，证明当时抄稿仍存苦雨斋，他依旧恋恋不舍。原文如后：

昔日偶然得到杨大瓢《力耕堂诗稿》、《函斋题跋》及《大瓢偶笔》抄本，因写《关于杨大瓢》一文，于民国二十九年发表于杂志上，至三十年夏，乃承杨氏后人的杨子日记一册见示，系大瓢手笔，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即此是也。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知堂。

知堂未见的大瓢著作，至少还有两种，一是他只闻其名的《睇发堂文集》，一是他连书名也不知道的《睇发堂诗集》。书各四卷，是铁岭杨氏于道光间编成的未刊本。文集中记大瓢父亲被流放事颇详，是杨宾传记中重要的一章。诗文中大量涉及的晚明和清初史料也很重要。若为知堂所见，他为杨大瓢印书的决心怕更大。奇怪的是知堂没有提到，正在他为文介绍大瓢的同时，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于1940年4月印了一本《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作为“吴中文学小丛书之十四”的非卖品，书前还有当时藏于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的杨大瓢像。杨为浙人，怎么会入“吴中文学”？书前有校印者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序，讲到大瓢奉大母丧葬后已年过四旬，适康熙南巡，他“携弟迎叩御舟，请代父戍，不许。遂出塞寻亲”。后来父歿戍所，他才几经阻折，“奉母扶柩，归葬吴下。”道光二十九年季某见此大瓢杂文残稿，不能得，录以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亲诗文卷，同时获见，并录于后。”书后的跋为咸丰八年吴人叶廷琯作，他说：“大瓢父墓在团山……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为姜西溟撰，它已漫漶过半，嫌其墓久不保吁。”看来知堂无缘得见这一平装铅印的非卖本还不是《大瓢偶笔》。

自古以来，我国学人向有搜罗乡贤佚失著作之风，借以保存先人文墨，嘉惠后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传统，并非周氏兄弟的独好。不知现在还有无识者重视这一传统？应该说，正是有这样热心乡贤佚作的人，祖国文化遗产才得以一代代地保存和流传下来。

周作人与汤尔和

友人中有研究周作人和搜集他的佚文者，我当然支持。记得寒斋所存零本小册中尚有可挖掘的，除已提供若干种外，今又得两篇，且都是有关汤尔和者。

汤尔和（1877—1940），浙江杭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攻医学，加入过同盟会。归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校医，1912 年在北京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1922 年后，曾任教育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当了汉奸，任北京伪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从他到北京一直到 1920 年赴欧洲以前，他与鲁迅先生有过往来。从《鲁迅日记》上看，无非共食和赠书等一般交往。如 1917 年 6 月 9 日日记载：“上午得汤尔和信并《东游日记》一册。”1918 年 7 月 30 日日记载：“汤尔和赠《蝎尾毒腺之组织的研究报告》一册，稻孙持来。”当然，鲁迅先生也曾寄信和往访汤尔和，如 1920 年 5 月 29 日午后即是，谈的什么却无可考。汤与周作人的交往，据周说：“本人虽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不甚频繁。”他对汤的为人是敬慕的，至少汤当汉奸比他还要早走一步，而且正是汤病逝后，周作人继任了汤的教育总署督办的职位。周有挽联吹捧汤：“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发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跌打胜微言。”汉奸惜汉奸，周作人目汤落水“只为救民苦难”，实在荒谬之至。汤尔和曾对骂他当汉奸的人说过：“是非功罪，在百年之后！”其实何用百年，从投敌开始那天起，他的历史已有结论。两个汉奸都强调侍敌不过为了保护文化和青年，这种鬼话连他们自己都欺骗不了。

1941 年 4 月 6 日，周作人曾有日本之行。张菊香同志主编的《周作人年谱》中，没有记载他此行目的之一，是 4 月 14 日参加东西文化协议会前会长汤尔和的追悼会。倪墨炎同志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七章“日本之行”，对此有记载，但无只字记其具体活动。看来都是未见有关资料，怪不得执笔者。

我藏有《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追悼录》一册，线装铅印本，载有“悼会记事”及出席者名单，除日方人员外，还有汤尔和的遗族、周作人、钱稻孙、尤炳圻等中方人员二十余名。致词者除日方人员，有周作人及汤的家属，并森岛库太、长与又郎的追忆，以及盐谷温的挽诗。

周作人的致词是以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的身份讲的。此书可能印于日本东京，因为几篇发言还附有日文，从纸张、印刷、装订技术来看亦似日本的出版物。出版时间当在 1941 年下半年。在这篇致词里，周作人吹捧汤尔和说：“汤先生在今日中国，是个伟大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佳者。”称赞他事变以后，“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只有汤先生一人而已。”出来干什么？当汉奸！又当面向日本人献媚说：“五十年来，我国的知识阶级，无不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周作人是怎样向侵略者摇尾乞怜的，于此可见。

又一册《汤尔和先生》，平装铅印本，小 32 开本，厚 212 页，作者幼松。1942 年 10 月出版，由北京亚东书局、燕京庄代售，显系自费印书。这是一本传记，共 20 章，对于七七事变后传主投敌的事，仅在第 18 章“羽扇纶巾——拯民水火”中一笔带过。当然是为传主的行为开脱、粉饰的。作者幼松原名不详，但让人联想到汤尔和号“六松老人”，也许是家属？从著者序中

知道，所记除汤生前亲口自述外，还参考了汤的记录和往来信件。莫怪周作说传记资料有从家族中得来者。

书前附有传主的八张照片。周作人的序写于1942年9月30日。这篇序文不见于周的各种文集，亦不见钟叔河先生编的《知堂序跋》。《周作人年谱》中亦失记。也许这一次不是在日本人面前讲话，周作人有所收敛，没有肉麻地讨好日方。但是，为汤尔和开脱之处不少，实在也是为了美化自己。他说“汤”一生中治学与为政相伴，其参与政事的期间差不多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好像沦陷区的人民还要感谢这些出来维持局面的汉奸。一切汉奸似乎都有这个说词。汤尔和一生中自然也有值得人们称誉的业绩，比如他在医学和医学教育方面的贡献便不可失记。本世纪初，他在争取医院实行人体解剖方面的斗争，更值得大书特书。而他主持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也正是今天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前身。可惜他在从医又从政的选择中，走错了道路，这决不像周作人所肯定的那样，“医术通于治道”，他治医有方，那么从事政治活动就一定会走正道？汤尔和晚年失节的历史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周作人的一切掩饰之词既显得苍白无力，又像个可怜的小丑，愈表白愈露出了本相。

陈绵的剧本

1989年第一期的《燕都》杂志，邓云乡先生发表了关于陈绵的一篇人物记，介绍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久未提及的一位故人。陈绵有“中旅保姆”之称，既编剧，又作导演。谈唐槐秋、唐若青父女的中国旅行剧团，总会想起他的名字。

邓先生说，北平沦陷后，陈绵写过一个话剧《候光》，可能暗示等待光明之意。这话不错。剧本于1943年8月由《中国公论》社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对书名也有所解释：“我们感觉着黑暗么？光明是有的，等一等吧！它迟早会来的！《候光》的含意如此。”《候光》的创作是受了一个外国剧本《星期一八点》的启发，而完成以后的剧本与原著却大不相同。时间、地点、人物完全中国化了，甚至有点北京化了。陈绵出身北京旧家，熟悉大宅门的风俗人情，也经历过家族的破败，他写活了富贵人家的兴衰哀乐。他说：“这是一段有钱的人家作排场请贵客的故事，表面上是热闹欢笑，但是骨子里包藏着多少黑幕令人感叹令人怨恨令人悲哀。”尽管作者想在剧本里告诉观众，对于光明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也不能无作为地一味死等”。但，作者只顾追求戏剧效果，批判的力量很微弱，似乎题旨不够鲜明。是受了敌伪统治的影响，欲言又止呢，还是意识上本来就模糊？

除了《候光》之外，沦陷期间陈绵于1944年3月还出版了一本《半夜》，作为华北文艺丛书之三，由伪华北作家协会出版。书中收了两个多幕剧，一是三幕剧《天罗地网》，一是五幕剧《半夜》。后者是陈绵根据他早年在巴黎看过的一个话剧，凭借记忆而改写的。原著者是匈牙利作家拉若司·吉拉希，原剧名《火鸟》。陈绵看的是法国改编本，名为《那一天晚上》，讲一个电影明星被暗杀的故事。陈绵有意把它改写成一个有侦探剧意味的剧本，也是中国化了的故事。《半夜》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来看并非无益，可是戏剧商业色彩明显，所以陈绵也说，《半夜》和《天罗地网》都是属于大众的剧本。

《天罗地网》在京津沪都演出过。剧中的人物很少，是一个心理剧，陈绵也是根据法国剧本改编的，原作还有陈绵的中译本，名为《缓期还债》。陈绵把它化作中国故事以后，剧名改为《干吗？》，一方面是根据剧中人的最后一句台词来点题，一方面可能从梵文的谐音而来。《干吗？》接近口语，《天罗地网》与剧情倒也贴切。剧本写一个谋财害命人的矛盾心理，故事性并不强，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恰可给优秀演员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作者把故事的背景设计在天津，当年我就是天津新中央剧场看的这场话剧。剧中男主角马金川由周刍扮演，现已改名周楚。这是一个很吃力的角色，可以说费力不讨好，没有舞台经验的人拿不下来。

陈绵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多年来默默无闻，猜想与他在沦陷区参加过某些日伪的文学活动有关。但是，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在日伪时期他曾两度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坐过监牢。这是否与他在中法大学这个教会学校工作有关呢？到了“文革”时期，旧账新账一起算，谁能承受得了！

陈寅恪佚文

治学而达于通识者难矣哉，已故陈寅恪教授近之。据称敦煌学即为其首创，对此他没有讳言。其说始见于1930年他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寅恪先生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反不如国外，因有警句：“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他于敦煌学致力非浅，获见甚丰。

1944年，陈先生于成都执教燕京大学，是年1月成都美术协会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文化界大为震动，寅恪先生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余于旧书肆偶得1944年4月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持集》一册，线装本，仿宋体铅印，合共百余页，为展览会从成都移至重庆展览专印的。书中收张大千《自序》及《汉高窟记序》二文，又《展览纪要》和名流诗文多篇。美术界执笔者有刘开渠、庞薰琴、雷圭元、吴作人等，诗作有叶圣陶、谢无量、沈尹默先生的作品。圣翁作《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奉题》，《篋存集》中不收，经我提供给先生。原诗如下：“敦煌古艺苑，壁画尤珍奇，妙绘诸佛相，并留信善姿，张君摹百幅，神迹两无遗，观者开心眼，如游西北陲。”书中又收金石考古学家马鉴教授《观张君大千敦煌摹画感言》及陈寅恪先生的《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后者不见《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当属佚稿。查蒋天枢教授所辑《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亦不见记载。今补录如后，改日或可添入文集。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谣考》，足证鄙说之非妄。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陈寅恪

文中谈到“预流”一词，也是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序言时所用。他认为敦煌学乃“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在陈先生看来，治学能“预流”者极为难得。

某年余又得《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一册，沈尹默书扉页，亦线装仿宋铅印本。目中详记壁画方位及尺幅，并有历史考订，为刘君礼、罗新之辑录，1944年5月成都四川美术协会印行。我并不研究美术，更何谈敦煌学，因想本书与前述《展览特集》当属相关配套的书刊，即以贱值收之。

1982年5月

两本《西川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叶圣陶先生入川。《西川集》是叶老入川后出版的唯一随笔集，1945年1月重庆文光书店出版。书内收入作者在1944年一年中所写的随笔小品。书名《西川集》，取写作地点而言。

叶老的文笔质朴自然，《西川集》亦不例外。头一篇《答复朋友们》，为答谢文艺界为他庆祝五十岁寿辰而作。叶先生自谦是个平庸的人，写不出平庸的文章，还说自己一生中无非当了两大员：不是当教员，就是当编辑员。说得平直坦白，一如其人。

在《西川集》的“自序”里说：“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是文学的时代的使命，这一个纲领我极端相信。”但是，他又通过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来实践这个使命的，不愿故作姿态，虚张声势。他在《暴露》中针对国民党的压制言论说：“遏止了暴露，就以为天下太平，社会美满，那是愚人的想头。”他在《“八·一三”随笔》里又说：“大家喜欢侈言革命，可是只限于挂在口头，实际上是懒得革命，尤其懒得革自己的命，懒得见少数旁人真正革命。”文章表面平和，实质尖锐，仍是叶老一贯的风格。

我所藏的《西川集》有两本，都是1945年10月上海文光书店的再版本。一本得自北京旧书肆，书品完好，1978年送呈叶老题字，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这小册子的初版用手工纸印刷，一翻就稀烂，抗战时期所谓内地版大多是这样。封面字是我自己写的。三只小鹿不记得从哪儿取来的。德明同志属题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叶圣陶。”另一本得自上海四川中路的一家旧书店，封面不存，扉页上却有作者的签名。签名用毛笔，后面署有：“三十五年二月廿八日”，即1946年的2月28日。签名旁还有蓝色印章：“文协文艺欣赏会纪念。作者签名本。”想来这是个盛会。

叶先生是同年2月9日从重庆复员到上海的，文协的这次活动带有欢迎复员归来作家的意思。近年叶先生发表了旧时的日记，查1946年2月28日日记中记载：

午刻，至吕宋路洪长兴，文协与苦干剧团作东，宴请今日参加文艺欣赏会之诸人。

此店为羊肉馆，年来甚有名，牛排与涮羊肉鲜嫩可口。食毕，偕胡风（前日方到）、葛一虹至辣斐戏院，听众几已满座。二时开会，余致开会辞，老舍、曹禺、胡风各为演说，又有朗诵歌唱，而殿之以苦干剧团之《正在想》。此剧为曹禺所改译也。

这段日记为我的签名本留下旁证，只是关于会上售卖作家签名本的事并无记载。据赵景深先生在《文坛忆旧》里所记，这天苦干剧团演《正在想》的演员有石挥、张伐、程之诸位。可惜赵先生也不曾记下作家当场签名卖书的事。1985年

赵荫棠的小说

若有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沦陷区文学史，人们会发现 1944 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父与子》，1945 年 6 月北京伪华北作家协会又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影》，两书的作者都是赵荫棠。

赵荫棠河南人，长期教书，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近四十年，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语言学家，早年著有《等韵源流》、《中原音韵研究》等书。抗战胜利后，他从北京进入解放区的张家口。“文革”中病故于甘肃师范大学。四十年代，当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时说，他的性格更接近文艺。1921 年左右，他在北京的《微波》上写稿，1928 年后与诗人徐玉诺等在北京合办《明天》、与女作家庐隐等办《华严》。这时期他还出版过一本文论《风格与表现》，由华严书店出版。1931 年后他开始专攻音韵，到 1936 年后，有朋友接办《晨报副刊》，他又重新拾起文艺之笔。北平沦陷之后，“一半为应付朋友的文债，一半为要稿费，于是又大写特写起来”（《父与子·序》）。赵荫棠亦作随笔，惜未结集。

《父与子》收小说二十篇，大多数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笔端流泻着幽默感，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诉说着这一阶层人物的辛酸和自身的弱点。作品的环境多为二十年代前后的北京城。这样能说他是“京味小说家”吗？不能。因为作家尽管生活、写作于此，但是他仍未忘记中原腹地小城人民的生活。他熟悉那里的乡绅、土匪、小职员、生意人、村妇和歌女，有的人物甚至是别的作家很少写到的，如《宋磁碗》中的小古董商、《白面房里》的吸毒者群。在写作手法上，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浑厚自然，注意刻画人物的心态。

长篇《影》，描写的是一位大学教授与一个烟花女子的纠葛。书的前半部分以写风俗的笔调介绍了北京南城一带的花街柳巷，包括前门外的八大胡同，以及珠市西口万明路附近的暗娼。当然，也写了一些文人学士、公子哥儿们在这里的进进出出。这是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前期北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缩影。作者借着书中的人物，表白他所以要写妓院生活，是因为“在这里也可以显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迟至战争以后，这种色彩恐怕都要全失了”。曹禺在《日出》里只在第三幕集中写妓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影》整部小说没有离开妓院，却让人感受不到激动的场面。我看这是由于作者过分追求民俗趣味的结果，于妓院的罪恶揭露少，客观描绘多，难免不带着欣赏的眼光，这是小说的一大缺点。

小说后半部集中写那个少女的吸毒成瘾，以及不可自拔的堕落行为。她几番挣扎想重新做人，终于陷落地狱，最后倒卧在什刹海的雪地里。小说男主角的性格有些模糊，他是个善良温厚的教授，又是个喜好寻花问柳的俗类，读者当会发现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的偏爱，今天的读者更会感到隔膜。

描写饥饿的作家

高深是一位不幸的作家。他仅仅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兼差》，那是1944年3月由小说家袁犀（李克异）编入“新进作家集”，交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但是作者不及看到这本处女作，便在1943年12月贫病而亡。他死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他的幼子刚刚夭折，妻子离婚，临终时只有一个孤苦的妹妹守着他。

高深的死，向世人宣告在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怎样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着，终于倒下了。日本侵略者既用炸弹和枪炮屠杀中国人，同时也制造饥饿和疾病杀人。高深原来生活在北京，写过长诗、散文，主要写小说。当人们注意他的创作时他已身染肺病，失业在家。由于付不出医院的费用，家属只好眼看着他成茶杯地大口吐血，靠当卖衣物和借钱生活。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妻子曾经把喂儿子的母乳挤给丈夫吃。最后他不得不投奔河南柘城的岳父家。到了那里也只能喝小米粥。此时他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说——

现再寄上当票二张，一张是弟棉袍，其他毛衣，祈兄预支点钱赎回，邮包寄弟，如此似迫兄太甚，但天寒地冻，屋中又无炉火，此中痛苦，实难尽述，尚有几张当票，但非急需物，以后再说。

接着，“太太却和他苦打了一仗，把他兄妹逐出家门和他离婚了，这给他精神和病体极大的打击，使他没有了温暖，失去了安慰，在他乡异域，断绝了一线生路”。（参见《中国公论》第10卷5期的有关文章）高深死后三个月，《兼差》在北京问世了。人们发现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离不开贫困和饥饿的描写。《兼差》共收小说六篇，连那篇带点浪漫色彩的《新秋》，写一个肺病患者和白俄少女的恋情，实际两人也都是病与贫的化身，那美丽的少女不过是个乞丐骗子。《兼差》更集中写一个小职员悲惨命运，男主人公是个文书，每月薪金养不活妻子和女儿，下班之后得兼差去拉人力车。拉车时他最怕碰到熟人，偏偏让他碰到同事和上司，最不堪的是让他碰到自己的女儿，而失学的女儿此时已沦为暗娼。高深笔下的这幅饥饿图，令人读了喘不出气来，是非常真实感人的。高深吐着血在描绘善良人们的饥饿，高深是不瞑目的。

限于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高深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是，他有勇气为“大东亚共荣圈”治下的平民作一幅真实的生活写照已经很难得了。书中没有歌颂皇军的话，有的地方还写了日伪军的专横。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也隐隐约约地写到一个不屈服的女中学生，那是沦为暗娼的少女的同学，最后她下落不明，据说犯下了可以枪毙的罪。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作者的原稿是否经过日伪当局的删节。总之，这是小说中的一线光明，可以引起读者的种种猜想。

想起徐调孚

徐调孚先生我见过的。这位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待人谦和寡言，神态间却包含着无限的精力和智慧。他一生献身出版事业，甘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他本人亦是一位学者。徐先生曾经协助沈雁冰先生编过《小说月报》。抗战期间，他又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编过一种文艺期刊《文学集林》，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文艺杂志编辑。

我听吴祖光先生讲过，抗战胜利后上海开明书店为他出版多卷本的戏剧集，经理其事的就是徐调孚。那严肃的工作作风，无愧为一个资深的编辑。

日前偶翻 1946 年出版的《上海文化》，见有徐先生关于《风雪夜归人》的一段评语，极精粹，全文如下：

一个是红极一时的名花衫，一个是供人玩弄的姨太太，却在偶然的机缘中相遇了。

他们同是可怜虫，同是被泥沙埋住的珍宝。他们想一同去走一条新路，可是，人是得受罪的，“明天”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从这两个可怜虫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物，作者写出了现实人生中的形形色色。这里有诗情，有智慧，有辛酸，也有丰富的人间味。

徐先生的译著目录，多在古典文学和元曲研究方面。这百余字的剧评很少见。上海沦陷期间，柯灵编的《万象》杂志上连载过一组《新录鬼簿》，专记新文学家的佚事，副题为《现代文坛逸话》，署名陈思和，时在 1944 年的 8、9 月。前后共记鲁迅、刘大白、曾孟朴、汪仲贤、沈西苓、陈大悲诸人。正如评《风雪夜归人》的那段文字不曾被人注意一样，徐先生化名写的这一组《现代文坛逸话》也少为人知。作者隐去了真名，但从行文中，又可窥知其人熟悉《小说月报》的掌故，让人猜到可能是位文界的前辈。如谈汪仲贤为上海“新舞台”编过一部《徽钦二帝》，为了编好剧本，汪曾遍阅宋朝南渡前后的历史和野史笔记，发表在《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的一篇《宣和遗事考证》，就是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副产物。又说戏剧家沈西苓，当年曾为创造社做文章和绘制书刊杂志封面，当时用的是“叶沉”和“一沉”的笔名等。这些也是行将湮没的史实了。

可惜徐先生的《新录鬼簿》不曾继续发表下去，否则会给新文学史提供更多的史料。

1983 年 7 月

《沙滩小集》的踪影

周作人的随笔集《立春以前》于1945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是他在沦陷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就在这本书中，收有关于《沙滩小集》的一篇序，写于1944年12月。当年我很想找到这本书一读，因为这是为纪念周作人六十岁诞辰而出版的一本纪念集。1945年4月，北京谢兴尧编的《逸文》杂志上又刊出新民印书馆正在印刷《沙滩小集》的消息，并称书内“南北名家均有祝贺文”，那时已临近日本投降，此书是否问世了仍是个疑问。

《沙滩小集》是由傅芸子编辑的。傅是旧京一位文史学家，主编过《北京画报》、《南金》、《国剧画报》等刊物，是版本学家傅惜华先生的兄长。原书初名《汉花园集》，后改《沙滩偶语》，最后才定名《沙滩小集》。周作人说：“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着少数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看来作者以留在北京的友人为主，其中亦收有周作人的几篇文章，周说：“朋友们的好意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不是有意义的事。”从研究周作人的资料来着眼，《沙滩小集》当是一本可读的书。稍后抗战胜利，又在讨伐汉奸，出版这样书确实不合时宜。《沙滩小集》即使印了也只能胎死腹中，难觅踪影了。

近时浏览杂书，三十余年来对《沙滩小集》的疑团，总算弄清一点眉目。我从傅芸子写的《近年来国学研究在北京》（刊1945年1月出版的《文化年刊》第一、第二卷）一文注释中觅得《沙滩小集》的部分篇目，计有俞平伯《论语孟子之起讫问题》、江绍原《周羲大畜上爻辞何天之衢新解》、瞿兑之《传说证误举隅》、郑骞《洛阳伽蓝记丛考》、傅惜华《李卓吾著作考》等。看来书内多为学术论文。不见论及周作人的文章和回忆性的散文。

《沙滩小集》未能问世，但在日本东京却编辑出版过一本日文版的周作人六十诞辰纪念集，即1944年9月由东京光风馆出版的《周作人先生纪事》。本书由自称周的学生的方纪生编辑，当时方正在东京任华北驻日留学生的监督。书内共收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林芙美子、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鹤见祐辅、山本实彦、吉川幸次郎等十八篇文章，分别记述了他们同周的交往或对周的印象；附录周作人谈日本的文章四篇。编者方纪生除了序言外，又写了《周作人点滴》，并编制了周的著作年表。此外，还收有周的墨迹、照片等多幅插图。封面是由武者小路实笃画的一幅彩色水墨画。该书只印了一千册。方纪生说，在周的六十寿辰前，有人即议论最好的纪念当然是出版周的全集，或设立文学奖金等，但考虑到时局的关系恐难成功，遂想到利用自己在东京的条件，取得日本作家的支持，编印了这本纪念集。至于编者方纪生，我只见过他战前出版的两本译著，即《文学家的故事》和《性风俗夜话》。北京沦陷期间，他还主编过《朔风》文艺杂志，“文革”以前亦偶有译著发表。

《西行漫影》之谜

《西行漫影》，大 32 开本、以 64 幅照片组成的表现延安抗战生活的图片集，1946 年 1 月上海画报公司出版，共印道林纸本 2000 册。摄影作者是战时美国《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福尔曼。

本书“前言”称：“中国共产党所建立和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广大的解放区，由于国民党和敌伪严厉的新闻封锁，在许多人心目中，成为一种神秘的谜。”当时有很多外国记者要求去解放区采访，遭国民党政府拒绝，“直到 1944 年，许多旅渝外籍记者又作要求，当局终于被迫应允。”“福尔曼就是 14 个记者中的一个。”他从延安归来写了一本《赤色中国报告》，《西行漫影》的图片即从本书中选来。图片集中并附原书的英文图片说明。

画集出版于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期，对广大国统区的人民来说，正是一本非常适时的读物。此刻，国民党一方面制造欺骗宣传，一方面疯狂地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人民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真相，而一个并非左倾的记者，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美国人，以自己耳闻目见的经历，对解放区人民的抗战作了热情的报道。这对国民党是个绝妙的讽刺和打击。

福尔曼对延安的抗日士兵怀有极大的兴趣，对于制造土炮、地雷的民兵们，他的摄影镜头也没有放过。他还拍摄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以及日伪俘虏的照片。对于陕北的窑洞，基层干部、妇女、儿童，以至领袖人物毛泽东、贺龙等也留下了镜头。他以诚实的态度对红区人民的的生活如实地作了介绍。这正是国民党当局最害怕的。

《西行漫影》的问世堪称三快：一是 1945 年刚在纽约出版了《赤色中国报告》，同年 12 月上海画报公司便得到了这本书。二是有关编辑人员立即选好摄影作品，译好文字说明。此外，附加地图说明，并根据形势发展编制了解放区光复城市的统计表。编辑计划是严密的。第三是出版周期快。12 月 15 日编者写好本书“前言”，新年 1 月份书便印制完成，正式发行。可以说这是一种战斗式的工作日程。

对于这样一本反映解放区人民抗战的书，国民党怎会任其流传，存世的当不会太多。六十年代初，我在南京中山东路的古旧书店以三角钱得之。版权页上没有上海画报公司的地址和编者姓名。我怀疑这个画报公司实际上并不存在，虚设其名，不给对手留下把柄而已。事隔半个世纪了，我曾求教于当年在上海地下党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前辈，无结果。难道这段革命出版史话永远是个谜了吗？

1996 年 11 月

柳亚子与林庚白

林庚白（1898—1941）在香港九龙遭日兵枪击殉于抗战后，夫人林北丽整理庚白的遗作旧体诗，编为《丽白楼自选诗》一册，1946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封面题字者叶圣陶先生，同时也是该书的负责编辑。书前有柳亚子先生执笔的《林庚白家传》、林北丽的《序》及《庚白的死》。附录十种，其中八种为林庚白散篇旧作，两种为林女士的《博丽轩诗存》和《更生集》，女士亦诗人也。书末又有亚子先生的一篇题记，剧赏庚白夫妇的诗作，最后说：“老夫耄矣，忽复逢此劲敌，惭喜交并，聊书数语。”时在1944年4月。应该说为了《丽白楼自选诗》的出版，亚子先生也尽了力。

偶读柳亚子先生的散文《怀旧集》一书，在《更生斋随笔》中有一则《记林庚白》，述及他自1928年以来与林过从最密。亚子先生认为庚白的诗“理想瑰奇而魄力雄厚”，又说：“庚白思想颇前进，而生活未能脱离士大夫阶级传统之积习，余曾戏目为‘客厅社会主义者’，庚白亦笑颌之。”这真是知者之言，比喻亦妙。我们若从庚白的诗集中，寻找一些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人与事还是不难的，证明他确实拥护社会主义学说，这在他人的旧体诗集中不易见到的。

林庚白曾经加入过南社，却又看不起南社的诗人。亚子先生在南社坚决反对同光体，为此与社内名流发生分歧，却把林庚白引为同志，以为只有他们两位才可以并列为南社的代表。亚子先生在《我的诗和字》（刊重庆《客观》周刊）中，分析了他与林庚白诗作的异同，他说：“我的诗和庚白的诗来源是不同的。庚白由唐入宋，再由宋入唐。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的，却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入诗。他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我不敢贸然附称，但也并不反对他。我自己呢，庚白死后，从淞妹那儿读到了他的全集，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到现在，我很想做一个丽白楼诗派的继承人。”这是1945年12月的事，到了1949年4月，亚子先生已经到了北京，他对林庚白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的说法已经无异议，此言见于寒斋所藏的亚子先生持赠陈叔通先生的《丽白楼自选诗》上的题字。亚子先生用钢笔写在书的封面上：“庚白一代天才，造诣甚深，非曼殊所能企及，方驾杜陵，岂狂语哉！”亚子先生一向推崇林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更高。

1940年，林庚白曾经着手编辑一部《今诗选》，共收民国纪元以来的诗人百余家，这里自然表现出选家的目光。于新诗人中，他选中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诸人，更有鲁迅和毛泽东的诗作，在当时这要一定的识力与魄力，可惜未能终稿。

《春寒》的故事

夏衍同志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春寒》，是1947年11月由香港人间书屋印行的。我收藏的一本得自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书品极佳，就像是刚刚印出来的一本新书。淘旧书的人难得碰到这样的好机会。

小说描写抗战初期至皖南事变这一时期，在广东战区的青年们参加救亡工作的情况。书中写到他们思想上的苦闷，也写到他们的感情生活。小说刚一出版，同年12月13日香港《华商报》便发表了作者夏衍的《关于〈春寒〉答读者五问》。最主要的一点是，一位读者向小说作者提出：广东的抗日先锋队组织在当时已相当活跃，是有目共见的，为什么作者在书中只提到他们的被捕，没有展开地去写他们的活动？作为一种读者意见，按说什么要求都可以提，但是，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来说，这一要求就值得研究了。这让我们联想起后来对电影《武训传》的某种批评，即批评者不就作品产生的时间环境，也不顾作者创作构思的规律和条件，责难影片何独只写武训而不去写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景诗？宋景诗当然应该写，可那是另一部影片的任务。至少这种批评有点求全责备。当时，夏衍同志对读者作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本书一开头就决定了以少数外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其间几次想多写一些‘抗先’的故事，我所知的材料就如‘后记’所说，可以另外写一本小说。这本书写于整风运动之前，你所指出的无疑的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

1980年，我写了一篇《夏衍的诗作》，收在拙著《书边草》中。夏公收到我的赠书后，于1982年3月14日写给我一封信，内容与《春寒》有关，今摘录如后——

有一篇文章提到我，累你“遍查”了我的著译目录，居然给你查到了我写的诗，但是，你只查对了一小半，一大半还是“中了我的计”。现在应向你坦白一下了。《春寒》中吴佩兰流亡途中在船上写的那首“不像诗的”新体诗，的确是我自己写的，但后面萧琛写的那两首七绝，就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抄”来的了，这两首诗是我的一位同年辈的朋友写的，我很欢喜，抄在本子上了，后来写到这个地方，“灵机一动”就用上了，——当然后来出单行本时征得了作者的同意。老实说，我写不出这样的好诗。

这位写诗的朋友是谁？老作家钟敬文也。但钟先生已不记得了。后来林同志在桂林查阅《救亡日报》，终于发现钟先生发表的旧诗中有此两首，复印了一份带回北京。钟先生一见方才恍然。他对笔者说：“还是老夏的记忆力好。”此亦有关《春寒》的一段掌故。

前几年，我在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了黄蒙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春寒及其他》，谈到他偶然经过坚道而想起当年并无其址的人间书屋，并忆及《春寒》出版时的某些细节。人间书屋是由几位有理想又不得不日夜为衣食而奔忙的穷知识分子所办，其中就有木刻家新波同志，他又是人间画会的创办人。黄蒙田先生当时是书屋同人，也是画会成员。他告诉我们《春寒》的排印本，“不是原稿也不是剪报，而是别人的手抄本，经过作者修改、润色和校正最后清样。这手抄本是章道非女士到图书馆借了《大众生活》抄下来的。她是新波夫人。”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当年人间画会和人间书屋青年同人的奋斗精神，不禁怀念起新波同志。到今年，新波已经逝世十年了。

十年前，我曾将自存的《春寒》初版本送请夏公签名留念。他用墨水笔写了如下几行——

韬奋同志在香港办《生活》周刊，曾连载茅盾同志长篇《腐蚀》，哄动一时，《腐蚀》完稿后韬奋同志命予滥竽充数，乃有此作。三十年后见之，更增惭汗，致此数语，供德明同志一笑。

——夏衍 1979 年 9 月

题语中的《生活》周刊，是《大众生活》之误，所谓三十年后更增惭汗，自然是谦词。

《围城》的封面

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于电视剧改编的成功，如今已是众人纷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赶印了六万册，以应书市的急需。

《围城》的初版本，1947年5月上海晨光公司出版。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一种，封面设计都是统一的，每种只要更换书名和颜色，及右下方的一幅画即可。比如徐志摩的《志摩日记》和老舍的《老牛破车》，右下方都用了作者的照片，而《围城》由丁聪作画。但是，书中并无说明，以至多年后连画家也忘记此事。丁聪用十分简练和流利的线条，描画了一对背对背的男女半身肖像。男主人公手持烟斗，颇具绅士派头。当时丁聪为很多文艺书刊设计了封面，常作人物半身肖像，如骆宾基的小说《混沌》，以及凤子编的《人世间》等都是。我曾经问过画家何以如此，他说如果把人物画成整身，或再加上环境描写，岂不成了书籍插图？反之则可突出地刻画人物形象。我为他补充说：“你的封面人物画，给人一种雕塑的趣味。”其实这也是我四十多年前读他封面人物画的感觉，只是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1948年9月《围城》再版，封面画换过了，亦无说明和介绍。换上的似乎是一幅绘画或文学插图，看不清画中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画中一男士坐在桌旁吸雪茄，一女士背向男士伏在柜前面壁凝思。我以为用这幅画不如丁聪的设计单纯、鲜明。直到前几年，我偶然读海外的报刊，见到有人介绍英国现代画家华尔德·理察·锡克特，所附的插图正好是《围城》再版本用的那一幅画，标题为《烦恼》。这是一幅油画，它同丁聪的设计有相通和巧合之处，都是在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烦恼，而且主人公都是一对男女。这是否就很典型地体现了《围城》的主题，真是见人见智。

据介绍，华尔德·理察·锡克特（1860—1942）是英国印象主义派画家，受了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影响，他也走进“外光派”的行列，即这些画家都喜欢直接利用室外的自然光来作画。他定居英国，但每年都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借以了解世界美术的新潮流。他善于作风景画，主要表现光的效果和某种气氛。1914年创作的这幅《烦恼》，是着重描写室内场景和人物心理动态的肖像画，颇受时人重视。《围城》再版本换上它来作封面，可能是借用它的讽刺、象征意味，这与书的总体气氛也是吻合的。也许以为它的内涵比丁聪的设计丰富些？

我在1949年3月出版的《围城》第三版扉页上，又见到DG创作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博士装男士，一裸女，一条远洋客轮。博士帽、文凭、论文、洋装书和笔均已腾空而飞。看来这也是为了呼应书的内容而作，不过稍欠含蓄，美感无多，从艺术的角度考虑类如蛇足矣。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排修订本，排除了先前设计的一切因袭，封面完全改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更不要说人物图影了。封面当然不一定出现人物形象，但这个封面又过于庄重古板了，甚至可以说缺少文学书的意味，与《围城》的声誉影响有些不相称。

李广田的《引力》

《引力》是李广田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1941年7月，他在昆明开始写，只完成了三章便搁笔，到1945年7月7日，才利用暑假在昆明附近的呈贡县斗南村继续创作。写到结束的第19章，即8月11日，已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这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抗日题材的小说。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反对蒋管区的黑暗，向往解放区的光明，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内容。

小说不是写真人真事，但李广田笔下的人物明显地带有自身的影子，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差不多没有凭空捏造，所以写起来遇到极大的困难，那些真实的现成的材料已经成了他写作上的障碍，“反不如出于自己想象中的事物更方便些。”（引文见作者1941年8月6日的日记）1947年，李广田从昆明来到天津南开大学，3月底他在付印本书时在《后记》中说：“……我的幻灭之感大半由于觉察自己的小说算不得‘创作’，也不过是画了一段历史的侧面，而且又只画得一个简单的轮廓，我几乎相信我自己有一个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于勉强写些短短的散文而已，这样想时，就难免有一种无可如何的哀愁。”这里有自谦，也有对散文的自信，而《引力》仍不失一部成功之作，只是它问世于战争环境中，人们处于历史大变革的新旧交替时代，无暇注意而已。就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抗日题材的小说而论，它虽不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那么丰富多彩，在思想深度和人物的刻画方面与其他说部相比并无逊色。

可惜从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初，《引力》一直没有重印过，以至很多读者只知道李广田的散文和诗，不知道他有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1983年4月，宁夏人民出版社重排印行，流传不广，笔者没有见到，而我收藏的还是建国前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初版本。

这样一本献给抗日战争的爱国小说，在“文革”中竟成为作者的罪证，“造反派”诬蔑它咒骂中国共产党，是“大毒草”。了解李广田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性格沉静，处世谨慎，但是在“造反派”们的压力面前，他实在无法忍耐，于1967年9月7日勇敢地写了《最后的回答》，对于《引力》他是这样讲的：“小说《引力》写于1945年，主题是抗日、反蒋、向往解放区。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历尽千辛万苦，从敌占区逃到蒋管区去找她的爱人，但等她到达蒋管区后，她所要找的人早已到解放区去了，她自己也就马上离开了蒋管区，到解放区去了，这就是故事的主要情节，书名《引力》，也正是为此。……小说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即日本法西斯特务石川，他对中国学生咒骂过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当然要骂我们。难道叫这个法西斯特务歌颂中国共产党吗？也许你们有这种本领，我自己是不行的，整个小说写的最多的就是揭露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其中也就写了一个骂共产党的石川。批判文章的炮制者诬蔑我借日本人之口骂共产党，我坚决反对这个诬蔑！”尽管他在最后喊出：“坚决反对颠倒是非，构人于罪的做法”，到底没有逃出“造反派”的黑手，逼得他在一年之后仍然悲愤地投湖自尽了，走了同老舍先生同样的路！

《引力》出版后，我作为新书购自天津，解放后带来北京。在反右派斗争后的大炼钢铁中，连同晨光版的一批书卖给了旧书店。起因于在运动中有人批评我喜欢现代文学是思想陈旧，一气之下以卖旧书的行动作为无声的抗

议。这是阿 Q 式的反抗，看来遇事不能赌气，吃亏的还是自己。不久即从旧书店重又购回一本《引力》，这也是劣习难改吧。但，这次购得的是李广田送给曹靖华先生的签名本，时间是 1948 年 9 月在北平，那时李先生已由南开调到清华大学来教书。目前有关李先生的传记、年谱，以及 1986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广田文集》五卷本，都据《引力》原书印的时间定为 1947 年 6 月出版，而我的藏本由作者把“7”改成“8”，证明原书印错了。此外，作者还一一改正了书中的错字，足见李先生的严谨作风。

不可理解的是书中有陈烟桥先生作的插图、封面画和扉画共 11 幅，插图是素描，扉画和封面画都是木刻。木刻画中表现的正是女主人公追求光明的图影，生动地传达出“引力”在解放区的主题，不想在书中的版权页和作者的“后记”中竟对插图作者没有一个字的说明。

1996 年 10 月

第三辑 杂志拾遗

太平洋上的小品

冰心先生回忆赴美留学时，讲到在船上认识了梁实秋：“梁实秋是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是1923年同船到美国去的，我认识他比认识文藻还早几天，因为清华的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种文艺刊物，叫作《海啸》，约我和许地山等为它写稿。”（见《悼念梁实秋先生》）当年在上海启程的这条远洋轮上，乘客们差不多全是中国留学生，光清华来的就有近百人，冰心和许地山等则来自燕京大学。看来，《海啸》的主要编者就是梁实秋，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许地山，其实亦刚过三十岁。从办《海啸》的兴致上，可见他们正热恋着文艺女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幻想。

《海啸》是怎样的一份文艺刊物呢？恐怕是手写本吧。如今还能找得到吗？时隔七十余年，原件怕已无存了。

顾一樵（毓琇）先生现居海外，他在《纪念许地山先生》中讲到，他们于1923年8月13日乘杰克逊总统号出发，他和梁实秋、许地山、冰心“合编舟次壁报，取名《海啸》，三日一刊”。原来这是一份壁报，至少出了几期。梁实秋在《忆冰心》里讲得更加具体：“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晕船，我们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文学性质的壁报，张贴在客舱入口处……”壁报原件虽无处可寻，但是不必遗憾，当时他们曾经从中选出14篇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在1923年10月出版的第14卷11期上发表了。14篇作品以《海啸》为总题，组成一个小小的专辑，全部内容是：冰心的诗三首，《乡愁》、《惆怅》、《纸船》。许地山的小说三篇，《海世间》、《海角底孤星》、《醍醐天女》，还有一首诗《女人我很爱你》。梁实秋的诗三首，《海啸》、《海岛》、《梦》，还有两首译诗《约翰，我对不起你》、《你说你爱》。顾一樵的小说《别泪》，又译哈姆生《维多利亚》之一节《什么是爱》。

刊物上发表的《海啸》题图，很可能是原来壁报上用过的，还装饰有一条远洋客轮和一只飞翔的海鸥，副题是：“约克逊舟中太平洋上几个旅客的小品”。在追求未来生活的航程中，几位青年人又不失雅兴地吟诗作文，倾泻了离国时的复杂感情。十几天的海上漂流，竟然结下如此丰硕的果实，让后人领略了前辈留学生们意气风发的才气。

这一组太平洋上的小品，均已收入四位作家的各自文集中，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诞生的经过和当年发表时的一段因缘。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不少题目又都涉及到大海，没有离开梦和爱。有三位作家又都写到了母亲。从许地山的文字里更可呼吸到佛家的气息。对新文学有兴趣的读者，很自然会感受到，在他们开始走向创作的早期，已经显示出各自的风格。

我有幸保存了一册《海啸》的单行本，那是作为“小说月报丛刊”的第27种，192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64开袖珍本，薄薄的66页，距今也已七十年了，能说不是一本有珍藏价值的纪念品吗。

《骆驼》和《骆驼草》

1926年7月，北平北新书局印行了一本文艺杂志《骆驼》。刊物方型，道林纸印，内附精美插图十余幅，都是法国米勒的名画，配合张定璜本期的译作《米勒传》。

封面“骆驼”二字为草书，中间有一静物水彩小品。扉页上贴有小纸条，书曰：“这个小杂志出版，承下村泰三君作封面画，沈尹默君题字，并承别的诸位朋友帮助，至为感谢。民国十五年七月，骆驼同人。”每页下边又印有下一页开头的第一个汉字，这是欧洲古典印刷的方法，据说为了阅读和检验是否缺页的方便。中国读者未必习惯。

所谓“骆驼社同人”或“骆驼社”，实际仅周作人和徐祖正二人，或者说主要是徐祖正。后者自号的室名即“骆驼书屋”。他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也是《语丝》杂志的撰稿人。《骆驼》第一集以主要篇幅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此外有周作人的译作两篇，一为《希腊牧歌抄》，一为葛理斯所著《论左拉》。另外还有沈尹默的《秋明小词》和陶晶孙的《盲肠炎》。

编后有《沙漠之梦》两篇，周作人说，《骆驼》原拟1924年出版；徐祖正说：“两年半以前我们几个人想合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内中要登我们的力作。”他的《兰生弟的日记》当然也是“力作”。读起来却如不顺畅的译文，如“她这封信是直截的否拒了我的爱。……我反尔去注意她当作拒绝理由泄露给我的那段失败谈”。

鲁迅先生见过《骆驼》，1926年7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得小峰信并《骆驼》两本，即复。”

《骆驼》的创刊号，实亦终刊号。

如果说《骆驼》是发表创作和翻译的纯文学刊物，那么4年后于1930年5月12日在北平创刊的《骆驼草》则接近于《语丝》的形式，特点是增加了评论。

刊物为16开本，每期8页，共出26期，至同年11月3日终刊。主要撰稿人还是《骆驼》的成员周作人和徐祖正。扩大的作者有冯至、俞平伯、徐玉诺、吴伯箫等。不过从刊物上连载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及他不断与读者、作者通信联系来看，应是废名执行编务。

《骆驼草》的发刊词标榜只当“秀才”，不管政治，为此宣告：“不谈国事。既然立志做秀才，谈干什么呢？”又主张：“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其实他们何尝只想玩古董，就在创刊号上废名再化名丁武写了攻击鲁迅的文章。那是讽刺由郁达夫、鲁迅领衔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的，竟骂鲁迅“丧心病狂”。这哪里是不谈政治。

鲁迅看透了《骆驼草》的用心，他在1930年5月24日复信友人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鲁迅先生对此似乎并未还击，让人想起他当时对北平诸公的看法：“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这种滋味很不好受。

丁武在第3期上又发表了《闲话》，表面在恭维鲁迅的小说，却不屑于

道及鲁迅的杂文。

徐祖正也发表了多篇文艺论文，对于普罗文艺语多偏见，还写了《文学运动与政治相关性》等文章，恰好自我否定了刊物“不谈国事”的宣言。倒是周作人的散文真的没有什么锋芒，保持了闲适的笔调。他写《村里的戏班子》，描述绍兴乡俗，引了一首歌谣：

台上紫云班，台下都走散。

连连关庙门，东边墙壁都爬塌。

连连扯得住，只剩一担馄饨担。

鲁迅在《偶成》里也引用过，文字稍有不同：

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

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同样的一首民谣，乃弟出于民俗趣味，乃兄却用来讥讽统治阶级串演的愚民政策怎样地不得人心，没有好收场。凡是不存偏见的人，当可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说《骆驼草》继承了《语丝》的余风，如就形式而言还差不多，就其主要倾向和思想内容而言则淡得多了，至少连《语丝》对旧社会的不平和微词也不那么明显了。

1982年7月

朱湘编《新文》

诗人朱湘(1904—1933)的诗集《草莽集》和罗念生编的《朱湘书信集》，近年先后重版了。于是，读书界又多认识了一位早逝的、有才华的诗人。

朱湘热心于诗的评论，他对于徐志摩的诗评价不高，认为除了《翡冷翠的一夜》以外，很多诗是令人作呕的。又以为徐志摩自己最满意的所谓哲理诗，恰恰是最失败的。朱湘在他的散文随笔集《中书集》里说：“徐君没有汪静之的灵感，没有郭沫若的奔放，没有闻一多的幽玄，没有刘梦苇的清秀，徐君只有——借用徐君朋友批评徐君的话——浮浅。”这种直言，对于“诗哲”乃是大大的不敬，可又不是空言谩骂，洋洋洒洒地进行了分析。朱湘的才气表现在诗作上，同时也反映在他那议论风生的散文随笔里。当然，不免过于自负，对人也稍嫌苛刻。这苛刻可能缘于他的孤傲。

自负还表现在他自编的、只发表他个人作品的文艺杂志——《新文》月刊上。他向社会征求订户，企图长期办下去，想得相当浪漫。

我寻觅此刊颇久，无所得。绝望多时，忽于申江意外发现，不禁大喜。《新文》是个32开的书型小刊物，第一期于1927年1月出版；只有22页，无出版处，由朱湘自费印行。其中有诗作《烽火》、《恳求》；译诗《晨歌》、《美人》；散文三篇，《咬菜根》、《梦苇的死》、《月圆室之文》。还有一篇是朱湘的“启事”。这则“启事”当属新文学史料，照录如下：

在广告里本来说了这一期要有《颐和园》、《我自己的诗》、《改良标点》三篇文章的。就中除去首篇要等加上春的颜色再送到读者之前以外，别的两篇我都决定不作了。

诗人要自己来解释，这未免是丢当代评坛的丑。至于改良标点，我现成的有榜样在这里，读者自己自然会拿去与那些杂货铺一般的新式标点的书互相比较，看究竟是那个干净。

读者对我的诗文如有话说，极其欢迎，来信请寄北京清华学校。

诗人所谓的“改良标点”，只不过是取消逗号，用圆黑点来代替而已，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标榜的。

《新文》的第二期于1927年2月出版，仅十六页。发表了诗作《小聚》、《我如》；译诗《仙童歌》、《情歌》；散文随笔《书》、《空中楼阁》和《月圆室之文》。看来“月圆室”是朱湘的斋名。头一期推荐了冯雪峰的诗，第二期则介绍了沉钟社的作家杨晦。从两期《新文》里，可以看到朱湘在清华大学怎样热衷文学活动。

《新文》只维持了两期，这不免令诗人感到寂寞。1927年5月25日他给吕蓬尊的信中说：“《新文》第三、四、五各期之稿，久已草就，惟因手头拮据，不克如期印行，焦灼奚似！”他不想放弃《新文》的梦，计划用售与北新书局的《英国近代短篇小说集》的稿费来继续办刊。又因留美在即，计划六期至九期之稿，到美国整理后寄回。到了8月，《新文》第三期仍无消息。诗人公开征求订户，来订《新文》的只有二十人。诗人想着：“五年之后，想必五百份总可销得去。”再期以五年，他便可以完全以著作编译来谋生，尽情去做自己乐于干的事情：“我身受文人之厄难，将来年壮之时手头宽裕，一定要开一书屋（文同书屋），拿重价收买稿集（好的，不是好销的）觅妥人经理，凡托书屋代卖的书籍都要先经过我的选择。”（见1927年5月26日致罗皑岚信）这美好的幻想，仍然带着书生气，注定了梦的破灭。几年之后，诗人终于投江自沉。

两期《新文》，是诗人留给后人的纪念物。每逢我翻开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时，想笑他的天真不能，想怪他的书呆子气也不能！清华园里出现过多少富有魅力的人，朱湘也是其中的一个。

1985 年 6 月

《血潮》

倪墨炎君治现代文学史，独重当年文网史料，曾去南京查阅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有关档案，开拓了新文学史料研究的领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善于利用反面资料，印证进步文艺生存之艰危，暴露了反动当局的专横和阴暗心理。查封刊物和书店，恰是独裁政府在政治上一贯主张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的再现。倪君的《哀 江南 和 血潮 被禁》（见 1993 年 7 月《出版史料》终刊号），提供了南京政府查禁这两种书刊的函件、训令等档案多件，足证其凶残怯懦之嘴脸。其中查禁《血潮》月刊的事，先由北平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宣部呈报，中宣部又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将此事通知了国民政府，再由政府通知各省、特别市及江苏省政府查办。时在 1928 年，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一本小小的文艺刊物，竟然经过当局的诸多机关插手，这内幕很难让人预料。

《血潮》是 1928 年 7 月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的，小 32 开横排本，厚达一百三十多页，最先由北平特务们发现，经国民党中执委确认为“共产党的宣传刊物，自应从严查禁，以遏乱萌”。又命政府封闭励群书店。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于 1929 年 3 月 26 日向南京政府报告了执行情况，法院、教育局及巡捕房西探均曾出动，虽然几番查询书店，并设法觅得一本《血潮》，“但终归无着”，因为书店早于 2 月 9 日旧历除夕主动关闭。《血潮》是否共产党办的刊物，励群书店的背景如何，当然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墨炎君未见原刊，以为可能没有问世。但，《血潮》确曾出版过，而且在 1928 年 8 月 15 日还出版了第二期。

创刊号发表有芳孤的论文《血潮拥起的第一声》，似乎可以作为“代发刊词”来看。作者明确提出：“处在今日而谈到革命，除了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推翻现代社会组织以外，更无真的彻底的革命。处在今日而谈革命文艺，除了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情感的出发点以外，也无更所谓革命文艺。”如此无遮掩的公开宣传推翻现存的社会统治，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怕是不够策略的。此外，署名藻雪的诗《东方的奴隶们》，亦多生硬的口号，如“杀出一条血路”之类。刊物的作者比较陌生，只有“凝秋”和“凤城”较熟悉。前者为陈凝秋（塞克），后者为顾凤城。第二期刊物有画室（冯雪峰）翻译的《诗人叶遂宁的死》，是日本作家藏原惟人的一篇论文。还有署名绍虞的小说《新年的回忆》，写于四川万县，是否文学研究会郭绍虞的作品待考。

两期均设有杂文专栏《莫名其妙》，态度激烈，杂有谩骂，如标题即为《他妈的校长布告》。洁梅的《幽默》一文，提出阿 Q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血花飞溅的时代。违忌的《呜呼！革命文学家》一文，骂编印“非现代需要”的诗文小说集者为：“他妈的，原来他还有这样一个理由！”这些作家不过说了要将旧作收集起来，留为纪念而已。连“留为纪念”都成为错误，显然这都是一些过激的言论，几乎不想作任何分析和讨论。

透过严密的文网，曾遭“从严查禁”的两本《血潮》还是保存下来了，而且寒斋所藏亦未必是孤本。想不到连上海图书馆亦不藏，这倒令我感到意外了。说来亦巧，我先得《血潮》第二期于上海四马路的上海书店，不想数年后在北京的海王村中国书店检得《血潮》创刊号，有此书缘，今天才有幸为倪君的大作补上一笔。

潘汉年和《A11》

《A11》，这是潘汉年到创造社以后主编的第一种刊物。

刊物的名字很新鲜，原来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刊物即以门牌号数为名。说是刊物，实为小报，每期八开四面。

1970年11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叶灵凤先生的一本随笔集《晚晴杂记》，其中收有一篇《A11的故事》，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介绍这个小报的文章。他说：“提议出版这个刊物，以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责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那时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多读者联络得很好，因此，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作为创造社的一种刊物，《A11》比较稀见，是我们研究潘汉年同志文学活动的重要资料之一。这里既见潘汉年的编辑才能，也能见到他是擅长写杂文和政论的。刊物有四版，只有一版是书刊广告，将近三个版刊载政论和杂文。

《A11》的创刊号于1926年4月26日发行，无发刊词或卷头语，只有潘汉年的一篇文章《A.11.》，说明刊名之由来，以及办报宗旨：“朋友们，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那四周围沉闷的碳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A·11》。”这也说明刊物是由广告印刷品扩大而成。

每期第一版设有一个专栏“A11.新闻小报”，经常披露创造社成员的一些活动，诸如报告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成仿吾在广东的消息；叶灵凤背了十个画布框，一个三脚架到扬州去作画，周全平也跟去了，等等。当然，这个专栏也报告创造社以外人员的活动，如第2期有悼邵飘萍的不少文字，其中一条写到鲁迅先生，所据系传言，显然含有讥刺之意。大意说鲁迅在北京于“逮捕声中”，躲入了六国饭店，而该饭店每日需费60元，一月要1800元，“所以没有住几天又跑到旁的地方去了”。这些文字历史地反映了当时创造社的人们对鲁迅先生的某种情绪。

1983年2月

《A11》的命运

据叶灵凤先生回忆，当年创造社出版部的刊物《A11》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这些都是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北方的胡适、刘半农，还有当时正在受人注意的张竞生，都是经常被攻击的对象。”“小伙计”们经常骂人，这是因为他们以为骂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并非不道德。有时不免出语伤人。如骂刘半农，不过是他的诗集《扬鞭集》用了古色古香的线装形式，罪名是“复古”。到大革命失败以后，潘汉年仍坚持写杂文，文风有变。

《A11》于1926年5月26日出版了第5期便遭军阀查禁，罪名是“反动”。

潘汉年不肯就此罢休，同年6月他又创办了《幻洲》周刊，这还不是后来同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在6月18日出版的《幻洲》周刊第2期上，估计是潘汉年写了一篇《A11周刊紧要启事》，可以当作《A11》结束的声明来看，史料珍贵，节录以存：

本刊出版才五期，为时也不过一月，然而这个小小的刊物倒受了不少挫折，——敌人暗中放冷箭，警厅扣留，要求邮务管理局认为新闻纸类“未便照准”，所谓联军宪兵司令部禁止邮寄，……直到今天止，我们不得不在我们一阵冷笑中宣告这个放屁刊物最后的命运——停止出版！

这是我们对读者十二分抱歉，对自己二十四分内疚的！没有狡猾如兔的手段，说话没有模棱两可高本事，弄到有今日的结果！但是我们闷居在黑暗里总得要追寻光明的，屈身疲乏苦闷中，也得要企求兴奋和愉快的，朋友，请你等着吧，我们还要找其他说话的机会！……

然而，这“说话”的新阵地——《幻洲》周刊的命运也不佳，两期之后又夭折。

潘汉年为出版部的小伙计们的思想与生活作了一幅写照，登在《A11》的第3期《代放屁小报宣言》一文里：“……我们只晓得以劳力换金钱，不，人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我们出版部里的小伙计，每天十二小时工作还不啻，我们所得到的，只有每月十元或五元的工钱。我们也不怨恨谁，也不可怜自己生在这个畸形时期，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且让自己做先锋，杀开一条血路，为我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这个《A11》不过是工作疲劳时的讴歌，借此想舒松舒松个人的闷气而已。”

从《A11》里可以看到，潘汉年一走上文学道路便是反抗的。至于《幻洲》周刊的夭折，恐怕不是由于外部的压迫，而是出于自己要正式办一个文艺刊物《幻洲》半月刊的计划；也为了尽量抹去创造社出版部广告宣传品的色彩吧。

1983年2月

《幻洲》周刊

《幻洲》周刊是潘汉年继承《A11》的未竟任务而办的一本 32 开的小型刊物，1926 年 6 月创刊，6 月 18 日出版了第 2 期即告结束。

这是同年 10 月 1 日潘汉年、叶灵凤合办的《幻洲》半月刊的前身。后者在创刊号发表过一则启事，特别声明创造社出版部过去办的两期《幻洲》周刊同新的《幻洲》“性质完全异样，并无连带关系，恐有误会，特此声明”。所谓“完全异样”，我以为主要是原来带有创造社书刊介绍的性质，是出版部的一种宣传品，如出版部招股办法及优待等事占了一定的篇幅，甚至还有入股者的名单。《幻洲》半月刊则纯属文艺杂志。

《幻洲》周刊第 2 期上有潘汉年写的一篇《晓舌》，原来他们又常以“骆驼”自居，如说：“‘黄梅时节雨纷纷，小伙计们欲断魂！——A 字 11 号里的一群孤骆驼，近来都有些伤心落魄的样子，……’又说：‘啊，变了，变了，A 字 11 号的孤骆驼们也变了：有的为了夏天已到，赎不出寄存在当铺里的夏布大褂，叫苦连天；有的为了半夜里受不住臭虫蚊子的侮辱，叫苦连天；有的为了找不着一个女字旁的她，叫苦连天；……有的为了跑进六个子儿一碗的小面馆，没有一点酸醋、辣糊，叫苦连天；总之，在人家看我们这群孤骆驼，太不安分守己——变了！’骆驼只能在沙漠世界中默默地前进，却又是一群反抗的‘骆驼’。就在本文里，潘汉年愤愤地写道，那些高贵的人们‘与我毫不相干，我却觉得个个是我的敌人；那些可爱的青年，尝了一点甜味，居然忘了本来的面目，也变做了摇尾乞怜的狗仔；那些粉头油面的女郎，出了学校门，一个个映入我的眼帘，没有一点可爱，……’这些，都比较含蓄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一部分知识青年的苦闷。

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们为什么又自称“骆驼”呢？恰好《幻洲》第 2 期上有一篇署名“骆驼”写的《我为什么要叫骆驼》，正可回答这个问题。作者“骆驼”，即周全平，稍后他即以这个笔名为潘汉年主编的《幻洲》半月刊写过不少文章。周全平的看法可以代表当时“小伙计”们的思想。

文章开头说：“倘若要问：我为什么要叫骆驼？那么直截痛快的一句答辞：因为我的生活是骆驼式的生活；我的周遭是荒茫茫的一片沙漠。”“骆驼”们正在承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两种压迫，负重地向前。他们不愿作媚人的猫，也不愿作乖巧的哈叭狗和肥肥的看家狗，“然而偏偏只会做一个骆驼。骆驼是应该在沙漠中奔走的，……”在茫茫沙漠中行进的一批骆驼，在社会发生巨大动荡的时刻，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果然发生了分化，有人竟甘心去作媚人的猫和哈叭狗了。而潘汉年不仅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洁性，而且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他不仅象一头骆驼继续在沙漠中前进，而且变得像一匹猛烈的狮子。熟悉潘汉年历史的人知道，正是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考验，他已成为一名出色的革命活动家，给敌人造成了不小的恐惧。

1983 年 2 月

《幻洲》半月刊

1924年潘汉年参加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同伴青年中还有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等人，被称为创造社的一群“小伙计”。平时他们干的是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包，送邮局等劳动，可是每人都没有放弃手中的笔。

1926年10月潘汉年和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创刊，这是46开本的小型刊物，设计精美，毛边本，内文有题饰和尾花，一切出自叶灵凤之手。刊物前半为“象牙之塔”，后半为“十字街头”，分别由叶、潘编辑，明显地表现出两者思想上的分歧。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把叶灵凤编的“象牙之塔”看成完全是脱离现实的。诚如潘汉年在创刊号的《街梢闲谈》中所说：“我们并无躲入象牙之塔里的资格……不过整天的徘徊十字街口，也会遥想到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志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虽是一座巍巍更可怕的象牙塔，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轩轻，依然是一块自由的安乐土。”《幻洲》半月刊创刊无宣言，这里却道出两位编者合作的思想基础。

创刊号上潘汉年以“亚灵”的笔名写了《新流氓主义》，把“五四”时期的闯将们视为“新流氓主义”，后来语丝社的几位主将亦是，只是有的人后来当了博士就没有资格成为“新流氓主义”了。统观“十字街头”的文章，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鲜明的，但同时攻击鲁迅、陈望道、刘半农、徐志摩、朱湘等人就错了。在文风上认为“骂是争斗的开始”，因此不认为骂是有伤道德的，骂成了“新流氓主义”的斗争方式，这也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1927年2月《幻洲》1卷9期刊出潘汉年离沪启事，表示“十字街头”仍由他续编，其时他已奉命到江西南昌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部政治部宣传科长，并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这期间发生了“4·12”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失败，潘汉年又回到上海。1927年10月出版的《幻洲》2卷1期，潘重新上阵，发表了《我再回上海》。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潘汉年变得更加成熟，他的杂文不怎么乱放枪了，几乎不再谈什么“新流氓主义”或骂人，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我以为2卷1期以后“十字街头”上的文章，是研究潘汉年思想的重要根据，值得人们重视。

国民党终于对《幻洲》下了毒手，1928年1月2卷8期《幻洲》问世后，当局即以“反动”罪名加以查禁，《幻洲》永远告别了读者。

1983年1月

新的《战线》

还是潘汉年办《幻洲》尚未结束的时候，他已经预感到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幻洲》半月刊的命运不会太长。尽管《幻洲》也是几经摧残后留下的一块新阵地，他还是要不妥协地再寻找新的地盘。在《幻洲》2卷7期上便预告《战线》周刊将要诞生，上面说：“小小的半月刊——《幻洲》，事实上不能容纳大家呐喊几声，我们觉得在这个青年被杀的革命时代，虽含痛殊深，说话的机会总该有一个，所以我们又决定在泰东书局出版一个为我们青年说话的周刊叫《战线》。”启事中还声明它可以说是《幻洲》的副刊。

1928年1月，《幻洲》出到2卷8期果然被禁了，这里也看到潘在政治上的敏感。这种预见，还可以从他写在楚狂的《新月书店》后面的“附记”里看到。潘说：“你这篇文章寄到时，本刊尚未寿终正寝，至于由原稿而付印，由付印而出版，是否尚在人间则非我所知。盖杭州光华书店以出卖‘反革命’的本刊，老板被抓去了，南京某书店代售《幻洲》已经罚过大洋三元”，云云。

所谓言论自由，本来单指党国要人而言，小百姓那里有资格可以自由呢……。

《战线》创刊于1928年4月，32开本，第1期开首便是潘汉年写的《战线的开场》：

现在《战线》周刊已经与读者诸君见面了，而我们的《幻洲》半月刊却已被当局认为“反动”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们的意中事，可是没有想到在我们目中认为《幻洲》副刊的《战线》没有出版之前，它就被宣告“寿终正寝”！好吧，现在的革命者，自有他们的权威，砍下万千青年的脑袋尚不费吹灰之力，禁止小百姓的出版物，赐以“反动”二字，还怕你不消灭下去吗？然而，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线》又在这里开场了。

这篇开场白俨如对国民党的一份控诉书。潘汉年先是回忆当年的《A11》，被军阀孙传芳赐以“反动”罪名，勒令停刊。随后出版了《幻洲》半月刊，现在随着革命军之进展，又被当局目为“反动”，禁止出版。因此潘汉年分析这两个时代是“外形虽异，内质依然！”他得出结论：“好在骂人‘反动’，是各阶级主观的意识，他反对我，我骂他‘反动’，我反对你，你骂我‘反动’，阶级的意识已经很清楚的显露着。在这时候，我们除去仗着各人的武器争斗以外，难道还求人家给我们所谓恕道的谅解？——你们的武器是权威，我们的武器是热血！”压迫愈深，《战线》的面目比《幻洲》更要激进、尖锐，说是一份文学刊物，无如说是一本政治刊物。由潘汉年一个人来编的这个刊物，连补白的地位也都排满了他写的激愤异常的匕首式的短语。

面临反革命的大屠杀，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他以笔名“汗”写道：

没有一个革命者，能够享受现实社会的幸福。

没有一个反革命者，不是咒诅人家都在反革命。

个人主义者常常到了自己要求满足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人家的需要。所以革命阵线中首先背叛革命者，巩固个人地位的是他们！

假如你真是一个革命者，绝对不会在统治阶级治下扬眉吐气，自由自在。假如你希望在他治下给你一点自由，除非你屈服了他的权威，甘心做他的奴隶！

他发表政论，继续他原来在《幻洲》上写的专栏“想到写起”，同时还发表了小说《浮尸》，描写工人的命运。潘汉年与合编《幻洲》的叶灵凤表

面上这时是分开了，其实叶灵凤在《战线》上也介绍过新俄的短篇小说。稍后，叶灵凤又创办并主编了一个小型刊物《戈壁》。不久潘叶两人又合编了一种大型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小说》，他们仍在并肩合作。《战线》一开始仍发表攻击鲁迅先生的文章，鲁迅先生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里回击了他们。

《战线》出版到第7期，即被查禁。

1983年3月

《戈壁》半月刊

《幻洲》半月刊被查禁以后，仅隔两月潘汉年继续办了《战线》，又隔了一个月叶灵凤在光华书局办了《戈壁》，发行人是张静庐。这样，《幻洲》便一化为二了。《戈壁》的创刊号于1928年5月1日出版。潘汉年在解释刊名时说：“戈壁者，《幻洲》被禁以后的一片沙漠也。”叶灵凤在刊首发表了自作的一幅宣传画——《未来的胜利》，写明是为纪念五一劳动节而作。画面上有模拟的炼钢工人的形象，手持镰刀和斧头，中间是鲜红的一个很大的“5”字。当然，画面上也少不了工厂的烟筒和钢架之类。总之，是要表现革命的，可是亦易引起当局的注意。这也是缺乏对敌斗争艺术的表现，会把一般读者吓跑的。

刊物无发刊词，只有一则短短的征稿简则，上面说：“本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因此十分欢迎同时代的青年朋友投稿……”刊物从封面装帧到著译，大部分出自叶灵凤一人之手，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办刊物的风气。

创刊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死与葬》，标题下是恩格斯的两篇著作，一篇是1883年3月15日，恩格斯写给沙基的信，详细报告了马克思的病逝经过；另一篇便是著名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在《戈壁》的第3期上又发表了托洛斯基的《涅灵访问记》，回忆了列宁在伦敦办《火星》时的生活。列宁的名字译作“涅灵”，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亚被译作“库斯克耶”。叶灵凤还在刊物上连载了自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这是俄国女革命家费娜·费格娜写的自传。她就是1881年3月1日，在圣彼德堡的大街上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女青年。此外，叶灵凤还发表了自译的《新俄诗选》。从这里可以看到，《戈壁》虽然是文艺刊物，政治色彩还是很浓的。

到了第3期出版时，潘汉年出面助阵，仍运用他的专栏《信手写来》。他说：“自从无聊的《幻洲》居然被禁以来，许久没有信手写来了，所以《戈壁》出版了两期，都是灵凤一人偏劳，我未着只字……”他回答读者的疑问说，他好久不写杂文，是否因为《幻洲》被查禁而吓得不敢动笔了：“《幻洲》一次被禁，我并不害怕，害怕的只是写了杂感没有人要，真的，我们为了发泄无名的牢骚，一次被禁，说不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是担心给出版家和叶灵凤带来麻烦吧。一篇署名“白门秋生”（估计是叶灵凤的化名）写的《杂志新语》，评价《戈壁》时说：“雏耳，为龙为猪，异日再定。”评价潘汉年编的《战线》时说：“横竖预备查禁。”这种办刊物的方针也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不能坚持长期作战，争取更多的读者呢。到6月16日，《戈壁》出版了第4期以后果然无法继续了。它只存在了两个月。

在《戈壁》的第2期上，叶灵凤画了一幅《鲁迅先生》，说明文字写道：“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这自然是读过鲁迅先生的《“醉眼”中的朦胧》以后画的漫画，对鲁迅先生表现出极大的不尊重。鲁迅先生在《革命咖啡馆》里说：“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给以还击。《战线》和《戈壁》，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坚决反对国民党是可贵的，但是他们对待鲁迅先生仍有错误。鲁迅先生指出这类刊物空喊革命口号，作者不能深入社会，也不能分析一些面前的实际问题，却只能招致敌人的注意，使自己受到损失。历史早已证明，鲁迅先生的

意见是正确的。

1984 年 1 月

《长虹周刊》

1928年10月，高长虹在上海创办《长虹周刊》，唱的独脚戏，公开声称这是他“个人的刊物”，借以推行狂飙运动。刊物维持了二十多期，直到1929年底为止。稍后他便出国了。现在，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份全套的《长虹周刊》，《高长虹文集》只编到《长虹周刊》第20期为止的文章，编者以为该刊只出版到这期，事实上我还藏有《长虹周刊》第21、22两期，后者是1929年8月24日出版的。是否就出到22期，也难说，因为他出国的日期至今模糊不清。高长虹说，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有狂飙运动。1929年6月他从上海一度北返，果然刊物随他而来，后两期即在北京编印出版。这种实干劲儿实在令人佩服。

《长虹周刊》印制得十分讲究，16开本，白道林纸印，每期还有一两页带颜色的铜版纸插图。创刊号的封面是高长虹的全身像。当时有读者来信说定价太贵，每期只能印几百册。高长虹曾经在刊物上发起“突破千卷预定运动”，一千册是他的奋斗目标。高长虹把出书所得的稿费，全部用来印制这个刊物了，从刊物的印数也能想象他的狂飙运动影响有多大。

刊物上曾经发表过四幅列宁像，还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在当时也要一点勇气。但，令人不解的是，在1928年10月出版的《长虹周刊》第3期上，他还发表过墨索里尼的四幅照片，封面上又有墨与雄狮的合影。这当然引起读者的反感，有人指出他这样做是无聊，他公开回答，他并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思想和人格，只是考虑到中国人是不太干的，而墨索里尼是行动的。意思是他并非宣传法西斯主义。同时他又解释，这正如他发表列宁的照片，并不赞成“赤化”一样。从这里当然可以看到高的思想混乱。他可能赞成行为主义哲学，破釜沉舟地办《长虹周刊》或是他实践行为主义的一种体现吧。他认为人类正处于苦难之中，他高喊“我援救你们”，“我来为世界辟一条生路”，自认为“是一个寻访奇迹的人”，因此只要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就要行动，而且独来独往，百无禁忌。

在上海他还发起狂飙戏剧运动，不仅写剧本，还做行政组织工作，干得十分起劲，的确表现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的剧本不论多幕剧还是短剧都有特色，在理论上又自视甚高，充满了理想和狂热。受了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影响，他反对婚姻制度，主张乱交。在谈及假如找妻子的话，他说如果自己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的，那么女方也一定能写出《安娜·卡列尼娜》来才行。所以他在恋爱方面，也只能是幻灭。《长虹周刊》基本上是文艺刊物，找不到高长虹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系统理论和纲领，主要还是他的文学创作。这时除了狂飙社成员向培良、高沐鸿、高歌支持他，还吸引了鲁彦、柯仲平、塞克等人来参加。高长虹在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的文学创作为他作了证明。

我们不应苛求“五四”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能够很快地找到真理，这是不现实的。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总要经历一定的曲折和漫长的路程。我们不必瞧不起这些人。当然，也有人一生也没有找到光明，反而落入深渊，如狂飙社的向培良，后来竟去歌颂反共戡乱。高长虹也是一种典型，他追求进步，很多文学见解也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但有时又很幼稚、激烈和偏激。他经历过磨难，最后选择了延安，这是个令人鼓舞的归宿。这时候他已经认识到，只有十月革命才是真正的狂飙运动。我们从他的《延安集》里，可以

看到他的这种变化。

然而，他在延安又遇到新的矛盾，一时也抛弃不掉旧时的因袭，他很痛苦，亦愈加孤寂。他的理想碰了壁，这有他主观的原因，是自身弱点的暴露，同时也有客观的原因，他无法排解这苦闷，背了沉重的包袱，终于病倒，直至永远地失踪了。

关于《摩尔宁》

三十年代北平“左联”出版的文艺刊物，包括一些由“左联”支持的进步文艺刊物，数量足有几十种，但是现在若想寻找一份总目也有困难，更不要说见到原刊物了。刊物流传较稀少的原因：一是当时政府的查禁；二是受了经济条件的制约，本来印的份数就不多，甚至不能公开发行；三是刊物的内容，限于当时左翼作家思想的限制，刊物不能广泛地团结作家，无法吸引更多的同路人。因此作者的圈子小，作品的质量不高，社会影响不大。“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团体，事实上更像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政治组织。我所见到的北平“左联”的刊物不多，给我的印象那些文艺刊物更像政治性的刊物。这与当时党的左倾领导思想不无关系，不讲究作品的艺术性，只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先把一部分读者吓得避开了。当然，这些热情、勇敢的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青年作家还是令人尊敬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中有的人已为这一崇高的理想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左联回忆录》（198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册，收有汪金丁同志的一篇《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他谈到当时北平出版的一种与“左联”有关的文艺刊物《摩尔宁》。他说——

一九三一年底，北平出现一本紫红色封面的文学杂志叫《摩尔宁》，其中张秀中的一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和技巧方面，我感到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是不是可以找个机会结识一下呢？我把自己写的一篇以当时学生救亡运动为题材的小说，送到《摩尔宁》的编辑部，那实际上只是一间大学生的宿舍。他们对我很热情，到第二期就发表了。但我没有看到这杂志再出第三期。有人告诉我，张秀中是北平“左联”的成员。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摩尔宁》出版过第三期，出版的时间是1931年12月10日，因此该刊的创刊时间，决非金丁同志说的“1931年底”。我只收藏有《摩尔宁》第三期，刊名当是英语“早晨”的译音，这是左联成员办的刊物无疑，因为其中的作者张秀中、柳风不仅是盟员，还担任北平左联的执委。我所见到的第一、二期的要目广告，《摩尔宁》创刊号上刊有卢纳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的译文，还有署名泊尔、微光、非凡、力山、柳风等人的小说（未见署名张秀中的小说）。第二期的《摩尔宁》，除了译文以外，又有沈痛、独醒、子兮等人的小说，金丁的《理智的要求》就发表在这一期上。但，金丁忘记了他还有一篇小说《炎》，发表在《摩尔宁》的第三期上。这一期除译文外，还有李芬、力山、曼君女士、微光等人的小说。金丁的《炎》，放在创作栏的首篇。刊物为大32开，横排本，还附有铜版画页。第三期画页发表的是苏联油画《农妇》，编者还特别声明，这画选自日本版《苏联美术大观》的第二页，第一页是列宁像。这种看似多余的附言，也是在显示刊物的政治倾向，在编者的心目中并不认为是多余的。此亦革命青年一时风尚，只讲革命，不重斗争艺术。

在编者写的《编后絮语》里，道出了刊物的处境不佳：“苦风凄雨的今朝，本刊第三期蓦的又展开了她的新生命。本刊诞生在不幸的当代，雪雨交加，阴风惨惨，不能不说是她的厄运，但是，突变与惊险，正乃生之最有趣的一幕，正是大时代到来的象征；愿她能坚忍不拔的奋斗下去，不惜冲锋陷阵，才能杀敌致果。”这“阴风惨惨”四个字，正暗示着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像《摩尔宁》这样的刊物怎能广泛流传。

关于金丁的小说《炎》，编者亦有介绍：“现在，惊天动地不可一世的

突变，谁都知道要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武力进攻，《炎》这一篇小说，正是要在这种事实的系列里显示其中之真的作品。在这篇里，有中国，有日本，有帝国主义者，有被压迫群众，有从军的志士(？)，有自杀警世的青年(？)，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有刻苦奋斗的健儿……看来正如狂风暴雨，正如雷电乍惊。也许有人认为是太粗了，但这毕竟应当是现代的产品。”引文括号中的问号是原有的，这表明编者与作者对人物的理解还有差异。从这一介绍里可以明白，作者急于用文艺武器为现实斗争服务，虽然精神可贵，却有面面俱到的缺点，难以艺术地再现生活，有些概念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在眼前，作家非常适时地说出了人们心里想说的话，当时的读者也许并不反感这样的作品。

柯灵与《开明》

作家与读者都离不开书店与出版社，早期的书店与出版社多为作家经营，并出版社刊、店刊宣传自己的出版物，加强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刊物叫《开明》。很多作家与开明书店发生了不解之缘，有的甚至是与《开明》联系，后来走进了文坛。翻翻前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与开明》一书可证。

柯灵先生不久前写了《开明风格》一文，载于近期的《编辑学刊》。他说大约在 1929 年第一次向《开明》投稿。这个带有广告性质的小型刊物是作家索非编辑的，于 1928 年 7 月创刊。笔者藏有零本《开明》，经查第一卷四期（1928 年 10 月出版），在“开明的读者”一栏中，名单上列有：高季琳，男，学（界），浙江。这是作者的原名。刊物是 1928 年 10 月出版的，距今正好六十年。那时柯灵多大呢？十九岁吧！据此，我把柯灵与开明书店发生联系的时间上推了一年。这虽然是无关大局的一件小事，却是染有史料癖者的习好。得了这种病，没治了。

其时开明书店联系读者的方式多有，例如在出版物中夹有“读者调查表”即其中之一，凡是填写此表寄还者便被认定是“开明的读者”，不仅上榜《开明》，且有种种优惠。当然，对出版物的各种意见也都刊载在《开明》上。我发现列榜的读者，后来在文坛上也享盛名的还有王森然、谭正璧、田仲济诸位先生。

当代出版家还有办刊宣传出版物，加强与读者作者联系的吗？恕我寡闻，只知道前些年北京中华书局办有《书品》，香港商务印书馆办有《书海》。是否仍在坚持出版，不详。

1988 年 1 月

话说《学文》

《新月》杂志是1933年6月停刊的，《学文》杂志创刊于1934年5月。两个刊物的主编者是叶公超。如果有人说《学文》是《新月》的继续，这可以理解，若是不问这一背景，只把它当作学人办的一本纯文艺刊物亦可，而且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这是京派文人的刊物。

《学文》没有发刊词，刊名的由来是引用了“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业余的性质。卞之琳先生在回忆林徽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也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卞先生说《学文》出了三期，否，共出四期，到1934年8月止。赵萝蕤教授在《读书》杂志上怀念她的老师叶公超，说《学文》是闻一多主办，不确，闻一多是刊物的热心赞助人则不假，《学文》第三期上有则《本刊启事》可为证明：“叶公超先生行即出国，本刊编辑事务自第四期起暂由闻一多、余上沅、吴世昌三先生代行负责。此启。”刊物的撰稿人多为知名的教授学者，其中也有青年作家。他们是梁实秋、胡适、杨振声、饶孟侃、沈从文、季羨林、唐兰、孙毓棠、钱钟书、李健吾、闻家驊、陈梦家、方令孺、废名、林徽音、卞之琳、何其芳、赵萝蕤、曹葆华、臧克家等。叶公超晚年回忆，除《新月》原班人马，新人中增加了朱光潜，为《学文》增色不浅。其实四期中并无朱的文章，可见当事人也记不清楚了。

刊物重视新诗，每期都由诗歌打头阵，一改当时以理论或小说开头的俗例。林徽音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陈梦家的长诗《往日》都是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后者连载了三期。林徽音还发表了小说《九十九度中》，为炎热的夏季北平社会写照。小说采取意识流的手法，反映的生活还是现实的、民族的，不仅真实可信，也不是让人看不懂的那种小说。作者熟悉上层社会人物，对他们不无讽刺，相反地对劳动者却充满了同情，写了他们的不幸。后来成为红学家的吴世昌先生，在第三期上发表了《魏晋风流与私家花园》，至今也是个吸引人的题目，他考证我国私家园林的起源，涉及魏晋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艺术随笔《论不隔》。第四期沈从文发表了《湘行散记》、同时又有胡适撰文、钱玄同书写的《一篇新体的墓碑》，是纪念1933年5月华北抗日战死将士的碑文。碑铭最后写着——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胡适和钱玄同以为，用白话写碑文的历史上可能有，但是用新式标点符号刻碑的，这是第一次。

1977年10月，叶公超在台湾发表了《我与学文》，他并不讳言办《学文》的人对上海左联的文艺路线没有好感，因此想提倡一种自由的文艺。刊物采取了绅士的风度，并未公开宣布这一主张，只是由于究竟不能与前进的历史合拍，而作者的情况又各有不同，终于不能布成阵局。“新月派”的旧人们，重聚仅四个月，不得不再次星散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文》的封面由诗人林徽音女士设计，取材古汉碑图案，用流利柔美的线条勾勒出古朴的人物鸟兽和花草植物。细心的读者还能从图

案画右下角，找到一个“徽”字的标记。

《水星》

巴金时常怀念三十年代在北平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的一个小院。在这里住着靳以和卞之琳，办着两种文学杂志，一个是《文学季刊》，一个是《水星》。巴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得见曹禺的《雷雨》原稿，并支持发表。《文学季刊》是由郑振铎、巴金挂帅办起来的，编务则是靳以。这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文学刊物。

1934年10月《水星》创刊。发刊无词，也无编后记，主编人是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刊物重创作，不发评论和译作，但给人的印象是个散文刊物。因为散文名手云集，如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吴伯箫、丽尼、芦焚、废名等时有新作，茅盾、冰心、朱自清、老舍、周作人也来写稿。写诗的则有林庚、曹葆华、臧克家、辛笛等。南北名家，京派海派，合流相聚，成一时之盛。

《水星》的装帧朴素典雅，封面只用红黑两种颜色，出自卞之琳的设计。发行这一刊物的文华书局声明，《水星》的特色是：“专登创作，内容纯粹，不杂广告，版式干净。”广告其实还是有一点的，书刊广告而已。因之刊物的书卷气颇浓。第二期编者告白，介绍了刊名的由来：“我们那一晚在某处坐谈，也许是举头见星，低头见水的缘故，有人提议叫作《水星》，大家觉得还来得别致，《水星》就《水星》吧。”又声明：“开场无白，编后无记，封面无画，正文前无插图，正文中无广告，这个刊物初次露面就不像一本杂志吧，可是我们倒想能这样老老实实的办就这样办下去。至于论文与翻译我们也知道是重要的，不过我们想暂时把理论与介绍的工作让旁的刊物去办。要不然，既非同人杂志，又无相当个性，这个刊物办在这个杂志世界里实属多此一举。少浪费一点，亦是好事。”四十余年后再见此刊，《水星》仍然可爱，个性鲜明。

《水星》办到1935年6月终刊。第一卷出版了六期，卞之琳编；第二卷出了三期，靳以编。巴金的作品，还有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西谛的《西行书简》、萧乾的《篱下》、李广田的《画廊》、李健吾的《意大利游简》等名著名篇都是在这里发表的。萧乾先生跟我说过，当年《水星》还退过他的稿，可见编者的作风是很严肃的。

不久前卞之琳先生相告：

“郑振铎、巴金挂帅，由靳以一个人办起来的《文学季刊》，打破了北京与上海、学院与文坛的界线，很受读者欢迎。我和另一些朋友协助靳以看看诗稿与散文稿。经售商见有利可图，要另办一个月刊，专登创作，《水星》便诞生了，实际上是《文学季刊》的附属刊物。两刊的稿源是一个，有的分给季刊，有的分给月刊。1934年下半年我也住到三座门的小院子里来，除了靳以和我，雇了一个人，做饭大司务兼传达、收发，另找一名白天上班的校对员，全部就四个人办两个刊物。1935年3月，因为我得如期完成中华文化基金会特约翻译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我主要的生活来源，就去日本京都找一位同学，住在他那里闭门译书。靳以一个人承担了两个刊物的编务。后来北平的形势日坏，我五个月后从日本回国，就转去济南教书，《文学季刊》和《水星》都停刊了。”

卞先生还告诉我，当时几个人决定刊物叫《水星》的地方，是在北海公园的五龙亭。

那个有水有星的夜晚极富诗意，偶过五龙亭畔，连我也常常想起《水星》，想起当年还是生气勃勃的那群青年作家。

1982 年 7 月

储安平编《文学时代》

1966年“文革”风暴一起，储安平在北京便神秘地失踪了。“革命派”诬他叛逃到国外，上面派人查了几年也无下落，就此不了了之。于是这位名噪一时的《观察》杂志主编、1957年的“大右派”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销声灭迹了。

随着历史的进步，也许会有更多的读者开始认识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编辑，并同情他的遭遇。笔者也是在1989年初才知道当年他先是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接着又跳海自沉。然而他究竟是在哪一天、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投的海也仍然是个谜。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上海创办的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观察》，在知识界影响很大。应该说这是他一生最活跃的时期。一边编刊物，一边写文章，同时还编了一套“观察丛书”，总的倾向是进步的。最后惹恼了国民党，下令查封了这个刊物。全国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观察》一度复刊，后改为《新观察》，他已无缘参加编务。1957年又动员他发言，终于被打成顽固的“右派”。他尝够了人间的冷暖。

储安平生于1909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参加过新月派的一些活动，编过《中央日报》副刊，创作过小说，并于1936年4月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说谎者》。这本小说收了他1931年至1934年的作品，说明他年纪虽轻，对于社会的观察还是比较深入的。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都为他后来出色地主编《观察》杂志作了多方面的准备。现在，如果我们要来研究储安平的编辑生涯，或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经历，不能不提到抗战以前他还主编过文学月刊《文学时代》。

《文学时代》的开本类似当时的《译文》和《作家》，设计很朴素，封面是黄色的，不加任何装饰，中间是本期作品目录。它创刊于1935年11月10日，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这个公司是邵洵美办的，当时号称发行七大杂志，除《文学时代》外，还有《时代漫画》（鲁少飞编）、《时代电影》（包可华编）、《论语》（陶亢德编）等。《文学时代》创刊号没有发刊词，从征稿简则里也看不出刊物的主张，只有储安平写的《编辑后记》，多少透露了办刊的宗旨。他说：“我们想出一个文艺刊物的理由十分简单，无非想借此使自己在写作上加上一根鞭策的绳索。”那时储安平正热衷于文艺活动，原计划这份刊物由第一出版社出版，拖延近半年方由时代图书公司接手。显然这与邵洵美当时的兴趣不无关系。尽管储安平一再声明不愿发表办刊宣言，而且认为一个刊物的内容，就是这个刊物的最真切的宣言，但是从他在《编辑后记》里的一段话中，仍可看出编者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他说：“我们并没有这种企图，想使读者从这一个刊物里看到有任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容许每一个在本刊上写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与见解，除了对文艺的本身忠实的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更大的苛求。”提倡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文艺，这正符合储安平一贯的立场。当然他的忠实于文艺的思想，也包含了尊重事实和尊重实际的思想。这也是他办刊物的方针。《文学时代》的封面上公开标榜这是一本“纯文艺”月刊，不想让有政治色彩的社团来干扰刊物。那么他能办到这一点吗？文艺又怎么能纯到毫无政治色彩呢。在储安平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他既然说了就一定要贯彻。我们从储安平

编的六期刊物来考查，他所团结的作者确实相当广泛，证明他的许诺并非虚言。不过话虽这么说，圈子还是有的，思想上的好恶也不可能在刊物上毫无反映。创刊号上女作家方令孺就透露：“安平立意邀集文章趣味相同的朋友们创办一种杂志。我想在这内外紧逼的年头，像不祥的云雾包围我们四周，能借文章来抒写心中的郁气，也算得泪眼中的微笑吧。”这“趣味相同”的标准当然也很宽泛，至少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吧。比如《文学时代》里切中时弊的社会言论就不见，注重的还是纯学术的研究。有什么样思想的编者就会编出什么样的刊物来，这是不言而喻的。那时储安平刚出校门不久，才二十六岁吧，气魄已经不小了，他的愿望是善良的，刊物的格调也不低。

看创刊号的作者，便足以反映出编者联系作者的方面。如老舍先生写来论文《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介绍了作家康拉得的成就，以及自己在创作上怎样受到这位波兰作家的影响。张天翼发表了小说《中秋》，反映了农村生活的破败。此外还有陈铨的小说《政变》、林庚的散文《今年的秋》，以及陈梦家、孙毓棠等人的诗作。以后各期的作者又有王统照、余上沅、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袁昌英、凌叔华、臧克家、梁宗岱、李长之、季羨林、林如稷、杨丙辰、赵家璧、罗洪等人。从这个名单，的确看不出这刊物属于一个什么派别或集团，甚至连编者同新月派的历史痕迹表现得也不太明显。臧克家的诗是写农村灾难的，他在《文学时代》第三期上发表了诗《水灾》。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小说了，第四期便发表了他的小说《义务打杂》。田汉的两个独幕剧《号角》和《黎明之前》分别发表在第三、六期上，剧中人有些就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剧本的内容都反映了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张天翼还发表了小说《蛇太爷的失败》。储安平也在第四期刊物上发表了《一只朱古律糖匣子的身世》，小说寓有讽世之意，写法颇生动。总的看来，刊物比较重视艺术技巧的追求，尤其在诗歌方面更是如此。所以整个刊物尽管有内容进步的作品，但生活天地仍显得有些狭小，刊物所能联系的读者当然就有限了。

《文学时代》并不是储安平第一次编辑的文学刊物，早在1931年，他二十一岁时还曾编了一个刚问世便夭折了的文艺杂志。此事见于储安平在发表方玮德一首遗诗后所加的注言，他说：“玮德这首诗是他在1931年3月寄我的。那时我们有几个朋友正打算出版一个小刊物。这首诗曾经编入那个小刊物的第一期上。但那个小刊物虽然印好了第一期，因为别的缘故，仍旧没有搬上市场正式出版。”从编《文学时代》到编《观察》，这十年当中储安平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流亡生活，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一旦遇到国民党政府加紧反民主、进一步实行独裁专制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编辑《观察》时所表现出的锋芒令人瞩目，他变得激进起来。

当《文学时代》于1936年4月出版第六期的时候，卷首便刊出储安平的一则启事：“敬启者，鄙人拟作远行，本刊事务未能兼顾，现已向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辞去本刊编辑之职，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本刊编辑事务当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另请他人继续负责。此启，储安平谨拜。”稍后，储安平便到了英国，在域外生活了几年。这大概就是他放弃编辑《文学时代》的主要原因。但是，即使他不出国，恐怕刊物的命运也不会长久，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想维持一本格端正派的纯文艺刊物又谈何容易。储安平在卷后的《告别辞》里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

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储安平一去，《文学时代》杂志便告结束，没有别人再来接办过这个刊物了，恰好出满了一卷。

“孤岛”的《离骚》

有人说上海“孤岛”时期最早出现的文艺刊物是阿英编的《离骚》，这是不错的。国军西撤以后，《离骚》于1937年12月20日创刊。用《离骚》作刊名，联系当时的环境，不仅富有历史感，更具时代感。敌骑当道，国土沦丧，屈原大夫的忧国之思正好代表了沦陷区人民心头的哀痛。原定出半月刊，没想到创刊号亦即终刊号。租界当局的嗅觉不能不说灵敏有加，他们不敢得罪日本。这是一本16开、仅有44页的杂志，编辑人写的是刘西渭，发行人是李克家。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刘西渭是李健吾的笔名，他用这个笔名出版过《咀华集》、《咀华二集》。为什么阿英编的刊物由李先生挂名主编？

抗战初起，阿英参加了以郭沫若、夏衍为首的《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上海沦为“孤岛”，《救亡日报》迁往广州，阿英留在上海，奉命办个刊物。阿英即与于伶、郑振铎商量，考虑到当时环境复杂，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决定请当时正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李健吾先生出面。尽管于伶、阿英同李并不熟识，由于有郑振铎的介绍，他俩去找李谈，李痛快地答应了。结果，《离骚》就用了刘西渭的名义主编。我问过当时同阿英生活在一起的钱小惠同志，他说当时《离骚》确由他父亲一人来编，连个助手也没有。

这段文坛掌故，既见我党文化战线的斗争策略，更见李健吾先生的豪爽和爱国。须知挂名要承担政治迫害，直至逮捕坐牢的后果，而李先生侠胆热肠，在所不计。这种精神，实在令人神往。

《离骚》没有发刊词，征文简则概括了刊物的内容，即：学术论著、地方通讯、人物素描、近代史话、散文杂感。这自然反映了阿英的编辑思想，尤其是开设“近代史话”更具编者的特点。刊首周予同作《经史关系论》，又赵景深的《杨家将考》，戴平万的散文《细雨的街头》、景宋（许广平）的《医》、林丰（叶灵凤）的《战争与木刻》，以及其他杂感和译文。李健吾以刘西渭笔名发表了散文《匹夫》，阿英以笔名寒峰发表了《甲午战争书录》。后者虽是近代书录，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眼前入侵的敌人。这组书录确是在炮火中完成的，不能作一般的史料来看。

薄薄一本刊物，编得淡雅大方，相当精致，连补白处不是加了短文，便有尾花装饰。题花也不少。尾花有多幅邮票大小的“战争藏书票”，时代氛围颇浓，编者的匠心和趣味俱现。我怀疑这些装饰木刻都由叶灵凤先生提供，因为《救亡日报》时期，叶先生也参加了编辑工作，当时与阿英往来紧密。

《离骚》一问世便得到“勒令停刊”的命运，世间少有留存。我保存的这本《离骚》，尽管有残页，我还是费时多年才在上海访得，幸亏当时毫不犹豫地拣在手中。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复本。如果说新文学零本期刊中较有意义，并稀见难得者，《离骚》可算一例。特别是它体现了阿英的苦心编辑和李健吾的临危相助，都是可传后世的佳话。

1987年1月

唐弢与《丽芒湖上》

1940年11月，郑子先编辑的“文艺界丛刊”创刊号《丽芒湖上》出版，大32开本，印制较精良，就其内容的扎实，作者的阵容，编辑的艺术都值得记。刊物没有发刊词，只有编后记。打头阵的是三篇小说，原因是“战后上海最感荒芜的是创作小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多尽点力”。依次是芦焚（师陀）的《傲骨》、柯灵的《离割》、方晓白（满涛）的《一个平凡的故事》。编者对此有所评介：“《傲骨》的作者以深沁人心的笔簇，刻画了一个那样寂寞的人物，而《一个平凡的故事》的作者所捧出的却是荒妄的青年的典型。在《离割》里，我们爱良良的天真，感谢俞太太的好心肠，但是对于那个在母爱里流露出坚强的性格的女人，我们又怎能吝惜自己的同情！对这种矛盾的错综的心理的处理，我们以为作者是成功的。”从这笔调里，你能猜到编者郑子先是谁吗？刊物的作者大多也化了名。比如理直是周建人，韦佩是王统照，邹啸是赵景深，辨微是周木斋，东方曦是孔另境，风子是唐弢。原来郑子先也是唐弢的化名。本期还开始连载了袁俊（张骏祥）的五幕话剧《小城故事》。唐弢特别介绍了巴人写的论文《地主性格》，认为这是文史学家一向所忽略的，“而作者却更进一步，以此揭示了现在的某些人物的思想的本质。”还有楼适夷的《记越剧目蓬救母》，虽是艺术论文，却有散文风格，又是“十分现实的文章”。谈地狱里对人的种种残害，岂不让人想到阳世间的一切。刊名《丽芒湖上》，用的是王统照先生所译拜伦的诗题。这是拜伦在瑞士丽芒湖畔所作的感兴诗。

我很欣赏姚克写的散文《归国杂记》，看似平淡却耐人寻味。唐弢说：“姚克先生于战前去国，出席苏联戏剧节，几年来漫游欧美，回国后首先为我们执笔，这是应该感谢的。作者并已答应为我们继续写下去。”作者是从旧金山乘船回国的，路过檀香山的珍珠港，那里还是个太平世界。夜晚在街头徜徉的尽是美国水兵，“白漫漫的一片”，成了“水兵之市”。望着这些身着白色军服的青年，作者写道：“这恐怕也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吧。……太平洋若起风波，夏威夷是用兵必急之地。”船到了日本的横滨，作者看到8台起重机，从美国船上卸下战备物资，整整卸了18个小时。“一方面在珍珠港停驻着主力舰队，一方面仍在把军备原料运到‘理想敌’手中；美国的矛盾真使我失笑。……横滨口外有几艘日本的军舰，沿岸都有蜂窝似的炮台，和夏威夷的美国海军遥遥相对。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太平的漫画。”话音刚落，日本便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的平安梦被打得粉碎。那些徜徉街头的美国水兵，不知有多少人没等醒过来便已葬身海底。可惜刊物只办了一期，我们没有机会再读姚克续写的归国杂记了。

“鲁迅先生逝世4周年特辑”，发表了周建人先生的《鲁迅任绍兴师范校长的一年》、许广平的《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文载道的《鲁迅先生的旧诗》。唐弢研究鲁迅，从一开始就重视资料，他在《编后记》里阐明了他的主张：

“现在各处都已提出了研究鲁迅的口号，而且仿佛还有一种普遍的见解，以为感情的琐碎的记载可以不必，应该多作理论的研讨。编者于此却有一点私见，觉得理论上的研究，也许后一代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而对于材料的提供，却是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因此我们觉得许先生和理直先生的文章，特别值得注意和推荐。”

时至今日，编者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

事隔 45 年之后，唐弢回忆这个刊物时说：“1940 年秋，邮局同事陈泉恩和一家印刷厂主合作，想办个文学刊物，约我主编，经过许多波折，于同年 11 月出版，这就是‘文艺界丛刊’第一辑……可惜印数既少，发行时又被没收，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以后，一扫而光，现在连知道的人也已不多了。”（见《狂狷人生·剑三先生》，1989 年 11 月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丽芒湖上》是唐弢初次主编的文艺刊物，注重撰写编后记的作风，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编者还是一位 28 岁的青年。保存这刊物既是研究沦陷区文学的一份史料，对唐弢先生亦是一个纪念。

《辅仁文苑》

《辅仁文苑》是一本 16 开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顾名思义这是辅仁大学部分师生们合作创办的。但是，1939 年 4 月的创刊号却叫《文苑》，是由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几位文学青年合编的。当时标明这是一本“友谊的纯文艺集刊”。到 1939 年 12 月出版第二辑时改为《辅仁文苑》，标明为“纯文艺季刊”。封面题字者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沈兼士。

改名后的刊物特别声明由学校提供经费，内容不变，但“以不妨碍公教的传播为条件”。所以个别文章也不免有点宗教色彩，还出版过一本“圣诞节增刊”，显示了教会学校的特点。刊物的生命维持较长，到 1942 年 4 月第十和十一辑出版后停刊。停刊的背景是“大东亚战争”爆发，不甘于伪教育总署的笼络和收买而自动结束，表现了刊物的品格。

《文苑》创刊号有赵荫棠的《悼钱玄同先生》、张秀亚的小说《珂萝佐女神》、林榕的散文、吴兴华的诗、李霁野的译文《战争与和平·导言》等。第二辑的《辅仁文苑》，有林庚、南星、朱英诞、李曼茵、李道静等作者。辅仁大学除李霁野外，教师中还有孙蜀丞、杨丙辰、朱肇洛等人给刊物写稿。编者提出：“文学不仅是表现人生，并且还负着指导人生的重大使命……所以这刊物积极方面要求每篇作品对人生都有好的影响，最低限度也要不至于发生恶的影响。”

现在台湾的女作家张秀亚，是《辅仁文苑》的编者之一。当时她年轻、活跃，几乎每期刊物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其中有诗和散文，但主要是小说。经常写作的还有查显琳，即现在台湾的作家公孙嫫。1940 年 3 月出版的第三辑，刊有孙羽的小说《山·海·城》。小说写了厌倦城市生活的一个知识分子，想在清幽的山中寻找心的平静，最后又失望地跑向大海。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这位孙羽即孙道临。

1941 年 4 月出版的《辅仁文苑》第四辑，凌叔华女士发表了《椰子集序》，这是同年 3 月她为秦佩珩的一本散文集写的序。对于秦的散文，凌叔华“惊讶他文章深深涂了晦涩与黯淡的色泽”。还有一位李道静，战前他就在卞之琳编的《水星》上发表作品，这时他在《辅仁文苑》上发表的小说、诗和散文，也都带着凄苦忧郁的色彩。他出身北大，抗战胜利后在天津一家私立中学教初中的国文，我正在那里读高中。看上去他是一个文弱书生的样子，一身旧西装，很不得志。最近见到林榕同志，据他说那时李道静刚结婚，不久贫病而亡。这是一位不曾出版过集子的有才能的作家。

1942 年 4 月第十、十一合辑的《辅仁文苑》终刊号，发表了苦水的小说《佟二》。“苦水”是当时在辅仁教书的顾随先生的笔名。他是冯至、杨晦领衔的沉钟社的社友，后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年出版有《顾随文集》。这篇《佟二》近似中篇，写一个忠厚农民全家的惨遇，小说虽然没有明指日本人和汉奸，但读者一眼便可看出这是影射日伪统治的。顾随教授的小说从来不曾结集，只有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收了他的一个短篇《失踪》。

《燕京文学》

《燕京文学》，半月刊，创刊于1940年11月20日，由燕京大学文学社编辑出版。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已经三年有余了，而燕京大学以美国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尚有一定范围的所谓自由。但是《燕京文学》也难以突破大环境的恶劣，这是不言而喻的。

“创刊号”的《发刊词》里既有呼声，也有不得已的隐衷，编者说：“在这长长的，严冷的冬日里，我们带不来‘春天’。我们没有这能力，也没有这野心。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可是我们的‘歌声’也许会很低，很轻，轻得别人连听都听不见，更不用说能使别人的心‘异样的快乐’。”凡是在沦陷区度过“冬天”的人，当然可以理解编者们的内心独白。

编辑的方针大致是发表诗、散文、小品、戏剧、小说、批评与介绍。“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小品，使它离开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就是因为以前小品太为人所轻视了。”另外，刊物还注重书评，并为此设立专栏。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便是《谈何其芳的散文》，作者欧阳竟，主要是评论何其芳的《还乡杂记》（良友图书公司版误印为《还乡日记》）。此外，还有孙羽的小说《猎人》、吴兴华的诗《柳毅和洞庭龙女》、黄宗江的独幕剧《戏》。当年这些燕园学子都是燕京文学社的成员，也是这个刊物的积极分子。吴兴华已故。孙羽即孙道临，他几乎每期都有作品发表，如《无帆船》、《歇息》、《弓》、《蝙蝠》等诗、散文和小说。黄宗江如今已年过七旬，仍写剧本，更写散文小品。他写的《戏》虽是戏，也有他自己生活的影子。那时的黄宗江，正是个热情的、充满了幻想的人。他的同窗孙道临却没有继续走作家的道路。现在仍住在燕园的郭蕊女士，有《雨愁》、《写在自己的小手册上》等诗发表。近年我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不时看到她的新作，散文多于诗，仍然保持着诗人的感觉，用诗心来写散文。

《燕京文学》的特点是每期都有一篇编者的言论，如《我们需要一个美术课程》、《生活的态度》、《谈悲观》、《我们对文学的态度》、《渊博与精深》、《我们需要一个戏剧联合》，等等。刊物宣布了接受外稿，并请本校教授陆志韦、郭绍虞担任刊物的顾问，似乎只有陆志韦发表过一组《杂样的五指诗》，绝大部分还是同学们的作品，颇具校园文艺的特色。刊物为十六开本，第一卷共出版六期。第二卷出版的是五、六期合刊号，时在1941年9月20日。这一期，孙羽又发表了小说《公墓》和散文诗《支流》，郭蕊发表了散文《子夜秋歌》，黄宗江那时已到了上海，他写来一篇京味十足的散文《罗宋菜汤》。刊物上预告第三卷起将改半月刊为月刊，1941年11月10日出版到第三卷第二期停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燕园，并搜捕了不少燕京人，连陆志韦教授都被抓进日本宪兵司令部。

《北大文学》

1943年6月，即沈启无创办《文学集刊》的前三个月，在他支持下的《北大文学》创刊，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文学会的名义主编，新民印书馆印行。当时沈启无正担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院长是周作人。

《北大文学》第一辑的创刊，仅见一篇简短的《编辑小记》，没有说明这是个定期刊物。刊物为大32开，同稍后创刊的《文学集刊》形式一样。编者讲了三件事：一是创办筹划已久，二是所有稿件“都分别经过文学会的导师沈启无、钱稻孙、徐祖正、山口四先生审定”，三是“《北大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文学刊物，除了纯文学的创作外也兼收其他研究的文章”。果然在创刊号里便有《佛家哲学思想略说》（魏善忱）、《扶南史略辑》（蓝文卿）、《少昊考》（宿白）等三篇哲学与史学论文。

开头的三篇文艺论文都是教师的作品，如沈启无的《关于新诗》、郑骞的《论读诗》、朱肇洛的《论默剧》等。此外还有傅芸子的《敦煌本温室经讲唱押座文跋》、李啸仓的《曲稗小识》、张琦翔的《读红楼梦札记》等。译文有原田淑人的《关于唐代女子骑马之土偶》和增田涉的《民国三十年来的文学思潮》。林榕的《简朴与绮丽》，是较早地研究我国现代散文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后来连同其他论文都收入他的论文集《夜书》中。他协助沈启无编过《文学集刊》，亦曾参加《辅仁文苑》的编辑工作，《北大文学》似乎也有他来效力。除了论文集《夜书》以外，他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远人集》。

创作部分诗与散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作者有沈宝基、黄雨、南星、李道静等，小说仅有闻国新的一个短篇《落花时节》。译作有钱稻孙译的日本古歌，以及别人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菊池宽的剧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等。

作为大学办的校园文艺刊物，《北大文学》比较正统严肃，缺少活力。从这一侧面，可以想见当时敌伪当局文化统治之严，就是这种与现实有距离的纯文艺刊物，也只维持了一期的生命。

沈启无编《文学集刊》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沦陷区出版的文艺刊物中，沈启无主编的《文学集刊》可称大型的纯文学刊物。它没有打出取媚于侵略者的诸如“文学报国”之类的口号，也没有贩卖庸俗的低级趣味。创刊号的《卷头语》里说——

我们羞于喊口号，怕的是事实做不到，变成不负责任的空言。我们愿意担荷这责任，

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熔为一炉，中外古今之得以贯通，而又各有它的独特。

《文学集刊》是季刊，第一辑于1943年9月出版，第二辑于1944年4月出版，总共出版了两期。它的停刊当然与整个时局有关，同时又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沈启无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沈启无出身北大，是周作人的学生，当时是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刊物的出版者是北京新民印书馆的艺文社，而艺文社的社长是周作人。那时的文艺刊物都以周作人为号召，但《文学集刊》上却绝无周的文字，也无一句提及周。但，在新民印书馆的宣传品中却宣传艺文社社长周作人领导了两大文学刊物，一是《艺文杂志》，一是《文学集刊》，并称后者“是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正向大东亚文学的目标前进。

《文学集刊》第一辑似乎以文学评论为主，如俞平伯的《谈西厢记哭宴》、傅惜华的《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的》、商鸿逵的《王渔洋的散文》等。小说有袁犀（李克异）的《手杖》，关永吉的《陈岫和他的朋友》、马骊的《骨头》等。诗歌有南星、沈宝基等人的作品，沈启无发表了《闲步庵书简钞》和新诗。

《文学集刊》第二辑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小说则有赵荫棠、毕基初等北方作家的短篇。译诗和译作也占了不少篇幅。综观两期刊物并无宣传大东亚文学字样，不失为一本严肃可读的纯文学刊物。至于沈启无在私下追随日本人则是另外一回事。

刊物出版的前一个月，沈启无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曾经到日本参加了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日本人提出的“扫荡反动老作家”的事件，表现了侵略者对周作人的不满。周作人断定沈启无在中间做了手脚，而在这以前他们之间为继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事已经有了矛盾，这可能就是周作人不支持《文学集刊》的原因。在《文学集刊》第二辑出版的头两个月，沈启无又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编的《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他编的《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并讽刺周作人办刊物把稿费全都送给了老作家。事情闹得很僵，就在第二辑刊物出版之际，周作人在报上发表了《破门声明》，公开驱沈于门外。声明中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继绝一切公私关系。”当年这位沈某曾是苦雨斋中的常客，周某亦以有沈这样的弟子为骄傲，不想今日已形同路人矣。

师生的反目在周作人的心中留下了阴影。他指名点姓地骂过沈启无，还检讨自己的“知人不明”。（参见周作人《关于老作家》和《一封信》、《文坛的分化》等文。）后来又指桑骂槐地写过几篇针对沈某的文章，如《遇狼的故事》等。此时周作人发表作品常用“东郭”的笔名，足证对沈仍耿耿于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夏，他还写了一篇《关于东郭》，虽然表面上无所指，其实依然是旧案的余波，念念不忘往日的恩怨。这篇文稿原拟在谢兴尧主编的文史杂志《逸文》第三期上发表，且在刊物上发出预告，终因

日本投降而未果。积压近四十年，前几年才发表在“万叶散文丛刊之三”《霞》上。如果不熟悉周、沈之间的矛盾，也许不会明白《遇狼的故事》、《关于东郭》都包含着对沈启无的不满。

全国解放后，周作人和沈启无都生活在北京城却无往来。沈任职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中住过“牛棚”，后来病故了。

绀弩编《艺文志》

绀弩逝世以后，很少人谈及他主编的散文、杂文刊物《艺文志》。那是1945年1月在重庆出版的一本月刊，它的形式很像1940年在桂林出版的同性质刊物《野草》。后者是由夏衍、秦似、绀弩、孟超、宋云彬五人合编的。这次《艺文志》由绀弩一人承编，发扬着《野草》的传统，也是一本文风犀利和密切关注时势的刊物。创刊号里没有“发刊词”或“编者话”，我们只能从一份简单的“稿约”里窥探一下编者的主张。

刊物标榜为散文、杂文刊物，却不那么拘泥，如说：“凡篇幅不过于繁重之稿件，不分门类，不问性质，一律欢迎。”所以少量的诗，甚至小说，剧本亦不拒绝。

刊物特别提出：“尤其欢迎新作者的”稿件，又优惠短稿。这两点也正是当前我们提倡的，相信编刊物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在提倡短稿方面，绀弩的设想很具体。他提出凡不足千字者，均按千字计酬；不足千五百字者，以千五百字计；不足二千字者以二千字计。以下类推。但万字以上者，则按实际字数统计。小小的稿约，可见编者的一番苦心。

《艺文志》创刊号发表了夏衍、沙汀、艾芜、孙伏园、杨晦、凤子、雪峰等人的文章。绀弩和雪峰还化名写了文章，如耳耶、萧今度、画室等即是。

刊物的第2期脱期一个月，是在3月份才出版的，作者又增加了茅盾、老舍、柳亚子、葛琴、秦牧、吕荧等人。可惜这第2期实际为终刊号。

绀弩的杂文特色鲜明。如果说雪峰的杂文以理论色彩取胜，那么绀弩的杂文既有理论色彩，而表现样式更显丰富，艺术性更强。如他的名篇《韩康的药店》，写西门庆的霸道来击讽国民党的野心，全篇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可是把国民党的消除异己，独揽天下的嘴脸暴露无遗。在《艺文志》的创刊号里，绀弩写了《怀 柚子 》，看似评介作家鲁彦的一篇小说，但关于小说本身几乎没有几句话，不能当文艺评论看，大量笔墨借历史和民俗知识，来揭示国民党正在屠杀革命者。这种借古喻今和喜作历史新编的手法，自然是不得已的曲笔，却显露出作者的学识和才华，并不是每一个杂文作家都能具备的。至于绀弩杂文中那种辛辣的幽默感，包括用古典常具新解，处处闪现出辩证法的光芒，更不是别人能轻易地学到手的。

有人说，绀弩的杂文常为妇女们的命运而呼号，证明作家具有一种可贵的品质。不久以前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绀弩的杂文选集《蛇与塔》，内容即包括他五十年来所写的有关妇女主题的杂文，兼及某些文艺评论。这对关心中国妇女问题的读者是个好消息。绀弩对待妇女命运的关切，以及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敏感，让我时常想到鲁迅先生。绀弩的杂文正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精神品格。

1987年2月

《消息》半周刊

抗战胜利后，夏衍同志在上海主持复刊《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仅仅出版了十二天就被国民党市党部查封了。1946年4月7日，他又主持创办了《消息》半周刊，16开本，每期16页。每逢周日、周四出版，编辑人宋明志、丁北成，实际是姚臻、方行。夏衍在《懒寻旧梦录》（1985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说：“我们决定办一个‘匕首’、‘投枪’式的小刊物，但还是要争取公开合法。从正面说，目的当然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但这样一个小刊物，不可能登长篇大论，所以用它来讽刺和揭露一切反动小丑，反而可以起《周报》、《文萃》所不能起的作用。”《周报》是柯灵、唐弢主编的进步刊物，《文萃》是党办的刊物，黎澍等同志编辑。两刊都以论文为重。《消息》半周刊以短文和内幕消息为主，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丑行和反动措施，向广大读者公开了一些背景材料，借此宣传了我党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这个刊物比较讲究宣传艺术，标题不那么呆板，如《延安也有美国兵》、《共产党的“骂”》、《CC与CCC》等，很吸引人。第10期刊有《中共宣传部长“衣锦还乡”》，副题是“新华日报出版有期”，以此来报道中共代表团已经到达南京的消息。陆定一是江苏无锡人，这就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衣锦还乡”原来就是打了引号的。所以从形式上看，《消息》半周刊的版面显得有些零碎，其实这正体现了刊物的灵活性，也是争取刊物合法化的必要手段。创刊号没有什么发刊词之类的话，仅仅在以后出现的《征稿小启》中，提出欢迎“言之有物，反映现实”的通讯、小品、杂文、图片。不要论文和小说，正是体现注重消息，发挥“匕首”和“投枪”式的特点。刊物以内容取胜，又照顾到国统区读者的欣赏习惯，因此问世以后不胫而走，很快就发行到两万册以上，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惊人的。

夏衍同志提到：“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反共。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按此文登在1946年4月25日出版的《消息》半周刊第6期，题名《曾琦梁鸿志唱和录》，作者署名“古董家”。夏衍同志把曾琦的名字误为李璜，把伪行政院长梁鸿志误为汪精卫了。曾、李都是青年党的头目，汪、梁都是大汉奸，性质不差，姓名错了，估计夏公手头没有保存刊物而误记了。查文章的最后，果有夏公所述的话：“曾先生近年墨宝，敝古董家搜罗尚丰，读者有兴趣，鄙人当徐徐制版抄录而公诸于世也。甲申后三年，天昏地黑之日。古董家撰于上海。”这种善于利用敌人的材料，从事宣传斗争的技巧，正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才略，而夏公一生究竟用过多少笔名呢？“古董家”又是不计其数中的一个。

夏公又提供：“这份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消息》半周刊是由党组织和党员办的刊物，但是如果当时没有“开明绅士”的资助也许就办不成，夏公不忘旧情地在此记上一笔，体现了我党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传统作风，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年支持这个刊物并应约题字的民主人士，夏公提到了黄炎培、朱学范

两位，此外还有马寅初、阎宝航、章伯钧、梁漱溟、施复亮，以及郭沫若和田汉。写文章的有叶圣陶。马寅初的题词是：“国破人亡，民穷财竭。”陶行知题诗两首是：“说是人民第一，弄得没有饭吃。指望内战快停，愿您传此消息。”“我从首都经过，自由尚无一滴。前天到了上海，喜见民主消息。”诗中两见《消息》的刊名。《民主》，可能是指当时马叙伦、郑振铎合编的进步刊物。这里都有双关的含义。

1946年5月23日，《消息》半周刊出版了十四期以后遭到查封，历时共一个半月。夏公亲切地称这个刊物为“小草”，我有幸保存了这株“小草”合订本，乐于为夏公补述几句。

第四辑 译林枝叶

《俄国文学史》

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我的自传》、《面包与自由》等早有中译，他的《俄国文学史》虽然不属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三十年代却亦有了中译本，而且先后出版了两种。两个译本都厚达五百余页，为大型 25 开本，一是上海北新书局 1930 年 12 月出版，译者韩侍桁；另一本 1931 年 4 月由上海的重庆书店出版，译者郭安仁。

本书原名《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由作者在美国波士顿罗威尔学院的八次讲演汇集而成，初版于 1905 年，1916 年出版了增订本。很明显，这部书是针对西欧读者的需要而写的，着重谈了俄罗斯的几位作家，如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等。正如韩侍桁说，克鲁泡特金并不是一位文学研究家，他讲文学偏重社会的意义与背景，而这恰好是俄国文学的特色，因此作者对文学本质的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郭安仁也说，当时的中国文学正需要有俄罗斯文学的空气来救援。他为我国翻译界几乎整个拥有了屠格涅夫、契诃夫而骄傲，为不久将全部拥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感到高兴。他似乎偏爱屠格涅夫，先后译过《前夜》和《贵族之家》，颇能传达屠格涅夫的气质。郭安仁的名字读者有点生疏，提起丽尼却广为人知，人们不会忘记他以丽尼署名出版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江之歌》。

两位译者都是从英文本翻译的，各自又参考了日译本，而且不约而同地声明，原译忠实原著书名《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今名《俄国文学史》是出版社的自作主张，出于生意眼也。

丽尼于 1968 年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他还译过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伊凡诺夫》、《海鸥》，纪德的《田园交响乐》。他 1928 年开译《俄国文学史》时才 19 岁。韩侍桁病故于 1987 年，翻译《俄国文学史》时已正式加入左联，同时译有苏联小说《铁甲列车》，由鲁迅先生作序，编入“现代文艺丛刊”。读者更为熟悉的，可能是他译的霍桑名著《红字》，至今仍为流行的译本。

两本禁书

外国作家中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若果细谈，似可写成两本专著。

1932年6月，上海南强书局先出版了一本《高尔基印象记》，7月又出版了《托尔斯泰印象记》。两书均为译文，黄锦涛编。出版之后即遭国民党查禁。前者所加的罪名是“普罗文艺”，后者虽未见诸文字，但仅以书中收有两篇列宁的论文即可论罪。编者黄锦涛，阿英同志的化名。

左联时期，阿英已经表现出他史料编辑的才能，两本外国作家研究资料余先后得藏，窃喜它们逃过森严的文网，更叹世人少知珍爱，以为平常不过的书物。我觉得无论从中俄文化交流史，以及纪念阿英和禁书难得而言，两书绝非寻常。人们侈谈珍本，珍本即在手边，怕的是我们漫不经心。

《高尔基印象记》收有柯根、巴比塞、秋田雀等人的论文和回忆之作；《托尔斯泰印象记》收有冯乃超、柔石、耿济之、赵景深、徐霞村等人的译文。列宁的两篇著作，即今译《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和《列·尼·托尔斯泰》。两书以较少的篇幅使读者能全面了解一个作家的生平、思想和艺术，在同类书籍中难能可贵。两书有编者序，作家传记，作品评论，作家生活印象，著作目录和中译本目录，还包括作家肖像和作品插图。这些都显示了编者的史料目光，仅以搜集中译本的目录来说，对某些编者便是个难题，甚至无从下手。

编者还向读者提示，书中所收日本昇曙梦和美国辛克莱的文章有非无产阶级的观点，希望读者明察。又指出鲁迅先生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一文极为重要，惜因篇幅过长未收，希望读者从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中去找。

如此等等，莫不体现出编者与读者的亲切交流，气氛和谐，一如朋友间的对话。我失悔往时旧书肆繁昌之日，未能有意尽访阿英编著的书刊，甚至认为阿英前辈虽为资深的革命文学家，亦有在白色恐怖下争取生存，编书为稻粱谋的时候，因而未加重视，失去不少收藏的机会。思之有愧！

1981年1月

瞿秋白与《茨冈》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茨冈”即“吉普赛人”），原作于1824年。瞿秋白于1933年冬季在上海着手翻译。那时他在白色恐怖的压迫下，曾经多次迁移隐居处所，但仍坚持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著译工作。正当《茨冈》译稿即将完工之际，他接到党中央让他赶赴江西苏区的命令，尽管这个决定对病中的他是很不合适的，他还是在1934年初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备，并分别向鲁迅和茅盾等人告别。他把未完的译稿《茨冈》，送给前来为他送行的彭玲女士。四十多年以后，彭玲在回忆秋白、之华夫妇的文章《难忘的星期三》（刊1982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中说，《茨冈》译稿写在一本黑色的漆布软面的簿子里，“他（按指秋白）一面打开译文，一面背诵起原文来，很快就沉浸在原作的意境之中，好像眼前看见了平坦广阔的草原、吉普赛人的篝火、帐篷和马车，甚至看见了真妃儿粗犷豪放、酷爱自由的目光。”出发以前，秋白便把《茨冈》译稿送给彭玲，并说：“你喜欢，你就拿去吧，作为你研究苏俄文学之助。”

抗战开始的第二年，穆木天和锡金正在武汉办诗刊《时调》，出版了五期，又改出《五月》诗歌综合丛刊，1938年5月仅仅出了一期便告结束。就在这小型的诗歌丛刊上第一次发表了秋白的译作《茨冈》，这是锡金从穆木天那里得见秋白的手稿而整理发表的。彭玲是穆木天妻子彭慧的妹妹，多年来一直珍藏着这部原稿。锡金把《茨冈》未竟的结尾写成了简介，并在刊物上影印了手稿第一页，又把秋白用铅笔写在稿本衬页上的一行拉丁字译了出来，放在诗的最前面，这一行字是：“这是我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尝试。”所以锡金在本书“附记”里说，秋白译稿《茨冈》的发表，为诗人们更好地运用诗歌语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茨冈》译稿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是在1940年3月，当时作为“文艺新潮社小丛书第一辑之一”，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文艺新潮》是上海孤岛时期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由钱君匋、锡金主编。这套小丛书也由他们二人主编。锡金为了本书的出版重新写了《后记》，说明他在武汉见到《茨冈》的手稿以后，“我费上两个整天整夜的时间，翻着《露和字典》，对着俄文原本，把可能整理出来的都从那些零碎纸片中整理了出来，第一次发表在《五月》上。”这一次出书，没有在诗的前面印出秋白用拉丁字写的那句话，只引入锡金写的《后记》中。据锡金介绍，1938年4月于汉口美的咖啡店楼上举行的第五战区士兵诗歌奖金评赛会上，他和话剧演员王莹女士、诗人高兰分段朗诵过《茨冈》，引起全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侍役特地停了音乐，连楼下的客人也站在楼梯上来听。1939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女作家关露也朗诵了《茨冈》的一段。人们热爱普希金，人们也怀着一种尊敬的感情怀念牺牲不久的秋白烈士。

《茨冈》的译本中，还收入张铁弦、陈冥译的苏联作家写的《普式庚·俄国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和《普式庚怎样写作》两篇译文，作为本书的附录。这个译本问世半个世纪了，包括更早一点在武汉出版的《五月》，都成了稀见的珍本书。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3年2月重印了秋白译的《茨冈》，原稿未译完的部分则由秋白的女婿李何同志补译完成。“出版说明”中讲当年第一次发表此稿的是《五月诗丛》，在上海出版。刊名和地点都弄错了，足见编辑部也没有找到原刊。

焦菊隐与《女店主》

18 世纪意大利喜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名字，中国读者未必陌生，他的《一仆二主》、《女店主》都曾搬上了中国舞台。《女店主》更是他的代表作。剧中写三个贵族追求年青的女店主，可是聪明美丽的老板娘却嫁给了善良纯朴的店员，愚蠢的贵族为此出尽了洋相。

我保存的《女店主》中译本是焦菊隐翻译的，1927 年 9 月北新书局出版。据焦氏称，1926 年夏，诗人于赓虞已经译好前两幕，因忙于写诗便转给他接译，年底，《燕大周刊》社要演此戏，临时由方文、雪莱二人于一夜间赶译完第三幕前后两场。焦氏即“前后改了一遍，起先还稍对原文，往后索性以他们的中译文为根据，胡改起来。所以现在如有哪位狂飙批评家以原文来找错，实在是很容易的。”每逢我翻看这本封面署名焦菊隐译的《女店主》，我总怀疑这能不能说是真正的翻译作品。查各类书目都把它列为翻译作品，我看值得考虑。焦氏又说，他所据的《女店主》是爱尔兰一位女作家的英文改译本，那位女译者不仅删去两个剧中人，而且加工处理为爱尔兰化了。在焦氏笔下再化为中国的故事，剧中人都变成中国姓名。当然，整个改编并没有离谱，也保持了原作简洁、轻快、流畅的风格。不过即使如此也不宜列入翻译作品书目，应列入戏剧创作书目，因为改编世界名著和外国剧本中国化的先例多有，焦氏的《女店主》也不能例外。

此外，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在本书“小引”里焦氏明确写道：“谢谢司徒兄画的封面。”这是指当时亦在燕京的画家司徒乔吧，可是画上的署名却是“LF”，即叶灵凤的签名。画上的店铺门面，包括门前挂的纸灯笼，以及女店主的形象亦已中国化了，画风更像叶氏。我怀疑这是司徒乔临时约他执笔的，因为这年夏天叶氏曾在北平勾留数十日。这当然是我的猜测，对于一本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不问亦罢。

最美丽的情书

在欧洲文学史上，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爱情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男女主人公是中世纪的法国人，由于阿柏拉身为教会的教师，并提倡唯理主义的哲学，受到宗教的迫害和世俗势力的阻挠终于无法与恋人结合，甚至残酷地受到斩断男根的惩罚。少女哀绿绮思随后也当了尼姑。在一个偶然的会里，她在修道院里与阿柏拉通起信来，倾诉了爱情的坚贞和难以抑制的情欲。留在世间的这一束情书，也不过六封而已，却赢得了全世界千百万读者的同情，被史家看作是最深刻最美丽的情书。这一对以悲剧而告终的恋人，被目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情人。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古老的情书大约写于 1128 年，1616 年在巴黎有过拉丁文本，1728 年在英国最初发现的可能就是这个本子。此后便以《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为名，出现了无数的英译本和各国文字的译本。凡是读过这部情书的人，一般都认为哀绿绮思的信写得比阿柏拉的还要感情强烈。她在信中说：“我明白我自己已经宣过誓，已经戴上女尼的面幕，已经认为我的爱情已经死了，埋葬了；但是从我心底又会突然不意地涌出一股热情，战胜了这一切意念，并且淹没了我的一切理智和信念。”一对恋人不能结合，互盼着自己死后对方能活着，最终合葬在一起。男主人公死于 1142 年，活到 63 岁；女主人公死于 1163 年。传说教会没有满足他们合葬的要求，也有传说合葬成功了，而且下葬时，阿柏拉虽然已死去 20 年，依然面目如生，张开了双臂拥抱了哀绿绮思。这同我们民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结局极为相似，说明在人民的心目中，真诚的爱情是可以战胜死亡的。

《阿柏拉与哀绿绮思》在我国的最早译本，是 1928 年底新月书店出版的，译者梁实秋。1931 年已经印行了第 3 版。新月解散后，版权转给商务印书馆，编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重新问世。梁实秋的译本，根据的是 1922 年的英译本，而这个版本又是翻印的 1722 年的英译本。梁译本问世后，胡适告诉译者所据的不过是个述意本，同时向梁实秋提供了蒙克列夫的英文全译本。总之，关于这部古老的情书集，光是英译本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五、六十种之多，考证起来是大有文章的。比如梁的译本中有阿柏拉被哀绿绮思的婢女所爱的情节，可能即出于述意本的原译者的篡改和附会。但，梁实秋已不及根据胡适提供的版本改译了。数十年来，在我国读书界流传的，似乎只有梁实秋的这个译本。

1956 年 6 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叶灵凤的新译本，书名与梁译本相同，只是阿柏拉的“柏”字与梁本的“伯”字不同。叶灵凤根据的是荷兰 1947 年翻印的 1824 年的英译本。梁、叶两位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也都是写小品文的能手，他们的译笔当然都具有一定吸引力。如果把两者比较起来读，一定非常有趣。限于篇幅，现在我仅把情书第二函，即哀绿绮思写给阿柏拉的信各引一小段作为对照，只见稍有差别，不足论两者的高低：“我在此地看见的只是神的标记，而我口里讲的只是男人！”（梁译）

“现在这里举目所见，全是神的记号，可是我却尽在谈着人的事情！”（叶译）

两位译者都非常推崇这部古典情书。叶灵凤以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起阿柏拉与哀绿绮思，“不仅显得浅薄，而且简直近似儿戏。”（见叶灵凤的《译者序言》）至于梁实秋的意见，我愿举出当年新月书店的

一则广告为凭，因为其中的语句与梁实秋在《译后记》、《再版后记》中的用语几乎一致，我怀疑它出自梁氏之手。

这是八百年前一段风流案，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所写的一束情书。古今中外的情书，没有一部比这个更为沉痛，哀艳，凄惨，纯洁，高尚。这里面的美丽玄妙的词句，竟成后世情人们书信中的滥调，其影响之大可知，所以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一切情书的老祖宗。最可贵的是，这部情书里绝无半点轻薄，译者认为这是一部“超凡入圣”的杰作。

1991 年春天，我在天津参加《散文》月刊的座谈会。有天夜里，主人招待我们看了一部法国电影《天堂窃情》，事先并不知道影片的内容，片名译得也有点近于鸳蝴派，不想正是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故事。我以为那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影片，特别是对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直到她临终时依然对圣父圣母没有丝毫的妥协。她是带着爱和仇恨走的。可惜的是，尽管北京也公映了这部影片，报上却默然无声，远不如对待武侠侦探或歌星笑星的胡闹那么热烈。这使我一想起便感到非常的不是滋味，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琵琶词侣诗画集》

十九世纪英国装饰画家比亚兹莱由于鲁迅先生的介绍，早已经为中国的读者所熟悉。1929年4月，鲁迅编印的《艺苑朝华》第四辑就是《比亚兹莱画选》。鲁迅在《比亚兹莱画选 小引》中对于这位只活了二十六岁的画家给以很高的评价——

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比亚兹莱少时的生活底第一个影响是音乐，他真正的嗜好是文学。

三十年代前后，作家叶灵凤受了比亚兹莱画风的影响，追随和模仿画家的线条，为自己的作品和创造社的书刊作了不少插图和封面。

就在鲁迅编印的《比亚兹莱画选》问世两个月后的1929年6月，上海金屋书店又出版了浩文译的《琵琶词侣诗画集》一册，扉页上写着：“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比亚兹莱的译名又化作琵琶词侣，这是译者有意追求一种典雅的书斋趣味。金屋书店是诗人邵洵美创办的，浩文是诗人的笔名，应该说邵洵美也是爱慕比亚兹莱诗和画的一位作家。《琵琶词侣诗画集》是一本64开、袖珍型的小书，像金屋书店出版的其他书一本，印制得十分讲究。选用了重磅道林纸，毛边本，诗文全部加了套红的花框，堪称一件艺术品。邵洵美是一位热衷于书刊艺术的实践家。他办金屋书店，把资金全部投入对艺术的追求，舍得花钱，所以赔钱多，关门也快。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是一段佳话。对于邵洵美的思想评价是一回事，对于他在出版事业上的追求还是要记上一笔的。

《琵琶词侣诗画集》共收画家创作的诗两首，一是《三个音乐师》，一是《理发师》。据说画家还有一首译诗，他短促的一生就留下这三首诗。此外便是比亚兹莱的自画像和三幅插图，及邵洵美写的序。邵说：“琵琶词侣（1872—1898）的画在我国已有人提起过了，他的线条画是受了我们东方的影响的，但是当我们看了，竟觉得没一处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啊，这一个美丽的灵魂！”又说：“他不到三十岁便死了，但是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还是不息地工作着。他同时还向文学努力；写了一篇故事《山下》，西门氏曾说，要是他能多活几年，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是第一等的了。情感的纯粹，文词的典丽，韵律的和谐，决不是平常的作家所梦想得到的。”鲁迅先生说比亚兹莱的真正嗜好是文学，而邵洵美翻译和编印了这册精美的《琵琶词侣诗画集》，恰好是为鲁迅的话作出实证。他认为画家的画是讽刺的，文也是讽刺的，指斥他的人并没有真正了解画家。在邵洵美主编的《金屋月刊》上刊有一则《琵琶词侣诗画集》的广告，可能出自编译者之手，今录如后——

国黄面志的艺术编辑，黑白画的创造者，他的诗在我国从没有人提及。原因是他的诗集原本不易购得，恐怕我国还没有人读到过。兹由本店重价觅到一册，请浩文先生译出，再用上等纸精印，并附琵琶词侣自作插图多幅及自画像一张，价目低廉，只售大洋二角。我们是本着宝贵的东西，不应当独占的意思。爱画的爱诗的爱收藏的都得来买一本。

翻翻《琵琶词侣诗画集》，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保存的这册小书完整如新，六十年代初以三角钱于旧书摊上捡得。现在有点不忍回味了。

《歌德之认识》

今年是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不论是在诗人的故乡德国，还是诗人所向往的中国，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你相信吗？当 1932 年诗人逝世一百周年时我国出版了一本纪念集《歌德之认识》。书前的“编者前言”说：“此集子所收的论文，除谢六逸、华林二先生者外，余均多在北平报纸上所出之歌德逝世百年纪念刊上刊载。”全书收论文二十余篇，编者宗白华、周冰若（辅成）。

本书计分五部分：一、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二、歌德的人格与个性。三、歌德的文艺。四、歌德与世界。五、歌德纪念。著译者有冰心、贺麟、田汉、谢六逸、杨丙辰、徐仲年、华林、宗白华等。在“歌德与世界”部分，有七位作者介绍了歌德与德国、英国、法国文学的关系，还介绍了歌德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小说、孔子的关系。附录三篇是：魏玛举行歌德纪念之盛况、苏俄的歌德百年纪念会、歌德的生平与著作。

“五四”以后，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影响了一代中国的知识青年，更早的苏曼殊、马君武也都以古语译过歌德的诗，中国新文学作家中的“歌德热”堪称盛况空前。书中收有宗白华的《歌德之人生启示》，泛论歌德的诗作，有几首也是用旧体诗的形式，如《琴弦师歌曲》、《迷娘歌曲》等，后者曰：“谁人识相思，乃解依心苦。寂寞而无欢，望彼天一方。爱我知我人，呜乎在远方。我头昏欲眩，五脏焦欲燃。谁解相思苦，乃识依心煎。”宗白华以为这表现了“人生的沉痛”，以及对美丽而永久的生命的追求。

田汉所译《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完成于 1920 年 3 月，所以宗白华说，那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一篇介绍歌德的长文”。实际田汉译此文的动机更早，时在 1919 年的秋天。那时宗白华拟作《歌德的世界观及人生观》。田汉、郭沫若、宗白华研究歌德的事，从他们三人合著的《三叶集》中可见。

田汉译文中的歌德诗是请郭沫若译的，其中《艺术家之歌》亦取古体，曰：“宇宙茫浩浩，一神之所表。艺海浩茫茫，一心之所彰。唯兹艺术心，‘美’饰中之‘真’。”

郭沫若说，译诗的手腕有直译和意译，尚有一种“风韵译”，他采取此法。

《歌德之认识》1932 年编成，巴金热情推荐给上海出版界，未成，始由南京钟山书局于 1933 年 1 月出版。

1982 年 3 月

《歌德与悲多汶》

诗人梁宗岱（1903—1983），一生热爱翻译工作，1943年他以“华胥社”的名义，在桂林自费印行了一本罗曼·罗兰的《歌德与悲多汶》。战时桂林，只能出土纸书。但，这没有影响译者印书时的雅兴。他在扉页背面声明：“本书单行本初版用南雄纸印三千本。另非卖品四册，用上等贡纸印，号码由甲至丁。一九四三年二月印竣于桂林绍荣印刷厂。总经售：明日社。”所谓“明日社”，那是翻译家陈占元等文人办的一家小出版社。纸质坚韧洁白的四册贡纸本，不知世间还有留存否！

罗曼·罗兰的这本书，实由四篇研究歌德的论文组成，依次是：歌德与悲多汶、歌德的缄默、歌德与音乐、贝婷娜。这最后一篇，是讲晚年的歌德无法抗拒一个少女贝婷娜的爱，而这女子又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带有疯狂性的才女和恋人。直到歌德临终前的十二天，那时歌德与她的关系早已疏远，她还让年方18岁的儿子去见歌德，并在信中对歌德说：“在这孩子身上再吻我一次吧！”

罗曼·罗兰是个热爱传记形式的作家，他的研究论文一点也不枯燥，甚至带有传记文学的风格。罗曼·罗兰把有关歌德与悲多汶的四篇文章编成一本书，时在1930年的4月，为此他还写了一篇短文作为《序曲》。当他谈到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征途时，他下面两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

我从不关心到达。使我发生兴趣的是路……只要它是在我所选择的方向里。

另一段是：

我时常在活着仿佛我可以活到100岁！或明天便死去；这于我毫无差异。问题只在于全神贯注于你所从事的工作。

梁宗岱命运坎坷，在身处逆境中也没有放弃他所选择的神圣事业，坚持翻译工作。他的夫人甘少苏回忆：“1967年7月28日，红卫兵第一次来抄我们的家，由英语系一个姓周的学生带队。他们把宗岱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的译著以及刚译好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世德》上集和二十多万字的《蒙田试笔》都投进火中，还有罗曼·罗兰的六封来信和瓦雷里的十三封来信以及两位大师送给宗岱的亲笔签名的大照片，法国画家哈烈为宗岱画的一张全身速写像，统统烧掉了。”（见重庆出版社《宗岱和我》一书）“文革”中，梁家一共被抄七次，如此暴行还要当事者“正确对待”，真是荒谬至极！我藏的这本《歌德与悲多汶》，在衬页上又有先前收藏者的题辞，写于1947的5月23日，初未留意，以为与本书无关可以撕去。后来觉得出语真切，未必是胡闹的文字，还是保留下来，或可作篇外的一则书话来读。

我把我青年时期的残骸，收藏在这个小小的《塔》里。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像这样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啊，青春哟！我过往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远，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读沫若小说《塔》题序书此。

至于这段文字为何不直接写在《塔》上，却写在梁译的罗曼·罗兰的书上，不解。作者署名“静”，是男是女，更不可考。

《托尔斯泰散文集》

这是一本土纸书，1944年7月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出版社工作的有徐迟、冯亦代等作家，曾经出版过一些好书。《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一册）就是由徐迟编译的。

托尔斯泰的小说集早就有了中译本，散文专集的译本我见到的不多，以“散文集”来命名的这还是第一本。徐迟在这里翻译了托翁的三篇散文，都是篇幅较长的。一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二是小说《克莱采奏鸣曲》的“后记”，三是《过一个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译者说选这三篇乍一看会令人发笑的，因为第一篇是劝人不要吸烟喝酒的，第二篇是劝男人禁欲的，第三篇则劝人不要吃肉。这些也是很有趣的话题，特别是由这样一位世界大文豪来谈就更有兴味了。

但是读来并不感到轻松，看似琐事，但在托尔斯泰来说，却是他久经思考的严肃问题。从思想上来认识，可以说这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散文既多有趣论述，也有很多枯燥的说教。托翁的小说那样的魅人，人物和故事那样的生动，他的散文似乎主要是逻辑思维，甚至离不开基督和福音书。他小说里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芒，在散文里（至少在这三篇里）给人的印象却是唠叨的规劝及某些偏见。这同读屠格涅夫或契诃夫的散文感受很不一样，后两位作家的散文思想清澈，文笔抒情，无沉重之感。托翁散文重在说理，深邃凝重。思想矛盾是存在的，但亦真诚坦白，非常严肃地与读者进行交流。

第一篇《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写于1890年，为一个医生写的《论酒醉》一书作的序言。托翁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是酒乃一切犯罪和邪念的渊源，只有人在醉酒之后，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才嫖妓、盗窃、杀人。他断言：“堕落的女人之堕落，有一半是醉酒的影响。”又说：“娼妓和疯子全是吸烟的”，而“过着正常生活的女人中间，吸烟的人很少”。他认为吸烟喝酒不是个习惯问题，而是有意窒息自己的良心，忌烟戒酒恰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他以为世上发生的生活混乱，不管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是在昏迷不醒时做的，是烟酒麻醉了他们。“从这可怕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

我不敢苟同托翁禁酒戒烟的理论，但我却喜欢他对自己吸烟时所作的心理自白，确是细致而又生动的描写。他说：

我回顾了我自己吸烟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特别需要香烟？总是这样的時候，在我的回忆中呈现了某种我不愿记得的事物，于是我想忘记它——不去想起它。我自己坐着，明知道我应该工作，却什么也不做，心里觉得不想做，我就吸吸烟，一直坐下去了。我答应人家五点钟到他家里去，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耽得过久了，我记起我已经失约，可是我不愿意记得，所以我吸烟了。我心里很烦，给人家说了很不客气的话，明知道我是错了，明知道我应该停止，可是我要我的坏脾气错到底——所以我吸烟，继续的对人不客气。我打牌，输得比预料的还多，所以我抽香烟了。我使我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了，我行为坏透了，我犯了一个个过失了，我应该承认我自己是乱七八糟，然后赶快逃开去了，可是我不愿意承认它，我诅咒别人——所以我吸烟。我写了一些什么，对我所写的并不满意，我本该扔掉它，可是我很想照我的计划，写完它算数——所以我吸烟。我在和人辩论，发现我的对方和我没有了解，也不能了解彼此，可是我希望发表我的意见，所以我不停地讲——一面点香烟。

这个分析可信而亲切，还有他那些谴责吸烟人把毒雾强加于人的文字，如“一个个吸烟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不散布那不健康的烟雾的，即使在房间里有不吸烟的妇人孺子——他们是也要呼吸空气的呢”。如果没有那些玄妙的理论，这是多么优美的散文啊。

第二篇反对性欲的散文，是托尔斯泰向基督理想迈进的宣言，是他向往羔羊和狮子同睡、万物在爱中结合必不可少的步骤。然而这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也不可能打动人心。世界上有很多托翁的研究家指出，在《克莱采奏鸣曲》中，托翁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虚伪和肉欲的夫妻生活的伪善，是令人信服的。可是在这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后，作者又加上了这篇“后记”，使得作品本身具有的某些矛盾愈加明显，也更令人扫兴了。

第三篇《过一个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是托翁 1892 年为《饮食伦理学》一书写的序文。这是一篇更加冗长的论文。当然，作者也并未简单地归结到要作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停止吃肉。但是，他却明确提出：“一个人追求的第一个美德是自制，自我的节制。”而在这个自制的程序中的第一件事就是饮食的自制，不吃兽肉。“因为我们且不说兽肉如何刺激情欲吧，吃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他必须首先执行那违背道德感情的行为——杀戮，而且只有贪吃以及爱好可口的食物的欲念才会形成这杀戮行为的。”为什么要饮食自制呢？在托翁看来，如果一个人吃得太多就无法不懒做，“而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就也永不能摆脱情欲。”所以，他还讲了一个他准备写作的故事：一个女人，为了要报复一个伤害了她的男人，劫走了他的幼子，去请求巫师教她如何报复。巫师让她把婴儿给一个无后的富翁收养。那孩子终于在阔人的奢侈荒淫中长大了，成为一个懒惰而无能的人，最后在破产之后，犯罪，或疯狂或自杀了。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散文只是托尔斯泰偶然的的游戏之作，他是非常虔诚，非常严肃地在同读者谈心。徐迟同志在“译序”里对此也作了说明，但是他也结合当时重庆政府的现状，作了某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阐释，借此讽刺了当局的一些愚蠢和陈腐的滥调。

按照书后的预告，美学出版社还有《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二册的出版计划，并且列出书内包括《论莫泊桑》、《论艺术中的真理》、《论艺术》、《论农民小说》、《学生与艺术》等篇目。显然这一册是有关美学及艺术的论文，译者是冯亦代。日前偶遇亦代同志，他说这第二册并未出版，因为在他开手译了一两篇以后，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很快离开重庆到了上海。时过境迁，新的战斗任务在迎接着他，他继徐迟之后续译《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二册的计划就烟消云散了。

1985 年 3 月

《域外文人日记抄》

欧美国家历来把作家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一部全集光是日记就占几卷。但是，按照一般的习惯都是在作家逝世以后才发表。直到今天我们看域外文坛消息，也还是这个传统，或是由作家的亲人、好朋友、秘书等整理出版，或是由出版家购得版权，委托研究者整理。这些文人的日记一向拥有大量的读者。

1934年10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施蛰存编译的《域外文人日记抄》，这是我所见到的较早介绍外国作家日记的书。书内收有托尔斯泰等七名域外作家的日记选译，至今读来意味盎然。这是因为作家们的日记都是优美的散文，而且也都敢于流露自己的思想，比较真实。

施蛰存先生在书前写了一篇序言，他认为“日记是美文中的一支，并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他说作家的日记往往是写给自己看的，记下的主要是个人的言行思想，因此可以叫“个人的文学”。因为是“个人”的，所以它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至少不要论文式的阐述和解释，不要小说式的锐意刻画，不要像写其他散文般地讲求“文体之明白畅达，词藻之风华典雅”。当然，这是指那些执笔时不曾想到要发表的作者而言。世间也有记日记时便想到了要发表，虽然比起其他文学样式来也比较接近真实，但终究看得出有不少的伪饰，是做出来的文章，不过采取了日记的形式而已。在中外作家中这类实例不少。清代著名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曾国藩《求阙斋日记》之类，都是在写作时便想到了要发表的。鲁迅先生的日记不曾想到要发表，前期的“闲笔”较多，后来因为环境的特殊，只余记事，而且不能不避开某些活动，这与外国作家们的可以欣赏的日记还有所不同。现代作家中郁达夫的日记是有特色的，不过大部分写来是为了发表的；也有记时未必想到发表，但在发表前还是作过整理，如《日记九种》即是。

《域外文人日记抄》介绍的第一位作家是英国早逝的女作家曼殊斐儿。这位年轻貌美的女作家死于1923年，她的日记一卷便是在她死后四年，由她丈夫整理出版的。早在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便翻译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而且他在伦敦还同这位女作家交谈过。早期的新文学家似乎都熟悉曼殊斐儿这个名字。近年来我们也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译名改为曼殊斐尔德。她的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写在病床上的随想录，记载了她对文学、人生的感想，反映了一个患了肺病的年轻女子的心理状态，笔墨蕴秀、简练，带着一股感伤的情调。

从日记里可以看到，她在病中还时时想到自己小说里的人物，还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她爱契诃夫的作品，人们说她的作品明显地受到这位俄国作家的影响，当然是就艺术风格而论。她想工作，但病体不支。她烦躁，无力抵抗寒冷而潮湿的天气。她恨大海！在1920年1月8日的日记便记下她这时的心情：“天色昏黑。全日如在地狱中。什么事都不能做。饮白兰地酒。决心不哭的——而竟哭了。孤寂之感真是可怕的啊。倘若我不能有所逃避，我真将死了。忧伤来袭，遂至呕吐，晕眩，寒冷。唉，我必须设法挣扎过它才好。”她的日记每天就写这么几句，情绪好时也只是这么一小段。

托尔斯泰的日记则要深厚得多，篇幅也长，他记下的主要是将要写出的思想材料，像写作提纲，又像备忘录，因此可以看作是他思想的自白。托翁思想上的矛盾也清晰地留在他的日记里。如1898年1月4日的日记里有：“一

事须记：即一切生命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终结是为上帝服务，为上帝的工作服务而使之完成，那是我们所不可几及的。稍缓我当将这意见写出来。现在我很忙乱。”显然托翁对人生意义的观点受宗教所累，他的这种思想在论文、小说中时有流露，在日记里也不放过。托翁的日记还记了不少关于女人和妇女问题的断想，比如同年2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以下的这些断片，当我写下来之后，我就忘记了：……一个妻子亲近着她的丈夫，对他说了许多以前没有说过的抚爱的话。丈夫感动了，但这是只因为她曾做过一些淫猥的事情而已。”托翁在他的小说里塑造过不少令人尊敬的可爱的女性典型，可他在日记里却有不少对女性不恭的言词，这也只能在作家的日记里才能看到吧。

在托翁的日记里还记述了他企图用宗教来团结人类，用自臻于美善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求助于上帝的爱来解脱世间的烦恼，等等。我觉得他在日记里表达的这些思想，似乎比在小说里表现的还要多，也更加固执。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日记则是爱情的篇章，是痛苦的爱情自白。同本书所收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哥庚的日记一样，我怀疑作者是当散文来写并准备公开发表的。哥庚的日记就是他那有名的散文集《娜亚·娜亚》，即鲁迅先生准备翻译而终于不成的那部作品。

《域外文人日记抄》里唯一的一位亚洲作家是日本的有岛武郎。这位作家于1923年6月与恋人多野秋子在信州三笠山的净月庵别墅里自杀而震惊文坛。1916年3月27日的日记里，记述一个藏书家的心理活动：“发见在第十五银行还有若干存款，我想尽那钱所允许地买书。究竟买了的书能读不能读，连想也没有去想。于是，下午逛书店，疲乏极了。幸而满足杂乱无章的好奇心的书极少，所以剩下了很多钱。我省下钱来，只是为要满足无益的欲望。可是我却买了几本排在书架上可以夸耀的书。”日本早就出版过有岛武郎的全集，他的日记收入第十卷。

《域外文人日记抄》还收有美国杰出的黑白版画家肯特的日记，他不仅是一位抒情画家，也是写抒情散文的能手。肯特笔下的山色风光一如他绘画作品中所传达的那样美丽动人，富有诗意。

1985年2月

《铁流》缩写本

1990年8月18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原上草》上的梁永《周文缩写苏联名著 铁流》一文，向我们披露了自1933年以来，周文缩写的绥拉菲莫维支小说《铁流》一共印行了四次，最后的是1950年9月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的作者最新修订本，并附作者的《说明几句》。这个版本距今已有四十年，平时不易见到，更不要说以前的各种版本了。

曹靖华先生的《铁流》中译本问世以前便“先天地”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原先订约的出版家不敢出版，还是鲁迅先生拿出一千元现洋，用“三闲书屋”的名义自己印行的。周文的缩写本一出亦遭查禁，市上流传极少。倒是解放区，《铁流》的原译本和缩写本都得以翻印畅行，革命队伍里正需要这种书。据曹靖华介绍，抗战末期，林伯渠同志从延安到了重庆，他对曹老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铁流》《译者的话》）我想，这当中也应该包括《铁流》的缩写本。

梁永的文章说，《铁流》的缩写本一共印行了四次，恐怕不确，更准确地说自它问世以来共有三种版本，即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的初版本、1941年2月延安的修订本、1950年9月北京的修订本。1948年11月的华东本，不过是延安的翻印本，而在其他解放区也有翻印的，似乎难以统计齐全，如笔者就藏有1947年11月冀中新华书店的翻印本，所据的即为延安本。那么缩写本的《铁流》，以所见者为准，至少已印行了五次。

冀中新华书店总店在河北省饶阳县。冀中版《铁流》缩写本以绿色木刻插图作为封面，那是在荒漠中行进的一条乌铁似的人流。书名为棕红色，封面用的是白报纸，内文用土纸，这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算是讲究的。书内有十余幅木刻插图，我估计是延安本中原有的，可惜不知作者何人。为了适应当时的印刷条件，木刻线条比较粗犷，构图简练有力，这符合《铁流》的内容风格。

《铁流》缩写本的初版本，寒斋有幸藏了一册，那是左联大众文学委员会编印的，是“大众文艺丛书”的第二种，1933年6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作者署名何谷天，印二千册。书前有一篇《大众文艺丛书缘起》，指明这一丛书是为适应青年大众的需要而出版的，主要考虑到有些外国名著的译本“原文构造的太复杂，译文的句法太难懂，以及书价太贵”，而“把它们的故事用最通俗的文字传达出来……描写极力求简单化，使十多万字至几十万的作品缩到二、三万字，书价也尽可能的定得低廉，使得一切忙碌而贫苦的大众都能购买来读”。从这篇“缘起”看，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左联”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事后来检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落空，《铁流》缩写本在解放区的一再翻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周文以何谷天的笔名写了序言，他说：“《铁流》是一篇新形式的东西；与其说它是一篇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首长诗更来得妥当些。”他把原译本的四十章，缩为十八章，着重把握《铁流》中的群像描写，而故事情节一开始就是紧张的，“一直紧张到底”。三十年代进步作家从事的文艺通俗化的经验，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意义。

《读书三昧》

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是太陌生的，因为鲁迅先生当年曾经翻译出版了他的散文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

不能说鲁迅先生对这位作家的随笔不感兴趣，因为从作者的文字里，“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鲁迅一向以为，外国的好药同样可以医治中国的疾病。当然，也不能说鲁迅对这位作家抱有多么大的热情，他分明又说过：“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解。”（见《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就文风而论，鲁迅以为鹤见祐辅的随笔“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这当然是指那些议论风生而思想明澈的部分而言。但是，鲁迅又觉得作者的旅行记过于轻妙了，轻妙到如同“日报上的杂俎”，那是一些消闲的浅薄文字吧。

继《思想·山水·人物》之后，作者又出版了一本随笔集《读书三昧》，完成于昭和十一年（1936）4月，距大正十三年（1924）出版的《思想·山水·人物》已经隔了十二年。这当中局势的变化，作者感慨万千，他在序言里指出“言论自由，到处甚感困难”。因此他的《读书三昧》不得不再三地推敲，改削和废弃的旧稿超过本书的二倍。他特别提醒读者要领会字里行间的含意和弦外之音。此刻，这位崇尚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作家算是尝到了“自由”的真味了。

1940年12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印行了《读书三昧》的中译本，译者是李冠礼和肖品超。译者序言写于1937年6月初的东京，正是“七七”事变的前夕。译者以为书中的话尽管是对日本人而发，但是“不单分明反照出中国的一大黑影，简直有各人自己的真面目在”。这译书的动机，显然也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

书中所谈不光是关于读书的方法，然而作者终究是生活于书斋中的文人，处处流露出书斋趣味，如《枕头的书》等即是。书中论述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家们的品性，同《思想·山水·人物》的思想也一脉相承。日本法西斯政治当然不准人们侈谈自由，所以《读书三昧》里的话不免吞吞吐吐，反不如那些专门谈读书的文章吸引人。

鹤见祐辅在日本并非很行时的作家，他的随笔小品却因鲁迅先生的介绍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三十年代，凡是致力于散文写作的人，几乎都读过他的随笔集。

商务印书馆的书，一般封面很少装饰画，《读书三昧》总算有了封面画，但画面上的条幅、烛台、线装古书，笔墨陈旧，无美可言。

1984年2月

《近代日本小品文选》

赵景深先生在《文坛忆旧》里不称谢六逸先生是翻译家，而称他为散文家，这是很有见地的。他们两位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多年来又一起在复旦大学教书，赵先生深知谢在文学上的成绩主要在散文方面。

谢六逸的散文随笔集有《水沫集》、《茶话集》，还有一本以宏徒为笔名撰写的《文坛逸话》。1928年9月，他在《水沫集》序言里说，他从1923年起，一向喜欢用随笔的形式来写自己的感想或介绍国外的著作。这种形式“常常能够兴奋阅者的精神”，“可是要写得好的也不很容易。”1929年5月，他在上海大江书铺印行了所译的《近代日本小品文选》，我觉得这是翻译，也是他致力于散文创作活动的一种努力。“五四”以后的一批现代散文作家，多少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对日本文学尤为接近，这当然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谢六逸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文学，还写过一本《日本文学史》，因此由他来译介日本随笔是顺理成章的事。谢先生以为，在近代日本作家的作品里，有不少优美的小品文，它的情趣与西方的散文家截然不同，这“是由于日本的自然与作者的日常生活交织出来的”（见《近代日本小品文选》“前记”）。译者似乎比较喜欢芥川龙之介的散文，本书选译了这位作家的《女体》、《尾生的信》、《英雄之器》、《黄粱梦》、《侏儒的话》等五篇作品，几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芥川龙之介的散文一如他的小说，思想上不乏神秘色彩和心理分析，不过在散文里表现得稍为单纯和精练一些。书中还收有夏目漱石的《猫的墓》、《火钵》等，余为佐藤春夫、鹤见祐辅、岛崎藤村、志贺直哉诸家之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地译介日本散文小品的有鲁迅先生，还有周作人和丰子恺。谢六逸编译的《近代日本小品文选》又是一例。这至少可以引起我们思考：日本作家的小品文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散文究竟有无影响？这是个很有趣味的话题。

《近代日本小品文选》封面画很有特色。蓝天上飘洒着粉色的樱花，富士山脚下落英满地，是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成功之作。

1984年2月

《日本小品文》

缪崇群是一位早故的散文家，1945年1月病逝重庆，时年38岁。从1933年到1942年，他先后献给读者6本散文集，依次为《稀露集》、《寄健康人》、《废墟集》、《夏虫集》、《石屏随笔》、《眷眷草》。死后，巴金又为他编了一本《碑下随笔》。缪崇群的散文是追求美的，风格上清淡细腻，但是比较忧郁，有的甚至有点感伤。但是，抗战开始以后，他在日本飞机下过着逃难生活，这不能不影响他散文风格的变化。他无暇再追求玄妙的哲理和空虚的美了，而是面对血的现实，直接描绘那个战乱的年代和人民的灾难，作品里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

研究中国散文史的人，也许不曾注意到缪崇群对于日本小品文也怀着极大的兴趣。1937年7月，中华书局印行了他翻译的一本《日本小品文》。这又一次证明，作家们热衷于散文创作的同时，目光也望着外国的优秀散文。他们把译介别国的散文作为自己创作生活的一部分。

这本《日本小品文》共收四位随笔家的作品，总计二十余篇。他们是德富芦花、吉田弦二郎、铃木三重吉、高滨虚子。何以选择这四家？译者所欣赏的大概是作者们在小品文里流露的那种哀愁和寂寞的调子。德富芦花的文字散淡，善于描摹环境和人们情绪的变化，文字非常简练。这些特点与缪崇群的散文有共通之处。铃木三重吉和高滨虚子对中国读者有点陌生，前者是夏目漱石的学生，后者是被誉为日本俳句之父的正冈子规的追随者。吉田弦二郎的散文纤细委婉，作品的风格近于散文诗，这当然更是译者所喜爱的，所以这位作家的作品几占全书的一半。

缪崇群19岁时到了日本，曾在东京生活了好几年。从他的散文集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写日本生活的篇章，如《揪之寮》、《野村君》、《江户帖》等。他在日本的生活是寂寞的，但却深爱日本的山川草木。作者笔下的日本风物的确相当迷人。

日本文坛的散文小品，一向拥有大量读者。但是近三十年来，我们见到的日本当代散文小品的译作实在太少。我们的翻译家宁肯介绍格调不高的日本流行小说，也不愿意译介几篇严肃的小品文，因为后者是没有什么情节和刺激的。至于一边写着散文，一边译介别国优秀散文的作家，现在也少见了。

1984年3月

第五辑 燕城零札

林纾的《剑腥录》

我的同事朱碧森君，送我一本他的新著《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福建人民出版社），这是继 1935 年寒光著《林琴南》一书问世后的林氏新传。林纾是一位与中国新文学运动颇有瓜葛的人物，朱君并非为林氏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反面角色翻案，但用公正翔实材料，表现了林纾思想和生活的另一面，还他以历史的全貌。如林纾的翻译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创作的小说则少人提及。朱君的新著介绍了诸如《剑腥录》等林氏创作的小说，恰可说明林纾反帝爱国的思想。

我存有《剑腥录》的初版本，民国二年（1913 年）十月在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署名冷红生著，书名全称《庚辛剑腥录》。十年后，商务印书馆重印此书时，又改名《京华碧血录》。

小说写到戊戌六君子的牺牲，也写了义和团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写了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和人民的遭难。这是全书的重点。郑振铎以为林纾创作的小说记叙时事真实有据，在艺术成就上却不如他的翻译作品成功。这很可能受了叙述实事的约束，作者热衷于求真，于人物的刻画反而忽略了。《剑腥录》贯串全书的虚构人物不脱传统小说的公式。如书中男主人公本是个文弱书生，忽而成了剑侠，可以力敌群贼、救助红粉佳人，等等，这都是失败之处。但是，林纾又是近代小说史上第一个打破了章回体俗套的人，从形式的革新方面开了风气之先。

《剑腥录》的成功之处，不在写了男女主角，而是写了修伯蓐这个人物，用林纾自己的话说，他创作这部小说，“意在表彰修伯蓐之忠”。伯蓐是个真实的人物，在小说中化名为伯符。他是林纾中举时福建主考官宝廷的长子。宝廷曾官礼部侍郎，伯蓐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到日本考察过学政，他同弟弟仲蓐虽然都是皇室弟子，却主张维新。林纾与他们兄弟在北京结识。伯蓐的岳父崔联元本恶新政，又是清廷老臣，庚子时仅仅因为支持女婿的反对杀戮外国公使的主张，与掌权的端王相忤被斩首于菜市口。伯蓐从岳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八国联军进北京，伯蓐不甘洋人的杀戮，在洋兵围困的住宅内服毒自尽。他在死前写下遗书，表明自己“虽讲西学，未尝投敌”。遗诗中有句：“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他以死来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当时与伯蓐一起服毒而亡的还有弟弟仲蓐，两个妹妹隽如、淑如，侍婢隆儿。伯蓐死时三十六岁，小妹淑如才八岁，侍婢二十一岁。这些无辜者不忍洋人污辱而死节的场面，林纾在小说中都有所描写，读来极为悲壮。

值得一记的是，在我的藏本《剑腥录》封面上有林纾的毛笔题字，是寒斋所收藏的作家签名本之一。原迹无标点，名后盖有“畏庐”的印章——

此书专表彰吾伯蓐光禄兄弟忠节。今其爱女来索吾书，心为怆然，即作数语识诸其上，幸世妹宝之。

畏庐老人和泪识

从题记看，林纾赠书给故友女儿的时候，是动了感情的。他洒泪写下的这些话，表明此刻在老人的心里，仍然忆念着那些在乱世中死难的忠烈。

《燕京百咏》

《燕京百咏》，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这是潘挹奎（1784—1829）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一部描述北京风物的竹枝词。时在道光六年。张次溪所著《辛亥以前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专收明清两代有关北京的书目，未载《燕京百咏》。1962年路工编选的《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也不见收录。

《燕京百咏》重在歌咏北京的文物名胜，诸如寺庙建筑，名园故宅，多有考据，富有掌故知识。作者很少写市井生活，对于一般吃食和民俗亦少记载。如写《于少保祠》，指出明代英雄于谦的祠，在崇文门内西裱糊胡同于的故宅内。堂中塑有于谦像，道光时祠已废，仅留下一座福德土地祠，即其原址。诗曰：“故宅崇门敞，荒初古木森，事同晋立围，谋黜宋和金。社稷还先帝，天人鉴此心，夺门功罪定，千载泪沾襟。”我在西裱糊胡同住过几年，始终不知于谦故宅何在。

关于白云观，诗人是这样写的：“神仙燕九集，见道似师希，殿宇辉金碧，牲牢谢杀机。白云送来往，元庙认依稀，一钵容如许，何为贱羽衣。”从中可见当年香火之盛。

一首题为《丰台》的诗指出那里的居民多以艺花为业：“叶叶复花花，临风烂若霞，色香成世界，烟雨足和涯。小住春如梦，重游鬓欲华，田间臣独惯，岁岁念桑麻。”作者如实地记下丰台人有传统的养花手艺。《查楼》，即今之广和剧场：“查氏楼名著，楼今署广和，管弦招胜侣，燕赵发悲歌。自昔环台榭，频年艳绮罗，登场看仔细，载酒漫经过。”这自然是有关剧场史的资料。写风景名胜的，还有《响闸》和《四川营》等。前者写出当时北城风景区是相当宜人的。德胜门月桥东的响闸，道光时名澄清闸，这一带的风景，目前难以恢复了。

据清张澍在《养素堂文集》的介绍，潘挹奎字石生，甘肃武威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著述颇多。潘的友人牛鉴为《燕京百咏》写序时说，潘为乡先贤立传颇得司马迁、班固的三昧，“往往以极琐细事，传其人之生平精神，跃然于楮墨间。”《燕京百咏》是潘挹奎闻父病辞官回到西北以后而写的。后来他在故乡生活困难，应一位新任监督山海关税的朋友的邀请重来北方谋生，不数月抱病移至北京，死时才45岁。一生当中似乎只留下这部与官场生活无涉的《燕京百咏》。

1984年3月

附记：雷梦水先生1985年编撰《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时，曾借去《燕京百咏》复印一份，收入《续编》中。按此书我也从琉璃厂购来，而线装古书一般皆通过雷先生之手，足见书海茫茫，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贤如雷先生这样的贩书人，也有漏落或未缘过目的书。一叹。

1997年春

忧时讽世的风俗诗

《王风笺题》，清光绪钱塘丁立诚著，收歌咏北京的风俗诗一百首。此书不见路工辑《清代北京竹枝词》，也不见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及《续编》。该书完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前，民国九年（1920）始由杭州丁氏嘉惠堂精校，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以线装毛边本印行。

嘉惠堂是杭州丁申、丁丙兄弟藏书楼的总名，一名八千卷楼。查吴晗著《江浙藏书家史略》一书，其中列有丁立诚的条目，介绍他字修甫，为光绪元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但没有说明他与丁氏家族有何关系。其实丁立诚是丁丙的儿子，而吴晗只提到丁丙有个儿子叫丁立中。《王风笺题》正是丁立中为他的亡兄丁立诚印的。民国二年（1913），丁立中为《王风笺题》写的跋语中说：“先兄客京师久，前后公车凡九上”，暇时为诗，“往往于世风之交易，朝政之得失不免有所感触，寓讽于规怨而不怒，有小雅离骚之旨焉。”时人多争诵他的诗，又要求刊刻出版，丁立诚以为不可，并就此征求过俞曲园的意见。俞师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忧时感事，语涉过激，且藏篋中，毋遽问世。东坡他事可学，诗案不可学也。”从中可以窥见清代文网之可怖，也证明了《王风笺题》的内容并不是只写风俗。

宣统三年，笺注此书的钱塘徐珂为《王风笺题》作序时说，丁诗“词意精妙，暗寓时事，盖有感于庚子拳变而作也。”然而，他的笺注有意避开了这些政治内容，只着眼于风俗掌故。当然，也许他当时不得不如此，而他笺注的风俗内容还是相当扎实丰富的。

《王风笺题》最重要的特点是，诗中几乎没有丑化义和拳，批判的矛头直指八国联军，并且一再揭露朝廷的无能和官府的腐败，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例如诗集开首的《颂恩诏》，本来是写“午门金鸡口衔诏，天上宣恩光照耀”的盛典，作者忽然笔锋一转，指出恩诏的内容不过是“四六骈文老腔调”，这对朝廷显然是极大的不敬。第二首《递国书》，写各国公使呈献国书，诗中却明白地道出各国列强的野心是：“土地实欲情义虚，递来哀的美敦书，二十四点钟期限，下旗升炮争须臾……”《洗白象》一首写宣武门的大象房，其中也有隐喻之句，如“……白象俸食三品禄。日蹙百里国不支，庞然自大痛莫知，西人虐谗若警觉，一洗积习仁政施，以齿焚身悔已迟。”又如《听鼓词》，采取了记事的写法，针对的仍是八国联军：“津门战鼓动地敲，三鼓而衰两将逃，十八子死河西务，舆尸乱涉流滔滔，东人鼓角风怒号。”

《舍火房》，表面是写慈善措施，实际写的是八国联军火烧前门大街的惨景：“朔风凛烈冻欲死，群聚火房乞人子，好行其善乐趋炎，帝泽如春王政始。一火烧尽大栅栏，谁人恤灾心力殚，土窟僵卧半生死，巷无居人求乞难，转瞬秋风生早寒。”又如《排大杠》亦是：“执紼挽歌路曲折，前门大街大杠设，丹旗前导灵輶行，三十六人舁成列。千人万人为国殇，无棺无槨委道旁，至无情者惟水火，渺无踪迹归鸿荒，掘地犹为葬者藏。”这哪里是写一般的礼俗。

最有意思的是，诗人借了写《跑快车》、《垫街土》等街巷日常见闻，还写到光绪和慈禧败走西安的狼狈相：“无端弹雨药雾昏，宫车夜出德胜门，望望贯市七十里，銮仪侍从几辈存”；“天子下殿走怀来，蓟门风雨行徘徊，驮轿侍从贝子坐，罗帷不起飞尘埃……”如此露骨地描写当朝皇帝、皇太后

不光彩的行迹，这在近代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莫怪俞曲园先生提醒丁家万万不可刊印，以免犯案获罪。

《京都新竹枝词》

琉璃厂雷梦水辑编《北京风俗杂咏》正续两书，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深得人爱。续编成书之前，笔者为他提供了清代刻本民国抄本各一册，可惜我的藏书欠整理，还是漏收了这本《京都新竹枝词》。

《京都新竹枝词》无出版处，线装石印，于民国二年（1913）八月问世，校印者署名“老羞”。这名字显然是假托的，让人联想到它的后半“成怒”。如果我们勉强地用这笔名来窥探一下校印者的内心所想，也许可以说作者多是有感而发，并对时弊有所谴责，尽管是一时的发泄，微怒而已。全书共收竹枝词一百五十首，署名者子虚、百里、绮佛、湛园、戎马书生、孤竹愚盲等十八人。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写民国初建时的社会生活，写静止的东西很少（如节令、饮食、古迹、文玩等），这可以说是近代竹枝词中最具史料价值的一种。

这十几位作者对政治不无兴趣，对民国多有看不惯的地方，而他们当时认为新奇的事物，如今已是微不足道了。书中有写妇女新风俗的：“裙履风流盛会开，革靴囊囊女宾来，座中道韞谈锋妙，一笑旋登演说台。”这还谈不上是对妇女走进社会的讽刺，然而下面一首就对从政者有所不敬了：“奇货争居别样珍，长安估客喜翻新，茗楼一角喁喁话，交易商量到党人。”为国务议员们写照更多讥讽：“短发西装色色鲜，马龙车水过街前，同游携得如花貌，认取新来国务员。”又一首：“蛛网萦回电线斜，西城大半议员家，自从出席新添费，到院多于往日车。”有讽党争者：“民国年来党见纷，恩牛怨李太纷纷，议场争比歌场好，低首兰芳与璧云。”最末一句是指名演员梅兰芳和贾璧云，当时戏迷中也有梅党贾党之说。又一首写道：“政局纷纷类弈棋，本来约法尚临时，四番总理曾更换，内阁从新组短期。”有趣的是某些竹枝词的作者已经看到新成立的民国，并不能给国民带来真正的喜讯，故而提醒人们注意外国的动向：“试向东交民巷看，今朝各国又添兵”。又有的揭露了政府的腐败：“政客连朝竹战劳，部名俱乐挂牌高，寻常消遣千金注，要比前清贵胄豪。”又一首：“国会将开又展期，政争剧烈痛分离，怪他议院成虚设，只把薪金案屡提。”还有：“来自田间众议员，此身如到大罗天，家肥那管苍生瘦，岁给薪洋要六千。”无疑的，尽管这些竹枝词在艺术上还不太讲究，但作为近代政治讽刺诗来说后人完全可以接受。

在写社会风俗变化的竹枝词里，也有一些意识很好的作品，如批评国人崇拜洋货者：“入口纷陈百货全，东西各国竞争妍，价高不惜金如土，可叹吾民嗜好偏。”当年的社会病态，今天似乎也没有绝迹！还有一首写琉璃厂旧书肆的，这位作者的感慨可以引起今人的共鸣，时间虽然过去了七十余年，而琉璃厂面临的命运何其相似：“大雅于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书稀，如何碧眼黄须客，卷书元明板本归。”竹枝词的作者解释说：“东西洋人不惜重金购厂肆名人书画载籍，国粹殆将罄尽。”读了这样的竹枝词能不让人击案三叹乎！

《京师地名对》

对京城大都地名感兴趣者，何止今人，又何独男士？清光绪丁酉年（1897）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郁郁而终，她是蒙古族的巴哩克杏芬女士。她的父亲在京城为官，女儿娇生惯养，临终与父亲告别时说，我愿时时于梦中与父相见，但恐非儿能自主矣。直到这时候做父亲的才深自谴责平时择婿过苛，贻害了女儿的青春。为了怀念千金，后由家人协助，把女儿独处闺中自撰的一本民俗小书《京师地名对》雕版成书，时在辛丑（1901），那时杏芬小姐故去已四年了。

聪明的杏芬姑娘，发现京城的坊巷地名各有掌故，新奇有趣，富有文学意味，因按韵编类，戏为比俚，日久天长，积成一帙，名为《京师地名对》。借此她打发掉一部分枯寂的闺中生活。全书分两册装订，共20个类别，每类次序均依诗韵编成，共五百余条。有的条目还加了注文，如“天地类”中，天妃宫对地安门，注文写道：“天妃宫，东四牌楼北马大人胡同；又朝阳门外沿河往南。地安门，皇城正北门，俗称后门。”在“天文时令类”中，雹子胡同对冰窖胡同，注文称：“雹子胡同，西四牌楼北，明汉经外厂也。正红旗官学在北。冰窖，东华门外，南池子。景山西雪池，地安门外，什刹海，其余城外甚多。”这些当然都是百年以前的京城景观了。又京西的“雪洞”对东城灯市口迤南的“甘雨”胡同，注内称：“甘雨胡同，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在焉，又作干鱼。”这些坊巷掌故，对研究地名变迁的人来说自然有用，对于一般读者亦未必不感兴趣。此书并非为了实用，主要还在于它的欣赏趣味，读者可以从丰富巧妙的文学语言中，得到不少知识，了解京城的街巷布局 and 里巷风俗，甚至联想到北京人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很多地名对虽然没有注文，读来却朗朗上口，如柳巷对草厂，甜水井对苦水井，大石桥对小石桥，碧云寺对清风巷等。

在“鸟兽昆虫类”也有不少巧对，如燕儿对蚕儿，石虎对喜鹊，鲜鱼巷对蜘蛛塔，鹌鹑市对羊坊店等。在“服饰用物类”则有帘子对绳匠，钩儿对碾儿，笔管对绒线，手帕对喇叭，方巾巷对靴皮作等。在“珍宝类”中有铜钟对石碑，银狮对金鱼，玉带对银碗，宝钞对珠市等。在“茶食类”中更多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地名，如菜帮对醋儿，炒豆对粥厂，烟儿对粉丝，擀面杖对米粮库等。也许只有在中国，或只有在北京这样的古代的大都才能以如此丰富的里巷地名，显示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魅力。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如今有些里巷地名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书面上追忆遐想了。如50年代中期我所居的建国门内的贡院东街，即与诗人臧克家所居的笔管胡同相邻，彼此联系极为方便。清晨及黄昏，我经常可以看到诗人到城外去散步。那时仍有城墙和护城河，以及铁道，现在俱已变成现代化的立交桥了。当年夏日的夜晚，在城墙外边的旷野里演电影《天仙配》，我还站在那儿看了半场。因此读了这本反映百年前里巷春秋的《京师地名对》，倍感亲切，引起我不少联想。

《杨翠喜》

偶从旧书店购得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天津新小说社刊行的《杨翠喜》一书，署名西泠山人编辑。当年此女涉及轰动朝野的一大丑闻。

杨翠喜一向在天津天仙茶园等处唱戏，拿手的是《拾玉镯》、《卖胭脂》、《青云下书》等花旦戏。那时的女演员地位卑贱，杨翠喜自然也逃脱不掉卖艺兼卖色的命运，不仅流氓、富商包围着她，还有天津直隶候补道北洋陆军统制段芝贵也是她的相好。光绪三十二年（1906），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来天津办事，这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是光绪的远房弟兄，父亲又是慈禧太后的的心腹，因此仰仗权势也当上了商部尚书、御前大臣。段芝贵设宴招待这位京城来的贵公子，他看上了陪酒的杨翠喜，于是段就顺手推舟地以高价买下杨翠喜，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送往北京，献于振贝子。段芝贵马上就被提拔为黑龙江省巡抚。

事情风传在外，御史赵启霖奏秉皇上弹劾段芝贵。清廷不得不下诏书撤去段的官职，并派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调查此案。既然事情牵连到奕劻父子，内线人物早就暗中通风报信，结果由天津盐商王某出面，造了假字据，承担了买杨翠喜为使女之名，掩护皇室弟子和重臣权贵们过关。尽管载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暂时辞去尚书的职务，而举报人赵启霖还是受到罢官革职的处分。段芝贵则不了了之。辛亥以后，段因袁世凯的关系，官运亨通，在北京政府当了拱卫军总司令，还先后担任过察哈尔和湖北两省的都督。

光绪皇帝诏书中给赵启霖定的罪名是诬告皇族，所受革职处分是“咎有应得”。皇帝又借此诏示天下：“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从严惩办。”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件就这样告终了。

但是，街头巷尾，舆论大哗。当时不仅各报发表新闻和评论，连外国人办的报纸也纷纷译载此案的经过。“新小说社”刊行的《杨翠喜》一书，多少表现了社会上的这种不满。我不知道这个“新小说社”，是否即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月刊社，按说《新小说》月刊在头一年已经停刊了。

《杨翠喜》于六月份再版。我藏的就是这个版本。书的最前面是光绪皇帝的《上谕》，接着是载沣、孙家鼐的《奏摺》，即调查天津杨翠喜案的报告。“奏摺”中说，北京派去调查的人（住在天津租界外国人开的高级饭店），在天津见到了杨翠喜和盐商王某等人，全都否认举报人揭发的事实，而在当时商人是可以随意买卖歌女和妓妾的，所以也定不成罪。其后收录的是《供词》，包括杨翠喜及她养父母等人口述的记录。据“供词”说，杨的养父母以三千五百元把她卖与盐商。又有杨的小传，说明杨原为河北通州人，案发时才十九岁。十二岁时因家贫被家人带到天津，开始学戏。十四岁时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次登台，又在北马路大观茶园、北大关福仙戏园、北门里景春戏园等处演出。唱红后为盐商王某和道员大人段芝贵所宠。书中还收有关于杨案的小说、杂文、诗词、评论等文章。有人以杂文笔法写道：“杨翠喜以妓女而使段芝贵革职，赵启霖革职，振贝子辞职，其势力为一般清议所不及，为台谏所不及，为各大员所不及，为政府所不及，欲清中国官界之污浊，安得有彼千百杨翠喜来。”又有人指出段买妓而由盐商出面，在天津俗语中这叫“倒口袋”。“盖官场中人购置妾媵，恐为上官所知，有干例禁，乃使别人冒名，以掩局外之耳目，亦官场中之习技。”又说段已派人送杨到北京，

案发后，又急忙将杨接回，当时不敢坐火车，由通州乘船回津。可见到一九〇七年，京津两地尚通水路。

杨翠喜，区区一个被人买卖过三次的十九岁少女，尽管她卷入了这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中，说穿了不过是权贵们的玩物，政客土棍们的工具，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而已。据丰子恺编的弘一法师遗著《前尘影事集》，其中收有作者给杨翠喜的《菩萨蛮·忆杨翠喜》两阙。那时的李叔同还是一位常与坤伶名妓往来的少年公子。词如后：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晓风无力垂杨嫩，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当然，这是一九〇五年李叔同去日本以前发生的事了。

都门三记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掌故、随笔这种散文形式比较流行的时候，有位署名“闲人”的作者，在北京《晨报》上专写京师市井风俗小说，1928年5月由《晨报》出版部刊行三集问世，即《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可称都门三记。三书绝版已久，以于照署名，实出工笔花鸟大师于非庵先生之手，多年来风气所关，偏激者大多视种花养鸟为玩物丧志之举，所以知画家工小品，更著都门三记者鲜矣。

知于氏者周作人也。他在1950年初于《亦报》上写有《于非庵的笔记》一文：“于君在北京是以字画和印出名的，但是在我的意见上最推重的乃是闲人的文章，因为这个我还比较的知道一点，对于书画实在是个外行。闲人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说句俏皮话，颇有他家奕正之风，可以与《帝京景物略》的有些描写竞爽吧。他早已中止写作，这是很可惜的，虽然艺术的成就也一样的有价值。”知堂一语道出了都门三记并非纯技术的工具书，他惋惜作者的搁笔自有根据。

我们距离清末民初究竟遥远了，读了都门三记可以体验到辛亥前后京城一隅的社会民俗，以及传统民间文化的无限魅力。包括书中涉及的某些俗语、行语，后人也不应该全部丢掉，何况闲话中道故实、讲珍闻更不无史料价值。如讲清乾隆嘉庆时的京西钓鱼台，到民国初年已无鱼可钓；同治光绪年间的昆明湖，“虽已圈入禁地，其中鱼介，一遇霪雨，时多漫出。玉河两岸，钓者麇集。”又乾隆曾两次到过钓鱼台，在宫中“每至春秋佳日，太液池畔，竟以垂纶为戏”。作者还见过乾隆的鱼竿，上了赭色的漆，还绘有金龙，上面写有乾隆十六年八月臣李宜恭制，共8截，每截长仅两尺，纳于一筒中。“庚子兵燹时，始流出民间，今不知落于何所矣。”流风所及，后来市面上常有争比鱼具高贵的习气，连钓者坐的马闸，也讲究用红木紫檀来精工雕嵌。一具之微侧面地反映了时代的沧桑。

二十年代北京城的钓鱼处，西有钓鱼台，东有菱角池，南有莲花池，北有什刹海。钓者向来又分成两派，“在东南城者，用钩既小，竿多敷漆，善用红虫，喜坐钓……”，西北城则反之。作者喜在北海垂钓，曾驾木舟于漪澜堂的荷花深处饮酒烹鱼，又于午夜在南海的瀛台下过钩。想不到这种平民化的乐趣也被权势者扼杀了，“文革”中北海即被江青划为禁地，作为她个人钓鱼嬉戏之所在。对此，当时竟无人敢问，实亦二十世纪出现的荒唐事之一。

于先生养鸽子有十几年的历史，平时撰有饲鸽日记，因此可讲鸽经，能绘鸽谱。他日与市井俗人为伍，所得极丰，如讲鸽佣一节便见功夫。当时有以饲鸽为业者，又称鸽把式。这些人在西城多聚市于护国寺的天泰轩，在东城者则聚在隆福寺的天宝轩。养鸽的主家们即勾心斗角于茶楼酒肆间，鸽把式们亦在此暗相结纳，事端多有。这些鸽佣能训得鸽子在空中追击搏战，组成的鸽阵至少以十余头为一小队，互相追击拼杀若干回合，败者最后退阵。空中决斗堪称奇观，当然也是一种赌博，想来触目惊心。于先生不养鸽子固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而于先生若非慧眼独具，有探索民俗文化之志，恐怕也完不成都门三记。

于氏著书亦有自白：“非庵不学，无所树立，惟胸中浩然之气，愧未全消，书画之暇，辄复从事记述。吾幸居北京久，吾又幸为北京之细民，吾眼

孔愧小，不能见北京之莘莘大者，仅于极小至微，鄙弃不顾中，掇而出之，觉其中有妙趣，有至味……”又说；“吾以小民，日与小儿女辈嬉戏。谈小文字，述小故事，或临溪捉小鱼虾，或即庭而弄小花草，斗虫豢鸟，以乐小儿女之所乐，而吾之乐滋永。”于先生动笔之际心存浩然之气是为大，同时他又一味强调个小字，以小儿女之乐为至味，这是怎样的一种艺术趣味呢！这中间的辩证关系和内在联系，倒值得今天写散文者仔细地思考一番了。

于非庵生于 1888 年，殁于 1959 年。除都门三记之外，当年他在《晨报》出版部还刊行了一册《非庵漫墨》，恐怕也是很有兴味的小品文，可惜笔者未见，不知哪位有幸藏有此书。

夏枝巢的《清宫词》

夏仁虎（枝巢子）著《旧京琐记》，我早就读了，并购有原刻。他是南京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北京为官，先后在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任职。民国期间又历经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的统治，直至全国解放。数十年来以著述为志，未尝远离京门一步，刊有《啸庵文稿》、《啸庵诗稿》、《枝巢四述》等。他热衷清代宫廷故实，194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刊行了一册《清宫词》，传本稀见，连八十年代北京古籍出版社搜罗比较完备的《清宫词》辑本也未收入。我得于琉璃厂书市，深感世间值得一看的书实在无法穷尽。

夏著《清宫词》为16开铅印本，郭则沄、吴廷燮作序，分为上下两卷，诗各百首。作者在序例中介绍：“上卷百首述帝后妃嫔皇子公主，以及侍臣监御宫中逸事。下卷百首纪宫苑典礼节令风尚杂事。”每首诗都有注，除取正史及各家笔记外，亦有得自“近时故宫所发见诸密档”者。他写宫词遵循两个信条，一是注重信史，不录传闻。二是反对华词丽章，不作任何铺陈，用他自己的话说：“宫词是细，亦史事之支流也，可以存一代之典章，纪一时之风尚，明一朝之得失，见一事之是非。若乃徒摭瑰词，漫夸丽藻为已未矣。”除了以上两点，我还欣赏作者选取材料的角度，虽不脱宫闱旧事，又非枯燥的典章陈列，善于从不被人理睬的细事中表现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此点反映的正是文人偏好，诗人本色。如写康熙二十六年六月，皇帝在中南海的瀛台避暑：“高槐大柳伴宫墙，入奏瀛台趁早凉。举网得鱼归去乐，不须割肉羡东方。”注中说，康熙谕令在此湖边桥畔设网，待大臣们奏事完毕，可以在水边垂钓，得鱼后可以带回府中与家人同享。人们都说康熙治政有方，由此一端也可看出他偕调君臣关系，团结高级干部的手段，不是颇富人情味吗？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与他的作风就大不相同了。夏氏抓取了这样的镜头：“纪纲整肃自宫中，玉食原应四海供。竹子院中昨设宴，进鲜恁与大家同。”此事得自清档中的一份雍正上谕，原称：“昨日竹子院设宴，朕筵中所有之物，中宫筵上亦有。传谕茶膳房，凡外来进鲜之物原为进朕，中宫所用如何与朕相同？”康熙的豁达，雍正的偏狭乖僻于此俱见。

枝巢子终究曾在清府为官，怕是旧念难除，他写《清宫词》主要不在评断前朝的是非得失，有的地方还流露了颂圣扬德的感情，很少批判的目光。如写乾隆四十二年，宫女因侍奉惇妃不周竟惨“责毙”，屈死于乱杖之下。诗曰：“杖下桃花似雨飞，朝来有旨贬惇妃。苦桃命薄君恩重，不许宫中更树威。”一个无辜的女奴白白送了命，乾隆不过把惇妃降了一级，照样当嫔妃；作者为此还要地下的宫女来感念君恩，这是无法令后人接受的。又如对慈禧太后，虽有微词却很含蓄。颐和园里最初出现机制轮艇的时候，那还是先进的新式装备，但不是用来兴国强兵，却变成慈禧游乐嬉戏的项目。陪侍她玩耍的则是一批贵族子弟。诗曰：“汽艇初来快若飞，黄头缚袴奉慈游。十年海上风涛苦，不及昆明一保优。”注云：“昆明湖初试小轮艇，供应官曰船坞委员，皆富家子弟，衣锦端丽，年终辄有优奖，故有未弱冠而得三品冠服者。海军老将士健羨而已。”作者为海军老将士们鸣不平，也指出了慈禧纵容贵族子弟特殊化的腐败作风，然而锋芒宛曲，绝少怨怒之词。尽管如此，夏氏的《清宫词》仍隽永可读，于史家和文学工作者亦不无参考价值。今后似应补入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清宫词》中，好让这个辑本更加完备。

夏仁虎究竟是哪一年写成《清宫词》的，刊本未作说明。如果完稿于四十年代初，那么他的公子夏承楹（台湾作家何凡）或已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了，似可提供某些写作情况。何凡先生的夫人林海音，即《城南旧事》的作者，台湾著名女作家。她在台湾印了《旧京琐记》和《清宫词》的合印本，后者所据的是抄稿，并说是首次印行。看来她也没有发现最初的印本。

《听歌想影录》

这是一个痴迷京剧人的看戏记录。

这些记载，在当时也许平常，无非记录了民国初年北京各剧场演出京剧的盛况，以及某名角在台上的风采、演技等等。其中也难免有个人偏爱。然而，有谁想了解六七十年前京城戏曲舞台风景的吗？那么这本小册子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罕见书了。

《听歌想影录》于 1941 年 10 月由天津书局出版，作者张聊公，当时是天津银行界职员，他有条件醉心于歌场。本书所载观戏时间，起自 1913 年，至 1918 年止。从某年某月某日某剧场演过什么戏，到剧场环境，演员的表演多有记述。当然，限于作者的兴趣，他单纯着眼于演员的唱念做，很少涉及剧本的思想内容，这也是旧时顾曲家和戏迷习见的弱点。作者还可以粉墨登场，演过《长坂坡》里的赵云，那么这本书也是一个票友的看戏札记。

我以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记载翔实，举凡伶官之沉浮，剧场之兴废，都有时间、地点可查，非一般传闻或间接所得者可比。作者在本书“自序”里，也自诩他的书可作“信史”来读。

我算不上京剧爱好者，但在北方长大，耳濡目染，也数得出一连串京剧老伶工的名字。由于年岁的关系，到底无缘接触这些名伶的声貌，《听歌想影录》却带我进入歌舞灯影中，得睹当年诸名伶魅人的风采。特别是属于社会人情和市井风俗方面的，更使我长了不少见识。比如人们常说的谭家三代演员中只有谭小培无光彩，他的父亲谭鑫培和他的儿子谭富英都红极一时。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谭小培几乎在台上是没有什么可看的，但在《听歌想影录》中，却多次记载了谭小培演出的实况，唱念做皆有可取之处，甚至相当不错。只是他的名声为其父子的盛名所掩，而人们又多相沿旧说，在传闻中竟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演员。

关于北京的堂会戏，这是当时的历史产物，景况如何，后来人是难以想象的。《听歌想影录》里却有不少的记载，大体见其规模，那戏目亦显示着豪门的权势和财势，晚间开锣之后，常常要唱到第二天黎明三点钟。我们从作者如实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达官贵人们的奢侈。例如 1913 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家里唱堂会戏，梅兰芳、杨小楼诸名伶都出台了，而老伶工谭鑫培，当时已老病侵寻，仍然力疾登台。当戏里演到跪拜的场面时，体力难支，只得由别人扶他起来。谭鑫培最后还是倒于堂会戏上。那是 1917 年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为欢迎广西督军陆荣廷，演出《洪羊洞》，他被迫抱病上台，回到后台就倒了下来。不到一个月即死去。

书中也写到了剧场风俗，如 1918 年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台下的观众席仍然摆着方桌，观众围桌而坐，边饮茶，边看戏。如这一年的二月某日，作者在吉祥戏园看梅兰芳演出的《祭塔》，同时还有王凤卿、程继先的《雄州关》；高庆奎、姚玉芙的《击掌》等戏。最前排可以看上场门的一桌，只有一个人据案独坐，极有排场，那是军阀徐树铮。最前排正中一桌则为支持梅兰芳多年的银行家冯幼伟。未终场，作者又到近处的丹桂戏园，台上正演程砚秋的《武家坡》，座上“亦有一位大名士罗瘦公先生，其时罗尚未与砚秋相识，但已发见此惊才绝艳，非常激赏而已。”这是一本京剧史话，欲问何物可以重现民国初年北京剧场实况，无疑的也是这本《听歌想影录》。

1984 年 10 月

《歌舞春秋》

1951年7月，上海广益书局有张繆子著《歌舞春秋》一书出版，封面题字者梅兰芳。这是《听歌想影录》作者张聊公的又一部作品。

《听歌想影录》所记观剧札记，至1918年止，本书所记上编自1916年至1924年，在北京部分；下编自1929年至1935年，在天津部分。连接《听歌想影录》的1919年至1935年间的观剧札记，作者拟另编一本《听歌想影录续集》，似乎终于未能出版，不知此稿尚存人间否。

这一本记事性的《歌舞春秋》，似乎对一般读者来说更有兴味，每篇都有一个比较吸引人的题目，如《刘少少赞美刘喜奎》，向我们介绍了燕市歌台的掌故，即辛亥革命以后，北京的剧场才开始有女艺人登台献艺。当时前门外大栅栏各戏园，“几全为女艺人所占据，而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尤为个中翘楚。”据作者称，当时谭鑫培不胜感慨，说过：“我男不及梅兰芳，女不及刘喜奎。”所谓刘少少，是指当时北京《亚细亚报》的主笔，剧捧刘喜奎，却从未与刘有交往。盖女艺人刘喜奎洁身自爱，除演戏以外，屏绝一切酬酢。解放初，刘喜奎仍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谭鑫培盖棺论定》一文中，有趣的是提供了老谭在唱词中热衷于改革的故事。如在《珠帘寨》李克用的唱词中，加上“自由平等”的新名词。平时与人议论起戏来，口头上常说：“咱们改呀！”

又《京剧艺人为人力车夫服务》一文，记载了1919年11月间，以梅兰芳领衔发起，为北京人力车夫添筑休息所而举行的义演，作者抄录了当时发起人的“启事”，以及这场义务戏的公演剧目。“启事”中说：“人力车夫，为劳动界极贫苦之生活。北京地邻边徼，时多暴风，人力车夫向无栖息之所，每每受风雨之侵，冻馁堪怜……”演出地点是新明大戏院，梅兰芳演了双出，反串《辕门射戟》和《游园惊梦》。其他有余叔岩的《碰碑》，程砚秋的《琴挑》等。这种史料，在当时唾手可得，如今恐怕知其事者也寥寥了。

他如《记窝窝头会义务戏》、《军警罢岗声中之剧场》、《一场离奇之堂会戏》等，都是人们感兴趣的题目。即以《梅兰芳三十生日闻见录》、《程砚秋婚礼汇志》来说，恐怕也是后人撰写梅程两位大师艺术生活时不可多得的史料。作生日是当时的风气，生日会上又是旧京文界的一次聚会和文化活动。当日到会的画家有姚茫父、陈半丁、王梦白、金拱北诸人，皆当场濡毫伸纸作画。余兴节目还有刘宝全、良小楼的京韵大鼓，德寿山的单弦，焦德海的相声。如今真的都已成为绝唱。

说起这位张繆子，“五四”时期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因为当时在《新青年》上，以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为一方，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厚载（即张繆子、张聊公）为一方，对于京剧的前途，有过一场论战。又因为上海《新申报》刊载林纾诋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荆生》和《妖梦》，有影射攻击钱玄同、蔡元培处，而林的文章都是通过张的介绍发表的，终于被北大当局以“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而开除学籍了。张与林纾相识则因他是林纾在五城学堂教书时的学生。我们在林纾的文集中还可以找到《送张生厚载出北大序》，承认张的离开北大与自己有关。至于张厚载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论辩的文章，我们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可以找到。在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潮流中，显然张繆子是站在保守的一面，尽管今天看来胡、钱也有偏激之处。例如钱玄同就说京戏的脸谱是粪

谱，就像他主张废除汉字一样，他提出要彻底毁灭京剧。

解放以后，张謇子住在上海，把自己保存多年的前代艺人剧照捐献国家。这些都是稀世的绝本，平时秘藏，甚至舍不得让朋友们触摸。仅此一端，足见他晚年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京剧艺术。

1984 年 10 月

清名伶“十三绝”画像

看过清代沈蓉圃所绘京剧名伶“十三绝”画像的人可能不少，当然是指彩色复印品。这十三位是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杨月楼、余紫云、朱莲芬、时小福、徐小香、杨鸣玉、刘赶三、郝兰田、张胜奎、卢胜奎。沈蓉圃是同治光绪间画人物肖像的名家，不仅求形似，更重神似。“十三绝”不是那种匠气十足的千人一面之作，的确是古代人物画中的珍品。梅兰芳先生一向注意搜集京剧史料，包括运用戏曲画、戏曲照片等来研究京剧，培养青年演员。北京沦陷后，“十三绝”为北京《三六九画报》社长朱某所得，1943年5月由他主持，约金佩山撰写了“十三绝”小传，加上各家题跋，合成一本《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正式出版。朱某的背景不详，从他请当时的伪市长徐良题署封面，也可猜度他的为人。《三六九画报》是当时流行的一本游艺性的通俗杂志，除了报道京剧演员生活，还有漫画、掌故，以及武侠和言情小说的连载。抗战胜利后，又有《一四七画报》问世。编辑作风，一如前者，时间不长便停刊了。

为本书题跋的梨园界人士，如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荀慧生、程继先、时慧宝等，都以手迹影印制版，为爱慕名伶文墨的读者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如王瑶卿的《先外祖郝君兰田小传》、金仲仁的《十三绝图序》、景孤血的《题十三绝图咏》、翁偶虹的《十三绝图像赞》，以及谭小培率子富英、世英的《十三绝图谱诗并小序》等，都为“十三绝”增加了研究价值。书内又有为本书而“志感”的言菊朋、萧长华等人的文字，及图影多幅，堪称有关“十三绝”画卷一本专书。

本书题记为首的是梅兰芳，撰于1942年冬，那时他正蛰居上海。从他撰文的意义和题记的内容考虑，此文应当收入梅氏的文集，特抄录如后：

沈君蓉圃所绘《思忠诚》剧画像，先大父及徐小香、杨鸣玉、朱莲芬、时小福、刘赶三、余紫云诸先生共二十余人，均为当时名彦，向藏余家。以有关国剧史乘，适余创立国剧学会，即以陈诸会中，所以垂久远而示来兹也。厥后陆续征求，复得程长庚、徐小香两公之《镇坛州》，暨先大父《四郎探母》画像均为沈君所绘。同时又旁搜博采汇集同光以来之名宿照片若干幅，悉移国剧学会保存。自兰芳移家海上，不获瞻仰观摩者已将十稔，老辈典型时时悬诸心目。今秋复昌先生出所藏“十三绝”画卷，亦为蓉圃所作，神情妙肖，色泽妍雅，图中都凡十三人，皆与先大父并时杰出人才，较兰芳所藏尤为美备，洵剧史之瑰宝也。敬识数语，以志景仰。壬午冬日，梅兰芳记于缀玉轩之南窗。

梅氏收藏沈蓉圃的戏曲画这么多，何独不见“十三绝”？想来令人生疑。题记中又强调所藏戏画已近十年未见，说明日寇占领北京后，原物可能散落或毁于日伪之手。看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梅先生对藏品有难言之隐，只好欲言又止。我甚至怀疑，这珍贵的画卷“十三绝”原为梅家的珍藏，现在这位朱某却连得自何处也避而不谈。

怀着这个想法，我找到梅先生在1961年4月写的一篇《漫谈戏曲画》，发现作者终于道出了实情：“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沈蓉圃画了许多的戏像，我收藏他的作品不少，如‘十三绝’、‘群英会’（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虹霓关’（时小福、陈楚卿和我祖父梅巧玲）等。……”画卷遭劫，梅先生在撰写这篇题记时，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梅先生生前没有再进一步说明“十三绝”画卷的详情，估计不会是后来从朱某手中购来，更不知这画卷今存何处。总之，梅先生如此重视收藏京剧

史料实在具有远见卓识，其间的经过和波折，更可能包含着动人的故事。希望有人能作一番调查研究，写一篇“十三绝”画卷考，为京剧史上这一文献的来龙去脉留下史证。

梅兰芳书话

小引

梅兰芳先生的戏，我只在前门外广和剧场看过他演的一出《凤还巢》。与其说是欣赏梅氏艺术，不如说我更仰慕其人。余访书京华，得地利之便，过目的梨园史料不少，先后淘得有关梅氏的书物若干种，亦出自尊崇其人而珍重其书。今逢梅氏百年诞辰，检出旧藏十种，依时序排列，似乎梅氏解放前艺术生活中的大事多有涉及，亦巧合也。

《梅兰芳》

民国二年（1913）冬北京出版，小32开本，竖排铅印，北京劝业场缥缈馆总发行。著者郭逋仙，题序者有木芙蓉馆主人等，题词者羞翁等六人。书前有梅少年时代便装半身照一帧，较稀见。又易实甫为梅作的《万古愁曲》、樊樊山作的《梅郎曲》，并罗瘿公等人的诗文。

本书所收梅氏于同年秋第一次到上海演出之资料甚丰，除演出盛况并各种评论外，并附演出45天之剧目及日期。梅氏晚年回忆：“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见《舞台生活四十年》第1卷第123页）当时梅氏刚20岁，从未离开家门一步，故由伯母同行照顾，而津浦铁路也刚刚通车。

《黛玉葬花曲本》

民国五年（1916年）8月上海石印局线装本，上海开智新书局发行。编者掣戡道人。书中除收《黛玉葬花》原词外，并戏考与剧评，及樊樊山为梅氏写的诗词《葬花曲》等。梅氏有志于把红楼人物搬上舞台，此为1915年初演于吉祥园之红楼曲本。俞平伯恰于是年进京就学，并在吉祥看了此剧，亦文苑艺坛的一段佳话。晚年的俞平伯先生，曾忆及六十年前的往事，联语有句：“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

曲本前有梅氏的便装照及剧照六幅，其中一幅剧照与扮宝玉的姜妙香合影，附有梅氏的题词：“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各西东，尽在不言中。他做合影里情郎，我做合画中爱宠。”

《梅母陈太君八十寿言》

民国五年（1916年）3月，梅兰芳祖母八十寿辰，是年梅正整装待发，将率团第一次赴日本访问演出。梅幼时丧父，14岁时生母去世，自幼由奶奶陈氏抚育成长。此时演戏有成，更“不敢忘德”，于三月初三日为祖母设寿堂，亲自粉墨登场为奶奶演了《麻姑献寿》。配仙女的有程艳秋、尚小云等名伶。事后又集祝寿诗词联语及文章绘画等近四百件，编成《梅母陈太君八十寿言》一册，宣纸线装，仿宋体排印，于1920年印成。题签作诗文联语者皆一时名人，如吴昌硕、张謇、林长民、陈散原、罗瘿公、姚茫父等。作画者有林琴南、徐悲鸿等。

书前附祖孙二人的合影。奶奶慈祥端坐，梅郎彬彬侍立，当是梅氏家藏

珍品。梅氏的祖母享年 85 岁。歿于 1924 年。这年十月，她的孙子又将率团第二次访问日本了。

《凌波芳影》

此为梅氏扮演《洛神》的特刊。民国十六年（1927）线装珂罗版影印。收有《洛神》唱词，并梅氏扮洛神的剧照。罗复堪手写的《洛神赋》，以明代石鼓研格写就。罗复堪为罗瘿公的堂弟，亦旧京名士，著名书法家。齐如山有序：“畹华有洛神小像，极飞鸿游龙之致。罗复堪先生为临王献之小楷《洛神赋》于后，精妙绝伦，得未曾有，索观者至夥。余因怱怱付之影印，以快先睹。丁卯二月如山齐宗康题记。”此件可为梅氏于舞台下乐于结交文士之物证。

余得此本后请许姬传先生指教，承他在扉页上题字：“《洛神》于 1923 年 12 月 21 日初演于北京开明戏院。次年，泰戈尔来华，梅畹华先生请其观《洛神》，泰翁对布景提了意见，并赋孟加拉诗，用中国笔墨书于纨墨上。1927 年岁在丁卯，齐如山影印此书，并以罗复堪所书小楷《洛神赋》为殿。余有此书已散佚，德明老兄属题，因记颠末。辛酉八二更许姬传。”辛酉是 1981 年，就在这一年，许先生仍奋笔完成了一部简要的梅兰芳传。

《梅欧阁诗录》

梅欧阁，梅兰芳、欧阳予倩纪念室也。室设江苏南通的更俗剧场内，是近代名士张謇建立。1919 年，欧阳予倩曾应张氏之邀，在南通主持了伶工学校，梅兰芳亦应邀到南通演出。本书于 1920 年出版，线装形式，附戏曲照片多张，计梅氏 11 幅，欧阳氏 4 幅。图版印制精良，留影愈显珍贵。

诗录中主要是张謇的诗作，亦收黄炎培、欧阳予倩、梅兰芳等人的诗。如梅氏有代弟子程砚秋向张謇求诗的句子：“程郎晚出动京都，小影传来亦自姝。学得汝师须体认，所应有所无。”梅与程是师徒关系，但更像是同辈朋友，这自然也体现了梅氏的风度和修养。

《梅兰芳专集》

此为 16 开软面精装本，烫金封面，全部铜版纸套色印，堪称装帧豪华。1927 年 4 月上海出版，编者严独鹤、唐世昌、任矜萍。书中收梅氏演出的剧本及唱词，如《太真外传》、《木兰从军》、《千金一笑》、《上元夫人》等十余种。又剧照、便装照、墨迹等近 60 幅。其中“缀玉轩字画及交际摄影”部分最珍贵，如《梅花辑瑞记》，记 1926 年 10 月瑞典王储在北京访梅宅事；《缀玉轩招待使团记盛》，记 1926 年 6 月意大利驻华公使夫人，及美国、西班牙、瑞典等国大使及夫人 18 人来访梅宅的情况；《中日名伶宴会之盛况》，记 1926 年 8 月日本演员守田勘弥、村田嘉久子访华演出，梅氏在大方家胡同李释戡宅举办茶会招待事，到会者竟达一百三十余人。此外，《梅兰芳外交史料之一节》，记中日实业界百余人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欢迎日本艺员集会的详情。难得的是这些活动都留有照片，可作图史供后人观赏和研究。时人论梅氏与国际文化界的交往，引用资料多出此集也。

《梅兰芳游美记》

齐如山著，1933年11月出版，16开竖排本。分甲乙两种，前者宣纸线装，后者报纸平装。余存乙种本，封面以古代乐器作图案装饰，题签者黄秋岳，作序者赵叔雅。1929年冬，齐氏随梅出访美国，共逗留了五个多月，第一次把我国京剧传播到欧美大陆。本书记录了梅氏访美演出的经过，以及出访欧美大陆的准备情况。共四卷，分别是：“出国以前筹备”、“戏剧的排练”、“各界的提倡与欢迎”（上下）。附录五篇有《梅兰芳接受博士学位记详》、《观达佩尔女士独角戏记》等。

本书由齐氏口述，女儿齐香笔记。齐香当时还是一位在学的少女，幼时在孔德学校就读时已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现在是法国文学教授。齐香女士的丈夫罗大冈先生，亦法国文学翻译家，并写诗与散文。此书又标以总售处为北平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某号，实即齐宅。想是齐氏的自费印书。

《梅兰芳艺术一斑》

1935年2月，梅兰芳从上海启程赴莫斯科演出，齐如山特地配合撰写本书。书用铜版纸精印，图文并重，并有英、法、中三种文本，于同年2月以中国北平国剧学会名义出版。此书不仅有利外国观众了解京剧，于国内读者亦大有教益。比如京剧中的笑，在艺术处理上即有冷笑、气笑、强笑、妒笑、假笑、媚笑、苦笑等27种，并且结合剧目一一加以论证，大开了观众的眼界。又一章论述旦角的手势，附图35幅，生动地说明手的舞蹈动作可以传达出人物不同的内心感情，这也是世界表演艺术史上所罕见的。莫怪有位俄罗斯的艺术家常夸张地说，看了梅氏的手势表演，他们演员的那双手真该砍掉。

《剧目》专刊

《剧目》专刊，红色锦缎封面，线装宣纸本文，铜版纸插图，以中英两种文字印刷，是非常讲究的一本说明书。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十日的国庆演出特刊，疑为南京国民政府招待各国驻华大使及外宾的演出。是日演了三出戏，一是尚小云的《秦良玉》，其次是杨小楼、郝寿臣演的《连环套》，最后是梅兰芳演的《贞娥刺虎》。特刊收了三个剧目的本事及唱词，以及演员便装照及剧照。英文说明由梁社乾译成。此人即1926年翻译出版英文本《阿Q正传》的译者。

转年抗日战争爆发，梅氏息影歌台。又一年，杨小楼病逝，盛况难再矣。

《梅剧团出演特刊》

梅氏息影舞台八年，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公演时的特刊。大32开本，封面为梅氏彩色便装照，封面题签并作梅花图者为画家吴湖帆。书前有梅氏蓄须时的照片。鲍庵的《发刊词》中介绍，当时友人颇关心梅辍演后的生活，梅氏回答：“吾宁弃物质之享受，而求得精神上之自慰也。”

书中有梅氏小传，并配演者杨宝森、姜妙香、俞振飞的小传和照片。又

有徐慕云《我对于梅剧团的期望》及《春秋配》的本事和唱词等。附梅氏的照片及墨迹等二十余幅，其中较珍贵的还有其父竹芬画的一幅兰花扇面，以及 1946 年底，梅氏在沪居的园中教授弟子李世芳身段的留影。梅的父亲早逝，年仅 26 岁，所留的遗墨不多，此物殊难得。梅氏厚爱弟子李世芳，还在李坐科富连成时，便已破例收为门下。李出科后，更关心其成长。1946 年冬，李世芳到沪演出，1947 年 1 月 5 日演出结束北返时，不幸飞机在青岛失事而罹难。根据这张照片，以及吴湖帆作封面画的时间推算，此书应出版于 1946 年或 1947 年初。

程砚秋书话

《霜杰集》

1926年，程砚秋还是一个22岁的青年，他便印了这部上下两册的《霜杰集》。这是一部研究和评介程砚秋戏剧艺术的专集，线装宣纸本，仿宋体铅印，天地疏朗，淡妆素抹，极为喜人。程砚秋是一位富有书卷气的演员，他的乐于印书，正说明他日常钟情于文墨，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据本书编者金仲荪说，他是秉承已故罗瘿公先生的遗志来编这本《霜杰集》的。1924年罗在医院的病床上对金面嘱：“玉霜所得海内名流诗词独多，顷已哀然成帙，思为汇辑■版，今惫甚，子盖助我成之。”罗歿后，金仲荪陆续搜集报章资料及各界投赠程砚秋的文字，主要是辑编1924至1925两年间的所得。罗瘿公是发现程砚秋天才的第一人，又为程氏编剧、排戏，并指导程处世做人，程视他为恩师。金仲荪继罗之后成为程的知己，同时也是为程砚秋编制剧本较多的一人，如《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等。金仲荪又先后任南京戏曲音乐学院北平分院研究所所长，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副校长，与程合作多年，成为事业上的同志。研究京剧史，或撰写如梅兰芳、程砚秋这些艺术大师的传记，不能不涉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文士们。过去不屑于写他们实在不公平，有很多问题也说不清楚。

《霜杰集》上卷为“咏玉篇”，收入歌咏程砚秋的诗词文章。下卷包括“锵凤篇”、“拾锦篇”、“贯珠篇”，分别是有关程氏的各种杂体文章，以及新编各剧及其事略。书名《霜杰集》，“取陶诗卓为霜下杰意也。”在金仲荪写的《玉霜簪拾遗》一文中，谈及1925年春他客居天津，程砚秋曾驰书来问，并附所作怀念罗老师的诗。金先生说，“唐宋名作玉霜多能背诵，然初未见其能作诗，偶尔出笔便朴茂有古致，此子稟质颖异。林屋山人云，玉霜恂恂如书生，以有名师熏陶气质自好，知言哉。”程砚秋的五言诗出语浅显，似无多少惊人处，但感情真挚，非代笔人之一般应酬。诗曰：“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回想伤心语，时时泪满襟。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供影亲尊酒，聊以尽我心。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这可能是程砚秋最早的试作诗歌，出自一个幼而失学的青年演员之手，极难得。在“咏玉篇”内题诗的作者有陈石遗、曾刚父、林琴南、黄晦闻、方地山、樊樊山、陈散原、张謇、况蕙风、黄宾虹、姚茫父等人，皆近代诗坛名家。如此风尚今已消退，其实有些题咏还是保存了不少戏曲史料。

我最感兴味的是“拾锦篇”，这里辑收了当时报刊上对程砚秋的一些评论文字，其中就有报界前辈、剧评家凌霄汉阁的文章，原是发表在《东方时报》和天津《大公报》上的。凌霄先生对于《霜杰集》的价值，在他后来所著的《说程》一书中作了批评。《说程》是一本线装铅印的小书。他说：“在旧剧界里，程砚秋曾经创始公开批评的前例。《霜杰集》前册是诗词，后册是批评艺术的文章，是从各报搜罗汇集，也是不问是褒是贬，一律全收。尤以《新中华报》之萍生，《新闻报》之少卿最为猛厉，谓须生之谭，青衣之程为哀音，为乱世之音……此外论列者二三十人，多数举长指短，均不失为批评。”“展读之下，深觉旧剧界批评公开，此为仅见。学者风度，佛西、上沅诸公亦深有同情。”余上沅、熊佛西都是新文艺家，他们也盛赞程砚秋的这种欢迎公开批评，不怕反面意见的学者风度，民主作风。一代名优，确有其不同凡响处。

《苦兵集》

自从程砚秋认识了罗瘿公先生以后，这位老师便规定了程氏每日学习书法的课程。程氏好学，多年不辍，他的书法在梨园界颇有声望。他练的是魏碑，今天我们若想欣赏他的书法成绩，当然很不容易了。但是，1931年他却出版过一册石印本手书《苦兵集》。京剧演员中还有以自己的书法专集行世的吗？恐怕程氏是第一人了。

程砚秋在《苦兵集》自序里说，为他编剧的金仲荪先生，“尝选三代以降诗歌之讽刺战乱者为《苦兵集》，盖上以示国人自古酷爱和平之心理，下以讽当今干戈洪水之惨祸缠绵悱恻。艳秋读而感焉，爰摘其中之警策动人者手写一帙，聊备展诵。石曾李先生见而赞许，谓足以启发人心，为呼吁和平之一助，督令付印售款赈灾，稍舒鸿雁之哀，冀化虫沙之劫。”唐代以下各篇则不及写竟。程砚秋没有谈到，他书写研习这些同情人民疾苦，要求和平，反对战乱的诗篇，其实也是为他在舞台上创造如《春闺梦》、《锁麟囊》这样的戏作了必要的准备。这种潜移默化的戏外功夫，也许不是任何一个演员所能具备的。

从《苦兵集》看程砚秋的字，果然刚劲挺秀，工整有致，一派魏碑风格。近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御霜实录》一书，是一本纪念程砚秋的专集，内收远居英伦的程氏旧友谦斋先生的文章。他曾经藏有程氏所书扇面，至今还藏着程氏书写的条幅。他以为程砚秋的性格坚强，内心仁慈，任侠重义，而“他的书法从张猛龙碑入手，加以变化，写出来厚重纯朴，颇似他的性格。”这评论颇有见地，可供我们参考。至于程砚秋平日习书练字的情景，金仲荪在所写的《玉霜箴拾遗》中亦有介绍，他说：“玉霜好弄柔翰，无他嗜，曲罢辄以临池为乐，见纸即书，狼藉委几案不顾也。平时作书似不甚经意，予所见最精者即瘿公歿后每日研朱写《金刚经》，凡十部，七日一焚化，字体极工，实所罕见……”（见《霜杰集》上卷）一个戏曲演员爱慕文化至此，也算得痴情了。

我所得的《苦兵集》先后两册。先得的一册只见程砚秋的序，后一册还有李石曾的序与跋。李说，1930年他与方耀庭、吴铁城、张岳军赴沈阳，与张学良将军讨论和平问题，适逢程砚秋正在那里演出赈灾，他每晚必去看程的戏，同张将军作深夜谈即在散戏之后。李氏把程的某些剧目与反战主义联系起来，与程手书的《苦兵集》联系起来，甚至与当时政界要员的文章联系起来，还要把程砚秋推举为“非战戏曲家”、“和平戏曲家”。这纯属政治家们的物事，有点多此一举。他扬言，《苦兵集》普及之日，即内战停止之日，亦即和平统一之时。李的序跋写于1931年9月15日，第三天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日。程砚秋本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同一个宣传什么主义的政治家自然隔膜，理应彼此回避才是。依我看，没有李石曾序跋的这本《苦兵集》较单纯，而有李石曾序跋的《苦兵集》，却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得不伦不类，不那么自然了。为了保存史料，寒斋还是把有李石曾序跋的《苦兵集》作为自藏本，把另一册送给热爱程砚秋艺术的冯牧同志了。

《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精装一册，大 32 开本，1933 年 8 月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出版。书前有程砚秋写的“引子”，说明他于 1932 年 1 月出国，次年 4 月归国，以所见所闻完成此书。全书分两章，上章记出访经过，下章记考察所得和建议。书后有“结语”，并插图多幅。

程砚秋的这次出国，得力于居里夫人的朋友郎之万的帮助不少。当时郎之万受国联的派遣正来中国考察教育。他看了程砚秋表演的《荒山泪》，以为颇具反战思想，鼓动程赴欧洲。程砚秋便是与郎之万结伴赴法的。

本世纪初，国外对于我们的京剧艺术还很陌生，直到梅兰芳、程砚秋两位先后访问欧美大陆，才引起海外的震惊，得到文化界的广泛注意。程砚秋在巴黎参观了国立戏曲音乐学校。学校的陈列馆里展览着世界各国的古今乐器。在中国部分却只有一把胡琴，而且可怜得没有松香，没有千斤，没有码。程砚秋感叹不已，连忙对校长直言：“我们中国乐器，不如是简单。这不能代表我们中国。”

程砚秋在法国尼斯参加了两年一度举行的国际新教育会议第六次大会，其中有戏曲音乐一门。参加会议的有五十余国的数百名代表，程砚秋在会上清唱了《骂殿》和《荒山泪》。到会者一旦了解到《荒山泪》的内容，演唱结束时，会场上便高呼：“废止战争！”“世界和平万岁！”当时正是德、意法西斯疯狂叫嚣战争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也正加紧侵略中国。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这种强烈情绪，感染和教育了程砚秋，使他认识到戏曲艺术产生的教育作用有多么重要。

在巴黎，程砚秋还参加了李石曾和欧阳予倩等人参加的一个关于戏曲问题的座谈会。当时欧阳予倩正在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会上涉及戏曲与人生哲学问题的辩论，双方观点相持不下。李石曾有无政府主义的背景，单纯强调合作与互助；欧阳予倩则力主竞争与抵抗。程砚秋说不上是什么主义，私下里与李石曾和欧阳予倩却都是朋友。他主张以和平为重，不过也提到“对于侵害者之需要制止，对于压迫者之需要反抗”。

程砚秋在考察中发现，欧洲的戏剧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但不是什么都好。比如，布景的写实和繁琐便断不可学。如果京剧搬用了外国的这种办法，连外国戏剧家也说“无异于饮毒酒自杀”。这一点，至今未能引起国人的重视。1933 年 3 月，程砚秋急于结束考察，匆匆返国，理由是：“中日纠纷扩大，山海关发生变故，平津动摇……”。国将不存，在外边说戏谈艺还有什么意义。后人怎能不尊敬这位爱国艺人的一片至诚。

《记程》

如果不是一书在握，你很难从《记程》这书名想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记程者，记程砚秋也。作者徐凌霄，一名凌霄汉阁，剧评家。抗战前在京津文化界，与他的弟弟掌故学家徐一士同享盛名。

作为报人，徐凌霄与《京报》主人邵飘萍是好朋友，又与洪宪太子袁寒云过从甚密，因此有机会得到袁世凯的种种内幕，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文章。他为天津《大公报》编过《戏剧周刊》和副刊《小公园》，自然是属于不曾革新过的旧派文艺副刊。剧评是他最爱写的文字。当年《大公报》的同事徐铸成说，自己所以迷上了京戏，便是受了徐凌霄的影响。

《记程》线装铅印本，由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印行，出版年月当在

“七·七”事变以前。关于书名，作者也有解释：“我现在写程砚秋艺术而定名《记程》，原意是想记载砚秋艺术成绩之过程，戏剧生活之前程，现在努力之工程。”又透露这书名的来源，脱胎于陈彦衡在二十年代写过一本《记谭》，那是记伶界大王谭鑫培的。《记谭》与《记程》都已绝版多年，如今难得一见了。

《记程》除前言外，计分四节：腔是歌的姿态、腔是真情表现、腔生于字无字无腔、腔以音气为帅。这是研究程氏演唱艺术的书，于程的歌唱特点及其短长均有论列。我对京戏演唱艺术纯属外行，不敢妄加议论。我知道程砚秋曾拜于王瑶卿门下，而书中恰好谈了王氏对于弟子的评价，这倒是令人感兴趣的。如程的《贺后骂殿》，评家一向以为是出于王氏的密授，而王老板却直言，那全是程砚秋“自己琢磨出来的”。作者说：“予尝与瑶卿谈及《骂殿》皇娘之唱，予谓砚秋细密而德霖刚强。瑶卿云，砚秋繁音促节中有浩气，乃真刚也。”王氏对程陈二人作了比较：“我看砚秋才是刚刚的。德霖噪音虽刚，其腔太慢而板，不足以写‘骂’。砚秋之细密而峭劲，气充而声激，能尽戏情，乃真亢也。”从王瑶卿的结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位真正懂得京剧美学的老前辈。陈德霖素有铁嗓之誉，独王氏不取此说，道出他不是真刚，病在难尽戏情，不能得意境之美。世间迷恋程腔者可谓多矣，能够谈清其来龙去脉者又有几人？因此王瑶卿的谈话和《记程》一书亦难得的京剧研究史料也。

《程砚秋图文集》

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的戏曲舞台上发生了两件轰动全国的事，即梅兰芳、程砚秋的重登舞台。出于抗日爱国的要求，一位蓄须明志，清苦自守，拒不登台；一位隐居北京西郊，以习农为乐。他们在侵略者面前，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尊严，维持了民族的荣誉。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史和我国现代戏曲史上，都是值得骄傲的一页。

为了纪念这次演出，报人龚之方、唐大郎编辑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程砚秋图文集》。16开本，光程氏的生活照及历史照片就有六七十幅之多。作者多为文艺界人士，包括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吴祖光等。图文集由上海天蟾舞台发行，出版时间是1946年11月。

程砚秋在卷首写了《希望与感谢》，讲到 he 多年来便已感到京剧必须改良，而“七·七”事变打断了他正在进行的工作。他说：“数年来，砚秋蛰居青龙桥畔，心情的冷淡，几乎忘了我的本身职业。”此文程氏文集漏收。

欧阳予倩先生写了《怀念程砚秋先生》，他说当年与程初见，这位一代名优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二十年代中期彼此重会于南通市，1933年又在世界花都巴黎重逢。文中似乎还没有忘记在巴黎与李石曾的争论，又含蓄地希望程砚秋能分清战争的性质，不可不加分析一味反战。结合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这也是良友的谏言。

田汉则以《寄语砚秋》，忠告程氏在戏曲改革方面继续贡献力量：“砚秋已过中年，此后他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人争一日短长，不如断然奋臂作改革先锋，更是千秋也。”当然，戏曲界的俞振飞、翁偶虹先生等也有文章。

我藏的这本《程砚秋图文集》，六十年代初得自上海书店。封面缺程氏彩色剧照一帧。北方的朋友很少机会见到这本书。热爱程氏艺术的冯牧同志，

长期过着紧张的军旅生活，更不知世间曾有此书。一旦得知我有藏，马上来函索借，看了几个月才还我。他是一位真正懂得程砚秋的专家。

第六辑 书苑风景

巴金谈书

1988年10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学术交流会。会后去看了巴金先生。

上午九点钟，我敲开了巴老家的铁门。室内静悄悄的，巴老一个人坐在高背木椅上，面前一张小茶几，旁边立着一根手杖。我轻轻地走到他面前，发现他依然是雪样的白发，和蔼的面容；依然是一身洁净的蓝布制服，温文儒雅。这是个阴天，屋外飘着雨丝。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参加会的朋友，有的去看过巴金，老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不会的。走以前我一定要来看您一次。”

“这一回你买不到旧书了吧？”

“一本也没有买到。昨天是星期日，我到南市的文庙去了一趟，那里不是有个旧书市场吗？书摊很多，差不多全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书，旧书当中只看到您的一本《雪》，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11月的第12版。很破旧了，我没有买。不贵，只要五角钱。”

“那很便宜么！”巴金说。“我已经收藏了《雪》的初版本，就是那个绿色封面，假托在美国印的那一本。我的还是毛边书，书品很好。”“那不错。这本书解放后我没有重印过。”

过去我曾经建议巴老应该写一篇自己买旧书的故事，读者一定很想知道当年他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怎样逛旧书摊，也想知道他在上海搜集旧书的情形。巴老显然很有兴趣，但是当时他说精力不够，以后有机会时再写吧。这一次，我又问他有关逛旧书摊的事，巴老说——

“过去我常跑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那里书店多，旧书摊也不少。还有个外文旧书店。常熟路也有几家个人经营的小店和书摊，我的很多外文书就是从那儿买来的。解放前，那附近住的外国人不少，他们临回国时就把书卖掉，其中有不少稀见的版本。”

我联想到巴老的外文藏书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于是补充说：“王子野最近翻译的《邓肯自传》的续编《没有讲完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用的就是您的藏书。他是从您送给北京图书馆的那批藏书里找出来的。您的藏书真起作用了。”

“不止这一本，还有一本也是用了我的藏书，那是一位美国作家谈写作的书。”

“您从什么时候就不跑旧书店了？”

“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吧，因为忙，那时连新华书店也没法去了。现在更失去了跑书店的自由，走不动了。”我想到巴老在抗战期间走了许多地方，成都、昆明、重庆、桂林、贵阳等地，是不是在各地都收藏了一些书？“我在昆明、桂林、贵阳没有什么藏书，在重庆的时候书也不多。那是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只要碰到有熟人复员回上海，我就随时托人捎一点书回来。结果有的箱子丢失了，书也就不见了。那时候土纸印的书价钱很便宜，也没有想到日后会这么珍贵。”

我向巴老谈起现在有的图书馆不愿意借旧书，甚至连旧书收藏目录也不公开，巴老当然不以为然，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好想。说着，他站起来，在书

橱旁边递给我一本香港版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并且事先已经签好名。我一边致谢，一边说这是一本好书，巴老却幽默地说：“书不好，印书的纸头好。”

巴老知道我爱书，又打开书橱下面的柜门，从里面取出香港新印的三本《家》、《春》、《秋》。巴老早已送给我国内版的这三本书了，香港版的用纸和设计都比较讲究，且是竖排本，我当然很高兴。我想蹲下替巴老取书，巴老说：“不要紧，我自己来。”他在《家》的扉页上签了名，抬起头同我商量：“签了头一本，那两本还签吗？”我连忙表示，够了，那两本完全可以不签了。巴老对香港版的封面设计很满意，特别是肖像照片的运用，似显未显，色彩也不刺目，含蓄而典雅。见我正在收拾这些宝贝，巴老微笑地问我——

“现在，除了唐弢以外，是不是就是你的旧书多了？”“我可不敢跟唐先生相提并论，差得多。但是，您这么一问，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我也得继续搜罗旧书。”我站在巴老的书橱前随便翻看，看到巴老当年编的“文学小丛刊”，它比“文学丛刊”还要巧小精致。我说女作家罗淑的那本《鱼儿坳》，我藏的那本还像刚出版的新书一样，书品极佳。巴老坐在那儿，不无惋惜地说：“我保存的那本被出版社借去，撕开了，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当年初版的《鱼儿坳》只印了一千册，现在再也找不见了。人们太不知道爱惜书了。”

我又翻到巴金编的《西班牙的血》，是1949年的版本，书柜内还有复本，恰好是我不存的。我无礼地提出要求：“巴老，这本画集我没有，您有复本，我要向您讨一册了。”厚道的巴老爽快地答道：“送把你，送把你。”我没想到，他把这书要过去为我签了名。这是巴老送我的唯一的一本旧书。我在自我解嘲地冲巴老说：“这有点变相地抄家了！”

那些日子，电视台刚放完电视连续剧《家》、《春》、《秋》，我问巴老看了没有？巴老回答看了。我又问：“怎么样？您觉得。”这明知是巴老不好回答的问题，我还是脱口而出了。巴老的妹妹在一旁回答，邮局送报纸的人说好，他天天接着看。送牛奶的人也好，可是他说：“好是真好，就是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大家庭，不是这个死了，就是那个死了，让人心里不好受。”这当然是现代青年的一种反映，巴老默不作声地听着。

巴老又向我打听罗荪同志的身体近况，谈到不久以前刚接到他的一封信，只写了几个字。冰心老人倒是常有信来。

我想告辞了，希望巴老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玩。

巴老说：“开会我都请假了。现在我一个月只出两次门。一次去理发，一次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每天早饭以后，还在院子里走两趟。”

我夹着重重的一包书满载而归，巴老照例要送客人。他站在屋阶前说：“再进来坐一坐么。好像离你上次来上海已经有两年了吧？”

看望巴老的当天下午，我终于又跑了一趟福州路，想再碰碰运气。承书店主人帮忙，我还是买到十几本三十年代出版的新文学书。第二天一早，我便赶车到苏州，专程去角直镇看了新建的叶圣陶先生的墓地。我在苏州寄给巴老一封信，向他介绍了他也非常关心的叶先生的墓地和纪念馆，同时告诉他，我那天从他家出来，到底又去了一趟旧书店，还是买到了旧书。我相信巴老不希望我从上海空手而归。

孙犁谈书

好久不见孙犁同志的新作。他病了。先是住医院治疗，现在家里养病。儿女照应他，拒不见客。孙犁爱书，往日我按时给他寄奉某古籍出版社印行的书目小报，现在仍照寄不误，也不知道他是否过目。我信中跟他说，有兴趣的话让儿女给念一下目录就成。

今秋，我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第一辑）出版了，其中有一本《孙犁书话》。起初他没有兴趣，家里人说顾不上。后来勉强答应了，大家很高兴。讲书话，没有孙犁的作品怎么行。

前几天翻阅个人的笔记，是1981年4月记在几张白纸上的。看了看全是孙犁谈书的话，那时他还住在多伦道的一座大院平房里。当时他打开书橱，让我看他保存的线装书，有函套的并不多，用线绳捆扎得整整齐齐。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那些用牛皮纸包裹封面的平装书，也是用线绳捆好，一排排地立在书橱里。你不能不佩服主人的细心和有条有理，甚至会想到他在生活中一定是位酷爱整洁的人。这些穿有书衣的书上都有他用毛笔写的题跋。我随手拿起的是新版《徐霞客游记》，可证题跋是近作。记得写的是友人报信此书新版，他虽有旧版仍购得一部，结果并不满意，至少三本中的一本特别厚，拿不动。又感慨今人不能以外贸眼光来办出版事业。我问主人何时开始藏书，并开始写题跋的，承答如后：

1956年，我的严重神经衰弱症暴发，完全不能工作了，只好彻底休息。但是，也不能一点不动弹呀，我就四处搜书。除了天津、北京以外，苏州、上海、杭州的旧书店也是我的目标。不能去就找他们要书目，所以那时候三天两头地都有旧书寄给我。这样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身体也好了一些，开始可以写点什么了。不想文革一来便搁笔十年。苦闷无聊，我就修书，利用废弃的牛皮纸包书，写点题跋自遣。这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劳动锻炼。到现在我还有一大袋子各式各样的包书纸，旧书的封面、插页有破损的，我都能配好各种纸加以修补，所以旧书也都像新书似的。

德明同志，你是藏书的。一个作家如果不爱书，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搞文化工作的干部不爱书竟能做好工作，我表示怀疑；写字的人不爱读书，要想写出好作品，我也怀疑。我买旧书的历史，最早还是抗战前在北平那段时间。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旧书摊，还有天桥的地摊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当时可以买到很多好书，其中有毛边书，还有米色道林纸的版本。文学书籍本身便是一种艺术品，封面讲究，排版疏朗，拿起一本书，你的心情就可以平静下来。

在解放区，处在战争环境里，当然没办法藏书了。进城以后，我常去天津劝业场、天祥商场的旧书店，但那时工作紧张，我又拉家带口的，过的是低薪制的生活，也不敢多买。要买也是买便宜的、零本的。有空时，我也去过“鬼市”，从地摊上挑几本。还有北门西、南门外马路边上的书摊，甚至在烂纸店里也买过很好的旧书。那些都是准备进造纸厂的。我跟店里人说，给你一角一本。店里很高兴，就让我坐在烂纸堆里随便挑。四部丛刊的很多零本就是我从那里挑来的。

我藏的线装书很少明版本，没有特别珍贵的，这可能与我的穷学生出身有关。那时候穷得连饭也吃不饱，专买便宜的本子，形成了我后来买书的习惯。大部头的书那时连碰也不敢碰，直到有了稿费收入，才买了几部像样的书。

我收藏旧书，一方面出于爱好，一方面也因为长期养病造成的。文革后期在书衣上写题跋则是有话要说而又无处去说，只好写在自己藏书的书衣上，留给自己翻翻，自己感叹而已。有些同志看到了，以为这对别人也有启发，就此发表了不少。现在河北省的出版

社要收集成一本小册子，加上我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一些小东西，起了个书名叫《耕堂杂录》。出版之后，一定送你一本看看。（这本《耕堂杂录》河北人民出版社于 1981 年 6 月出版，不久我就收到了孙犁寄来的赠书。）

那次交谈，孙犁同志还说到他的身体，本来他已吃了十多年的安眠药，在文革中造反派怕他自杀，不给吃了。没想到他硬是挺了过来。目前索性不再吃安眠药也能过日子了。只是还不能出门，怕乱，因为曾经在街上被车撞过，神经反应很敏感。看来今后只好坐在家里看书、写文章。每天晚上睡得很早，不能看书，否则就甭想睡觉了。

15 年前的这份记录，看看仍保留着主人的口气，我不敢也不愿增损内容，就此整理成篇。希望孙犁同志早日恢复健康，再能执笔。读者都在期待着。

1996 年 11 月 25 日

卖书记

买书是件雅事，古人向来爱写藏书题跋，常常是在得书之后随手而记，讲起来多少有点得意。卖书似乎欠雅，确实不怎么好听。先不说古人，黄裳兄跟我说过，他卖过几次书，传到一个“大人物”康生的耳朵里，那人就诬他为“书贩子”，果然在“文革”开始后，有人便盯上了他的藏书，来了个彻底、干净地席卷而去，还要以此来定罪名。贤如邓拓同志，因为需用巨款为国家保存珍品而割爱过个人的藏画，亦被诬为“倒卖字画”。

我也卖过书，一共卖了三次。

头一次可以说是半卖半送，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并无痛苦可言。那是天津解放后不久，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风气所关，当时我的思想很幼稚，衣着如西装、大衣之类与我已无缘，我就要穿上解放区的粗布衣，布底鞋了。旧物扔给了家人。最累赘的是多年积存的那些旧书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我把敌伪时期的出版物一古脑儿都看成汉奸文化当废纸卖掉了。这里面有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上海出版的《新影坛》、《上海影谭》，还搭上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的《青青电影》、《电影杂志》、《联合画报》（曹聚仁、舒宗侨编），等等。有的觉得当废纸卖可惜，如北京新民印书馆印的一套“华北新进作家集”等，其中有袁犀（即李克异）的《贝壳》、《面纱》、《时间》、《森林的寂寞》；山丁的《丰年》；梅娘的《鱼》、《蟹》；关永吉的《风网船》、《牛》；雷妍的《白马的骑者》、《良田》等。再加上徐许的《风萧萧》和曾孟朴的《鲁男子》（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一部小说），等等，凑成两捆送给我的一位堂兄，让他卖给专收旧书的，好多得几个钱。这也是尽一点兄弟间的情谊，因为那时他孩子多，生活不富裕。我匆匆地走了，到底也不知道是否对他略有小补，也许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留下的很多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书刊和翻译作品，还有木刻集，包括《苏联版画集》、《中国版画集》、《英国版画集》、《北方木刻》、《法国版画集》、《抗战八年木刻选》，等等，临行时，几位同学和邻居小友来送别，我又从书堆中捡出一些书，任朋友们随便挑选自己喜爱的拿走，作个纪念。我感到一别之后，不知我将分配到天南海北，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可是风气已变，记得几位小友只挑去几本苏联小说，如《虹》、《日日夜夜》、《面包》之类，别的都未动。

这就是我第一次卖书、送书的情况。

到了北京学习紧张，享受供给制待遇，也无钱买书。后来，我已作好了去大西北的准备，可分配名单却把我留在北京。几年之后，社会风气有变，人们又讲究穿料子服了，我也随风就俗，把丢在天津家中的西装、大衣捡了回来。参加“五一”游行时，上面号召大家要穿得花哨些，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手里还举了一束鲜花，惹得同伴们着实赞美了一番。当然，也有个别开玩笑的，说我这身打扮像是工商联的。

我把存在家中的藏书全部运到了北京。

生活安定了，办公的地方距离东安市场近，我又开始逛旧书摊，甚至后悔当初在天津卖掉那批书。

第二次卖书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

那时既讲炼钢，又讲炼人。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很多地方都嚷嚷着要

插红旗，拔白旗，而批判的对象恰恰是我平时所敬重的一些作家和学者。整风会上，也有人很严肃地指出我年纪轻，思想旧，受了三十年代文艺的影响。我一边听批评，一边心里想：“可也是，人家不看三十年代文艺书的人，不是思想单纯得多，日子过得挺快活吗？我何苦呢！”有了这点怨气和委曲，又赶上调整宿舍搬家（那时我同李希凡、蓝翎、苗地诸兄都要离开城外的北蜂窝宿舍，搬到城内来）。妻子一边帮我收拾书，一边嫌我的书累人。我灵机一动，也因早有此心，马上给旧书店挂了个电话，让他们来一趟。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老保姆罗大娘高兴地抢着说：“书店来人了，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呀。瞧，留下一百元呢！”望着原来堆着书的空空的水泥地，我苦笑了一下，心里说：“老太太，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他拉走的哪里是书？那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罗大娘还告诉我，那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不过，当时搬家正需要用钱，妻子和孩子们还真的高兴了一场。我心里也在嘀咕：就这样可以把我的旧情调，旧思想一股脑卖掉了？我这行动是不是在拔自己的白旗！

这一次，我失去了解放前节衣缩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学版本书。其中有良友出版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学丛书”，包括有《四世同堂》在内的老舍先生的全集（记得当时只留下其中的两本，一是老舍先生谈创作经验的《老牛破车》，一是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现在这两本书还留在我的身边）。失去的还有几十本《良友画报》，整套的林语堂编的《论语》和《宇宙风》。还有陈学昭的《寸草心》，林庚的《北平情歌》等一批毛边书，都是我几十年后再也没有碰上过的绝版书。

那时我并不相信今后的文学只是唱民歌了，但是我确也想到读那么多旧书没有什么好处。我顶不住四面袭来的压力，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地轻松自如？有那么多旧知识，不是白白让人当话柄或作为批判的口实吗？趁早下决心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吧。

第三次卖书是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那时的风声可紧了！《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李慧娘》都成了大毒草，连“左联”五烈士的作品也不能随便提了。我的藏书中有不少已变成了毒草和违碍品，连妻子也为我担心。那时人人自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爱上了文艺这一行，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这是自投罗网，专爱“毒草”！深夜守着桔灯，面对书橱发呆，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幸福，也为了自己的平安，我又生了卖书的念头。这一次又让旧书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轮车书，连《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也一起拉走了。我想有两套选集足够了。第三次卖掉的书很多是前两次舍不得卖的，几乎每本书都能勾起我的一段回忆，那上面保存了我少年时代的幻想。我不忍心书店的人同我讲价钱，请妻作主，躲在五楼小屋的窗口，望着被拉走的书，心如刀割，几乎是洒泪相别。妻子推开了门，把钱放在桌上怏然相告：“比想像的要好一点，给的钱还算公道。可是，这都是你最心爱的书呢……”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懦弱的人。我在一股强风面前再一次屈服了。

不久，“文革”来了，我们全家都为第三次卖书而感到庆幸，因为拖到这时候连卖书也无门了。

风声愈来愈紧，到处在抄家烧书，而我仍然有不少存书。这真是劣根难除啊，足以证明我这个人改造不彻底。若在第三次卖书时来个一扫而光该多干脆，不就彻底舒服了吗！书啊书，几十年来，你有形无形地给我添了多少

麻烦，带来多少痛苦，怎么就不能跟你一刀两断？我应该爱你呢，还是恨你！

大概人到了绝望的程度，也就什么都不怕了。这一次，我也不知道何以变得如此冷静和勇敢。我准备迎受书所带给我的任何灾难，是烧是抄，悉听尊便，一动也未动。相反地，静夜无人时，我还抽出几本心爱的旧书来随便翻翻，心凉如水，似乎忘记了外面正是一个火光冲天的疯狂世界。

然而，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残书保留下来了。二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卖过一本书。

今后，我还会卖书吗？不知道。

1986年7月

烧书记

“七·七”事变那年，我还是个孩子。我蹲在父亲身旁跟他一起烧过书。父亲识字不多，但爱集邮，也有一些附有图片的书和画报，上面难免有蒋介石的像和抗日的内容，日本人见了是犯禁的。有些邮票也烧了，因为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到了1966年夏天，书的厄运又来了。大街小巷都在烧书，整个北京城布满了火堆。

我们宿舍大院烧书的那天，我却显得异常镇静。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往日也许很多人已带着孩子去逛公园，或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看书、写作，至少在准备几样可口的小菜吧。可是今天大院里死样的沉寂，好像有什么不祥之兆。两天前，宿舍里几名“积极分子”便贴出破四旧的倡议，说我们大院里没有动静是不忠，号召星期日采取“革命行动”。果然就在这个美好而平静的上午，在“积极分子”的指挥下，刹时间在大院中间就形成两座书堆，冒起了浓烟和火光。女儿噤噤地跑上楼来报信：“爸爸，快点，人家都烧书了，不然的话要到各家来搜查！”我凑到窗前往下看，火苗老高，烟味也冲上五楼。烧书的人少年子弟多，那几位“积极分子”一边烧着书，一边还冲楼上喊：“谁家有封、资、修，谁家明白，免得挨家去搜！”被吆喝的当然有我在内。

望着女儿和我的书柜，我茫无头绪。两天前我就下了决心：一本书也不烧。不是我顽固抗拒，是我无从下手。一本本书都是我多年来在各地搜寻来的，是我的心血结晶，要烧，就来个彻底干净地全部烧掉。但我自己决不动手，谁若采取“革命行动”就任意来吧。我跟女儿商量：“还是再等等看，要烧得全烧。你都看见他们烧的是些什么书？”女儿说：“有《红楼梦》、《水浒》，还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对了，还有老舍、巴金的小说。”父女相对默然。我看出女儿对我的态度有点不以为然了。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一惊，莫非真的要来采取“革命行动”了？我抢上前去开门，原来是隔壁的邻居老赵。他探身进来问我：“怎么办？真得往楼下去烧书吗？”我说不想去，拖拖再看吧。他很高兴地说：“行，你不去，我也不去。反正你比我的书多，而且我还没有老书。你那么多老书都不烧，我还怕什么。”说着退身而去。

也有人让孩子送下几本不三不四的书去充数，不懂事的幼童们则围着火堆拍手乱叫，看热闹。火光微小了，孩子们的兴致也没了，大概带头烧书的几位“积极分子”的肚子也饿了吧，就此收了兵。

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宿舍传达室门前贴了一张捷报，鼓吹了一番昨天的“革命行动”，又警告那些死保四旧的人们应该如何如何，否则绝无好下场。

我们全家担心的第二次“革命行动”终于没有来，也许因为形势发展过于迅速，那几位“积极分子”正忙着成立造反组织，急于去干夺权的“最最革命”的行动了。

我的藏书似乎可以保存下来了。我暗自庆幸，可又不知所终，因为昨天的革命文学和进步文艺，今天都已变成了反动文艺黑线的产物，保存这些“黑货”不是恰好证明自己的立场反动？这时不断有某某被抄家的消息传来，谁家只因为藏了一册民国时期的什么书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胡同里罚跪示

众。那时任何人都可以进门来抄家，我的书怎么能保得住？卖吧，早已无人收购。邻居姚君把一些绝版好书偷偷地转移到故乡的农村去，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我又没有这条件。送给如我一样的爱书者吧，那是给人家送去灾难。我真后悔多年来干的蠢事，耗去我多少精力和金钱，从妻子和孩子的嘴里又夺去多少美食，从她们身上夺去多少像样的衣裳，最后竟给全家人带来痛苦和不安，实在对不起妻子和孩子。

还是女儿最体贴父亲，她在我的书柜上贴满了批判毒草的语录，说明这些书已自动封存，是供大批判用的。我虽然怀疑它的效果，但是多少起了一点安慰的作用。

风声还是很紧。听说有人只是对样板戏说了一句不怎么恭敬的话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又有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人，查阅旧杂志，顺便翻到了蓝苹的材料，结果被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案，关进了监狱。活该碰上了“防扩散”！一天妻子小声地提醒我：“你给我看江青演戏的照片，那些书可是要命的东西。”经她这么一提，我倒真的有点后怕起来。我何以胆大包天至此，竟把这种“祸害”安然放在书柜里，这不是自寻灾难吗！就在当天，我找出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争演《赛金花》的那本特刊，那是我当年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花两角钱淘来的，连那天我在露天书摊雨篷下冒着小雨买书的情景还记得。特刊是用绿色油墨印的，主要是王莹的照片，也有赵丹演李鸿章的剧照，而蓝苹演的只是一名普通的妓女。我不敢再细看了，暂时压在床垫下。接着又找出上海苏商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文集，那上面有江青同赵丹、郑君里、吕班合演《大雷雨》的剧照，这是“女皇”最忌讳的。我又找出抗战胜利后魏金枝、丁景唐在上海编的杂志《文坛》，有一期上也有江青的便装照。这些东西只有化为一股青烟之后才能免除我的不幸。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可以犹疑的？不仅如此，当时我突然开朗、大方起来，虽然有几种并不属于“防扩散”的书，我也一并烧毁了。这当中有胡风的杂文集《棘源草》，赵荫棠的一本小说《影》。前者是“反革命集团”头目的书，后者是敌伪时期出版的，写了北平的妓院。还有一本古色古香的线装影印的诗集《初期白话诗稿》，因为里面有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的墨迹，免得费口舌，烧了吧！

什么时候烧？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这时候才想到当初不听“积极分子”的号召太不识相，否则不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地烧掉吗，还落个响应号召。按说在阳台上烧最方便，但不妥，容易让人发现，怀疑我是烧什么罪证，硬说是烧地契、变天账可就麻烦了。最后选定在厨房洗菜池下面的地沟里烧，还不能用大火，以少冒烟为限。最后再泼水把灰烬冲掉。

这天夜里，我像个作案的罪犯，早就偷偷摸摸地准备好一切。我站在阳台上四面窥伺着，希望宿舍大院里的每个窗口早点熄灭灯光，好让我人不知鬼不觉地行事。颤抖的手终于燃起了火柴，首先即烧易燃的宣纸本《初期白话诗稿》。想到其中还有鲁迅的诗，我想留下来，又一想那是周作人代笔的手迹，算了罢。最后只留下了李大钊那张《山中即景》的墨迹：“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烧吧，烧掉我对书的迷恋，烧掉我心头的种种疑惑。烧掉这给我们全家带来过不安的不祥之物吧！

我仿佛听到轻微的丝丝声，是书在哭泣，一下子让我想起孩提时代同父亲烧书的情景。那时候头上有隆隆的炮声，街上有刺耳的铁蹄声，敌人已经冲到我们的大街上了。现在呢，我为什么要烧书？还像个贼似的？

火光熏蒸着我的脸，我感到汗水的湿润，也许还有泪水。是烟呛的，还是我太懦弱了。

1986 年 3 月

李一氓藏书

我本无意搜集古书，然而京华旧书肆仍以线装书为多，随意翻翻亦有使人不忍释手的，零星所得放在一起足可满架了。记得鲁迅先生讲过类似的话：若在北平久居，慢慢会染上玩玩古书、摆弄一点小古董的陋习。现在情势大变，旧家子弟的习俗渐稀，然而其遗风也难说查不可寻。

某年购得一刻本《冬集纪程》，乾隆人周广业撰，是他由江浙出发，一路到达京城的日记，并附诗。我藏的是道光二十年的版本，即1840年所刻。这位来礼部应试的周某，住在宣南北半截胡同，正是后来鲁迅先生居住过的地方。书上有“无是楼”和“一氓藏书”的印记。

又一年购得清刻《鸿泥目录》一册，书上钤有：“成都李一氓”等几方印章。后来发现此本前后有残页，即求黄裳兄指点，承示：“此为罕传佳册，不知一氓同志何以弃之也。二十年前余亦得此书，《目录》八卷外尚有《续录》四卷，《续吟》一卷。”黄兄还为我补钞了残页，知为王定柱所撰，记录了嘉庆时代他在云南、贵州、四川的旅程，“凡道里风俗故事，琐细毕书，非古文家之徒以文章名世者可及。”这类难题不求黄裳兄更求何人。

又过了两年，我居然买起钞本来。想来可笑。这是一本蓝色绵缎面装《晏元献遗文》，我怀疑是李一氓同志买后重装的，封面上有他亲笔署签，书内有“无是楼藏书”、“无是楼”、“李一氓五十后所得”、“一氓读书”、“李押”等五方印章，足见藏家的兴致。钞本是民初人所辑的《晏殊集》。我并非不爱晏殊的诗词，但我从来也没想到要搜求他的版本。我之一心要收藏它无非出于书缘。书后一氓同志的小跋亦难得。他写道：“仅属素材，须加董理始能成书。得后因记。”我收拾藏书家的弃余是想分得藏家曾经有过的喜悦吗，还是不忍心被别人拣去？

对于这位当年创造社的健将，我始终把他看作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然而这位从战火中冲杀出来的猛士竟然如此迷恋线装书，当初我亦曾有点意外。难道这是不能相糅的一对矛盾？

多年前，我知道一氓同志是《花间集》的爱好者，国内最权威的收藏家。我买了他新印的整理本，拜读了他洋洋洒洒的题记，了解到他在皖南访书的辛劳。这都是他在域外工作期间偶然回国休假时进行的。大约是十几年前吧，我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那里陈列有李老所赠的杜集各种版本，大开我的眼界。他为自己多年的所藏找到了最好的去处。

前几年我到了承德避暑山庄，那里正在举行纳兰性德的学术讨论会，还临时开辟了一个小小的陈列室。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几种平时不易见到的纳兰的集子，是李老特别派人送来助兴的。李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我相信他并不寂寞，因为他有书为伴。他已经把自己的感情倾入自己的藏书里，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音符，由老人编织成一首首欢乐的乐章，给人间带来庄严的沉思和一片温馨。

他当了多年的外交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国外竟因地制宜地玩起外国版本来了。他在维也纳的书店里买到过《资本论》的德、法、英文版初版本第一卷，还买到过列宁在国外出版的书。后来进而搜集起马克思、列宁的手稿残页和书简，这些在国外古老的旧书店里还能找到，包括一些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出国护照等遗物亦有出售。李老把这些收藏带回国内，分别送给北京图书馆或中央档案馆，“我把东西买到手上缴后，就算完事，以后变化和

我不相干了。”这些藏品后来有的已被苏联和国内出版部门补入了经典著作的全集中，名副其实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宝库。这种玩外国版本的情趣岂不恰好说明一个革命者所具有的文化素质。我敢说，在我们当代藏书家的名单里，李老的收藏是独一无二，少人问津的。

一氓同志在他所著的《一氓题跋》里带着无限的怀恋说：“……我至今还想到那些伦敦的旧书店，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特别是维也纳的那些旧书店。”我的心似乎也随着他的笔飞到那令人向往的所在。

我还会去旧书肆漫步，还能碰上有“无是楼”藏书印的书吗？

1987年5月

逛琉璃厂

十几年前的一个春天，王冶秋同志打电话来约我去逛琉璃厂。那时候正是文化不值钱的年代，琉璃厂旧书店还真有点好书。

碰到两位熟识的老店员，领我们走进一间正待整理的藏书室。脚下踩的全是古籍版本，甚至有墨迹手稿。我随手拾起几本看看，发现有古典小说研究家孙楷弟先生的手迹，写于战前日本印的那种竖格的笔记本上。那米色道林纸稿本上已经有被人践踏过的足迹了。我不觉惊叫起来，老店员微微苦笑说：“这是孙先生的笔记。不止这几本。他的藏书都是用麻袋装来的。孙先生的书论斤当废纸卖了。”怎么，孙先生寒心了？再也不想研究古典小说了吗？

果然，在门市部公开陈列的书架上，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从架上拣得有孙先生签名的书。我看到有胡适签名、送给孙先生的一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文集》，代图书馆购下。我也买到他的几本藏书。其中的一本还是日本作家清木正儿签名送给他的。

冶秋同志跟我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的藏书也是装了麻袋当废纸卖掉的。那些书都是他从冷摊上一本本搜集来的，装麻袋论斤过秤时实在惨不忍睹。他说不上是藏书家，似乎也没有形成藏书体系，但是从他的室名“零本斋”可以看出他藏书的见地，不论古籍、近代、现代的书，他有公私藏家书目中不见记载的，不是大部头著作，多为零册，可称杂家的眼光。他有一本清代笔记是专谈螃蟹的。从蟹的生理一直谈到它的食法和营养，以及历代咏蟹的诗文，等等。还有一本是专谈卖膏药的，都是冷癖的奇书。一本民初印的小册子《王金发》，很多人找他借用过，是辛亥史料，也是研究鲁迅的书。

“文革”中，王冶秋先被赶到湖北的乡下去落户。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出版界召开的一个大会上点名找他，他才被召回北京。早在抗战时期，王冶秋在重庆冯玉祥将军处工作时，周恩来便熟识他。十年动乱期间，不知多少人都受到周总理的保护。

回到京城，王冶秋负责图书博物馆的工作。说他负责，实权却在军宣队手里。我们在琉璃厂见到一批刘半农的藏书，是清华大学刚卖出来的。当年刘先生病逝后，生前藏书让给了清华大学。五十年代初院校调整，清华取消了文科，现在的当事者觉得这部分古籍无用，随便地处理了。这么珍贵的书，也是任何读者随手可得。听老店员讲，吴晓铃先生已从中挑选了几本有关俗文学的书。后来我也买到两本有半农先生签名和藏书印的线装书。

按照王冶秋的意思，这部分藏书已经完整地保存了几十年，不应再分散流失，可以由公家统一买下来，可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也不敢夸这个口。他只挑选了数十种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书留在那里让公家来买。然而这些书堆在书店好几个月也没有动静，主要是军代表不同意，对王说：“你挑选的这些书，尽是谈鉴别金器银器的，还有古笙古笛子什么的，花钱买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

这些书到底卖给谁了，我没有去查考。说起来不知令人可气呢，还是令人可悲！

既然无权给公家保存古籍就个人买点小册子吧，所以王冶秋有暇还常常去琉璃厂走走。他似乎要重建自己的“零本斋”了。其间最难得的是他买到

了有鲁迅先生签了书号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宣纸线装大本，即使常年跑旧书摊的人也难得一见。原收藏者是将书折起来存放的，画页中间已然断裂，他以20元购得。又花了10元托修书的老工人整旧如新。其中乐趣自然也包含着对鲁迅先生的一种严肃的感情。他究竟同鲁迅先生有通信之谊，当年借居北平未名社时也见过鲁迅先生，大家都呼他为“小王”。

我们这次来琉璃厂，他还要取一本旧书，二十年代末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精装本《曼殊遗墨》，柳亚子先生编，封面用了孙中山先生的题字。

我翻阅这部铜版纸精印的图片集，深为苏曼殊的诗、文、画所吸引。书中还有和尚生前遗物照片。曼殊大师能画我是知道的，但这么多的墨迹还是头一回看到。我问他：

“你怎么想起来买这本书？”

“不是我要。叶剑英元帅喜欢这本书。去年他找我借，我没有，就到北京图书馆以我的名义借了出来。时间久了，图书馆催我还书，叶帅秘书一时又没找到，我就请旧书店到库房里去找一本，买来先还给图书馆。”冶秋同志一边回答，一边掏出两元钱买了这本书。

“你看，一员武将，可是特别喜欢曼殊和尚的诗文，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然而这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紧张形势不是有点不调和吗？我默默地存有一个幻想，管它调和不调和，什么时候我也要访得一本《曼殊遗墨》。

后来，我终于买到了这本书，似乎比先前冶秋同志买到的那本书品更佳。

现在叶帅已仙逝，冶秋因脑病已卧床昏睡好几年了。他不仅无法再去逛琉璃厂，连看书谈书也不能了。呜呼！想到这里让我怎能收笔。

1986年12月

半农买书

文人春节逛厂甸的旧书摊，早已是消失了的旧梦。设摊者摆出的多系零本散册，说不定还有平时不易见到的奇书。查鲁迅、周作人当年的日记，包括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有关文字，他们绝不放过这个求书的好机会。名人学士与平民百姓挤逛厂甸，也成了旧京过年的民俗之一。请看，鲁迅和钱玄同访求多年的小说《何典》，还不是刘半农 1926 年春节逛厂甸时淘来的。

寒斋藏有一册刘半农题跋的《东坡遗意》，即 1933 年春节刘氏从厂甸所得。他似乎很珍爱此书，在封面上题道：

赏奇轩刻明末梁溪顾邹两君帖。廿二年一月半农买于厂甸。

题字后钤有“刘复”印，扉页上又钤“江阴刘氏”及“刘复所藏”印两方。刘氏遗书，原藏清华园，“文革”时散出，余于厂肆仅得一二而已。

半农先生厂甸访书固然一乐，但此刻亦有不乐的时候，1944 年 11 月，刘氏后人刘曼湖回忆往事，写了一篇散文《父亲》，载于上海《天地》第 19 期，提到年关厂肆书贾到刘家坐讨书债的情景：

过年时有一桩事最令父亲不高兴，那便是那些坐在门房中等着的债主，他们既非来自油盐米面的吃食铺，也不是裁缝师来索要工资，这些债主原来全是琉璃厂旧书铺的先生们，平日每天星期一日清早父亲尚未起床，他们可已在门房中排排坐起，直等父亲叫他们进来，他们才按着秩序背着大包袱走进来，大包袱中的东西便是父亲嗜爱物之一——古书。父亲虽自知非富人，但因嗜爱便不时留下一二本，谁知积到年底其价值也就颇可惊人了，幸而父亲代书店常介绍买卖，因此情面是有的，只还一部分也就过去了，但父亲每到过年时仍是很怕那些书铺先生们的来临。

半农先生故于 1934 年 7 月，1933 年春节他买《东坡遗意》时，该是他最后一次逛厂甸访旧书了吧。

1985 年 2 月

书肆的灾难

琉璃厂旧书肆在北平沦陷期间，遭到日本占领者的公开劫掠，这段历史不应忘记。

想不到在 1947 年到 1948 年解放军进城以前，厂肆古籍又遭到另一场厄运，甚至是空前的大灾难。祸首当然是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

抗战胜利后北归的朱光潜先生说，他去逛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坊，每家都如深山古刹，整天不见一个人进来。他以廉值购得一部海源阁藏的《十三经古注》，一部秀野草堂原刊的《范石湖集》，因之感叹道：“于今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贱，书贱，读书人也贱！”（见《周论》创刊号，1948 年 1 月出版）教授们穷得不再买书，却靠卖书来贴补生活，连叶公超也忍痛卖掉了《图书集成》。

琉璃厂稀见的历史场面出现了，线装古籍版本的价钱，还不如约斤当废纸卖值钱。大批线装书成车地运往造纸厂，化为纸浆变成了“还魂纸”。有的则被小贩买去作包装纸用，包花生米的竟是宣纸木刻的零页。按当时的币值，朱光潜先生作一对比：“《古逸丛书》的零种每册合到两万元，许多明刻本及乾嘉刻本也只要一两万元一册。……我买最平常的稿纸也要八万元一百页，一册旧书至多就合到纸价的四分之一。”当时旧书卖废纸，一斤可卖二至三万元。一部《图书集成》定价一千余万元，若从架上取下来卖废纸，可得两千余万元。

燕京大学历史教授邓之诚先生，亦琉璃厂的常客。他亲见整套的《弘明集》、《朱子全书》、《皇朝经世文编》、《佩文韵府》、《唐宋八家书文》、《海国图志》等当废纸论斤卖，其中还有大半《光绪会典事例》、五州同文《二十四史》等，内心能不受到打击！即以《皇朝经世文编》而论，那是一百二十卷的同治刻本啊！他在《哀焚书》（载《现代知识》第二卷第七期）中举例：“近顷某人有书一屋，商之书肆，最高价不过七百万；无已，作废纸卖，竟得二千万。”他估计了一下，书肆下架卖废纸，“若以十万斤计，则二十万册之书，已入炉成浆矣。”面对古书的毁灭，读书人实在难以沉默。

北大教授吴晓铃当时统计，1947 年琉璃厂和隆福寺倒闭的旧书店就有三四十家，有的书贾到单位当了茶房，隆福寺一家旧书店一次就把存书当废纸卖去七千斤。一位书铺掌柜向他诉苦，一部翻殿版的《全唐诗》，十二函一百二十册，定价四十万元，合不上战前的两个银元。但，如果称斤卖废纸，约四十斤，立刻可得四十四万元。

贩书人也不甘心自毁古籍了，来薰阁店主陈济川，趁胡适到南京参与中华教育会文化基金董事会和美国在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之前，登门拜访，请胡适把书籍变成造纸原料的严重性向政府呼吁，并求设法解决。胡适并没有打官腔，他让陈以书业公会的名义写成意见书，由他带到了南京。据当时报刊记载，到 1948 年春节，北平市内旧书仍源源流入各造纸厂，北平造纸厂门前从大卡车上卸下旧书甚多。几天后，教育部才拨款十亿来收购旧书。但，十亿元仅合战前的五万元，有人打比方，敌伪时期收购藏书家卢木斋的旧书，一笔就是六十万元，而且物价一日千里，胡适的这番努力又怎能挽救得了厂肆的厄运。

如今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想来多有，为什么不给后人讲讲这段历史？

1996 年 6 月

卖书人

1994年10月26日，一个卖旧书的人走了。

他来自河北农村，16岁进京，在琉璃厂通学斋旧书铺学徒，掌柜的是他的舅父、著《贩书偶记》的孙殿起。解放后，他是中国书店普通的店员，又协助孙氏整理了《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小志》。

我久闻其名，但一向很少收藏线装书，与他并不熟悉。直到“文革”中期，因为要找几种鲁迅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如陈师曾、姚茫父等人的集子才与他交往较多。这类书多为零本小册，有的还是石印、铅印本，买主卖家历来都不太重视，只有细心如雷梦水这样的贩书人才当回事。我偶有提问，总会得到可靠的答复：“见过的。这书不难找。”或称：“见过的。这书往日不稀罕，近年也有人来找过。现在可难说了。”也许时隔一年半载之后，连我也忘记了，或者认为全无希望得到的书，他会突然从座旁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递到你的手中：“这是您要找的书，我留起来了。”个别的时候，有你事先未能料到的书，他也为你留着。譬如卞之琳先生战前在琉璃厂刻过一部木版新诗集《音尘集》，宣纸、红墨印，外加黄缎函套，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他虽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没有下过工夫，但因为是线装本，通过了他的手，还是为我留了下来。当然，定价要稍贵些。

老雷并非独厚于我。有一次，我在他座后的书架上，见到四十年代初黄肃秋在北京出版的一本诗文集《寻梦者》，正是寒斋所无，他摇摇头说：“不能卖给你。这是前几个月作者来找的，我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了。”我当然不敢掠美，只求他以后留意，也替我找一本。可是到底没有消息。我非常尊敬老雷对读者的这种热情和负责的精神。我亲眼见过，外省外县来的陌生读者，因当地政府新修县志，特地到北京来寻访旧县志，他不怕辛苦地蹲书库，一一满足了对方的要求。还有和尚与道士来寻找佛道典籍，老雷亦能对答如流，令对方喜出望外，满载而归。尽管我有时去逛海王村，在他那里一本书也没有买到，与他聊上几句也受益匪浅。有一次谈到版本的差异，他说旧时琉璃厂的书商有味着良心赚不义之财的，专门作伪，连专家学者也受骗。又一次谈起抗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长期在琉璃厂搜罗我善本书，有的卖旧书的奸商专门为日本人服务，整包整包地运到日本去，以至国内学者专家还得跑到外国图书馆去借书、抄书。他说，只有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才断了奸商的这条路。我动员老雷把这些掌故写下来，借以教育那些只图获利、不顾民族利益的人。他嫌自己的文化低，怕写不好。后来，他还是写了如《古籍的东流》、《古籍的回归》、《记书估古书作伪》等短文，现已收入他写的《书林琐记》一书中。

正好在老雷逝世的一个月前，即去年9月26日，他写给我一封信，我不知这是否他的绝笔，或者他那时已经预感到自身有什么不测，信中说：“敬恳者，弟年事已高，有一桩大事与兄商量，即弟旧存之两卷经卷，想献于政府，未悉给哪个单位比较合适？根据咱们的生活情况，应该有什么要求，做的要圆满一些。我总想不好，敬恳吾兄在百忙中帮我拟个呈文草稿……”读了他的信，我很感动，在此商品大潮下，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文物献给政府，而不是到什么地方去拍卖，得个大价钱，或是异想天开地找个海外出美金的阔人。所谓两卷经卷，可以参考他写的一篇散文《西城取经记》（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拙编《书香集》）。那是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大崩溃的

兵荒马乱中，他在北平西四北的悦古堂书坊，购得一卷北魏时写的《道行经》，另一卷是唐以前写的《妙法莲花经》。尽管卖家是熟人让了利，他一个卖旧书的还是咬紧牙关倾囊而出，才抢救下这两件文物。多年来他不想奇货可居，等个善价，而是默默地购来《魏书》，一字字地亲加校勘，做学问。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他惊奇地发现，自北宋靖康以来八百余年的一个讹误，竟然被历代学者忽略了。他把这一喜悦写进《西城取经记》，让我们与这个卖书人分享了快乐！

可惜我不会写呈文，更不会讲价钱，只好求助相关的朋友，立刻想到我熟悉的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史先生很高兴，并向我表示当此敦煌研究热中，老雷收藏的这两件文物十分珍贵，理应由国家来收藏。史先生还开列了博物馆两位负责人的名字，以便与老雷取得联系。我很快地将这一切函告老雷，并说国家一定会按照政策付给收藏者报酬。老雷在来信中不曾谈及自己生病的事，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月后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稍后，我又有域外之行，匆匆上路了，也不知他的心愿到底完成了没有。

琉璃厂书肆培育了这位有教养的卖书人。数十寒暑，清贫如故，爱书的心却没有变。好容易晚年有了新居，也享受了专家的待遇，他却去了。他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滚滚而来、又一本本从这里散出去的书。他为这古老的书坊留下些什么？以后人们还会记得他吗？

一个卖旧书的老人悄悄地走了。

1995年8月

天祥二楼

天津没有像北京琉璃厂那样古老的旧书集散地，似乎自清代以来刻版印书的风气也不盛行。“五四”以后北京出现了像东安市场那样的商场书肆，我不敢说天祥商场是否受了北京的影响，从初建的那一天起，便把二楼设计为书摊的集中地，至少在三十年代，这里已形成了购书中心。当代藏书家黄裳，抗战前还是一名南开中学学生的时候，便从这里起步搜罗版本了。诗人辛笛告诉我，当年他在天津也常去那里淘旧书。

相邻的劝业商场也有两家卖书的，却远远比不上天祥二楼的规模。这里不仅绕二楼一周尽是书摊，连三楼也有两家，其中一家还是专门经营西书的。不过就我的记忆所及，这里始终显得很冷落，读者寥寥无几。我上中学时，有时下午逃学，常往这里跑。我把此地当作开架的图书馆，是我获取知识和搜集绝版书的最好去处。

我不认为这里的书摊主人有多么高明，但是若想从这儿购买进步书刊乃是举手可得的事。不论是哲学、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还是其他国民党查禁的书刊，只要你细心寻找，总会有所发现。我在这里见过蒋光慈、胡也频的小说和诗集，也见过郁达夫的全集和田汉的戏曲全集。抗战胜利后，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被害后的纪念集，也赫然摆在书丛中。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四世同堂》、《志摩日记》、《围城》等，我都得自这里。包括耿济之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四本一套的《卡拉玛助夫兄弟们》，外加那个漂亮的纸盒封套，当时都带给我不少喜悦。当然也有羡慕已久却无力购回的书，比如四厚本黄色封面的《静静的顿河》，用精致的纸匣装置的《鲁迅三十年集》即是。我也奇怪，按说天祥商场二楼的这种文化氛围，与建立这个商场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当事者竟长期容纳了它。是时代潮流的进步不可阻挡，有心提高商场的文化品位呢，还是整个商业的不景气使它的主人也无可奈何？

当然，旧时天祥商场的书肆也并非那么纯洁。我高中的一位同班同学，从那里偷偷地买来了伪造的张竞生博士的《性史》。从三楼卖电影明星和风景图片的摊子上买来了成套的春宫照片。如果你站在他们的摊前不想离去，摊主会轻声地主动问你：“要看《性史》吗？”

我至今保存完好的抗战胜利后、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文集单行本，以及几本历史剧，也都得自这些书摊。当时我们高二级的国文老师黄振镛先生，在给我们讲屈原的《离骚》以前，先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来讲郭老的话剧《屈原》。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一课。他带到课堂上来供我们参考的那本《屈原》，也正是我已购存的同一版本，当时我那种得意的心情至今犹能回味。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购得三册战前施蛰存和康嗣群编的文艺刊物《文饭小品》，实得其半，不久回津探亲，又在天祥商场得到了所缺的另外三册，正好凑成一套。我可不信神佛，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哪位书神于暗中给以助力，想想也有趣。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袁水拍、陈笑雨同志率队到天津参观自由市场，在皇宫饭店住了一夜，我忙中偷闲地还是去了一趟天祥商场的旧书店。那时个体书摊早就没有了，只有一家国营旧书店，我有幸买到了几本稀见书。一是俞平伯线装诗集《忆》，一是袁水拍在抗战期间印的土纸书《冬天冬天》，

还有一本是天津大公报原藏、联华画报在阮玲玉自杀后印制的纪念集。此后，我便与天祥商场的书肆无缘了。若是旧书店仍在，我想它也敌不过时新商品的冲击，就像北京东安市场残余的那家旧书店一样，不过是形同虚设而已。

历史的变迁已是人力无可挽回的了。听说北京的东安市场和天津的天祥商场，近期将要全部推倒，与外资合建新的商场。当万人欢呼现代化的新型购物中心行将出现时，我却来重温早已消逝了的书肆旧梦，难道仍想为它争得一席之地不成？

沪上访书记

到上海正赶上办书市，可去的地方很多。如河南路的大学书店开张，书刊一律九折，也吸引我挤来凑了一场热闹。这里没有什么通俗读物，读者的层次比较高，购书者绝大多数是青年，看了令人欣羡。外地参加书市的客人乘大轿车来，有警察维持秩序，小街上充溢着节日的气氛。

那几日我到邮局去寄书，年轻的邮局工作人员抱怨自己弄不到书市的入场券，快快不乐。我恰好还存有两张赠券，随手送给了他。

福州路的古籍书店正举办一个书展，不仅有古今名人字画，还有宋、元、明、清的善本书，以及近代和“五四”时期的绝版书。那天黄裳兄陪我去的，他注目于明清善本，我则留意观察那些“五四”以来的毛边本初版书，其中有鲁迅、柔石、丁玲、蒋光慈、钱杏邨、夏衍的，也有叶灵凤、高长虹、张资平的，平时都不易见到。书无标价，只供陈列，若一举可得，当可成为珍本收藏家。“五四”以后的稀见版本竟有如此之多，更不知十年噩梦中又焚毁了多少。

我在古籍书店的三楼上买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共三册。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铅印书。《小记》印于1931年9月，《续记》上下印于1931年12月。定价十元，价钱公道。黄兄告诉我，这书的《续记》还有卷六、卷七一册，印数极少，颇不易得。他的那一册还是抗战胜利后直接写信托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菊生先生，张菊老特地写信到福建的商务分馆才觅得唯一的一本。作为当时《文汇报》的副刊编辑，黄裳兄便是从马先生的这一组读书笔记中得到启发，专门邀马先生为副刊开辟了一个文史专栏，这就是解放前在上海出版的笔记《石屋余瀟》和《石屋续瀟》二书。我想，四十年前黄裳兄费了如此周折才弄到手的《续记》卷六、卷七，恐怕我一时难以找到了，不禁对黄兄产生一种又羡又妒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促发我一定要寻觅此书。明知渺茫，也要侥幸一试。这也是一切有收藏癖的人的通病。回到北京后仅一个月，我居然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轻易地买到了它，实在幸运。这本书卷六、卷七是1939年2月出版的，距前几卷的出版已隔七、八年。我为得此书比黄兄容易而高兴，更为黄兄不能专美于前而得意。是否一种狭隘的自私心理在作怪说不清了。夜间，在旅舍中翻阅这几本书，虽知马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可是他这部读书笔记却有不少哲学、文学，以至民俗掌故的记载，读起来很有兴趣。在《读书续记》上册中，有一则是批评商务印书馆的。文中说民国三年（1914）教育部命蒋宰堂审查商务印书馆所编的许著《国文评注》。蒋因事不能，托马代校。“余立援笔抉其讹谬者百数十事（似止第一第二两册）。后此馆又寄《词源》样本于余。样本仅数页，余亦指其谬者若干条，为补常见者数百条。张菊生见之索寄馆中，谓当属依改。今年夏有《日用百科全书》者，余得之即随手翻阅，其第六编哲学类《中国哲学史》第六节的近世期之概观有云……此一段文字仅百余字耳，而其谬已可屈指数。……此种疑误后生之书，乃出之中国中最有名之大书店，不知教育部负责审查之责者，亦目极否耳！”商务名声老大，编书竟亦如此粗疏，实出意外，而商务印书馆肯于将这条笔记一字不易地收入本书，不怕出丑，亦算大度。这事不失为出版史上的一段掌故。

马先生的《读书续记》还有卷八至卷十五，是稿本，共八册，未及刊行。听说这八大厚本原稿仍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未知何时才能公诸于

世。为什么这么多年竟无人动议印它出来？

上海书店原名上海旧书店，就在福州路古籍书店的对门。如果不见外的话，我可以说是它的老主顾了。我在这里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换句话说，我在这里得到过不少买旧书的乐趣。

这一回我在店内没有碰上“鬼”，却有幸遇到了“书之神”。访书之际冥冥中似有一位“书之神”在暗暗地助我一臂之力，说来可真有点神了。

二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东安市场买到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译文丛刊”之二《祖国的土地》一书，1941年5月出版。我的老领导林淡秋同志参加了丛刊的编译工作，楼适夷、陈冰夷、蒋天佐、辛未艾、蒋锡金、金人等也都是译作者。二十几年来我访求其他各辑，知道一共出版了四辑，甚至还开列书单请京沪两地旧书店代配，一无结果。这次在上海书店也没想到会碰上这书，事先连想也不曾想过。然而，第一天到了旧书店便在书架上翻到了丛刊之一的《良心丢了》，1941年4月出版，虽然书品欠佳，我还是高兴地拿在手中。这样不是全书已得其半了吗？就在这一辑里便有淡秋同志译的苏联小说《贵族的子孙》一篇。过了几天我又来到书店，在台子上摆的旧书堆中竟然发现了丛刊之四《孩子们的哭声》，1941年7月出版，书品较好，显然这不是从前一位读者手中流散出来的。我欣慰无比，洋洋自得，以为四本之中已得其三，距离完璧的目标所差无几了。藏书也像集邮，我也有求全的癖好，其实凑全了又当如何。过了几天，我下午即将北返，趁上午办事的间隙又走了一趟旧书店。没想到竟在乱书堆中又拣出了一本崭新的丛刊之三《神圣家庭》来！1941年6月出版。这本书经历了四十五年，好像不曾被人翻动过，封面上蓝色的古典花纹，优美的钢笔画插图，以及那浑厚有力的美术字（一看便知道是出自钱君匋先生的手笔），处处吸引着爱书的我，捧在手中犹如完成了一段长跑，又如一个在野外从事挖掘工作的考古者，突然发现了上千年的国宝，当时的心情实在难以名状，真想失态地大声欢呼。我想告诉周围的陌生人，不知他们是否相信世间会有这么巧合的事？难道这几本旧书不是专门等待我这个北方来客？为什么不被别位爱书者发现？为什么只出现我缺少的这三本？再多一本也没有？为什么这三本书分三个时间三次被我购得？一切都是那位“书之神”安排的吧。她让那分散了几十年的四本书，像一家人似地团聚在一起了！

我在上海书店还找到一本久想一见的书。那是窄条本、灰色封面的一本小书，田间的《未明集》，1935年12月上海“每月文库”社出版，印数一千册。书前有王淑明的序。意外的这还是一册作家的签名本，扉页上写着：“溶华我兄存念田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田间同志去年病逝，他的字我熟悉。他青年时代的字写得工整，不像晚年那样龙飞凤舞，难以辨识。这位受书者“溶华”，是李溶华，当时也是一位写诗的青年。

没想到，第二天去书店，又翻到一册绿色封面的书，恰是李溶华著的小说集《正反合》。这是一部中篇小说集，1936年8月万人出版社出版，为“绿色丛书”之一。这套丛书中还有吴奚如、周楞伽等人的作品四种。诗人李溶华还有小说集行世，以前不知道。这本《正反合》究竟写的是什麼，客舍中无暇看，只好留待北返后再说。作家李溶华的身世不明，新文学史上不知有多少过来人都已被人遗忘了。

在旧书堆中发现各种话剧剧本不少，有不少书上都有鲁思的签名，证明他的藏书比较集中地流散出来。他是前几年故去的，柯灵同志为他写了一篇

非常有感情的悼文，画出逝者不求闻达，默默劳作的高尚品质。上架的旧书中有他写的剧本《十字街头》、《狂欢之夜》等，我挑选了几册未藏的，包括有李健吾先生签名赠他的剧作集《十三年》。这是巴金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小丛刊”之一。

买到一册书品极好的田汉改编的托翁名著《复活》。这是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12月出版的第二版，印数一千五百册。本书初版于同年9月，印数也是一千五百册。不出三个月，前后印行了三千册，这在当时已是令人眼红的印数了。

买得田汉改编的《复活》以后，又从旧书堆里翻出一本夏衍改编的《复活》。我早已收藏有夏衍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复活》，这个版本是1946年1月上海据重庆美学出版社土纸版重印的第三版。我很喜欢这一版本的封面木刻，后来知道是丁聪作的。夏衍在改编托翁的《复活》时，显然已经读了田汉的改编本。他在“改编后记”中说，他没有把“寿昌兄那样多采地描绘了的土地问题放在这改编本的主位。”这也是见仁见智，属于改编家的眼光有别，其间经验和改编的得失，改日似可写一书话。

几天来每次到书店，总能碰到上海的一些朋友。前天见到黄裳、丁景唐，昨天听说吴德铎、魏绍昌也来了，还问起我，可惜我昨天未到。我见上海孤岛时期赵景深编《戏曲》杂志一套，小开本，价奇廉，因已有藏便向黄裳推荐，他即购下。他从书架取下有杜国庠签名的书一册给我，听人劝吃饱饭，我乐而收之。今天又见到倪墨炎、陈子善、胡从经三君。胡君即将赴日访问仍赶来买书。他连解放后版的《韬奋文集》也抱在怀里，又兴高采烈地找到一本魏如晦的剧本《碧血花》，上面还有作者的签名。他问我受书者周起是什么人？作者签名是我所熟悉的阿英的亲笔，周起当年是话剧演员，上海沦陷后演过不少电影，后来是销声匿迹了。

陈君告诉我，他连日来也得到作家签名本两册，一是谢六逸的，一是钱歌川的。又说，他之搜集作家签名本，还是受到我的影响。真是罪过！

北归前到大陆新村去看了赵家璧先生。一走近这地方，三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风云变幻立刻笼罩了我的心头，当年鲁迅先生正住在这里。

“文革”以前，我去过赵先生家，在溧阳路。现在搬到大陆新村来，是“落实政策”时他自选的地方，这里面自然也包含着对鲁迅先生的一点旧情。

赵先生正在家中准备写回忆茅盾的文章，书桌上摆满了有关的书刊资料。我随手翻开一本土纸书，是重庆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茅盾著散文集《时间的记录》。这未免令我感到新鲜，因为我只见过1946年11月上海大地书局的印本，我收藏的正是此本。赵先生遂即翻开土纸书让我看，扉页上有茅公用毛笔书写的送给叶圣陶先生的签名。这是书店新近为他找来的珍本。原来此书在重庆刚刚排印好，日本帝国主义即投降，市面上仅售出六百余册，存书及纸版全毁。因此重庆土纸本的《时间的记录》坊间极少见。这土纸本内还收有茅公写的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两篇，因战后误传胡先生在南洋逝世，有好几位朋友都写了悼文。郑振铎当时也写了。我所藏的海“大地”的印本中，作者已抽去了这两篇，并增加了新作七篇。新文学也要讲究版本学，这又是一个例证。战后出版的这套“大地文学丛书”，编委共五人，计：茅盾、叶圣陶、洪深、郑振铎、郭沫若。除了茅盾的《时间的记录》，似乎只出过洪深的一本《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五位编委，现在仅叶老一人健在了。

这次沪上所得一共寄回四个邮包，随身带的旅行包也装满了书。进了机舱举手往行李箱放包时，空中小姐过来帮忙，诧异地相问：“这么重！什么呀？”

我说：“书。”

“书！”她重复了一句，嫣然一笑。

这真是美好的一笑，坐下来让我舒服了好半天。

1986 年岁尾

新文学的线装本

唐弢先生在他的《书话》中，写过一篇《线装诗集》，讲的是“五四”以后的新诗集以线装的形式出版，包括某些译诗集在内。唐先生还以刘半农的《扬鞭集》为例，说到当时上海的进步青年对此不以为然，斥为陈尸人的装束。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那是指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们的批评，即潘汉年、周全平等人的看法。唐先生举出这类线装新诗集还有俞平伯的《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于赓虞的《晨曦之前》等。其实他没有提到的还有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林庚的《冬眠曲及其他》三种，都是三十年代中期的新诗集，正是一时的风气。后两种，还是由琉璃厂的文楷斋木刻雕版，比铅字排版更加古色古香。这几种版本我先后得藏，正可为唐先生的《书话》作一补遗。

此外，1932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曹葆华诗集《落日颂》，虽然用铁丝装订，不是纯粹的线装本，但是用宣纸印刷，磁青的封面上还贴有书名签条，追求的仍是线装书的风味。扉页上印着：“给敬容没有她这些诗是不会写成的”。敬容，当指“九叶派”的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女士。他们是四川同乡。我的藏本还是曹葆华签名送给萧乾的。

四十年代初，王统照先生的译诗集《题石集》，自费印行，也是铅印线装本。不过不是白话新诗，用了旧体诗词的形式。

以线装印的现代小说，我只见过滕固的《迷宫》，1926年8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厚达二百余页，用的是粉连纸，拿在手中却很轻，这是作家的第二本创作集，共收短篇小说12篇，其中一半选自他的第一本小说《壁画》。《迷宫》封面原有红色洒金的书名签条，可惜我的藏本只残存一角。

1932年6月北平青年作家邓承勋的话剧选集《红酒》也是线装本。这类自费印行的线装本新文学书恐怕还有。

林语堂的杂文集上下两卷的《大荒集》，线装粉连纸印，生活书店1934年6月初版，书签林语堂自题。1933年章克标出版的《文坛登龙术》，上下两册，也是粉连纸的线装本。绿杨堂藏版，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我收藏的是1934年的第3版。

俞平伯先生的散文集《燕知草》，是一部精美的线装小书。用洁白的宣纸印刷，版心加框，书有包角，丝线装订，纯然是民族装束，再加上丰子恺先生的彩色插图，朱自清手书的序，知堂手书的跋，实在令人爱不释手。新文学家中讲究书籍装帧艺术者，俞先生也算一位。书分上下两册，1930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78年，我以初版本《燕知草》的下卷，请俞老题字留念。他以毛笔在扉页上题道：“五十年后重见此篇感叹戊午春”，下面是名印。当时俞老奇怪，为何不见上卷？其实这是我耍了一个小小的“阴谋”。因为这也是一部签名本，上卷扉页内留有俞老的墨迹：“颉刚吾兄正弟俞平伯”，并印。这个签名代表了两位学人半个世纪以上的交谊，彼此又都是“五四”时代的名人，若果讲起他们的故事，恐怕三天三夜也不能罢休。我担心俞老见了会问，顾先生的藏书何以会流落到街头旧书肆？怕老人为此伤神，于是我收起上卷，只送下卷。尽管俞老提笔时曾经问了一句，在不得要领之后，也就没有再打破砂锅问（问）到底了。

当然，谈起线装的新文学书，还有刘半农编、北平星云堂出版的《初期

白话诗稿》，以及许广平印的《鲁迅书简》和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是不是仅止于此了，我不敢把话说绝。因为有的作者出于个人的偏好，备好宣纸，到印刷厂抽印几本，然后用线装订成，作为自留本也是很容易的。黄裳兄的《旧戏新谈》，市上所见的是开明书店的平装报纸铅印本，他却自存了一册宣纸印的线装本。选编后记

姜德明

我开始写书话是在六十年代初。

那时我编副刊已好几年，一边请唐弢先生写书话，一边描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到了“文革”开始，各地纷纷揭发本地的《燕山夜话》，我给天津晚报写的专栏《书叶小集》榜上有名。天津想见报公开批判，幸有我们单位几位贤明的领导不同意，因而拖了下来。运动多变，又开始对“反动路线”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也就顾不上我了。若果批判我，说不定还会揪到天津去，遭此大辱，也许我的身家性命难保，想想真后怕。写书话竟可获罪，我事先万难预料，现在的青年又怎能理解。

十年噩梦后，我重又访书并写起书话来。从八十年代初已先后出版了《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燕城杂记》、《书廊小品》、《余时书话》、《梦书怀人录》、《书摊梦寻》等九本书话集，这不能不说是欣逢盛世，社会到底进步了。切盼旧时文字狱的阴影再也不要卷土重来。

至今为止，我仍认为唐弢先生写的书话最有魅力。当然，光是模仿也不行。如今，人们要想翻看一些新文学的版本更加不易，有很多爱书的青年朋友连毛边书都没见过，因此，我写书话时有意多介绍一点书的内容，以补读者不能见到原书的遗憾。书话的形式无法统一定格，文章长了亦未必不好，可书话仍以篇幅短小隽永为宜。写得精粹又谈何容易！这次，我从前述几本拙著中编成这本书话选集，顺便对某些文章作了删节，个别的已近于改写，目的想尽量剔去枝蔓，不至累赘。好在原书大部分已绝版，不再重印了。另有若干近作则是第一次收入书中。

书话写的愈多，愈有不敢下笔的顾虑，生怕读者和编者不以为然。因为时代相距日远，访旧书，谈版本，类似玩古董了。如今要找旧版书得去拍卖市场，写书话岂非诱人下海！想到这里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

1997年春北京

